

瞿秋白 年谱新编

QUQIUBAI NIANPU XINBIAN



周永祥/著

学林出版社

B4507

大正
44

周永祥 / 著

學林出版社

瞿秋白年譜新編

(沪)新登字113号

责任编辑：柳肇瑞

封面设计：鲁继德

暨秋白年谱新编

周永祥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发行者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插页 4 字数 313,000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0510-708-4/K·46

定价：软精装7.95元

说 明

一、本年谱纪年采用公历，在括号内注明农历。一般只注“年”，不注“月”、“日”。

二、本年谱基本上按一日一事立目。有些跨日的与谱主关系密切的重大事件，区别不同情况，或综合后立目，如“五四”、“五卅”等；或分作若干条立目，如中共“六大”、共产国际“六大”等。

三、本年谱的纪述，以时间先后为序。有月无日者，采用“上旬”、“中旬”、“下旬”、“上半月”、“下半月”、“本月”等字样，依序排列，“本月”置于月末（若知其事在某事之前或某事之后者，仍以先后为序）；有年无月日者，采用“春”、“夏”、“秋”、“冬”、“上半年”、“下半年”、“本年”等字样，依序排列，“本年”置于年末。

四、本年谱记述谱主的活动，一般均省略主语。

五、本年谱所反映的历史背景，一般不注明资料出处；属谱主生平活动者，尽可能注明其出处。资料第一次使用时，详细注出有关各项内容；以后使用时，则一般只注出作者、书名（或篇名）、页码，其他各项从略。

六、本年谱所反映的谱主的作品，凡原来署名“瞿秋白”、“秋白”者，一律不标出署名；凡原来以笔名发表者，则尽可能注明其署名。

DP 87/26

七、本年谱对谱主的某些作品，尽力作简要的介绍和评述，以供读者参考。涉及译作中的外国人名，年谱正文均用今译名，引文保持原译名。

八、本年谱对一些有关的人物、事件作必要的注释。有诸说并存者，取其一说，另加注说明。

九、有些重要活动，如党内的会议等，谱主肯定参加，但因未见资料根据，只能作历史背景列入。

十、书后附有《本书参考资料举要》。

序

丁景唐 王铁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多以后，毛泽东同志曾为筹备编纂《瞿秋白文集》写了亲笔题词^①。题词写道：“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岁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不久，1953—1954年间，冯雪峰主持编辑出版了反映瞿秋白在文学方面战斗业绩的《瞿秋白文集》，并在序言中作了中肯的评价。到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二十周年纪念日，在瞿秋白的遗骨安葬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的庄重仪式上，陆定一同志代表党中央作报告，称颂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家和宣传家”，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但是，在很长

^① 这份题词，写于1950年12月31日。当时未公开发表，现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手迹插页，刊入1985年6月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和1987年3月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的扉页之前。

时间内，我们只从瞿秋白在文化战线上的功绩，进行介绍和评价。对瞿秋白的光辉业绩缺乏全面的了解，自然也难以作全面的深入的研究。特别在“文革”的空前浩劫中，瞿秋白的历史地位不仅受到怀疑，更被大肆讨伐，全部抹黑。瞿秋白不能被人了解或者被反对，有诸多原因，最主要的是他在生前受到王明路线的打击、受到“左”的路线的干扰，他的著作被反动派查禁等等，另有一个原因，是瞿秋白本人的思想、性格和气质不为一些人所理解。至于在反对瞿秋白的人们中间，无疑有不少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或怀疑论者，另外也有受到蒙骗又未能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的正直、善良的人们。1980年，瞿秋白终于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给予平反，洗刷了他在“文革”中被诬加的“叛徒”罪名。1985年，在他就义五十周年之际，杨尚昆同志代表党中央在纪念会上讲话，肯定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这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全面的、崇高的评价。同时，在瞿秋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流血牺牲的长汀，重新建立了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在北京八宝山恢复了烈士墓地。

要全面地、准确地了解瞿秋白，除了需有清明的政治环境，正确的思想指导和方法外，还需要有充分的、系统的史料。早在1959年，曾有了景唐、文操（方行）合编的《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①出版。这本书得到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支持帮助，收入了当时能够搜求到的瞿秋白包括政治理论和文学方面在内的篇目和书目。虽然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遍收瞿秋白全部著译目录，缺漏尚多，但不失为一本可以提供人们进行深入研究的工具书，从而也能窥见他作为无产阶级理论家和宣传家的基本面貌，为全面、深入地

^① 《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初版，10月再版，内部发行。60年代香港有翻印本。

研究瞿秋白提供了线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研究瞿秋白的新阶段，关于瞿秋白的研究资料、论文、著作不断涌现，还出版了前所未有的三部各有特色的瞿秋白传记，常州瞿秋白纪念馆出版了《瞿秋白研究》专刊 3 期，长汀也编印了《浩气贯长虹——纪念瞿秋白就义 50 周年》纪念集。其间，从 1985 年起，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指导下，成立了新的《瞿秋白文集》编辑机构，整理出版新版《瞿秋白文集》，分为“文学编”和“政治理论编”，陆续出全了文学编 6 卷，政治理论编 1 至 3 卷（4 至 8 卷待出）。随着新版瞿秋白遗著的出版，随着革命前辈李维汉、陆定一、伍修权等同志回忆录的发表，也随着许多研究论文的探讨，人们对瞿秋白的认识，是不断地深化了。

在党中央为瞿秋白烈士作出平反结论，恢复了名誉以来，在一些研究论文中，从多方面分析瞿秋白在牢狱中写的《多余的话》，驳斥了“四人帮”的诬陷，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多余的话》现有当时别人的抄录本和 1937 年《逸经》（上海）上的刊本。对《多余的话》这篇在牢狱中特殊历史条件下写成的文章，因各人的理解不同，认识也有不同。我们觉得陆定一同志发表在 1991 年 3 月 13 日《人民日报》的《陆定一文集·自序》里的一段话，最能帮助我们理解《多余的话》中“为什么情绪消沉”的问题。陆定一同志说：“我现在认为，这不是情绪消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上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我们觉得这才是我们正确理解《多余的话》的要点，理解瞿秋白同志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他高度的革命使命感和由此而生的自责，他对王明集团的愤懑，他对自己身上残留的旧文人习气的严格解剖等等。有的文章离开了这个中心点去研究它，这是值得

商榷的。要全面地认识和评论瞿秋白，只能根据他一生的多方面的实践活动和五百万言的著述。而这，就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导，不断加强自己的理论学习，需要有耐心，长期刻苦努力，付出艰辛的思想劳动。

为瞿秋白编写一部年谱，是一件帮助人们全面地系统地了解瞿秋白的极为重要的工作，也是一件颇为艰苦的持久的工作。周永祥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就着手编撰《瞿秋白年谱》，于1983年4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正文约9万字。出版以后，获得社会好评。但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搜求资料不易，尚嫌单薄，缺漏亦多。何况瞿秋白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生活、战斗的历程却十分复杂、丰富、多变，要编出比较完善的年谱，更需较长的时间。周永祥同志在年谱初编出版以后整整十年的时间里，充分利用现有的较好的条件，再接再厉，孜孜矻矻，重行补充订正编写。他更仔细地、全面地研读瞿秋白的著作，其中包括近百篇未曾发表的和只在内部油印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信件、会议上的发言等等，又参阅了二千余万字的资料，找到许多别人尚未发现的材料，复经他深思研究，终于完成了这本《瞿秋白年谱新编》，篇幅达30万言，已是又一部新著了。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虽然看到出版界一度难以出版学术著作的不景气状态，但为一种庄严的使命感所驱使，始终坚持收集材料、艰苦编写。他的治学态度严谨，在编撰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肯定了瞿秋白的功绩，也不讳言他的缺失，力求使年谱将瞿秋白的真实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近年来，有关瞿秋白的资料不断有所发现，为信息交流所限，这本年谱也难免有个别遗珠之憾。尽管如此，这本新著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仍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它的出版，将十分有利于今后瞿秋白研究的深入，对一般的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也具有参考价值。并且，瞿秋白年谱，除这本以外，迄今仍无第二本，因而更值得我们赞许。

我们庆贺这本年谱能获得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从而能够得到出版，与读者见面。对此，我们作为从事瞿秋白研究者同样感到庆幸。想来读者在读完这本年谱之后，也会有此同感的。

1991年9月，上海

目 录

序.....丁景唐、王铁仙(1)

年谱正文

- 一八九九年.....(1)
一九〇〇年.....(5)
一九〇三年.....(6)
一九〇四年.....(7)
一九〇七年.....(8)
一九〇九年.....(9)
一九一〇年.....(10)
一九一一年.....(11)
一九一二年.....(12)
一九一三年.....(14)
一九一四年.....(16)
一九一五年.....(17)
一九一六年.....(19)
一九一七年.....(23)
一九一八年.....(25)
一九一九年.....(26)

一九二〇年.....	(31)
一九二一年.....	(50)
一九二二年.....	(72)
一九二三年.....	(84)
一九二四年.....	(115)
一九二五年.....	(139)
一九二六年.....	(173)
一九二七年.....	(196)
一九二八年.....	(246)
一九二九年.....	(274)
一九三〇年.....	(287)
一九三一年.....	(301)
一九三二年.....	(327)
一九三三年.....	(349)
一九三四年.....	(371)
一九三五年.....	(383)
本书参考资料举要.....	(403)
后 记.....	(408)

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诞 生

1月29日(农历戊戌十二月十八日)^① 诞生于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今属常州市)^② 青果巷86号八桂堂天香楼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宗谱中名懋森,乳名阿双,学名双、霜,自号雄魄、铁柏、铁梅、漆梅。中学后期改双为爽,字秋白。笔名和别名颇多,曾用维它、巨缘、屈维它、双林、维摩、斯特拉霍夫、林复、史铁儿(或史铁尔)、狄康、维嘉、林祺祥等等。^③

① 因在春节前,故按旧历为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

② 阳湖县于辛亥革命后,并入武进县。1949年4月解放后,武进县划归常州市。故有人称瞿秋白是武进人,或常州人。

③ 丁景唐、文操:《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初版,10月再版;《常州中学校友会会员录》,民国六年九月刊;《瞿氏宗谱》,民国二年癸丑重修;《访问羊牧之先生记录》,1980年6月13日。按:据丁景唐的《瞿秋白笔名、别名集录》(见《瞿秋白研究文选》第31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所记和考证,瞿秋白笔名、别名还有:犬耕、秋粟、史维它、双莫、陶畏巨、馥、颀、维、热、血、沸、腾、了、宿心、它、M·君、美夫、之夫、一天、屈意、Doulon、启凡、樊梓、樊梓生、董龙、陈笑峰、司马今、Smakin、V·T、J·K、史维、易阵风、范易、易嘉、范易嘉、文尹、A·F·T·、范亢、宋阳、向茄、向茄、华靖、静华、卓乐欧、魏凝、维宁、何苦、乐笑、干、何家干、子明、余铭、洛文、何凝、疑冰、疑众、宜宾、萧参、陈途、商霆、H、商霆发、陈节、史步昌、史杰等等。

瞿秋白诞生的年代,正是“中国史上的新纪元”,清王朝昏庸腐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中国社会……疾然翻复,变更的倾向,已是猛不可挡”。^①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不久,袁世凯篡权夺国,中国仍旧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痛苦深重。瞿秋白的早年,特别是“幼年的社会生活,受这影响不小^②”。

祖父廷仪(1837~1882),又名酉同,字贞甫,国学生,兼袭云骑尉、同知衔江西候补知县、云南白盐井大使(未就任)。^③

叔祖父廷韶(1838~1903),字赓甫,号舜石,曾在直隶、河南做官。同治庚午(1870年)科顺天乡试中式举人。同年赴湖北,在湖北做官30多年,官至湖北按察使、湖北布政使,辅佐两湖总督张之洞办理新政,^④以书画、篆刻著称。

父亲世玮(1875~1932),字稚彬、稚宾,号一禅,道号圆初、园初,以字行。有“国学生、浙江候补盐大使”等虚衔,曾长期无业,在家侍奉疯瘫的母亲。好技击,擅长山水画,喜读医书,习黄老学,信奉道教。^⑤

母亲金璇(1875~1916),是一个娴淑的女性,字衡玉,江苏江阴西乡大岸村人,后家迁至江阴贤庄。其父金城,字心芴,曾任清候补广东盐大使。衡玉自幼聪颖好学,通晓史书,爱好文学,擅长诗词,对瞿秋白早年的成长,有极深的影响。她经常给瞿秋白讲解中国古诗词,如李白的《静夜思》、张俞的《蚕妇》、汉乐府《焦仲卿妻》(《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名篇及《聊斋》中的故事。^⑥瞿秋

①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5年。

③④ 《瞿氏宗谱》。

⑤⑥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

自从这些作品中受到不少感染。

四伯父世琬(1866~?),系祖父廷仪的长子,叔伯中行四,故称四伯父。原名世瑄,字薛斋,附贡生,兼袭云骑尉、知府衔升用同知。清末历任浙江桐乡、山阴、常山、长兴、黄岩、嵊县等县知县;民国成立后,历任江苏丹阳、泰兴知事。因祖母由世玮侍奉,世琬每月给世玮寄大洋约50元,成为瞿秋白家主要的生活来源之一。^①

五伯父世璜,叔伯中行五,早故未娶,瞿秋白为其嗣子。^②

六伯父世琨,叔伯中行六,字逸传,日本法政学校毕业,曾任法政学堂提调,婚后早故无子,瞿秋白二弟云白为其嗣子。^③

大姑母,嫁江阴贤庄金逸亭(曾任广东按察使)之孙金翰如。每年大姑母家要接济瞿秋白家柴米,也是瞿秋白家主要的生活来源之一。^④

二姑母,嫁湖北黄陂周世鼎,字福孙(翰林院编修,山东巡抚周福陔之孙)。^⑤

瞿秋白共有弟妹七人:

大弟懋焱(1902~1964),小名阿耘,后改名昀白、云白。北京解放后,在北京某中学教授俄语。^⑥

二弟懋鑫(1904~?),小名阿兴,七八岁时病死。^⑦

三弟懋森(1906~1929),小名阿森,后改名景白。^⑧1925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被瞿秋白带到上海大学深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后任上海曹家渡区团委书记。1927年3月赴武汉,参加党的工作。1928年去苏联进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原名中山大学)读书。

①②③ 《瞿氏宗谱》;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霜痕小集》(《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访问羊牧之先生记录》。

④⑤⑥⑦⑧ 《瞿氏宗谱》;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王铁仙:《瞿秋白论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

四弟楸垚(1909~?),小名阿垚,死于山东。①

小弟楸穀(1913~1944),名銓,小名阿谷,后改名坚白,又名谷生。1926年杭州志诚小学毕业。1929年在杭州钱塘门辞海编辑处当小职员。1931年以后,先后在浙江淳安、嘉善、镇海等县县政府当职员。1938年到汉口。不久,由徐特立介绍转往延安进陕北公学第3期第25队学习,又进抗日军政大学。后分配在太行山地委调查研究室工作。1944年日本侵略军大扫荡时,牺牲于武安百草坪。②

大妹铁群(1900~1981),小名均均,又名群群。③

小妹红红(1908~?),三、四岁时,患肺炎病死。④

①② 《瞿氏宗谱》;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王铁仙:《瞿秋白论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

③④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一九〇〇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一 岁^①

八桂堂人口繁衍,家道中落,瞿秋白一家由八桂堂迁至附近的乌衣桥(同年10月軼群在此诞生)。仅住几个月,因屋小又搬至城西织机坊(后称西大街)庄氏星聚堂九皋楼下祖母的娘家。^②

① 此为周岁(按当年虚岁减去二),以后年份类推。

②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一九〇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四 岁

7月27日 叔祖父廷韶(虞甫)在湖北病逝(时由湖北布政司使升巡抚,未到任)。10月间,家眷扶柩回籍安葬。^①

① 《暨氏宗谱》。

一九〇四年(清光绪三十年·甲辰)

五 岁

入庄氏塾馆读书,直到8岁时转学。塾馆在星聚堂(常州西大街星聚里)九皋楼前院新厅。塾师是庄怡亭先生。^①课本有《百家姓》、《神童诗》、《千字文》等。

^① 《庄怡亭儿子庄隆夫妇的回忆》(1980年6月14日)。

一九〇七年(清光绪卅三年·丁未)

八 岁

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 在家中走廊里正在看《三国演义》时,忽然听见哗唧唧的一声响,象是整桌的碗盏都被打翻在地。接着就是瞿秋白父亲的骂声:“混帐东西,办他!拿我的片子,送他到衙门里去!”事后瞿秋白打听到,那被“送去”的人,被打了20下屁股。随便拿一张大红名片可以打人家的屁股,这使得瞿秋白感到非常奇怪,愤愤不平。后来,当瞿秋白看到《三国演义》里张飞大打督邮和张角造反的故事时,就觉得特别有滋味,他想:“你们要打人家的屁股,人家自然要造反,为什么又要叫人家是黄巾贼呢?”①

春 由庄氏塾馆插入常州觅渡桥冠英两等小学堂(今常州觅渡桥小学)初三班读书。冠英两等小学堂为举人庄鼎彝(1855~1909)于1905年2月创办,自任堂长。庄鼎彝,字荃甫,具有维新思想,主张废科举,倡办新学。长子庄俞(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三子庄适(从日本早稻田师范部留学归来),也在该校任教。② 学校课程有国文、算术、博物、生理解剖等。瞿秋白读书勤奋,成绩优异,深得老师称赞,同学仰慕。

① 《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这是1932年6月10日瞿秋白写给鲁迅的信,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

② 张晓萃:《瞿秋白少年时代生活侧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

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己酉)

十 岁

1月 冠英小学堂初小毕业,后辍学,在家自修一年。^①

^① 贺忠贤:《瞿秋白学年考》,《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庚戌)

十 一 岁

春 插入常州府中学堂预科一年级下学期;同年秋,升入本科一年级。该校创建于1907年11月15日。校长屠宽(字元博),留学日本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经常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一般的教员也大多同情革命党。学校课程设有国文、英文、算术、几何、三角、外国地理、外国历史、军事体操等,采用外国教学方法。学校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设置游艺部,内分图画、昆曲、军乐、柔术、标本、园艺、摄影、手工、拳术、器械操、篆刻等。^①

8月 常州府中学堂全校师生赴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的展览。常州府中的展品最引人注目。^②

① 贺忠贤:《瞿秋白学年考》;张晓萃:《瞿秋白少年时代侧记》。

② 张晓萃:《瞿秋白少年时代侧记》。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辛亥)

十二岁

7月 因病未参加一年级下学期的期终考试而留级,休学在家自修。^①

10月10日 辛亥革命爆发。常州光复后,常州府中停课放假,校舍驻兵。瞿秋白听到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非常高兴,独自把辫子剪掉,边跳着边喊着:“皇帝倒了!辫子剪了!”原来他早就对同学张复(后改名张太雷,字泰来)说过,满清鞑虏,奴役我们两百多年,老百姓贫苦不堪,非把这尾巴似的辫子剪掉不行。^②

本年 因家境贫困,不得不违反族规,搬进庙沿河城西瞿氏宗祠。^③

① 贺忠贤:《瞿秋白学年考》。

②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霜痕小集》;《访问羊牧之先生记录》。

③ 杨之华:《秋白同志年谱》(未刊稿)。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壬子)

十 三 岁

1月1日 上午,孙中山由上海乘火车赴南京。瞿秋白与全校师生一起,在校长屠元博带领下,到常州火车站迎送孙中山。^①

1月1日 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成立。不久宣告辞职,让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从此,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人民依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2月 常州府中学堂驻军撤出,军政分府拨款两千元,整修校舍。

4月 常州府中学堂复课,瞿秋白回校复学,继续读一年级下学期。^②

本年 有一次同友人羊牧之交谈《水浒》中的英雄好汉。瞿秋白愤然地说:“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来往好汉的酒保。”可见,当时瞿秋白已经萌生对旧社会的反抗思想。^③

本年 四伯父瞿世琬在泰兴任知事时,一个师爷(武进人)偷

① 冒三:《瞿秋白研究》第156页,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

② 贺忠贤:《瞿秋白学年考》。

③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盖印章放走一名在押的强盗，上司追究世琥的责任。世琥被罢去知事职务，改任沙田局长，俸薪每月仅100元。世琥不谙此道，不久，就弃官赋闲，寓居浙江杭州。晚年，曾在钱塘尹衙门做过一次书办的小官，经济很拮据。世琥于1913年秋天，将母亲从常州接回杭州，不再寄钱给瞿秋白家。^①不久，大姑母去世，诸子分炊，柴米也不再运来。^②瞿秋白家中因经济来源断绝，生活更加艰难。

① 王铁仙：《瞿秋白论稿》第162页。

②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癸丑)

十四岁

在常州府中学堂继续读书,上半年为二年级下学期,下半年为三年级上学期。^①

9月 常州府中学堂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

秋 与同班同学吴南柱^②、任乃闾^③、李子宽^④等人组织一个班会,类似诗社,“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⑤“秋白与任、吴乐此不疲,各存二、三百首,抄录成帙,秋白与任君进步尤速,惜稿早失。三人中唯秋白间亦作词。”^⑥瞿秋白所作的诗作唯有《白菊花》一首,得以流传,诗曰:“今岁花开盛,栽宜白玉盆。只缘秋色澹,无处觅霜痕。”诗中嵌入瞿秋白的名字籍、秋白3个字,反映他追求高洁无畏的品格。这是至目前发现的瞿秋白最早的诗作。此外,瞿秋白对篆刻、绘画、音乐、昆曲,也有一定的研究。

① 贺忠贤:《瞿秋白学年考》。

② 原名南如,又名凌虚,字炳文,江苏宜兴人。

③ 字净叔、希闾,江苏江都(今扬州)人,早故。

④ 名裕基,字子宽。

⑤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页。

⑥ 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烈士》,(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59年第1辑。

秋 父亲世玮征得四伯父同意，到湖北黄陂二姑父周世鼎家做帐房，月薪约 30 元。这是世玮平生第一次外出工作。^①

10月9日至11日 因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正值国庆节，教育部规定全国各学校放假三日。常州各机关、学校、商店、百姓住宅都要张灯结彩，并在灯笼上写着“国庆”两字，以示庆贺。但瞿秋白对袁世凯窃取革命政权十分愤慨，在瞿氏宗祠东侧门前却挂着一只白灯笼，上面写着“国丧”两字。^②后来，他在《饿乡纪程》一书中指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③

本年 屠元博担任国会议员，常州中学堂由童斐(字伯章)继任校长。童斐对元曲、昆腔很有研究，影响了瞿秋白对音乐、昆曲的爱好。

① 王铁仙：《瞿秋白论稿》第170页。

② 杨之华：《秋白同志华谱》(未刊稿)；瞿铁铮：《怀念哥哥秋白》，《文汇报》1980年6月20日。

③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3页。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甲寅)

十五岁

春 在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三年级下学期继续读书。

6月10日 江苏省第五中学全校师生坐船到上海参观展览会。该校同学工艺作品在上海展出后,有80多种展品被选送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其中有瞿秋白用木头制作的汤匙等物。^①

秋 作《志怀》诗。全诗的主要部分已经散佚。仅留存两句:“悲欢原有别,天地岂无私?”抒发家庭悲惨的境遇,控诉旧社会贫富不均,抨击黑暗的旧社会。

秋 升入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四年级上学期。学期終了因病未参加考试而留级。^②

① 张晓莘:《瞿秋白少年时代侧记》。

② 贺忠贤:《瞿秋白学年考》。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乙卯)

十六岁

春 在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重读四年级上学期。

夏 在江苏省立第五中学读完四年级上学期后,因家贫辍学,在家自修。①

中学时代,喜欢读课外书籍、报刊,特别爱读哲学、历史、文学一类的书籍,如《西厢记》、《牡丹亭》、《聊斋》、《花月痕》、《太平天国野史》、《通鉴纪事本末》、《中国近世秘史》、《饮冰室文集》、《仁学》、《群学肄言》、《庄子集释》、《老子道德经注》、《陶渊明集》、《杜诗镜铨》、《李长吉歌诗》、《词综》等等。②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写道:“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历史上的英雄好汉,给他留下了“最强烈的印象和记忆”。③ 有一次国文老师辱骂革命分子为“乱贼”,瞿秋白予以驳斥,因而受到记过处分。④

① 贺忠贤:《瞿秋白学年考》,按:瞿秋白读冠英小学初等班时,每月学费3角,一学期只需缴学费3元。进入常州府中学堂以后,每学年需缴学费30元;学校规定学生一律住校,要交膳费30元;还规定学生每年要统一做夏季和冬季两套学生制服,费用也可观;此外,还有书籍簿本费等。家庭实难供养瞿秋白继续读书,故辍学在家自修。

②④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③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79页。

在校读书期间，与工友费金生（来自农村的青年）结为好友，经常交往，闲谈，帮助他学习文化，以礼相待。同时，经常和同学张复（张太雷）在一起温课，议论时政，抒发胸怀。常州红梅阁^①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

每逢假日，经常跟母亲到常州北门外贤庄大姑母家和外婆家去玩。贤庄清溪环绕，景色宜人。瞿秋白曾同大姑母幼女纤纤（名君怡）交往甚密，彼此产生过“亦即亦离的恋爱”，成了瞿秋白美好的回忆。^②瞿秋白还经常与农民和农家孩子接触，结交朋友，帮助他们车水、放牛、拔草、割麦、割稻等，培养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有一次，瞿秋白拿着他母亲的棉袄等物去孙府弄当店典质，有人问他，天冷时，你母亲怎能不穿棉袄呢？他回答说：“天下冻馁人，何止我母亲，到那时再说吧！”童年的瞿秋白，心中就有天下穷苦人。^③

① 常州古迹，初建于唐末，后遭毁弃；清代重建。

② 幼年挚友羊牧之后来有感于此，作诗一首。诗曰：“可爱环溪溪水清，贤庄少女实倾城。青梅竹马如无意，团扇佳人似有情。尝想青庐能偕愿，却邻白屋未成名。临行信物频频赠，总恨蓬山隔岭横。”

③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霜痕小集》；《访问羊牧之先生记录》。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丙辰)

十七岁

1月初 瞿秋白母亲特意请无锡的外甥女婿秦耐铭一家来到常州,设酒菜招待,拜托秦耐铭为瞿秋白在无锡谋个职业。在此之前,曾几次写信给秦耐铭,都谈及瞿秋白的前途问题,说:“阿双年龄大起来了,他的父亲不管一切,最好跟他姐夫(秦耐铭)在一起,可以研究些学问。”后来,秦耐铭在无锡为瞿秋白谋到一个小学教员工作。①

1月27日 世玮两手空空地从湖北黄陂回到家,意气消沉。②

2月4日 临近旧历年年关,四邻都在欢乐忙年,而瞿秋白家却已经典尽卖光,灶冷甑尘,一无所有,债券累累,债主催逼日紧。瞿秋白母亲陷于绝望之中,遂决意自杀。是日,母亲因不忍儿子目睹其自杀惨状,便催促瞿秋白去无锡,说:“你去看看学校在哪里?可否住宿?以作开学准备。”③

2月7日(农历正月初五) 深夜,瞿秋白母亲一连写下几封请亲友代抚儿女的遗书,趁孩子熟睡,服了红磷火柴头和虎骨酒。次日凌晨,父亲发现母亲腹痛如绞,在床上乱滚,知己服毒。时值节

① 张晓萃:《瞿秋白少年时代侧记》。

② 王铁仙:《瞿秋白论稿》,第172页。

③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日，医院停诊。急忙到别处请来了一个外科郎中抢救，因抢救无效，于当天（正月初六）下午6点钟左右，离开人世，终年41岁。瞿秋白在无锡接到噩耗后，同秦耐铭于2月9日（正月初七），急急赶到家里，跪在慈母遗体前，痛哭不已。父亲向亲戚借了100元钱，买了棺木，草草入殓。因无钱买地安葬，只得置灵柩于祠堂第三进偏西一室，挂起白幔、遗像，立牌位，上写：“金宜人之位”。^①

母亲死后，“一家星散，东飘西零”。母亲“头七”刚过，瞿秋白就跟随表姐夫秦耐铭回无锡，到南门外江溪桥（又名镬子桥）杨氏私立国民小学教书，教算术、图画、音乐。月薪10元。妹妹轶群同弟弟阿谷寄居舅舅金声倡家。父亲世玮携阿珩回湖北黄陂，继续为二姑母家管帐。弟弟阿森和一位许氏阿妈留在宗祠。后来，世玮因二姑父嫌弃其贫困，转往山东平原县、济南，投靠朋友，以教书绘画为生；轶群带领弟弟阿森、阿谷前往杭州的四伯父家。

4月5日（清明节）学校放假，从无锡回家，看望母柩。瞿秋白悲伤地向友人出示他的《哭母》七绝一首，诗曰：“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此时饥寒无人管，落上^②灵前爱子身。”抒发了对母亲的怀念和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后来，瞿秋白深有感慨地说：“母亲自杀以后，我从现实生活中，悟出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自古以来，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父、天主、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孙中山提的‘天下为公’也是平不

①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王铁山：《瞿秋白论稿》。按：母亲灵柩置于祠堂达10年之久。1930年前，当地有关方面将孤柩搬到常州乱坟堆埋葬。1962年，在常州人民政府的支持下，杨之华从《瞿秋白文集》稿费中拿出300元，将灵柩迁葬于常州西郊公墓，并竖了墓碑，上刻：“瞿秋白烈士母亲金太夫人之墓”。下署：“媳杨之华女瞿轶群敬立”。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夷为平地。

② 疑是“落落”之误。

均。可见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①

8月 辞去无锡杨氏国民小学教员职务，返回故乡常州^②。

秋 曾在贤庄小住，并绘了一幅山水画^③赠给表妹金君怡作纪念。画面是：一只小船在滔滔江流中航行，浪花怒溅；岸上是一片茂密苍翠的松林，天空有飞鸟远去。

12月 写信给堂哥瞿纯白，^④准备投奔到他工作所在地武昌。

年底 离开常州，溯江西上，赴武昌——探索新的生活道路，追求人生的真理。

那时，瞿秋白虽有改变环境，发展个性的要求，但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上的限制，因而对前途感到茫然，陷于苦痛之中。在无锡教书期间，他看到学校四周地方恶劣势力，任意欺侮农民等人间的不平现象，感慨地说：“‘人与人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残酷的社会，好象严厉的算术教师给他出了“一极难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社会不能满足瞿秋白心灵的“内在要求”，“于是痛、苦、愁、惨”，所以他说：“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于是，他就“决然忍心舍弃老父及兄弟姊妹亲友而西去了”。^⑤

在堂哥瞿纯白的帮助下，考取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

①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② 瞿秋白《多余的话》附录：《记忆中的日期》。

③ 此画现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

④ 瞿纯白(1889——?)原名常，字纯白，四伯父世璠长子，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法文专修班。曾在南洋方言学堂、上海南洋大学、北京民国大学、清河陆军预备大学任教。当时任职于北京政府交通部京汉铁路局，临时驻武汉办事(同时兼外交部译事)。

⑤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5页。

语。其间，曾到黄陂二姑母家住过一段时间，终日饱览群书，特别爱读《老子》、《庄子》、《资治通鉴》和四书，常常读至深夜。有时绘画、刻印自娱。在表哥周均量^①的启发和帮助下，“对诗词的研究更深入一层”，并引起研究佛学的兴趣。

① 周均量(1894-???)又名君亮，湖北黄陂人，二姑父周世籍(字福孙)的儿子。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丁巳)

十八岁

2月6日(元宵节) 入夜,周均量等邀瞿秋白去看灯。瞿秋白无兴趣,他提议到远郊区的铁锁龙潭去赏月。在铁锁龙潭畔寒空的月光下,瞿秋白高吟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触景生情,转而反复低吟杜甫的诗句:“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抒发了手足之情,思念起寄养在杭州四伯父家的弟妹。^①

春 在武昌、黄陂生活了三、四个月之后,因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条件差、“饭碗问题”也没有解决,便离开武昌,随瞿纯白转往北京。住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羊肉胡同的瞿纯白家(后迁东单东城观音寺草厂胡同)。不久,瞿秋白弟弟云白、懋焄也来到瞿纯白家。瞿秋白到北京后,想进北京大学文学院读书,但瞿纯白无力资助其深造。后来就和常州老同学到北京大学旁听,曾听过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讲课,接受新思想的影响。

4月 根据瞿纯白的意见,应普通文官考试,未取。^②

4月 到天津与久别重逢的江苏常州中学的老同学任乃讷

① 周君适:《瞿秋白同志在黄陂》,《山花》,1981年第7期。按:周君适系周均量的弟弟。

② 瞿秋白:《多余的话》附录《记忆中的日期》,见拙作:《瞿秋白年谱》第16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

(已肄业于北京大学)、张太雷、李子宽(已肄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吴炳文等会晤,大家尽情交谈,并合影留念。

7月1日 张勋复辟,时局动荡。瞿秋白陪瞿纯白的妻儿回黄陂周世鼎家避难。旋即只身返回北京。^①

9月 考入北京政府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今北京东总布胡同23号)^②学习俄语,自修英语、法语,并继续研究文学、社会科学和哲学。该校学膳免费。瞿秋白读书刻苦勤奋,每天学习、工作达11小时以上,常常至深夜两三点钟才入睡。他治学态度严谨,所读的《汉书·艺文志》、《盐铁论》等书,都用朱笔小楷注满眉批,详加考证和评述。在校学习成绩优异,“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作文“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以致名传校内,无人不知!”在俄专学习期间,开始学习和翻译托尔斯泰、果戈里等的著作。曾和俄专同班同学耿济之合译了一本《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由蒋百里主编的“共学社丛书”编辑部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③

11月7日 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领导下,俄国爆发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世界历史开辟了新纪元,也给中国以重大的影响,使人们在“阴沉沉,黑魃魃”的长夜中,看到了人类的新曙光。

① 瞿重华:《大叔秋白生平琐记》,《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

② 俄文专修馆系民国元年由东省铁路学堂改建的,分甲、乙、丙、丁班。瞿秋白系第二届甲班。

③ 沈颖:《关于秋白的一点回忆》,《忆秋白》第1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8月。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戊午)

十 九 岁

阅读大量新书刊,接触进步思想,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他急切地探索新路,丢掉佛经,研究卢梭、狄德罗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进而研读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以及《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开始怀疑和否定原有的观察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渐渐走向真理,走上了光明的道路。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己未)

二十岁

3月2日至6日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者有21个国家、52名代表，列宁出席并主持了这次大会，作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文件。大会作出决定，建立第三国际，定名为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都作为它的支部，并受其领导。

5月4日 五四运动爆发。当时，瞿秋白是俄文专修馆学生会的负责人，威信很高，被推选为该校代表，参加5月6日正式成立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京学联”)，担任北京学联的评议部议员，参与重大事项的决策，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积极组织和领导本校同学参加这场爱国反帝运动，参加了五月四日北京各校学生共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及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英勇斗争，呼吁全国人民“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接着又参加总罢课，进行街头宣传，要求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瞿秋白街头演说，通俗易懂，生动感人，深受群众欢迎。瞿秋白还和其他邻近的学校代表郑振铎(铁路管理学校)、许地山和瞿菊农(汇文大学)等组成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开会，进行爱国活动。瞿秋白成了他们的“主要的‘谋主’”，“起了很大的作用”，“显出他的领导的天才”^① 6月3日，瞿

^①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秋白率领俄专同学同其他学校学生一道，分赴街口发表演讲，宣传爱国反帝思想。北京反动当局采取压制手段，先后逮捕学生约800人左右，瞿秋白也在其中，被关押在北京大学的法科临时拘留所。他勉励前去探望他的同学们说：“你们要继续奋斗，坚持罢课，不达目的，绝不休止。”^① 6月8日，在全国爱国反帝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北京当局不得不很快作出决定，释放全部被捕学生，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瞿秋白随之出狱，但因劳碌过度，开始吐血，患上肺病，一直没有完全痊愈。

7月17日 于北京《晨报》发表《不签字后之办法》。这是迄今发现的瞿秋白首次发表的文章。文章针对巴黎和会上英、美、法等国无视中国的主权和战胜国的地位一事，予以评论，要求北京政府“须有手段、有眼光，勿再蹈此项失败之覆辙”，“万勿再与日本订立自丧主权之条约”，同时又告诫国民，“今日政府万不可靠”，要求各界人士，留学生、华侨、华工亟宜组织起来，行动起来，采取各种方式，力争主权，救亡图存。

8月23日 上午，山东、天津、唐山等地和北京各界联合会的代表，为了山东省发生的“马良祸鲁”事件，于北京山东中学举行集会，决定进行联合请愿斗争。瞿秋白积极参加了这场声援斗争。上述代表们向北京政府呈递了请愿书，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罢斥马良^②各职，严加惩办。下午3时，瞿秋白同全体代表共35人来到新华门，呈递请愿书，要求徐世昌接见，徐不予理睬。下午4时，军警将代表全部捕去。26日京、津学生代表30多人再次请愿，徐世昌仍拒不接见。27日京、津学生二、三千人齐集新华门前请愿，要求惩办马良，释放被捕代表。军警又野蛮毒打学生，并逮捕代表11

^① 温济泽：《瞿秋白同志革命史略》，《烈士传》，苏南新华书店印行，1949年8月初版。

^② 时马良为济南镇守使兼警备司令。

人,数十名群众受伤。30日,在全国一致声讨下,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两次被捕的代表。“五四”以来,瞿秋白由于劳碌过度,又经两次狱中生活的折腾,再次吐血。

9月15日 于《新中国》第1卷第5期发表译作托尔斯泰的小说《闲谈》。1920年收入《新中国》杂志社出版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1集。

11月1日 受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委托,同瞿菊农(远房叔叔)、郑振铎、耿济之等人以北京社会实进社名义创办《新社会》旬刊。该刊开始介绍青年修养、科学知识,后来转向鼓吹社会改造、家庭革命,抨击时政,讨论社会主义。发刊词说:“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新社会》的意思就是想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创造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瞿秋白在该刊物上发表了18篇文章,1篇译作。他的文章很有份量,有力地批判了旧社会、旧思想,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新社会》成为当时反帝反封建的阵地。刊物读者远及四川、两广、东北等地,影响较大。《新社会》被反动当局视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1920年5月1日,该刊出版第19号以后,被京师警察厅封闭了。

11月1日 于《新社会》旬刊创刊号发表《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着重论述了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中失败的经验教训。文章指出:“这一次中国的失败,失败在那里?就是失败在中国人没有坚毅的志向和明敏的智能,不能组织一良好的社会去适应世界的潮流,建设一巩固的国家,去迎合世界的现势。”瞿秋白要求中国人要格外接受这一教训,“赶忙觉悟——真正的觉悟——去改造现在的社会,重建现在的国家”。他根据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明确指出:“新思潮是壅不住的”,“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他要求中国人民,“要有世界的眼光”,“适应世界

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

11月11日 于《新社会》第2号发表《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文章通过对一个绅士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侧面的描写，揭露绅士阶级的腐朽没落的生活，抨击旧社会旧道德。他说，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只“盼望着有一个头品顶戴状元及第的人出来，大家靠着享点福就好了。于是知识阶级里的人，也只望自己能够做到这样一个人就够了，等到差不多到那地位的时候，就可以百事不做，养活一班无耻的同类……就算尽了天大的责任了。”最后，瞿秋白概括全文的中心思想是：“说明旧道德的崩溃和旧制度的动摇”，要“创造新道德，新信仰”。而当时的“急务”是“创造新道德”，其力量“应当居十分之六”；“攻击旧道德的力量应当居十分之四”。

11月16日 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因对现实社会不满，于北京三贝子花园（今西郊公园）愤然投水自杀，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瞿秋白针对此事，写了评论文章《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发表于12月3日《晨报》上。他认为，青年人对现实不满，不应当采取自杀方式。文章认为：“既然觉悟了，就应当预备着受种种痛苦，经种种困难”。不经受“痛苦”和“困难”，就不可能“达到我们改造运动的目的”，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自杀呢？”最后他要求青年人要“深信社会的确可以改良”，指出过去改良成效不显，如同治病一样，只是“药不对症，没有不治之病”。鼓励青年“要细心去观察社会的病源”，“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的研究”。

11月21日 于《新社会》旬刊第3号发表《革新时机到了》，分析了世界进步形势和国内基本状况，指出传播新思想，批判封建旧道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文章说，革新时机到了，中国人若能趁机努力奋斗，“非但中国自身有无穷的希望，就是对于世界也有极大的贡献。”文章还提出了革新社会的具体意见：“一、竭力传播德谟克拉西；二、竭力打破‘君子小人’主义；三、竭力谋全人类生活的改

善；四、到穷乡僻县——远至于西藏、蒙古、新疆——去，实施平民教育；五、实行‘工学主义’，‘学工主义’；六、研究科学，传播科学。”

11月27日 浙江省督军卢永祥、省长齐耀珊密电北京政府大总统、国务院、内务部、教育部：“《新社会》、《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等书以及上海《时事新报》，无不以改造新社会、推翻旧道德为标帜，掇拾外人过激言论，迎合少年浮动心理，将使一旦信从，终身迷罔。”“当此邪说横行，不啻众流就下，防范之法，尤应加严。”12月2日北京政府国务院便密令各省督军、省长、都统、护军使：“此种书报，宗旨背谬，足为人心世道之忧”，“应即随时严密查察。如果与出版法相违，立予禁止刷印〔印刷〕邮寄，毋俾滋蔓，以遏乱萌。是为至要！”^①

12月1日 于《新社会》旬刊第4号发表《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

12月11日 于《新社会》旬刊第5号发表《自杀》、《唉！还不如》两篇简短随感。

12月21日 于《新社会》旬刊第6号发表《知识是赃物》。

^① 《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转引自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第2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1988年3月。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庚申)

二十一岁

1月1日 于《新社会》第7号发表《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揭示妇女在旧社会的悲惨命运，“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桎梏……造成这样一个精神的牢狱把他们监禁起来……他们的聪明才力没有可用之处”，妇女被看成“玩物”，受“轻蔑”，“有许多手足胼胝还吃不饱肚子”，瞿秋白指出“这全是旧宗教，旧学说，旧社会造出来的罪恶。”他大声疾呼：解放妇女决不是小问题，文学家对此应当引起重视，通过“诗词，文章，小说，戏剧”积极反映妇女受歧视受虐待的不幸遭遇，担负起“文学家的责任呵”！

1月1日 北京社会实进会编辑部于西石槽6号郑宅召开编辑工作会议，讨论《新社会》旬刊的改革问题，瞿世英、郑振铎、瞿秋白及许地山参加了会议。会议作出如下决议：“一、注重于社会学术的介绍，每期均应有一篇社会研究的著作（由瞿世英、许地山、郑振铎三人担任）。二、注重于本会会务及服务成绩的报告（议决请本会书记及各部部长逐期送稿来）。三、此后登载的论文，都应该有研究的态度，科学的根据。四、社会上临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应该有严密的批评与指导。五、本报应该逐期尽力的改善，做到纯粹‘社会研究社会批评’的地步。”^①

^① 《北京社会实进会消息》，1920年1月11日《新社会》旬刊第8号。按：经瞿世英介绍，本次编辑会议通过，许地山被吸收为《新社会》旬刊的编辑。

1月11日 于《新社会》第8号发表《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明确指出：“改革社会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而这种社会运动需要一小部分牺牲者，“他们应当没有无限的轻信心，没有极端的感情，不受无意识的暗示，而有积极的怀疑心，有沉静的研究心，有强固坚决的毅力。”为什么要具备这样的条件呢？文章说：“他因怀疑而觉悟，研究的结果就能创造新的信仰，人生观；毅力的坚决就能打破旧的习惯制度。他因此能不受旧社会势力暗示，觉着不得不打破旧的习惯和制度”，这样他就能为了改革社会而牺牲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

1月13日 翻译托尔斯泰著作《告妇女文》、《答论驳〈告妇女〉书》(节录)，3月1日发表于《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5期。

1月21日 于《新社会》旬刊第9号发表《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①叙述他学习李守常的《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的心得和对新村运动的研究。他认为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胜利，指出：“胜败虽然一时分不出来，这种趋势是很明了的——世界的进步着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究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文章最后指出，新村运动是空想的社会主义，是绝对不能实现的，它“仅仅是新式理想的‘桃源’”。

2月1日 北京社会实进会编辑部召开会议，欢迎新编辑郭梦良和徐其湘，讨论《新社会》旬刊编例改进的问题。

2月14日 翻译果戈理1839年所作的独幕剧《仆御室》，并写了《译后记》，当月发表于《曙光》第1卷第4期。瞿秋白在《译后记》中，对果戈理作了简要介绍，赞赏果戈理高超的写作水平，说他被人称为“俄国写实派的第一人”，他“艺术上的本领就在于描写刻画‘社会的恶’而又没有过强的刺激。于平淡中含有很深的意境，

^① 《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系李守常所作，发表于1920年《星期评论》新年号。

还常常能与读者以一种道德上的感动。”瞿秋白又联系中国社会实际，说“现在中国的社会还不算‘恶’吗？”他认为文学的任务应当“以文学的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旧社会习惯。”“现在中国实在很需要这一种文学。”

2月15日 作《托尔斯泰的妇女观》，发表于10月1日苏州《妇女评论》月刊第2卷第2期。

2月 于《曙光》第1卷第4期发表译作《论〈不死〉书》（马德志尼作）。

3月1日 于《新社会》旬刊第13号发表《社会与罪恶》，努力探讨社会问题——功罪的标准，认为功罪“都是以时以地而不同的”，但功罪都有共同的固定的标准，那就是“爱与不爱”。他说，凡是“爱人”，“爱社会而有利于社会”，就是功德；“不爱人”，“不爱社会而有害于社会”或者“社会不爱个人”，就是罪恶。他还认为，“社会的影响，固然有伟大的势力，而个人的意志，也有伟大的势力”，两者“互相抗拒”，“互相迎合”，互相影响的。

3月6日 作《文化运动——新社会》，发表于3月21日《新社会》旬刊第15号。文章认为文化运动和社会改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指出：“真实能做改造社会的——创立新社会的——第一步，只有真正有实力的‘文化运动’。我们所预期的‘新社会’既然不是一篇文章、一部书所能说明的，我们就不能不慎重的思考，讨论研究，试验，实行，传播；直到能直接运动的时候，这第一步才算告终。”文章最后说：“从文化运动——新社会，中间须经历的过程有多少！大家务必要注意才好。”

3月6日至4月初 作《心的声音》，内分：绪言；1. 错误；2. 战争与和平；3. 爱；4. 劳动？；5. 远！。先后发表于《新社会》旬刊第15号（3月21日）、第18号（4月21日）、第19号（5月1日）和《人道》月刊创刊号（8月5日）。

3月15日 夜12点,为沈颖译作《驿站监察史》(普希金作)写序,题为《论普希金的〈弁尔金小说集〉》(收入1920年7月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1集),对普希金及其《弁尔金小说集》给予热情的评价,他用唯塞夫的话说:“这部小说集的艺术上、体裁上的创作,都无意之中,为后来的文学家歌歌里,屠格涅夫,妥斯托也夫斯基,托尔斯泰,开一先河。”他认为《弁尔金小说集》里,《驿站监察史》一篇为最好。他又引用果戈里对普希金的评语,盛赞普希金,说“俄国文学家没有一个人能出普希金之上的”。序文还指出,从普希金的作品中,可以推及中国所需要的文学,中国文学家应当努力去探索,去模仿和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使人人都看得懂,受着新文学的影响。

3月15日 于《新中国》第2卷第3期发表译作《祈祷》(托尔斯泰作)。

3月16日 为《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撰序,热情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国际影响,指出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序言说:“俄国布尔塞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关于对中国的影响,序言写道:“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瞿秋白在序文中还论述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指出:“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他说:“俄国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动影响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紫回推荡,一直到现在,而有他的特殊文学。”

3月 经李大钊的组织和指导，由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等人发起，在北京大学秘密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瞿秋白也参加了这个研究会。该会经常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青年会，或在瞿秋白的住所，秘密集会，学习和讨论问题。

4月1日 于《新社会》旬刊第16号发表《将来的社会与现代的逆势》。

4月3日 翻译法国都德著作《付过工钱之后》，并在文末加上《译者按》，发表于4月11日《新社会》旬刊第17号。

4月11日 于《新社会》旬刊第17号发表《谁的利器？La Grève, le sabotage, 谁知道呢？》，指出各国劳动者遭到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可以通过罢工、怠工进行抵制，而中国农民就没有这种条件。文章说：“可怜！农业国的中国，几千万农人受着军阀，财阀学阀间接直接的强暴侵略，有什么利器——抵制底方法呢？”又指出：“我们农人三年水四年旱，一天够两天短，寅年吃着卯年粮，小地主贷块钱却糶出五担米；山迢水远，东村三家，西村四舍，联合呢，还没有这些闲功夫，罢工怠工呢，自己先挨着饿；哑子吃黄连，受着苦，又有谁知道呢？”瞿秋白对农民寄以深厚的同情，当时，因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他还提不出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

4月13日 翻译德国倍倍尔著作《社会之社会化》，并在译文前写了译者的话，于1920年12月、1921年1、2、3月，先后发表于《改造》第3卷第4至7期。译者对本文及其作者作了简要的评价。

4月21日 于《新社会》旬刊第18号发表《伯伯尔^①之泛劳动主义观》，分析了倍倍尔和托尔斯泰对于劳动的看法有两个不同之点：第一、托尔斯泰“轻视精神劳动”，“反对现代社会的文明”，主张“理性之认识”；倍倍尔主张“努力于科学，使生产方法改善”，“以科学技术的方法增进人类的幸福”。第二、托尔斯泰“主张泛劳动主

^① 今译倍倍尔。

义,又主张无抵抗主义”;而“这一点是伯伯尔最不表同意的地方”,倍倍尔主张进行“激烈的改革运动”,“创造新社会”,赞成“劳农革命”,“消灭资产阶级底垄断‘尊严’和‘精神的财富’”。瞿秋白称托尔斯泰是宗教家和哲学家,而称倍倍尔是科学家和社会运动家。最后指出他们有一个共同观念,即“劳动力和劳动底出产品不是可以拿来‘买’‘卖’的‘货物’,而是供给人生‘需要’的‘东西’,‘大家享用的东西’;不应当有资产阶级来掠夺劳动者底劳动力和劳动底出产品。”

4月21日 于《新社会》旬刊第18号发表《劳动底福音》,热情地歌颂“劳工神圣”,指出“劳动能给人以完全的幸福”,“救治我们的只有劳动”,劳动是“人类的福音”。

5月1日 于《新社会》旬刊第19号发表《世界底新劳动节……中国底新劳动节》。

6月15日 于《新中国》杂志第2卷第6号发表译作《论教育书》(托尔斯泰作)。

8月5日 《人道》月刊创刊号出版。《新社会》旬刊被查封,瞿秋白、郑振铎等人非常愤慨。他们表示要继续坚持斗争,瞿秋白最为积极。他们说服北京青年会,又创办了《人道》月刊。刊名是郑振铎取的。当时,瞿秋白是不赞成这个名称的,但又没有提出别的刊名。后来瞿秋白回忆说:“《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向已经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了,我的辩证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①《人道》发表的《本刊宣言》,虽然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及其伪善的假面具,但没有指出改革社会的正确道路。《人道》月刊只出版了1期。第2期已编好,并登了广告,因编辑部成员思想有分歧,青年会借口没有经费而停办了。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7页。

五四运动以来的一系列社会活动，使瞿秋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渐渐发生变化，开始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后来，他在《饿乡纪程》一书中回忆说：“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朋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但是“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伟大的五四运动使瞿秋白基本上摆脱了消极厌世避世的思想影响，开始倾向社会主义。他说：“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漩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五四运动使瞿秋白“更明白‘社会’的意义”，“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他“无限的兴味”。创办《新社会》、《人道》，又增加了他对社会的感受 and 了解。

8月16日 在李大钊等的倡议和领导下，瞿秋白等的“人道社”和周恩来等的天津“觉悟社”、李大钊等的北京“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团体的部分成员，在北京陶然亭举行座谈会，商议联合活动的问题。大家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宣言提出了在“赤旗”下，“团结合作”、“到民间去”的口号。瞿秋白对“到民间去”的口号是很赞成的。不久，他赴俄途经哈尔滨时，更有所感触，认为在中国急需“往民间去”的先锋队，以创造新的革命力量。^①

8月18日 下午，人道社同觉悟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少年中国学会等团体在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召开代表会议，决议成立“改造联合”的联络组织。^②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24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第2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

② 陈福康：《郑振铎年谱》第3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1988年。

秋 胡政之为聘请天津《大公报》副刊编辑，邀请瞿秋白、耿济之、沈颖等吃便饭。席间瞿秋白与主人胡政之交谈，由时事而及文艺及法国出版的李白诗选译文，大家都惊异佩服他的渊博。不久，瞿秋白与沈颖同赴天津，采访俄人柏烈伟，瞿秋白的俄语，说得相当流畅。^①

秋 《人道》月刊停办后，同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人发起筹建文学研究会。

秋 北京晨报馆聘请瞿秋白、李宗武为驻俄特派员，^②上海时事新报馆聘请俞颂华为驻俄特派员。

10月1日 于苏州《妇女评论》月刊第2卷第2期发表《无产阶级运动中之妇女问题》。

10月1日 《人道》月刊编辑部在青年会召开会议，出席者共26人，周作人应邀参加。

10月初 因即将去俄国，赴济南拜别父亲瞿世玮。一天晚上，瞿秋白和父亲及父亲的朋友共三人在大明湖畔一个草棚下的小酒馆里，叙谈离别之情。父亲深情地叮嘱他：“你这一去……随处自去小心，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身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呵！……”回到父亲朋友家里后，和父亲同榻，又“整整谈了半夜”。次日清晨，辞别了“亲爱不忍舍的父亲”，离开了济南。在车厢凭窗闲望，顿觉人生孤寂，悲凉感慨，想起与父亲远别，不知何时重逢，“家道又如此”，于是想起常州诗人黄仲则的名句，“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当天夜晚到达天津，又去向二表姊全家辞行。他们用白兰地

① 沈颖：《关于秋白的一点回忆》，《忆秋白》，第1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8月。

② 当时瞿秋白在俄专还没有毕业。按：李宗武又叫李仲武。

招待，“痛饮半宵”。第二天返回北京。^①

10月中旬 郑振铎曾对王统照与许地山评述了瞿秋白赴俄考察的行动，说：“他这一走是决定了！……他为什么走？他居心要往这条路上走！他的心意的罗盘针，与他的境遇的四围雾雾，使他要定了决心走这条路！……他这一走，是抱了满腹人生的苦痛走的，是从刻苦与烦闷的人生中，找得出一条死路；也可以说是一条生路……”^②

10月上半月 一天黄昏，外出归来，因远别在即，就同瞿纯白哥、嫂谈家常。后来，瞿秋白忆述了当时赴俄前同哥嫂离别的情况，他说：“在北京整整的住了四年，^③虽纯哥是按‘家族的旧道德’培植扶助我，我又被‘新时代的自由神’移易了心性，不能纯然坐在‘旧’的监狱里，或者有和他反背的意见，纯哥当初竭力反对我到俄国去，以为自趋绝地；我却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论点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从，——现在一切都已决定，纯哥亦就不说什么，勉励我到俄国后专门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辍。”^④

10月上半月 对母亲死时遗下的债务做个“交托”，不要叫人说“是无赖呵”；对旧时诗古文词稿，遵照其父亲嘱咐，作了一番整理，“做个纪念”；又给远在江南的“幼时的小伙伴”，一一“写封信告辞”。^⑤登门向北京的表舅母和幼时“成天的一块玩”的三表妹珊珊道别。^⑥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7~10页。

② 剑三（王统照）：《新俄国游记》，中国大学《晨光》杂志第1卷第3号。

③ 瞿秋白住在北京实际时间为3年半，跨四个年头。

④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6、17页。按：据杨之华的《回忆秋白》一书记述，瞿秋白曾在日记中写道：“到新俄，为舍己救人，自己的死是为千万群众的生。”

⑤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7页。

⑥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0~21页。

10月15日 晚上，去北京饭店俄国远东共和国代表尤林处签出国护照。深夜回来后，又和前来送别的旧友耿济之、瞿菊农、郑振铎、郭绍虞、郭梦良、郭叔奇聚会话别。瞿秋白激动地说：“我现在有了我的故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他还说，已经决定走了，向送别的诸位赠言：“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①

10月16日 清晨，同李宗武、俞颂华共3人一行，早早到了北京火车站。瞿纯白、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及其他亲友都到车站送行。6点半，列车离开北京，驶往莫斯科。当天途经天津，再次向二表姊告别。晚上，“与张昭德及江苏省第五中学同学吴炳文、张太来三位同志抵足长谈”。^②

10月18日 晨，在天津接到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分别从北京寄来的信，及所附的诗。当即复信说：“我们今天晚车赴奉，从此越走越远了。越走越远，面前黑魆魆地里透出一线光明来欢迎我们。”“菊农叔呀！‘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我们此行的意义，就在这几个问号里。”信后也附以诗，题为《去国答〈人道〉》，把自己比作邮差，“来去无牵挂”，不怕艰难险阻，要给人们送来俄国新世界的信息，为“灿烂云华”作出贡献。^③此诗最初由郑振铎加上附言发表于1920年10月25日北京《晨报》。

10月18日 晚十一、二点，同俞颂华、李宗武人3乘上京奉列车离开了天津，与中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副领事刘雯、随习领事郑炎结伴同行。^④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1页。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2页。按：张太来，即张太雷。

③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2～36页。

④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6页。

10月19日 傍晚,列车抵达奉天(今沈阳),下车换乘南满路列车。满洲,虽然“是中国的领土”,但瞿秋白一出山海关到了奉天站,却感到“已经另一世界似的,好象自己已经到了日本国境以内呢?”“奉天站连中国脚夫都很少很少”。他深有感慨地说:“原来日本铁道车站上的中国苦力,他们劳作也受‘日本的’节制的。帝国主义的况味,原来是这样!”^①

10月20日 晨,列车到达长春,瞿秋白等一行,又换乘中东路列车。

10月20日 当日晚八、九点,列车到达哈尔滨。瞿秋白同俞颂华、李宗武三人乘马车前往道里地段福顺客栈住下。当时,苏俄内战未息,“谢美诺夫横梗在满洲里、赤塔之间”,“谢军和赤塔民军剧烈冲突”,“赤塔满洲里中间桥梁也已经毁坏了”,致使火车不通。当时,哈尔滨生活程度相当的高,天气又酷冷。开始,“三人之中不时发生退回北京的提议”,瞿秋白却是坚定不移的。他认为“至于冒险而去,成败究竟如何?”并不是不应当问,而是不必问,或简直是不问。“宁死亦当一行”。他们“商量又商量,决计静候时局,再定行止”。因此,他们三人在哈尔滨停留了50多天。当时,俄国各派社会党人在哈尔滨都有活动。在此期间,瞿秋白以新闻记者身份,作了一些社会调查。访问俄、日居民区,深入大学,接触一些俄国革命党人和劳动人民,彼此交谈中俄文化;还访问俄国新党机关报《前进报》总经理图尔察郭夫斯基、白军谢美诺夫机关报《光明报》主笔;搜集一些俄文书报,调查俄国的工人组织,开始研究俄国劳农政治。“哈尔滨一游”,“得共产党一点空气”,成了“‘游俄’的绪言”。^②

10月22日 作《哈尔滨四日之闻见》,于10月30日、31日发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0~41页。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2~60页。

表于北京《晨报》。这是瞿秋白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新闻报道^①。报道开始记述他们从北京至哈尔滨途经奉天、长春的所见所闻及作者的感想,他说:“途中仿佛经过(中日俄)三国”。文章侧重介绍哈尔滨殖民地化的某些特征。指出十月革命后的哈尔滨,“俄国人的势力衰微,日本人的势力一天盛似一天”。文章说:“满街插着日本旗的汽车、红十字会车、兵车,触目皆是”,日本人开办的“饭店、旅馆、理发馆、大商铺”,也到处可见。但“俄国人非常之多”,大多是过去逃到中国来的,原来“很欺侮中国人”,现在“彼此亦相安些”。文章还指出,哈尔滨由于长期遭受沙俄和日本的统治,当地中国本身的“教育很不发达”,“文化很低”,“市政很糟”,“地方行政很坏”,“盗匪甚多”,“生活程度之高,异乎平常”。最后认为中俄双方有知识的人应组织团体,研究哈尔滨下流社会中俄国人的“实在情况”,“研究彼此互受的影响怎样”。

10月28日^② 作《哈埠见闻中之珥春事件——日本设总领事与张使直接交涉》,发表于11月4日北京《晨报》。

10月 翻译俄国果戈理著作《妇女》,发表于11月1日苏州《妇女评论》月刊第2卷第3期。瞿秋白在译文末尾写了简短的《译者志》。他说:“鄂歌黎^③是写实主义的文学家,晚年忽然一变而为神秘主义派,这篇就是他的神秘派的作品,他深悔当年写实派的作品,有一篇忏悔录,述之甚详。我初看这一篇很有兴味,随手就译了出来,自己看看,觉得太晦涩。然而始终觉着他的意味无穷,所以寄给侣琴先生看看。我只怪我的译笔太拙,抱歉得很!”

11月3日 于北京《晨报》发表《谢军大败后东俄情形》。

① 瞿秋白在苏俄两年期间,先后发表于北京《晨报》上的新闻通讯,约40余篇,16万多字。另有不少通讯,“多被邮局遗失”,甚为可惜。

② 发表时,28日误排为“18日”。

③ 今译果戈理。

11月4日 开始撰写著名的散文集《饿乡纪程》，开篇是《绪言》。指出在阴沉沉，黑魑魑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微细的光明”，盛赞十月革命的曙光，“快照遍我们的同胞”和“大千世界”。瞿秋白申明“往饿乡去”的目的，是“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11月7日 经俄国友人的介绍，参加哈尔滨工党联合会举行的俄国十月革命3周年庆祝会。会场挤满人群，走不进去。瞿秋白同会长商量，到演讲坛上坐下。他亲自听到劳动群众高呼“万岁”，第一次听到雄壮的《国际歌》，听到俄国共产党人介绍关于苏维埃政府、俄罗斯共产党、第三国际和世界革命的演说。会后，瞿秋白等人应邀，参加俄国友人（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家庭晚宴。“屋里放着盛筵，电灯上包着红绸，满屋都是红光，红光里是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肖像。”“大家痛饮欢呼”，亲切交谈。^①

11月7日 作《俄国远东之统一问题》，发表于11月13日、14日北京《晨报》。

11月7日 翻译俄国托摩著作《俄国革命周年纪念》，发表于《曙光》第1卷第6期。

11月10日 晚7点，到哈尔滨俄人所办的劳工大学，听乌思德略洛夫讲授《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史》^②。在哈尔滨逗留期间，瞿秋白常到这里听课。

11月13日 作《赤塔统一会议与右党》，发表于11月20日、21日北京《晨报》。

11月17日 于北京《晨报》发表《哈尔滨之劳工大学》，未署名；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转载了这篇报道，署名秋白。报道简要介绍劳工大学的主办单位，听讲对象，讲演科目及其主讲教授，“听讲者甚多，约八九百人。除工人外，资产阶级亦甚多，拥挤不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61页。

^② 秋白：《哈尔滨之劳工大学》，上海《时事新报》，1920年11月20日。

堪”，但“气象颇佳，沉静严肃”，十分赞赏俄国国民“伟大之气概”。

11月19日 作《远东统一之将来》，发表于11月24日北京《晨报》。

11月21日、22日 经布尔塞维竟党员优亭君的介绍，和友人廖连雅一起访问中东路沿线俄国工党联合会会长戈尔恰科夫斯基。会长同瞿秋白一行就联合会组织、中东路交还中国、中俄关系、俄日关系等问题交谈，态度恳挚。会长认为中东路交还中国、中国收回领事裁判权、取消旧公使和旧领事，都是合理和理所当然的，并建议中国“挑选有纪律的军队护路”。双方都希望早日恢复中俄外交关系。^①

11月22日 于北京《晨报》发表《欧俄最近实况谈》，记述他在哈尔滨访问来自莫斯科的旅客，借旅客之口，介绍苏俄最近的实况。说苏俄已采取措施，改造经济生活，“现在一般农民的生活状况，比革命以前，总算好多了”。关于教育事业，政府规定“全国男女儿童一律都要入学”，实行义务教育，“政府对于儿童，异常优待”。此外，还着重介绍和宣传了苏俄政府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指出：“政府对于一般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和哲学家等都非常爱护。只要他们不持反对之态度，政府对于他们，都是一律的优待。”又指出政府对“有专门知识的技师和熟练的工人”也很重视。

11月25日、26日 于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同俞颂华合写的《两个有党派关系的俄国人对于俄国外交内政矛盾的意见》。这篇通讯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俞颂华写的，后一部分是瞿秋白写的。

11月27日 北京《晨报》开始刊登《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

^① 瞿、秋白，《中东路工党首领之谈话》，北京《晨报》，1920年11月30日，12月1日、2日。

共同启事》(11月28日起,时事新报也刊登了这一启事),宣告国人向欧美遣派新闻记者事宜。启事说:“吾国报纸,向无特派员在外,探取各国真情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亦每因研究困难,愈趋隔阂淡漠,此诚我报界之一大缺点也。吾两报有鉴于此,用特合筹经费遣派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冀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启事公布了已派出和即将派出的特派员的姓名。瞿秋白、俞澹庐(即俞颂华)、李续忠(即李宗武)被列为派往俄国的特派员。

11月29日 作《远东统一与日俄商务》,发表于12月4日北京《晨报》。

12月1日 作诗《无涯》,抒发对人生的看法,要求人们要改变社会环境,认为去“饿乡”是追求真理彻底觉悟的道路。

12月初 为了深入了解哈尔滨俄侨对于中国政府对俄政策的反应,瞿秋白等人连访各方面人物,听取有关俄侨的意见。俄侨对于中国政府停止旧使领的待遇的决定,都认为是“正当的办法”,但认为不应当“放任他们自由活动”;关于中东路问题,都认为“正主人是中国”,应“交还中国”,“不愿意亲日的旧党把持路政,从中暗施伎俩,断送路权于第三国之手”等等。瞿秋白同俞颂华把这次访问所得写成调查报告,以《哈尔滨俄侨之舆论》为题,发表于1920年12月10、11日北京《晨报》,要求中国外交当局慎重考虑俄侨的意见,并“表示明确的态度”。

12月7日 于北京《晨报》发表《俄工党会长对中国之陈情》。^①

12月8日至9日 于北京《晨报》连续发表《哈埠工会联合会会长访问记》,报道访问哈尔滨联合会会长洛拔诺夫的经过,即时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苏俄工人生活得到保障的事实。

^① 本文发表时,没有署名,只注有“俄国特派员通讯”,估计至少是合作的。

12月10日 瞿秋白等一行离哈尔滨北去。瞿秋白高兴地说：“启程了，启程了，向着红光里去！”“向着自由门去！”仍与中国驻莫斯科领事陈广平等3人结伴，乘坐一列专车。他们是“截然两个世界两个社会的人聚在一块，精神上的接触，发生种种的痛感，绝不投机的谈话，费了无限的宝贵的光阴”，但是从领事那里“略知中俄外交以前的经过”。在车上，瞿秋白与俞颂华作了分工：俞颂华“负通信事务指导的责任”，瞿秋白“当竭力帮助”；瞿秋白自己“勉力为有系统的理论事实双方研究”，“研究共产主义，俄国共产党，俄罗斯文化”。①

12月13日 晚上，列车到达满洲里。中国边防处派驻俄军事代表张斯麇中将回国，也到达满洲里，与瞿秋白一行相遇。张介绍了中俄外交关系，说苏俄政府很愿放弃一切帝国时代所侵略的权利，和中国开始友好的谈判，恢复通商。但中国政府畏葸，没有确定的计划方针。他还介绍俄国政府的政策，说“劳农政府在军事时代采严厉的集权制，正在禁止投机商业。”② 这使瞿秋白增加了一些感性认识。

12月13日 和张斯麇同车到达满洲里的还有旅俄华工联合会总会会长刘绍周。③ 刘向瞿秋白一行介绍了许多华侨的情况和俄国的现状。他说，现在俄国经济状况已有好转，“人民生活好得多”，“学校不收学费，儿童公育。可是国家穷困，经费不足，一时也不能普遍，成绩不能十分好。”因而瞿秋白“得知劳农政府的事实上的经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60～65页。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65～66页。

③ 刘绍周于1919年3月初，曾同当时华工联合会莫斯科分会负责人张永奎作为旅居俄国华侨工会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19日，刘绍周又同安恩学列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他多次受到列宁的接见。

济状况。”^①刘绍周还详细介绍了俄国对华外交方针和中俄外交关系的现状。瞿秋白当获悉俄国“确有诚意要和中国联盟”，而中国政府的态度却是冷淡的之后，颇有感触，对中国政府提出了批评，他说：“如此看来，俄国对华政策如此之热诚希望，而中国对俄政策如此之茫漠不定，荒谬矛盾，两方面愈趋愈远。将来中国对俄外交，一定又要发见极大的失策。政府及国民务必及早注意才好呵！”^②

12月14日 于北京《晨报》发表《北大三青年赴俄之旅况》。

12月16日 离开满洲里，进入俄境西伯利亚。^③

12月18日 抵达苏俄远东共和国的新都城——赤塔。因为必须办许多手续，致电莫斯科得复电，再转北京政府，领事专车才能前进，瞿秋白一行3人也须向远东外交部请签护照，所以他们就住在车上，在赤塔逗留了17天。瞿秋白一行3人趁此机会调查赤塔的社会生活，进行新闻采访。^④

12月中旬 一次，同中国驻赤塔副领事葆毅（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在一家戏院看戏，同学劝他“不要到莫斯科去”，另一位对现实不满的俄国女郎也随声附和地说：“可怕得很！可怕得很！莫斯科去么？……”瞿秋白没有理睬他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心理，生来如此”。

12月中旬 到赤塔一居民家庭里，送交在哈尔滨一俄国人托带给他亲戚的东西。瞿秋白在此见着西伯利亚居民生活之一斑。互相交谈起来。主人还热情地招待吃饭。这家另有一客人（属智识阶级）“不断的骂布尔塞维克”，“什么共产主义！布尔塞维克只会杀人”。后来瞿秋白批驳这种诬蔑之词是“智识阶级式的武断的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67页。

② 《欧俄归客谈》，北京《晨报》，1920年12月19日～21日。

③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0页。

④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70～82页。

头脑。”

12月中旬 访问赤塔华侨联合会会长，询问在赤塔的中国侨民问题，了解在西伯利亚华侨的生活。

12月中旬 和俞颂华一道，由一波兰人陪同访问远东共和国交通总长沙托夫，谈及中东路问题时，沙托夫和和气气地说：“中东路，赤塔政府决定主张以条约的形式归还中国，中俄有密切的邦交，必须协力抵抗日本的帝国主义，中东路一旦落于日人之手，大非远东各小弱国之福……。”

12月中旬 辞别沙托夫的第二天，又经那位波兰人的介绍，访问食粮部总长格罗斯曼，格氏坦率、真诚地向瞿秋白、俞颂华解释新政府在食粮问题上的社会政策，赞许“中国为全世界最亲密的友邦”，表示“愿意和中国(结)为同盟国”，还谈及中俄通商问题。

12月中旬 赤塔共产党委员会赠给瞿秋白一行许多书籍杂志，如《俄罗斯共产主义党纲》(即《俄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及《社会主义史》等。这些刊物使瞿秋白“稍稍知道俄共产党的理论”。

12月中旬 在赤塔停留期间，作《中国工人的现状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发表于1921年2月27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第1期《远东来信》专栏。文章分析了中国工人的大多数是由破产的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数量少而且大多是手工业者。指出中国工人身受外国资本家和中国资本家的压榨，甚至比欧美工人所受的压迫还要厉害。瞿秋白预言，中国各大城市中的工人，“在中国未来的社会改革中，他们将是中国的无产阶级的首领。”这时，瞿秋白所说的无产阶级，包括工人和农民。他又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没有组织”，急需“已经觉醒的中国青年，或者是热心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去“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为人类服务”。他说：“我们来到俄国是为了向中国正

确报道俄国的情况。……而我们的这次旅行将给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第一次推动。”

文章还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工人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瞿秋白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只寄希望于你们，勇敢的俄国工人。”中国无产阶级对他们“为全人类的幸福而英勇奋斗”，和克服重重困难，“实现着社会主义原则，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伟大壮举，表示“极为钦佩”，“衷心地祝愿他们获得成功和胜利”。文章特别赞赏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不仅具有民族性质而且具有国际性质”的重大意义。坚信：在十月革命的积极影响下，“世界将会出现人道和正义”，“全世界人民将会觉醒起来”。

12月20日 作《东俄之情况与华侨》，发表于次年1月16日、17日北京《晨报》。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辛酉)

二十二岁

1月1日 作《旅俄华侨问题》，发表于1月14日北京《晨报》。

1月2日晚，同俞颂华到苏俄远东共和国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克拉斯诺史赤夸夫的寓所(即外交部)进行友好访问。国务总理扶病接见了瞿秋白等人，回答了他们事前所提出的关于远东共和国与中国关系等七个问题。总理谈到对外政策时说：“对于中国呢，我们对别国一样，尊重中国的主权，并且希望保持两国平等和亲睦的关系”，“缔结密切的友谊的条约”。总理还详细地向瞿秋白一行介绍他们和莫斯科的关系，介绍他们政治经济状况及大政方针，并表示热诚希望“中俄两国的门户开放”，彼此交流所需的物产，不断地发展商务关系。^①

1月4日 文学研究会于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成立大会。蒋百里为会议主席，郑振铎报告文学研究会筹备的经过，会议讨论和通过由郑振铎起草的《文学研究会简章》，推选郑振铎为文学研究会书记干事。当时，瞿秋白虽然赴俄考察，但仍是当年文学研究会正式会员。^②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79页。

② 张尔燕：《略谈瞿秋白与文学研究会》，上海鲁迅纪念馆：《纪念与研究》第7辑，1985年；陈福康：《郑振铎年谱》第4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1988年。按：据张尔燕上文以大量材料考证，瞿秋白确是1920年正式参

1月4日 离开赤塔，专车继续西行。

1月4日至25日 作《自赤塔至莫斯科的见闻记》，先后发表于8月26日至29日上海《时事新报》；9月11日起，北京《晨报》曾断续转载。本文后收入1924年9月1日北京晨报社出版的《游记》第2集，同年10月上海书店出版的《国外游记汇刊》中也录入。

1月7日 下午3点，专车抵达伊尔库次克。站长命令把中国专车拉下来，停在车站尽头。待通车，再挂车前进。随后，上来几个人进行检查。瞿秋白同中国副领事刘守清下车去伊尔库次克城拜见西伯利亚外交委员。进城后，见街市荒凉，一片雪影，足迹非常之少，店铺掩着双扉。他们找到外交委员家里，外交委员不在家，便留话离开。又去访留伊的副领事薛君处。在薛君处第一次吃着“苏维埃的黑面包”。瞿秋白记述道：“其苦其酸，泥草臭味，中国没有一人尝过的，也没有一人能想象的。可是那天席间还有些鸡鱼。据他们说，布尔塞维克来了之后，商业一概禁止，这是乡下有熟人偷买上来的。”^③在此停留了两天。

1月9日 上午8点，一切都已接洽妥贴，专车开动。

1月16日 专车到鄂木斯克。因要办交涉，再度停顿。在伊尔库次克时，外交委员答应打电话到鄂木斯克，可以领些食物。到此交涉好久，才出官价2000多卢布买了面包、牛肉、鸡子等。当时

加文学研究会的。“在《文学研究会会员录》中，瞿秋白的名字是第40号”，会员录中名字的顺序肯定是以“入会先后次第排列”的，瞿秋白的名次而且先于当年入会的朱自清（59号）、冰心（第74号）、朱湘（90号）等人。张文还以确凿的材料，证实瞿秋白还是文学研究会“前期酝酿阶段的重要骨干成员——积极参加者和最初的实际发起者之一”。笔者曾于1983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年谱》中，把瞿秋白参加文学研究会的时间，写成“1923年”，是不确的。

③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90页。

苏俄物品奇缺又昂贵。瞿秋白在车站上买一盒俄国香烟,要 1750 卢布。^①

1 月 18 日 离开鄂木斯克。

1 月 21 日 于上海《时事新报》发表《访远东交通总长及粮食总长记》。

1 月 24 日 专车到复洛葛达。瞿秋白记述道：“愈往西愈近俄国的工业区，已出中世纪而进现代，所以西来渐渐觉着有生意，车站上往来的行人也穿着得比较好些，整齐些，不象东西伯利亚的穷窘形状了。简单的物质文明的进步观念，原来在人类文化上有很大的意义的。”^②

1 月 25 日 晚 11 点钟，瞿秋白一行抵达赤都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站。他们直接来到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办公大楼，东方司司长杨松接待了他们。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竭诚欢迎”，希望他们“为正直的中国人民一开耳目，为中俄互相了解的先声”。杨松还向他们介绍了许多地方，可以搜集材料、访问要人，派了英文、俄文的翻译。俄文翻译郭质生，^③后来成了瞿秋白终生的知己。根据杨松的安排，首先访问了苏俄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主笔美舍利亚科夫，开始了他的“正式的考察调查”工作。瞿秋白一到莫斯科，就非常兴奋，激情满怀地赞颂这赤国的都城“处于欧洲无产阶级‘心海’的涛巅，涌着俄罗斯劳动者心血热浪”。是人类文化的“灯塔”。他说：我这个“进赤俄的东方稚儿预备着领受新旧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甘露了。理智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的社会主义，性灵的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 1 卷,第 91~92 页。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 1 卷,第 97~98 页。

③ 郭质生(1896~1979)本名维·斯·格罗戈洛夫(В·С·КОЛОКОЛОВ)出生于中国新疆。回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是苏联汉学家,曾翻译《红楼梦》等小说,编纂《俄汉词典》。

营养,敢说陶融于神秘的‘俄罗斯’。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①

2月2日 苏俄外交委员会派汽车把瞿秋白一行三人安排到外交委员会一座公寓(旧时的旅馆)住下。两间房间里,有桌、椅、床铺、电灯,汽炉烧得暖暖的,公寓里还设有食堂。

2月6日 同俞颂华、李宗武联名于苏俄《消息报》上发表《致俄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署名后用括号注明各自的身份。瞿秋白和李宗武为“北京《晨报》记者”,俞颂华为“上海《时事新报》记者”。《呼吁书》充满革命激情,赞颂苏俄工人阶级及其所从事的崇高壮丽的事业。称俄国无产阶级是“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光辉思想的第一批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建设自己的社会”,“为解放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而斗争”,认为俄国“社会制度的全部内容,……经济和政治的总方向是国际主义的”。“《呼吁书》正确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心态:“酷爱和平”,愿与“那些愿为共同利益而改善国际局势的人民友好相处”,而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呼吁书》最后科学地预见中国人民的革命前景,指出:“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人民也将能掌握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原则”。他们坚决地表示:一定忠于新闻记者的职责,“向中国人民如实报道俄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以便日益加深和巩固两国友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2月上旬 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华工代表大会,受到近两百名代表的热情欢迎,瞿秋白向他们讲述了国内的学生爱国运动。与会代表听了以后,“如渴得饮”,非常满意。会间,瞿秋白结识了一些华工,并常有往来。

2月上旬 参观莫斯科特列嘉柯夫美术馆。这是瞿秋白“在莫斯科第一次游览之处”。这里陈列着古代、近代著名的俄罗斯艺术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03~104页。

作品，“名画如山积，山水林树，置身其中，几疑世外”。瞿秋白参观以后，感受和印象颇深，想起“文化”的真价值。他说：“俄罗斯文化的伟大，丰富，国民性的醇厚，孕育着破天荒的奇才，诞生裂地轴的奇变，——俄罗斯革命的价值不是偶然的呵！”深深感到“社会之文化是社会精灵的结晶，社会之进化是社会心理的波动。”^①

2月9日 著名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季米特洛夫村病逝。2月12日，瞿秋白以新闻记者身份前去灵前吊唁。2月13日清晨，又去参加了隆重的送殡仪式。2月21日，克鲁泡特金夫人来到莫斯科，瞿秋白在外交人民委员会职员陪同下前去拜访。夫人老态龙钟，听到中国新闻记者来凭吊克氏，非常感动，表示许多欢忭的意思。瞿秋白赠送夫人一袋白面，以示慰问。

2月14日 经友人介绍，会见了俄国当时著名的将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诗人向瞿秋白问及中国文学，并赠送一本他的诗集《人》留作纪念。^②

2月15日 到莫斯科大剧院观赏旧歌剧。剧情“花露润融，高吟沉抑”，感到旧艺术虽“衰落不少”，但“一切美妙的庄丽的建筑艺术都保存完好”。在此之前，曾到家乐剧院观看将来主义派的戏剧，认为“一切旧规律都已去尽”，剧情“不可了解”；又到国家第二剧院（旧小剧院）欣赏了苏俄文艺评论家、作家卢那察尔斯基所编的《国民》一剧的演出，这是“有政治宣传性”的“新艺术”。瞿秋白认为，《国民》一剧“所用布景，固然是将来主义，已经容易了解些，剧本的内容却并非神秘性的，而是历史剧，演古代罗马贫民革命，且有些英雄主义的色彩。”瞿秋白指出，苏俄“新旧两派平行缓进，还可以静待灿烂庄严的将来呢。”^③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04页。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18页。

③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19页。

2月16日 开始撰写著名的散文集《赤都心史》，开篇是《黎明》。文章指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并分析了当时俄国文化发展的趋势。瞿秋白认为：“人类的文化艺术，是他几千百年社会心灵精采的凝结累积，有实际内力作他的基础。”“社会心灵的精采，也就包含在这粗象的经济生活。”他指出：“一切资产阶级的艺术文化渐渐的隐隐的暴露出他的阶级性：市侩气。”他认为当时苏俄的文化所反映的状况是：“根本方就干枯，——资产阶级经济地位动摇，花色还勉强留几朝的光艳。新芽刚才突发，——无产阶级经济权力取得，春意还隐于万重的凝雾。”文章还评述俄国革命后盛行一时的艺术流派将来主义，说他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夜之余，无产阶级文化的晨之初”；是“春阑的残花”，“冬尽的新芽”。并指出，目前虽“奇静”，但黎明后“劳作之歌”，使人“奋然振发”。^①

2月中旬 同俞颂华、李宗武到克里姆林宫，访问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受到热情接待。卢氏因要去人民委员会开会，同他们谈了10分钟，但谈吐简截了当，完满不漏地回答了瞿秋白所提的问题。卢氏谈及教育上的革新，科学技术上的发明，指出欧美各国对于俄国革命后学术文化上的进步，都非常有兴趣，而要加以研究。卢氏侧重谈了苏俄对于东方文化的态度问题。他说，“俄国跨欧亚，和东方素有接触”；“对于‘东方’极有同情”，“极端平等看待，对于他的文化尤其有兴趣”。他还说，为了增进苏俄和东方各民族的互相了解，并交流东西方文化，苏俄政府已经设立一东方学院。^②

3月底前后 苏俄教育人民委员会又派汽车接瞿秋白等3人去参观几处幼稚院、劳动学校等。教育人民委员会还给瞿秋白送来一些书刊，包括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等。后来，瞿秋白、李宗武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17～118页。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25～126页。

又应邀去教育人民委员会所设立的无产阶级文化部出席音乐会，受到热情欢迎。^①

3月8日至16日 第十次全俄共产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瞿秋白连续写了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从6月22日起至9月23日先后分27次连续发表于北京《晨报》。全文约3万字。热情地忠实地向祖国人民介绍会议的情况，宣传苏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问题的现状，指出当时苏俄已经“由军事时代过渡于和平时代”。他还详细地介绍了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说苏俄的民族政策，“确为世界历史上开一新纪元”。瞿秋白特别赞赏苏俄的政治制度和共产党人，指出：“共产党严戒党员利用自己的地位作威作福”，“共产党人的办事热心努力，其中有能力有觉悟的领袖，那种忠于所事的态度，真可佩服。”称赞苏俄政治“不失为一种贤人政治”。他积极宣传共产主义理论，说共产主义是“无国界”、“自由平等”的社会，“实行共产主义真是伟大，而且(是)艰巨的‘工程’。”他深有体会地说：“实际生活上的教训——人间化——是不能不领教。共产主义从此不能仍旧是社会主义丛书里一个目录了。”瞿秋白还联系中国革命，要求“中国人应当用一用心”。他说：“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希望中国革命应当效仿俄国人。

3月11日 因病无事，在同俄国友人闲谈后，写了一篇杂记《公社》，介绍和评述苏俄军事共产主义经济政策，文章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每一城市作为一共产社。”“俄国现在无物不集中，消费者都以团体为单位，个人名义很难领到需用物品。全国集权行得很厉害。”同时指出：“这种集中制在军事时代很有用处：没有一人没有一天能浪费物品或偷闲惰怠的，固然有许多弊病，然而这本是列宁所谓‘军事的共产主义’，这是军事的共产社制度，在‘国内战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24—127、132页。

争’期内，他的必要，却有一定的程度。至于乡村间呢，贫苦农民多分得土地，生活还象私有者。”^①

3月12日 写一首题画诗《秋意》，赠给克鲁泡特金的亲戚林德女士。此作收入《赤都心史》一书。

3月15日 于《改造》第3卷第7号发表译作《共产主义与文化》（俄国凯仁赤夫作）。

3月19日 看了当天俄国报纸关于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已被平息的报道之后，当即作《革命之反动》一文，正确分析了这次暴动的社会原因，指出：“大概不得志的小商人，小资产阶级的农民，1920年以来，都不满意于劳农政府，社会革命党所谓‘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到处宣传鼓动。实际上‘食粮均配法’，收取农民出产物之全量，为近时西伯利亚以及其余各处农民反抗的真因，——这种风潮，我们到莫斯科时已经很甚。”^②

4月3日 作《社会生活》，记述了他和托尔斯泰孙女苏菲亚·托尔斯泰互相访问的情况。先是苏菲亚经俄国友人纪务立的介绍来到瞿秋白寓所访问。苏菲亚说，托氏前在莫斯科的住宅（托氏死在这里）改为托尔斯泰陈列馆。于是邀请瞿秋白等人去参观，并到她家作客。托氏陈列馆离瞿秋白寓所不远。接着，瞿秋白等赴约去瞻仰陈列馆，苏菲亚亲自陪同。到托氏家后，受到苏菲亚母亲的亲热接待，并赠送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老子》，为俄文节译本。苏菲亚的母亲还对瞿秋白一行说，各种社会公共机关，“凡不是共产主义的，只要不带政治上的危险性质，如托尔斯泰陈列馆等，都不受什么妨碍，有时亦能稍得辅助。”^③

4月5日 译俄国诗人莱蒙托夫诗作《烦闷……》。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28～129页。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30～131页。

③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33页。

4月10日 作题画诗一首《皓月》，赠送苏菲亚·托尔斯泰女士。全诗为四句：“皓月落沧海，碎影摇万里。生理亦如斯，浩波欲无际。”此作收入《赤都心史》一书。

4月11日 分别会见了德国经济调查员兼外交代表史德勒博士、伦敦《每日先驱报》通信记者亚尔史李葛，经后者介绍又会见了美国资本家访德列浦和《旅俄六周记》作者朗塞，他们分别向瞿秋白叙谈了访俄感想和对俄关系等问题。^①还会见了苏维埃政府通商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列扎瓦。列扎瓦向瞿秋白详细地介绍了苏维埃政府的国际关系。他说，俄国与国外通商是政府的专利。与英国已经正式签约，与德国即将签约，与其余边境各小国及意大利、捷克斯拉夫，都已结通商关系。他还强调指出，外国商人在俄国，政府担保他们的利益。俄国正在努力协理各种租借地，借外国资本来发展俄国工业——社会主义的基础。还要“聘用外国技师，购买外国机器”，“工业附属品”。列扎瓦还着重地说：“没有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况且决不能在隔离状态中实行新村式的共产主义。”而是实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②

4月22日 作《俄罗斯之工人及协作社问题》，发表于7月26日至28日北京《晨报》，报道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继公布课税法改善农民生活以后，又着手改善工人生活的情况。苏俄当时成立了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工人报酬问题等一系列法令。瞿秋白评述这些措施“是经济改造的第一步”。

4月23日 是俄国旧历复活日曜日^③。友人郭质生来到瞿秋白寓所，邀他及其他人一同去莫斯科最大的教堂——基督救主庙，参观希腊教的复活节礼拜仪式。瞿秋白说：“救主庙的神甫，是全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38页。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39页。

③ 即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家家要插“瘦柳”，教堂中要举行大礼拜。

俄最高神甫，革命前受国库供养，统辖全国教堂事务，所谓‘国家中之国家’。十月革命后教制仍存，不过与国家政府绝对脱离关系，单受信教徒的供给”。^① 瞿秋白同郭质生看完长达两小时的礼拜仪式之后，回到自己寓所，彼此交谈感受。郭质生问瞿秋白有何感想，瞿秋白说，我仿佛不在欧洲。郭质生笑着说，俄国东方文化很深，大多数农民群众，迷信得很呢。——革命之后才稍好些。瞿秋白又感慨地说：“诚然不错，希腊教仪式竟和中国道教相似。”^②

4月29日 作《莫斯科之中俄外交》发表于7月19日、20日北京《晨报》，报道中俄外交中的华侨问题和互派代表问题，指出当时“中俄外交却冷淡到极点”，“这并不因为俄国政府没有好意”，而是中国“外交当局稍须要负些责任”。

5月1日 是国际“五一”劳动节，恰巧又是俄国复活节。节前夜晚，莫斯科的市民怀着欢乐的心情，涌向1500余个教堂，四处“圣钟殷鸣——陡破夜神的深寂”。等到午夜一、二点钟，复活节的夜祭开始了。瞿秋白“挤在基督救主庙里，人山人海，至少也有两三万，一切仪式也不能十分看得清楚。好容易挤得出来，返回寓所已经四点多钟，很疲乏”。^③

5月1日 瞿秋白带着两重佳节的兴致，顺路访问一女友。女友要瞿秋白在她家“吃过节饭”。俄俗凡逢复活节的一星期，家家户户都大摆筵席，美餐一番。女友询问瞿秋白：中国有复活节么？瞿秋白略略解释中国人的宗教观念、风俗和对于基督教的关系。女友一家人听得非常有趣。瞿秋白参加了节日活动后，深感“莫斯科市民淡于五一节而热于复活祭”，认为这是“经济落后国家的守旧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41页。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42页。

③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44页。

性,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反映”。^①

5月初 应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的邀请,同俞颂华、李宗武3人访问彼得格勒3天。他们参观了画院、美术馆等,去剧场观赏了驰名世界的芭蕾舞。

5月4日 作《莫斯科之耶稣复活节及五一节》,发表于8月24日、25日北京《晨报》;9月1日上海《时事新报》转载;后收录于1924年9月1日北京晨报社出版的《游记》第2集。文章说:“莫斯科城里‘新的五一运动’和‘旧的复活祭’同时举行。共产党人欢呼万岁声和着礼拜堂的钟声振动了这共产国家都城的空气。”瞿秋白在报道俄国人民群众庆祝五一节时,生动地描写了莫斯科的庆祝场面,人民群众热烈“欢呼劳农政府万岁”,到处是关于“电气化”、“工人管理生产”之类的标语。文章还介绍了俄共中央领导人向人民群众发表演说内容:“现在我们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已是共产主义的国家。我们的仇敌——资本家——已推翻了。现在我们多做工是为自己,不是为资本家了。我们努力向着共产主义建设事业进行。”瞿秋白在文末深深感慨地说:“他们共产党的精神非常之好。可惜比之全国国民,人数太少,人才太缺,所以每每办事,有些不周到的地方。以‘五一节’和‘耶稣复活节’相比而观,使人领略到俄国国民性及共产党之‘五一’运动的意义,不免发生一种奇异的感想呵!”

5月12日至6月15日 作《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在这总题之下立下列五个小题:《协作社、货币制度、工钱制度,自由商业》(5月12日)、《“苏维埃政府之国家的资本主义”——财政改良问题之讨论》(5月19日)、《三大会之经济政策决议案》(6月7日)、《国民经济苏维埃、职工联合会两大会议中之两大问题》^②、《劳农政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45、146页。

^② 无写作日期。

府之“农民政策”——新经济政策与人民之舆论》(6月15日),本文按上列小题,先后发表于9月24、29日,10月26、27、28、29日,11月1日至6日北京《晨报》。

5月19日 作《俄都记闻》,发表于8月31日北京《晨报》,本文要点是:“一、劳农政府毛类课税令及烟草课税令”;“二、全俄职工联合苏维埃第四次大会及全俄国民经济苏维埃大会”;“三、俄罗斯之面包问题”;“四、西伯利亚之金矿”;“五、劳农政府之行政问题”;“六、赤俄小闻”。

5月22日 俞颂华到达拉脱维亚首都里加,3天后去柏林,他在里加收到瞿秋白致他的信。瞿秋白对俞颂华说:“列宁最近指出四种苏维埃制度中之国家资本主义(Governmental Capitalism), (一)租借地, (二)合作社, (三)商人, (四)企业家(私家小工厂)。现第四次全俄职工联合大会及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已在讨论之中,此种过渡办法甚有味。”^①

5月 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参加共产党;9月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翻译时,始正式入党。^②

① 转引自俞颂华:《旅俄之感想与见闻》,见《游记第二集》,北京晨报社编,1924年版。按:原信全文无法查考,因原信已无下落。

② 根据传统的说法,瞿秋白是1922年2月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如1955年陆定一在瞿秋白同志遗骨安葬仪式上的报告中和杨尚昆1985年在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都是这样表述的。但瞿秋白在他的《记忆中的日期》中记述为:“1921年5月,张太雷介绍入共产党;9月任东大翻译始正式入党。”这与当时曾任东大社会支部书记彭述之女士的《中国共产主义的历程》第1卷(1992年)中

6月8日 翻译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诗作《安琪儿》。

夏 同李宗武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撰写一份材料,题为《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①,向俄国人介绍了中国社会的状况和性质,指出:中国是“表面上保持政治独立,而在经济方面则是为西欧资本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得以发展充当沃土的殖民地国家之一。”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开展情况。指出,大约20年前,西方的社会主义就传到了中国,但是只有到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中国才认真着手研究马克思主义。经过五四运动,中国几乎所有同新文化运动有联系的刊物,如《新青年》、《星期评论》、《解放与改造》和《建设》等,都刊登文章,宣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热烈讨论社会主义问题。同时,在中国还翻译和出版了一批社会主义著作,如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等等,并介绍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一类的学术团体也在中国相继成立。这篇材料还简要地介绍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以上海、唐山两地为例,介绍和分析了中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分别说明各个行业工人工资是如何的低,劳动时间是如何的长,指出中国工人遭受的压迫和剥削是世界上所罕见的。

两个人还不是共产党员,到共产国际‘三大’时候(1921年6月底至7月初)才加入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心小组派了一个代表团作为观察员来参加共产国际‘三大’ 其中一个代表名为张太雷,是瞿秋白的同乡和同学……他说服了瞿秋白和李仲武两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时这个党正要召开她的成立大会。”(第287~288页)对照彭述之上述回忆,瞿秋白回忆自己入党的时间是正确的。

原件是俄文打印稿,署名瞿秋白、李宗武,归入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案卷。此文已编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

6月22日至7月12日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和克里姆林宫)举行。列宁在会上先后作《捍卫共产国的策略的演说》、《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托洛茨基在会上作《关于世界经济现象的演说》。瞿秋白等新闻记者和中国代表张太雷等人参加了大会。会间，有一次列宁和瞿秋白在走廊上相遇。他给瞿秋白介绍了几篇关于东方问题的材料，因事忙，略谈几句后，就走开了。这是瞿秋白第一次见到列宁。他学习了列宁介绍的东方材料后，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会后，瞿秋白在文章中对列宁的高大形象作了生动的描绘：“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掌声所吞没。……”^①瞿秋白等新闻记者还去访托洛茨基。这次大会给了瞿秋白以极大的思想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政治生活的莫斯科这次(会议)才第一次给我以深切的感想呵。”^②

6月 将俄国莱蒙托夫的短诗《烦闷……》汉译稿以墨笔书赠俄国友人郭质生，书上题写着：“质生兄鉴正 秋白”。在封面上还画了一枝菊花。^③

7月23日至8月初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后移至浙江嘉兴南湖)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和党的任务的决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中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有了根本保证。

8月4日 再度吐血。几天前，医生对瞿秋白说，“你左肺有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59~162页。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62页。

③ 曹斯：《瞿秋白研究》第178页，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

病，回国为是”。瞿秋白被病魔折磨得很痛苦，“心神不定”。他说：“北地风寒积雪的气候，黑面烧肉的营养，究竟不是一片‘热诚’所支持得住的。”“气压高度令人呼吸都不如意。……那有江南春光明媚，秋花争艳的心灵之怡养。”可是瞿秋白想到祖国的命运，眼看祖国“要成完全的殖民地，英国‘老爷’来了”，因而，仍坚持在俄国探索救国真理的决心，他又振奋起精神说：“还我的个性，还我为社会服务的精力来！”^①

8月12日 作《官僚问题》，叙述旧俄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如何受到苏维埃政府的攻击。文章说，俄国社会问题除90年代勃然兴起的劳工问题外，“向来在社会思想中占极重要而不得解决的还有三个问题：智识阶级问题，农民问题，官僚问题。”文章突出评析了官僚问题，认为官僚贪污作弊的社会经济根源是“封建遗毒，东方式专制政体”，并列举现实生活中一些贪污作弊的事实。文章指出，苏维埃政府对官僚主义是深恶痛绝的，无产阶级新文学中已有“新果戈理”出现，无情地讽刺官僚主义，“共产党报纸上努力的攻击官僚主义呢”。^②

8月29日 作《饥》，介绍东俄遭受旱灾的严重情况，引述俄国中央和各省报纸上所报道的惨不忍读的灾情；继而介绍苏俄政府采取种种措施进行救济：“各机关实行赈捐”；各城市“举行音乐会，演剧，募捐”；“职工联合会组织募捐队，又到灾区调查”；“没有被灾的农村，都派人募收志愿捐助的食粮”，“政府茹苦含辛派遣火车去办移民”；等等。此外“请外国红十字会来俄国考察赈助”。文章痛斥了吝啬鬼——资产阶级，说他们神经麻木，良心暗黑……是市侩主义。瞿秋白对苏俄在连年遭到战争破坏之后正面临建设之际，又蒙受如此特大自然灾害的打击，深有感触，他说：“真可见俄国无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64、165页。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66页。

产阶级创业的艰辛。”①

9月15日 于《改造》第4卷第1号发表译作《校外教育及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俄国凯仁赤夫作)。

9月16日 是中国中秋佳节。瞿秋白被友人嘉德琳·亚尔奏莫维次女士邀请到她家一道欢度这个佳节,彼此欢乐地交谈。当谈到瞿秋白的病时,嘉德琳女士竭力劝说瞿秋白回国。瞿秋白也自知“夜夜虚汗咳嗽吐血,难怪心绪不能好”,对回国有所思,但犹豫不定,“回去罢,又怎么办呢?……”夜深,散宴回寓所。路过郭质生处一谈,“在莫斯科物质生活太困苦,还‘不如归去’,或者有‘可为’。”瞿秋白觉得“病体支离,要做的,应当做的,也都不能做”。他感慨低徊,涌出热泪。家园、故乡、人生的意趣,将来的责任都拼在泪花里。②

9月16日 作抒情诗《“东方月”》一首,表露出自己节日的情思。瞿秋白在思念之余,又产生了良好的祝愿,望明月高照,“欧亚华俄——情天如一”。诗的末节又抒发了他对俄国劳动人民不幸遭遇的同情和关怀。

9月25日 致信俞颂华,告知初步决定回国。他说所以要回国,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求学问题,(二)通信问题,(三)经费问题,再加我现时的病状,不能不决定回去了。现在我已着手进行,可是旅途困难,行李笨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走得成功呢。……”后来因“西伯利亚行旅现时非常困难”,而要带的“书籍太多”,“病亦似乎轻了好些”,同时又不愿,丢下学习和工作,结果还是没有“走得成功”。③

9月 除担任新闻记者外,又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71~172页。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80~181页。

③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81~182页。

大学(简称“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讲授俄文,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他教课热心、认真,诲人不倦。当时在东方大学读书的有刘少奇、罗觉、彭述之、任弼时、卜士奇、萧劲光、蒋光慈等人。

9月 于《小说月报》增刊《俄国文学研究》发表译作《痴子》(兹腊托夫拉斯基作)、《可怕的字》(阿里鲍夫作)。

10月10日 前往莫斯科一家书店购书,偶然与德尔纳斯嘉女士相遇。德尔纳斯嘉女士约请瞿秋白参加她的家庭音乐会,“聊一散心畅怀”。瞿秋白如期赴约,出席音乐会者有20多人。宾主自由谈论,从家常琐事谈到文学、哲学。有一女郎还和瞿秋白研究中国的诗。音乐会开始了,瞿秋白觉得欧洲音乐,比较的能传达人的情感于外,他说,我听中国音乐却没有听外国音乐易于感动愉悦。乐竟,大家聚着几位少年(老年人于晚饭后已告辞归去),假作演剧,一直到次日清晨6点才散去。①

10月12日 在苏俄的华工(皮包匠)林扬清邀请瞿秋白到他家里吃饭,在座的还有好几位林扬清的同伴。女主人做了牛肉汤、面条招待他们。宾主边吃边谈,“热热闹闹”。主人林扬清说,工人生活就是如此,也不算得坏。每天工作结束回家,有俄国妻子谈谈心,有时上戏院观看演出。瞿秋白非常欣赏劳动人民这种爽直、乐观的性格。当时,他颇有感触,“暗暗的想,他们——非智力的劳动者,——即使有困难苦痛,大概永没有我这一种……‘烦闷’呵”。而对照自己,作为智力劳动者,却是“性情怪僻”。②

10月13日晚,应托尔斯泰孙女苏菲亚的多次邀请,同李宗武、嘉德琳随同莫斯科教育厅第一试验模范学校一班师生等共30余人,到莫斯科苦尔斯克火车站,共坐一辆专车,前往托尔斯泰故乡雅斯纳亚·波梁纳(即清田村)③游览。14日晨到图拉车站。火车

①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82~183页。

③ 离莫斯科约400余里。

忽然因故停驶，至晚上8点钟始开车，九、十点钟到清田站。夜宿站边一旧别墅里。15日，步行至托尔斯泰故居陈列馆参观访问。托氏幼女、陈列馆事务所主任亚历山大出迎，讲解室内陈设。瞿秋白感觉“托氏生前生活确很朴素，——贵族生活如此却也在意想之外。”进入书房，突然映入眼帘的是芝加哥出版的汉英对照的老子《道德经》。室内参观结束，从后院走出，到托氏墓地，再返托氏家午餐。瞿秋白与托氏妻妹、托氏幼女亚历山大，托氏媳安德莱夫人等人边吃边谈。她们连连“问及中国政象，老子学说等”。饭后，安德莱夫人又请瞿秋白一行游园。法国式的芳径，树木夹路，秋末残叶满地，踏步行来胜于毡茵。瞿秋白问安德莱夫人乡居如何，安德莱夫人作了回答，意思是“很乏味”。接着来到一木屋——农民家访问。屋内有小小巧巧四五间，也有电灯、玻璃窗等。安德莱夫人介绍相见，女主人是前托氏的农奴，还有一位客人是安德莱夫人前陪嫁的丫鬟。他们见瞿秋白等人来访很惊讶：“原来中国人也来看俄国乡下人呢”。女主人非常热情地招待瞿秋白等人吃茶，介绍他们的生活。自农家出来，顺路到托尔斯泰派公社一游。他们见中国人来访，非常欢迎，谈及中国托氏运动等等。他们特别介绍公社的产生和当时的生产情况。15日晚上，回到清田村住下。16日上午，乘车返回莫斯科。瞿秋白清田村一游，加深了他对俄国社会生活的了解。他看到了世界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的遗迹，看到贵族遗风还喘息于乡野，“依稀萦绕残梦”。知识分子的唯心派，新村式的运动，也有稀微印象。俄罗斯的农民，风俗气息，是浑朴的，但其经济还很落后。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社会问题的根蒂，依然显露。”瞿秋白指出。“智识阶级问题，农民问题经怒潮汹涌的十月革命，冲动了根柢，正在自然倾向于解决。”①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84～198页。

10月31日 作《劳农政府内政外交之新局面》，发表于1922年5月24日、25日北京《晨报》。文章说：“劳农政府从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一切大政纲都渐渐为相当的变更，国内经济生活都因自由商务的开放而渐渐发展。新经济政策中最重大的原则，就是概括的提高‘生产力’，及间接扩充振兴‘国有企业’。”通讯还报道俄国劳农政府已随着经济的“一天一天的发展”，决定设立银行，“监督国营企业”，“振兴私人企业及生产合作社”，“统摄商业”。通讯介绍了俄国对外开放政策：“一切转入和平时代，非但实行租借地政策，要利用国外资金来开发俄国的富源，以立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为了“维持信用”，俄国政府已对各协约国宣布。“承认1914年前的国债。”

10月 写就《饿乡纪程》，为该书撰写《跋》。11月23日于莫斯科 Knyaji Dvor 病榻上在《跋》后写了《附记》。全书分16节约6万字。1922年9月，经友人郑振铎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被改作《新俄国游记》（副题作《从中国到俄国的纪程》）。该书1920年11月4日着手于哈尔滨，完成于莫斯科。全书是作者记述自己“‘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抽象而论，是记著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凡路程中的见闻经过，具事体实，以及心程中的变迁起伏，思想理论，都总叙总束于此（以体裁而论为随感录）。”^①反映了瞿秋白的个性特征。瞿秋白在《跋》中指出，过去人类的历史象“重重的噩梦”。在茫茫的人生的海洋中经过多年的探索，隐约看到了人类的曙光。他说：“我寻求自己的‘阴影’，只因暗谷中光影相灭，二十年来盲求摸索不知所措，凭空舞乱我的长袖，愈增眩晕。如今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虽然只赤光一线，依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辨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他对前程充满着信心，认为“罗针指定，总有一日环行宇宙心海而返，返于真实的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09页

‘故乡’。”^①

11月6日 听说华侨吕某从哈尔滨回到莫斯科，带来老弟的信，因半年未接家书，心切，当晚就去访吕某，未遇。

11月7日 参加莫斯科第三电力劳工工厂(原称狄纳莫工场)举行的俄国十月革命四周年庆祝晚会。庆祝晚会使瞿秋白非常感动，他于次日写了《赤色十月》一篇优美的短文，描述了纪念会的盛况。文章着重反映俄国工人群众对列宁的无限崇敬和爱戴。文章说：“无意之中忽然见列宁立登演坛。全会场都拥挤簇动。几分钟间，好像是奇愕不胜，寂然一晌。后来突然‘万岁’声，鼓掌声，震天动地。……”文章又进一步描绘工人群众对领袖的深厚感情，说“工人群众的眼光，万箭一心，都注射在列宁身上。大家用心尽力听着演说，一字不肯放过。列宁说时，用极明显的比喻，证明苏维埃政府之为劳动者自己的政府，在劳工群众之心中，这层意义一天比一天增胜，一天比一天明瞭。”瞿秋白还记述了杜洛次基突然登台发表演说内容，杜讲了恢复社会生产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求大家“努力奋斗，研究我们自己的错误过失，改正他。那时我们才能胜利。”瞿秋白在文末抒发了他的感慨，他说：“赤色十月工厂中的庆祝晚会，确有无限盛意。”^②

11月16日 再次去华侨吕某住处，取回了北京云白弟弟写来的家书(家书是这年3月间发出的)。瞿秋白盼到弟弟的来信极为高兴，“感动涕泣，热泪沾襟”，真是“家书抵万金”。信上写着家里都还“好”，以消除瞿秋白对家庭的惦念。但信还是勾起哥哥旧梦重温而生伤怀。瞿秋白“想起旧时未决的问题”，想起“中国曾有所谓‘士’的阶级。”他说：“在过去时代，中国的‘士’在社会上享有特权，实是孔教徒的阶级，所谓‘治人之君子’。”现在士的阶级“特显破产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09页。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03~204页。

状况”。他联想到他的家庭，也“是士的阶级”，也“绝对的破产了”，“母亲为穷(困)所驱，出此宇宙”；“父亲一生经过万千痛苦”，“在外省当一小学教员”；“兄弟姊妹呢，有的在南，有的在北，劳燕分飞，寄人篱下”；“我又只身来此‘饿乡’”。瞿秋白感叹地说：“这就是我的家庭。这就是所谓‘家里还好’！”转而又激奋地指出：“总有那一天，所有的‘士’无产阶级化了，那时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总有那一天呵……”^①

11月末 “病益加重”。

12月3日 作《“我”》，后收入他的散文集《赤都心史》。瞿秋白主张个性解放，发展个性。他在文中分析了个性问题的“内性”，分属三种范畴。在人类进程中，“有人既发展自我的个性，又能排除一切妨碍”而“进取”，“增进人类的文化”；“有人要发展自己的个性”，但无“进取的创造力”；“有人不知发展他的个性，整个儿的为‘社会’所吞没”。瞿秋白自问：“我将成什么？”“我的职任很明瞭”，“盼望‘我’成一人类新文化的胚胎。”这时，瞿秋白的思想已发生了质的飞跃，基本上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正如他自己写道：“‘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又自谦地写道：“我自然只能当一很小很小无足轻重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②

12月15日 肺病严重，住进莫斯科郊外的高山疗养院。自这年7月以来，因物质生活条件差，“工作更无限制的增加”，“起居无时”，“饮食不节”(指太少的“不节”)，致疾病严重起来了，“昏卧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09~211页。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12~213页。

床榻……有两三月之久，因此通信中途停止……有四个月”。^① 瞿秋白卧床休养，虽然不能外出采访，但是，仍坚持读书，写作。《赤都心史》中的《中国之“多余的人”》、《晓霞》、《彼得之城》、《美人之声》、《新村》、《生活》等，都是在病床上写出的。不久前（10月12日）瞿秋白在《智识劳动》一文中写道：“肺癆是要‘养’的。可是我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不能不工作；要工作。”^② 瞿秋白在住院期间，正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曹靖华，几乎每星期都去探望他。他总是兴奋得忘了病，口若悬河地与曹靖华谈论着。瞿秋白曾对曹靖华说，苏联是一座琳琅满目的革命宝山，表示要拼着自己的病弱的生命，把革命的宝贝更多地运到祖国。^③

本年 受苏俄政府大规模扫盲运动的启示，在莫斯科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并写成了中国最早的一部《拉丁化中国字母》，成为中国文字改革的先驱者。

①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302页。按：住院期间，曾于1922年1月下旬去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作翻译。大会在彼得堡开幕后，因劳碌过度，“血痰又起”，在国际旅馆昏睡四五天，于2月7日被“运到莫斯科”，继续住进高山疗养院。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82页。

③ 曹靖华：《罗莎玲追忆瞿秋白并忆鲁迅先生》，《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1日。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壬戌)

二十三岁

1月1日 凌晨1点,瞿秋白还没有入睡,作<离别>一文,记下刚刚结束的高山疗养院迎新晚会的热闹场面及晚会引起的情怀。1921年除夕,他和病友、医生、职员会集于王爵邸宅的客厅里,钢琴伴奏,跳舞,捉迷藏。瞿秋白同大家自由漫谈中俄的习俗。一位女医生问瞿秋白,中国过年有什么样的娱乐礼俗呢?瞿秋白随便给他们讲了一些中国的习俗,大家都引为奇趣。中国的风俗又勾起瞿秋白对父母膝前旧梦的回忆,怀念起六年前离开人世的慈母。<离别>一文后编入散文集<赤都心史>。^①

1月9日 翻译俄国斯拉夫派诗人丘特契夫的诗作<一瞬>,后编入<赤都心史>。瞿秋白在译文前加了按语,对作者给以评价,指出诗人“一生行事,没有什么奇迹,可是他的诗才高超欲绝。当代评论家白留莎夫^②称他继普希金的伟业。”^③

1月12日 翻译丘特契夫诗作<寂>,后收入<赤都心史>。

1月21日至2月2日 为推动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对抗美、英、日、法等九国召开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礼堂召开了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2月2日大会在彼得格勒举行闭幕式。中国、日本、朝鲜、蒙古、荷属东印度、安南等国共一

^{①③}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23、224、225页。

^② 俄译勃留索夫。

百五六十名代表出席会议，中国派张国焘、邓培、高君宇、王尽美、邓恩明、林育南、于树德、张秋人、江亢虎、黄凌霜、王丽魂、王尔平等几十名代表组成大型代表团，以张国焘为团长出席会议。正在高山疗养院养病的瞿秋白，同李宗武、卜士奇担任大会的翻译工作。与会者听了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作的《国际形势与华盛顿会议情况的报告》、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萨发洛夫作的《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的报告》及各国代表的发言。会议通过宣言。大会揭露为协调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的利益而举行的华盛顿会议的反动实质，总结了远东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了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列宁未参加大会，但在会后几天的一个晚上，在克里姆林宫抱病会见了张国焘、张秋人、邓培等部分中国代表。列宁希望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合作，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一致，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①

1月29日 是瞿秋白的生日。他在病房，欣然提笔作《晓霞》一文，后收入《赤都心史》。文章抒发革命豪情，相信人类必将走向进步，走向光明。他说：苏俄“曾染浓艳光赤的晓霞。——现在久现红日了。”满怀信心地指出：“有赤色的晓霞为之先声，不久不久，光现宇宙，满于万壑。”“革命赤日的遥光，那正是‘晓霞’的散彩。”看到了“群众的伟力，愈抵拒愈激厉”。^②

2月13日 作《俄雪》，后收入《赤都心史》。

2月17日 翻阅去年的俄国《新闻报》，偶尔发现该报曾发表世界著名的美国舞蹈家、现代派舞蹈创始人邓肯的《新艺术与群

① 大会名称有如下几种叫法：“远东劳动人民大会”、“远东弱小民族大会”、“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代表大会”，最后定为“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29页。

众》一文。邓肯大约是上一年10月间来过莫斯科。她在这篇文章中大声疾呼：“我们现时的艺术时代，应当融洽于‘生活’，不但不能后于生活一步，而且还当为人类描画‘将来’的理想。”认为应当给工人“怡养于高尚的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受艺术化的教育”。该文引起瞿秋白的注意。他当即把它摘译出来，题作《美人之声》，后收入《赤都心史》。

2月26日 翻译高尔基的诗作《阿弥陀佛》，后收入《赤都心史》。

3月1日 作《新村》，记述农民问题。文章首先指出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但同时又指出：“农民却是小资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的。”瞿秋白肯定俄国在革命第一期实行“土地国有”是正确的。他认为可以转向第二期——无产的工人与小资产的农民间之协进，实行新经济政策。指出这是非常必要的和适时的。文章说：“资本主义中‘最初积累’的发展，必定令农民为阶级的分化；国家工业的发达，必定一面吸收无产阶级化的农民，一面扩充财政，技术的影响于乡间……创社会主义现实的基础。”最后明确指出：“俄国不能成隔离的新村制，而是现实经济改造世界中之一部分。”^①

3月10日 作诗《海》，后收入《赤都心史》。

3月20日 在高山疗养院撰写《赤都心史》最后的一章《生活》，至此，全书稿竟。不久前，即于1921年11月26日为该书撰写《序》，后于1923年8月4日撰写《引言》。全书分49章，约7万多字。1924年6月，由友人郑振铎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赤都心史》记述了作者在“赤色的莫斯科里所闻所见所思所感”，及作者如何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体裁有“杂记”、“散文诗（“逸事”）”、“读书录”、“参观游览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1页。

记”、“随感录”以及译作等。瞿秋白在《序》中曾说，《赤都心史》是他“心理记录的底稿”和“社会的画稿”。《赤都心史》同《饿乡纪程》一样，都是我国最早以亲身的体验，忠实地介绍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后政治生活和社会面貌的作品。热情地歌颂了伟大的十月革命，指出：“1917年之秋，俄罗斯红光烛天，赤潮澎湃……20世纪历史的事业之第一步。”^①“莫斯科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②

4月15日 于《改造》第4卷第8号发表译作《宗教与道德——经验派的道德之矛盾》(托尔斯泰作)。

4月中旬 出高山疗养院。

4月19日 作《赤俄之第四年》，发表于8月16日至18日北京《晨报》。瞿秋白对苏联开始施行新经济政策的1921年作了概括性的介绍。如实报道了苏联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的变化。文章说：苏联在无产阶级的“政权稳固”之后，社会各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都“在解决之中”。农民得“经济的协约”，“贸易状况，一天一天振兴起来”，“国外通商也日盛”，“小工业出租”，“大工业国有”，等等。无产阶级正在实行“他们的历史使命，经济改造——为人类文化之(而)奋斗。”同时指出，苏联还面临着困难，“反革命正想趁机破坏”等。瞿秋白在通讯中，盛赞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出：“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步步证实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革命的伟力各方面的发展，几十次困苦的战斗，全赖于两革命阶级——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他们“负巨大牺牲”。

4月21日 作《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发表于8月19日、20日、22日、23日北京《晨报》，介绍这次大会的基本精神，并突出地报道了列宁在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上所作的内政外交的报告。列宁明确地指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没能扑灭”苏维埃，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00页。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59页。

是因为苏维埃的事业“以全世界劳动阶级幸福为目的，得各国劳动者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进而指出社会主义的胜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瞿秋白在通讯里明白地告诉人们：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的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4月22日 作《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1922年3月28日~4月4日)》，发表于8月29日北京《晨报》，报道苏联自第十次共产党大会后推行新经济政策一年来的基本变化，介绍第十一次苏联共产党大会除“重新审视一番”过去既定的政策外，又作出了新的决议，以“补充遗漏”。瞿秋白在这篇通讯中，忠实地宣传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传苏联工人阶级对国家机关、对企业的监督作用，并着重介绍苏联共产党“十一大”决议中关于职工联合会的新职任的决定，“职工会的鲜明旗帜不但可以救济苏维埃司法当局之不周到——私人企业家的违法作弊，而且可以救济苏维埃经济当局的官僚恶化——国立企业管理者办事的迟缓以至有损工人的现实利益。”通讯还说，职工联合会通过“推荐工人入国家经济机关办事”和“考察成绩学习管理”的两种方式，“参与管理生产”。

4月22日 作《一九二二年之西欧与苏维埃俄罗斯——俄国经济改造之新气象》，发表于8月26日北京《晨报》。

5月12日、19日 作《莫斯科传来——日诺亚^①会议情形》，发表于7月21日、22日、24日至26日北京《晨报》。客观地报道和评述热那亚会议的实况，揭露帝国主义对苏俄所采取的种种卑鄙伎俩和无理要求。指出：“四年以来，协约国对俄，始以军力，不成；继之以阴谋及经济封锁，不成；现在居然恭请到会。国际地位上，俄国实际上已得‘事实上的政府’之承认；即使现在协约国还勉力团结一致对俄，也至多只能作政治上的封锁了。况且协约国向来疾呼厉骂不准‘过激派’宣传；现在却请他们到外交议席上大宣

^① 视译热那亚。

特而特宣传‘解除武装，保证和平’，‘有限制的私有制’，‘帝国主义之罪恶’了。”瞿秋白认为热那亚会议是帝国主义的“一场春梦”。

6月8日 作《柔鲁会议后之中俄外交》，发表于8月12日上海《时事新报》和8月15日北京《晨报》（题改为《日诺亚会议后之中俄外交》）。报道热那亚会议后，俄国国际地位“毫无可疑的增高了”，俄国与捷克国之间“订成政治的协约”，而且“双方承认”；美法虽反对俄国，而仍旧有协约国与之“订‘七个月不犯边境’之协议”；蒙古外交代表到达莫斯科对俄国明白宣布，蒙古对俄国“有一定的政策”，“此来正是实行交换外交代表之一条，而可续订通商、汇兑、邮电等协约”。瞿秋白以此为对比，报道中国政府对俄国冷淡的态度。他听到来到莫斯科的中国代表沈崇勋说：“中国此次仍旧绝无一定的外交方针。”报道沈崇勋关于中俄关系的谈话：中俄关系诸如中东路问题，通商问题，应当如何如何……。瞿秋白指出：“可惜每句之上必加以‘我’‘早就’‘说’‘应当’，……而不是‘政府’‘早已’或‘现在’‘办’。……说到临了，原来还有末了一句话，‘而“部”里没有确定的方针’，这就是所谓日诺亚会议后之中俄外交。”

6月8日 作《苏维埃俄罗斯之立法》，发表于8月17日上海《时事新报》。报道俄国国家性的法律正在逐步形成。指出：“五月的全俄中央执行会开本年的第三次期会，已受第九次苏维埃大会的委托，议政治案，其通过的有刑法典、刑事诉讼法与民法典等。”瞿秋白扼要地阐述了民法、刑法的意义，并介绍其基本内容。特别介绍自由商业、私人产权均受“法律上的保证”，“凡苏维埃俄国的公民，都有经营组织工商企业之权，金钱的私有权无限制”，“‘物权’上之关系，则质权、发明权及遗产权都有规定”，等等。他认为苏维埃俄国通过立法保障无产阶级权利，“亦可以算尽其能力于执行‘革命’之使命了”。

6月15日 作《世界劳工之统一战线与莫斯科》，发表于8月

18日上海《时事新报》。

6月26日 作《反对社会革命的社会革命党》，发表于8月19日至21日上海《时事新报》和8月24日、25日北京《晨报》。介绍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产生，说它刚成立时，“即已与正派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被列宁称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文章叙述了社会革命党的演变过程，指出十月革命以后，“一切纯入于反动潮流”，并分析了社会革命党“竟成反动派”的根本原因。文章列举社会革命党在十月革命后的“种种罪恶”，并介绍自6月8日开始以来，社会革命党案的审判情形。

6月27日、7月3日 作《智识阶级与劳农国家》，发表于9月10日、20日北京《晨报》。瞿秋白在这篇通讯中，说中国驻莫斯科的记者，只有他“区区一个”，全副功夫只注意于俄国的“政治”、“外交”、“经济”，“会议又会议”，未免太厌烦，所以现在排一段“文人雅事”，为读者解解闷。本文专门介绍俄国知识分子的状况。认为俄罗斯的知识阶级，19世纪六七十年代，极汹涌的革命精神在世界社会思想史上放出无量光焰，不下于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运动。指出，1905年革命以后，知识阶级暴露出不同的政治态度。文章说，“一部分真正的小资产阶级，纯粹入于反革命之营垒，……结果完全失败，遁逃外国。一部分就是真正的思想(者)、诗人、文士，时为其个性主义所蔽，不愿意了解布尔塞维克的革命意义，也只落得侨游西欧，落魄无聊”。接着报道他们在西欧活动的概况，不同的派别都办有报纸，经常各自或互相之间进行争辩。到1921年劳农政府基础稳固，十月革命，在人类文化上，在俄国劳动者的利益上的真价值日益明显出来了，“于是‘思想者’的知识阶级悔悟而重归大道”。文章说：“1921年，此派知识阶级遂组织一杂志于国中，就名以《以代罗针》。”称这一派代表着知识阶级的“新思潮”。文章着重介绍了《以代罗针》派的使命及其对革命的态度。

6月 翻译《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发表于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1期，介绍第三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及少年共产国际。

7月2日至4日 于上海《时事新报》发表译作《无产阶级运动中之妇女》。

7月10日 作《海牙会议与俄国》，发表于9月6日上海《时事新报》和9月9日北京《晨报》（改题为《海牙会议与俄罗斯》）。

7月16日至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宣言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作出决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陈独秀被大会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7月17日 作《苏维埃俄国之劳工保险法》，发表于11月14日上海《时事新报》和11月18日、19日北京《晨报》（改题为《欧俄新订之劳工保险法》）。文章揭露俄国帝制政府时由国会通过的保险法，是“偶然从外国底稿抄来的官样文章”，“是潦草塞责缓和工人不平的敷衍办法”；1917年临时政府所订的保险法，“不过是俄皇时代底稿的‘三读’形式，一一文句上稍微好一些”。文章认为，只有今年6月1日劳农政府颁布的保险章程，才是真正保护劳工利益的保险法，“确能实行劳工保险之纲要的全部，较之于西欧资产阶级国家之保险事业，为社会文明上之一大进步”。文章逐一地分析了苏俄新订劳工保险法的“五大特色”，指出劳工保险的范围和对象、保险费的缴纳等规定，都优于西欧国家。文章还介绍了劳农政府为保证劳工保险法的实行而规定的若干措施。

7月24日 作《劳农俄国之国内商业》，发表于9月19日上海《时事新报》和9月22日、25日北京《晨报》（题改作《欧俄国内商业之新发展》）。文章指出，苏俄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的经

济方针,国内在于“恢复大工业”,国外则是“整理通商事业”。但工业因“久年封锁,饥灾战祸”,“一时不能恢复旧状”,故“劳农政府经济事业上的全副精神,暂时还只在‘国内商业’”。文章着重介绍伏尔加河和沃加河交汇口的下新城(即今高尔基市)的“极重要地位”和兴衰史,通过对下新城市集“复旧况”的介绍,让读者了解苏俄“国内商业之现状”。文章指出,国家银行正在“赶办下新城分行,努力振兴信托事业,恢复金融之枢纽”,又介绍国家机关(如国立托拉斯及辛迪加、各区经济总会、各省供给机关商业部等)以及东方各国(波斯、阿富汗等)参与此市集贸易活动的盛况。

7月31日 作《海牙会议后欧俄经济之前途》,发表于10月7日北京《晨报》。瞿秋白根据自海牙返回莫斯科的劳农政府代表的谈话,概述了“海牙会议已经无结果而散,此中前因后果,以及对于苏维埃国家经济事业的前途之关系”。文章指出,最近一年内,俄国经济恢复计划的重要点,“大概不能在于外国的新借款,而只可以完全利用国内自有的富源” 文章说:“恰好海牙会议时,正是俄国渐脱饥灾而进于丰收年之际,今年年成非常之好,食粮状况的前途,大有乐观。”最后,列举若干事实,说明俄德之间自互认条约签订后,“两国经济关系已渐入常轨”。

7月 蒋光慈在读了瞿秋白的《赤潮集》诗稿后,作一首题为《西来意》的诗相赠,以表达共同抱负。诗人把俄罗斯比作“当年的印度”,把自己和瞿秋白比作“今日的唐僧”,称他们赴苏俄学习和考察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十月革命这部“真经”。蒋光慈和瞿秋白于1921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就相识,并建立了革命友谊。他们曾共同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探讨了无产阶级文学与近代文学的渊源关系,研究过新诗的创作和改革,并且相互交流了新作。

8月8日 作《苏俄一九二二年之丰收》,发表于10月7日、8日上海《时事新报》。报道并评述苏俄1922年夏季农作物可获丰

收的经济形势。据全俄中央统计局的报告，今年夏熟作物的产量预计“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三光景”。瞿秋白认为农业丰收，有了余粮，就“足以舒展俄国的经济生活，利用之振兴实业，创办电站，购取国外的机器等，来年的经济状况大可乐观”，“城市居民的食粮状况，也大有改善之倾向”。

8月13日、17日、20日 作《新经济政策之因，旧政治思想之果》，发表于10月10日、11日、18日、19日、20日上海《时事新报》和10月13日、17日、21日、23日、24日北京《晨报》。

8月18日 于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世界劳工之统一战线与莫斯科》。

10月12日 于北京《晨报》发表《劳农俄国之经济前途》。

10月 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至北京。

11月5日至12月5日 共产国际在彼得格勒（11月9日移至莫斯科）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参加会议者有50多个国家约400余名代表，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和刘仁静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翻译出席了会议。列宁作了题为《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列宁因身体欠佳，只重点讲了新经济政策问题，托洛茨基作了补充报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刘仁静在会上作了发言^①。大会讨论和制定了团结广大群众的统一战线的方针，通过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总题纲》。大会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统一战线的策略，应当采取反对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形式。瞿秋白为陈独秀等人作翻译，并及时地把列宁在会上的报告和其

^① 会议规定，大会发言限英、俄、德、法四种语言。陈独秀虽懂英语，但口语表达还有困难；瞿秋白虽能用俄语发言，但又不是代表；刘仁静英语较好，故由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言。

他重要文件译成中文，寄回国内。

12月上旬 以新闻记者身份参加莫斯科苏维埃政府为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少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赤色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国代表饯行而举行的宴会。宴会结束，欣赏戏剧演出。

12月21日 因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应陈独秀邀请离开莫斯科回国。瞿秋白在苏联“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俄国历史的及现今的环境，中国社会呢？客中中国书籍没有，不用说现代的不能研究，就是历史的都不成。于是决定回国一次。”^①这也是瞿秋白回国的原因。回国前匆匆地告别几处大学的教授、东方语言学馆的同事、棉纺厂的职工等。

1921年至本年 撰写《俄国文学史》一书，比较系统地评述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诸如“民间文学”、“古代文学”、“俄国文学之中世纪”、“俄国文学与西欧文明”、“俄国文学之黎明”等，介绍著名的文学家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等人的生平、创作道路和文学成就。这里，瞿秋白进一步评价了普希金和果戈理。赞誉普希金是“俄国诗的太阳”，他的文学作品，具有“现实性”和“平民性”，语言纯洁而美丽。指出果戈理是普希金派最著名的作家，认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到果戈理时才算完成，果戈理比普希金更进了“一程”。他指出：“普希金是‘文学接近生活’的第一人，而歌歌里的描写更侧重于现实生活中的消极的恶的方面。”特别赞赏果戈理开创的“心理分析”的创作方法和“文学为服务社会的工具”的主张。瞿秋白通过评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名著，论述托尔斯泰的伟大，说他具有“开人类文学史的奇彩”。瞿秋白这部《俄国文学史》，后来于1927年10月，经他本人同意，由蒋光慈加以删改，并改名《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被编入蒋光慈自己的专著

^①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419页。

《俄罗斯文学》下卷。蒋光慈在《书前》写道：“关于本书的下卷，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朋友屈维它（瞿秋白）君，因为这是他的原稿，得着他的同意，经我删改而成。本书当然是简单概括的很，不过读者也可由此得知俄国文学与俄国社会运动的关系。”^①该书于同年12月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印行，为商务印书馆“世界丛书”之一。

本年完成《俄罗斯革命论》（又名《现代的俄罗斯》）。次年春，因经济困难，以800元将书稿卖给商务印书馆。后中共中央得知，要用钱赎回，商务印书馆不肯，但又不敢出版。1932年“一·二八”时，商务印书馆遭日本飞机轰炸，该书稿被烧毁。但是，其中的《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一篇，因曾单独发表于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得以留存下来。发表时以编者名义在文前加了按语：“此篇为瞿秋白所著《俄罗斯革命论》中之一篇，原题为《世界革命之先驱》。那部《俄罗斯革命论》，本是秋白集所作关于‘十月革命’的各方面之论文而成。他的体裁，是科学论文的论文，琐屑的史实不载。所以本篇也是如此，——所述至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止（1921年）。”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1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癸亥)

二十四岁

1月1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明确指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同时又强调：“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活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1月13日 回到北京，住在东城大羊宜宾胡同他的堂哥瞿纯白家。后来，有时在黄化门西妞妞房瞿菊农（即瞿世英）家小住。归国后，李大钊曾介绍他到北京大学俄国文学系教授《俄国文学史》，后因学校反动的教务长顾某把持校政，不发聘书而未成。当时又有人邀请瞿秋白到北京政府外交部工作，月薪200元，外交总长黄郛送来了聘书。瞿秋白很恼火，说：“这是谁同意的？为什么给聘书？”又说：“上海有我的工作。”^①

1月17日 作《最低问题——狗彘食人之中国》，发表于1月27日北京《晨报副刊》。文前写有简短引言，说他离开中国两年回来后，本急于想把“在俄国研究所得以及俄国现状”告诉国人，但到京三天后，中国现实生活，使他“受异常的刺激”，所以“不得不先对

^① 曹清华：《点滴忆秋白》，《文艺报》1955年第11期；羊牧之先生的回忆，1980年4月。

中国说几句‘逆耳之言’。”瞿秋白在文章中正视现实，痛斥帝国主义的罪行，“纵犬食人”，谴责中国政府是“‘率兽食人’的政府”，“谄媚欧美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平民劳动者”。指责统治阶级整天在高谈什么“最高问题”、“阁员问题”、“巡阅使问题”、“制宪问题”等等，即所谓“高等华人的大心事”，而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威海卫问题”、“片马问题”、“英国派兵唐山问题”、“殴辱重庆学生问题”等等的所谓“最低问题”，实质是中国人民最根本的问题，则不予“一顾”，置之不理。瞿秋白呼吁人们，“不要再做华盛顿会议的黄粱梦了。”指出：“中国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义，假使不推倒世界列强的压迫，永无实现之日。”“全国平民应当亟亟兴起，——只有群众的热烈的奋斗，能取得真正的民主主义，只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能保证中国民族不成亡国奴，切记切记！”

1月25日 作《赤俄之归途》，发表于1月30日、31日北京《晨报副镌》，抒发离开“世界第一新国”——俄国的惜别之情，“低徊不舍的感慨”。文章对当时的俄国同两年前的俄国作一对比，赞俄国的“惊天动地”的变化，指出“现在俄国正在‘复活’，两三年前到过莫斯科的人，如今不认识他了”，街上有“许多大商店”，行人“穿着也整齐得好多”，“小工业（纺织、火柴等）已经大大恢复”，农业也“有复生气象”，等等。他特别指出，在归国途中看到铁路交通方面同两年前相比，“有天渊之别”；现在有定期“特别快车”，车上“有卧位”，“有饭车”，“沿路车站上都可以打开水，买食物”等。瞿秋白以亲自考察所得，揭露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当局对苏俄的诬蔑。他要求人们无论如何应当知道俄国决不是什么“洪水猛兽的过激派”，“俄国是一个人的国，也许是‘人食狗彘’的国，可决不象狗彘食人的中国”。

1月26日 孙中山与苏俄全权大使越飞在上海签署《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1月27日 作《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发表于1月31日《向导》第18期。这是瞿秋白归国后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文章首先指出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形势：“中国的辛亥革命死了！在满中国都是反动的潮流，他一天一天的紧迫要想返中国于封建制度”，“寇盗式的军阀财阀——一大班督军、总长、议员、政客，零冠拍卖中国于世界的列强”，结果“引起五四运动、六三运动”。文章分析了“五四的精神”和五四以来“动荡不止”的“革命潮”，从而揭示了知识分子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肯定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又指出知识分子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必然要发生“阶级分化”。瞿秋白认为那士绅阶级，“以政客为职业，以议员为职业”的“旧的智识阶级”成了“社会赘疣”，而那“‘欧风美雨’，学校的教职员，银行的簿记生，电报、电话、汽船、火车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成了“新的智识阶级”，他们“是新经济机体里的活力，正在膨胀发展”。特强调青年学生的重要作用。他说：“新的智识阶级中之学生界，尤其占最重要的地位，和旧的智识阶级中之官僚一样。”指出：“一是民治派的健将，一是专制派的鏖师。”瞿秋白最后提醒革命的知识分子不可以“自傲”，应当同革命主力军工农群众相结合，他说，“在两种政治倾向的冲突中”，智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辅助的工具”，“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

1月 编译《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之党纲问题）》，发表于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1期（共产国际号）。该文首先提出，世界无产阶级要担负起“改造社会”的伟大使命，必须要有改造社会的“总原则”、“计划”和“步骤”，也即要制定党的纲领。文章说：“无产阶级秉其集合组织之根性，能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深察世界社会中之动象，得有切于现实的总原则，以为进攻资产阶级社会之方针，进而求发展生产力，——发展无产阶级自身，也即以

整顿世界经济的总规划，——有此，方能以革命的方法改造社会，复兴人类的文化。”接着详尽地介绍共产国际诞生以来的世界经济状况、共产国际在世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共产国际党纲的理论根据和大体纲要。

1月 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处演讲，介绍苏俄的现状和苏联的文学。^①

1月 时常同友人郑振铎、许地山、瞿菊农等聚会，参加聚会的还有曹靖华、韦素园和李霁野等青年朋友。他们在一起大多是交谈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有一次，瞿秋白对曹靖华说，中国文学园地太贫瘠了，你应当做一个引水送肥的“农夫”。^②

2月1日 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下令禁止。2月4日，京汉铁路全线工人两万余人举行总罢工，全路客、货、军用列车一律停驶。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调集两万多名军警，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及其他各站的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屠杀。全路工人被打死50人，打伤300余人，被捕入狱的40多人。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在敌人的屠刀下，慷慨就义。此血案即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2月 编译《现代的劳资战争与革命（共产国际之策略问题）》，发表于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1期（共产国际号）。文章指出革命策略的极端重要性，详尽地介绍了欧战以后劳资势力的消长，法塞派的反革命活动；共产国际策略的总原则及其运用的经过；共产国际最近革命的战术方针。瞿秋白阐述共产国际的策略时，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指出：“务使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

^{①②} 王铁仙：《瞿秋白文学译传》第86、8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87年。

导的地位，在无产阶级之中则共产党取得指导者的地位。”这是因为“他们要求较高且广，自然能包含其他阶级的要求，而其他阶级的要求却不能包含他的”。同时，无产阶级“较其他阶级（小资产阶级等）为彻底，为不妥协”。进而指出共产党的策略必须以“无产阶级为主体”，“联合一切劳动群众，——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等”，只有实行这样革命联合，“方能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

2月 作《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发表于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1期（共产国际号）。本文是作者对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发表在1922年7月8日、10日至13日北京《晨报》上的《先进国之社会主义观》一文所作的评论。罗素在上列一文中提出“世界之阶级战争为文明之末路，而非新世界之门户”的观点，“反对阶级斗争”，而坚持和平主义的立场。瞿秋白针对罗素的观点作了具体分析和评论。指出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必不可免”的，无产阶级只有经过阶级斗争“取得政权”，“方能完全消灭世界之资本主义”。他说：“并不是无产阶级格外爱斗争，而是资产阶级不容你不斗争。”他责问罗素：如果不要“工人阶级独立执政，请问欧洲之‘社会主义合众国’如何而有？”“其结果所得，至多是‘以大英为中心之欧洲的国际帝国主义’”。瞿秋白指出，许多历史事实一再证明：“若不经阶级斗争而行无产阶级独裁制，资产阶级也决不容忍你们来从容不迫的行‘社会主义政策’”，“你怕牺牲‘世界文明’，资产阶级却不怕牺牲你呢”。瞿秋白最后又作了形象的比喻：只有进行革命，同资产阶级进行对抗，“破坏方能较少”，“方能缩短此‘社会主义婴儿’之难产时间而减少其痛苦”。

3月 作《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署名屈维它，发表于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1期（共产国际号）。文章剖析和批评以梁启超、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的封建主义哲学——复古倒退的思想。文章分析了东西文化的本质及其特点之后，指出所谓东方文化

基本上有三个元素,即(一)“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二)“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三)“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文章说:“所谓东方文化的‘恶性’决非绝对的,宗法社会的伦理也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但是他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同时指出:“中国的文化,——宗法社会,已经为帝国主义所攻破;封建制度已经成帝国主义的武器。”因此,东方文化完全是复古,拉历史的倒车,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瞿秋白认为,只有“宗法社会及帝国主义颠覆之后”,东方文化才能获得发展,“引向新文化的道路”。最后,他明确指出:东方被压迫民族必须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祸,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

4月7日 陈独秀致信胡适,请他帮助“早日出版”瞿秋白介绍“新俄”的书。信上写道:“秋白兄的书颇有价值,想必兄已看过。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陈独秀认为“秋白此书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误解”。所以他切望胡适“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为要”。^①

4月20日 作《北京政府之财政破产与军阀之阴谋》,署名巨缘,发表于4月25日《向导》第22期。文章指出:北京政府“内外罗掘一空,竟想到私印印花税,增发流通券,甚至于要公卖鸦片烟,无一不是故意扰乱金融,盗取社会财富,以遂军阀的阴谋,巩固其统治地位。”文章认为必须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国财政才有希望”;“若不肃清祸源,不但财政无整理清楚之一日,而且全国经济都将毁灭。”文章对军阀血腥镇压工人的暴行进行无情地谴责,同时告诫资产阶级要赶快醒觉起来。文章说:“全国资产阶级诸君呵!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94页,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

你们不要睡觉了，军阀们杀到你们面前来了！请看2月7日京汉罢工工人受曹锟、张福来、吴佩孚、萧耀南的残杀压迫，……。此种反动潮流卷及各路，直到上海，这明明是军阀们对于国民的示威运动呵！”文章认为，决不能把这种屠杀看成为“单纯的工潮问题”，因为横暴的军阀镇压工人以后，“对于胆小的商人还有什么顾忌”！于是要求资产阶级不要再“迷信和平手段，迷信外国人的势力了”，“快快低首于劳苦平民的革命伟力之前”，站到劳工阶级的一边，共同反对军阀。文章一再强调：“军阀阶级不倒，各地方不联合作一总解决，民权永无伸张之一日；全国各界不附合于劳动阶级作全国的群众运动，亦永无建立民权之日。”

4月25日 作《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发表于5月2日《向导》第23期，着重分析了中国军阀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条件。文章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只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半宗法社会的状态，所以虽然号称‘中国’，其实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半自然经济’的区域，生生的粘合起来罢了，——那里是整个完全的中国？因此，每一个经济区域自然形成一政治的中心，——割据的局面，藉此而造成。”文章还阐述了中国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互相依存的关系，指出他们结成反动同盟，共同压迫中国人民。瞿秋白要求全国人民应当团结起来进行“武装革命”，开展“群众运动”，“颠覆封建制度，掘帝国主义的根，绝帝国主义的命”。

4月28日 作《乐志华案是一幅中国的缩影》，署名巨缘，发表于5月2日《向导》第23期。文章通过描述宁波人乐志华因“向洋主人辞退”而遭到上海虹口巡捕房一顿无端诬陷和严刑拷打的血淋淋的事实，揭露了英、日等帝国主义在华的罪行，大声疾呼：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赶走帝国主义，撤销“治外法权”。

4月 中共中央机关由北京秘密迁回上海，以便加强对南方工作的领导，进一步推进国共合作的实现。瞿秋白也离开北京到

了上海。时住闸北区，屋内布置得像作家的书房，出入于他那里的是些青年作家。他与国民党于右任过往甚密。^①

初夏 中共中央决定把机关刊物《新青年》由月刊改为季刊。瞿秋白任主编，为《新青年》设计封面，题写刊名。他还主编中央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在这些刊物上，瞿秋白先后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和译述，致力于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探讨和总结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此外，瞿秋白紧密结合中国革命斗争形势，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主张、方针和政策，武装工农群众的思想，及时地给工农群众指引斗争方向。他在文章中批判了胡适、张东荪、梁漱溟、吴稚晖、戴季陶等人。还常给塔斯社写稿。瞿秋白对党早期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理论宣传作出了巨大贡献。

5月7日 作《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发表于7月1日《前锋》创刊号，驳斥章士钊的《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一文^②。文章揭露国会和代议制的本质，指出这种制度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形式。瞿秋白认为国会一类的东西，在一国之中不外有两种作用：一为治者阶级把持政权或新兴阶级夺取政权的工具；二为治者阶级各部分之间进行争夺的调节机关。指出：“中国的治者阶级是军阀，中国国会就代表他们，压迫劳动平民”，“成军阀政治之一机械”，“中国国会里也常常表现所谓皖派、直派、奉派等的斗争。”他还指出中国国会，“因其经济基础的畸形”，而形成一种“畸形的制度”。最后，批判了章士钊的所谓“农业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指出章士钊主张回到“古代的均产社会主义”，那是历史的倒退，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83页。

^② 此文发表于上海《申报》，1923年4月18日、19日。

律。

5月21日 作《文明的列强，野蛮的中国？》，署名巨缘，发表于5月23日《向导》第26期。

5月23日 作《一致团结的反对军阀罢！》，署名巨缘，发表于6月6日《向导》第28期。

5月23日 作《中国还没有亡？》，署名巨缘，发表于6月6日《向导》第28期。

5月26日 作《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署名屈维它，发表于7月1日《前锋》创刊号。文章论述了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原因，进而揭露帝国主义自鸦片战争几十年来，以各种方式和手段侵略中国的罪行。指出，鸦片战争时，帝国主义“侵略方式纯是各行其军事的占据领土，及强力开辟商埠”，把中国变为他们“销货的市场”。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侵略方式已是列强争相以军力、以外交手段占据‘势力范围’”，“中国对于列强已成原料出产地”。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战争以后，列强“侵略的方式乃是争相放债以取得抵押品，取得债权，取得监督财政权为条件，……于是关税、盐税等都入外国人之手”。他们向中国“移植资本”，创办工矿企业。除上述方式外，列强（主要是美国）又进行“文化侵略”，“遍处设立教会学校，办他那假惺惺的慈善事业”，“改造中国人的心肺，贿买整个儿的阶级，预备做他将来的‘代理统治者’”。文章还分析了列强在掠夺中的矛盾和斗争，指出英国、日本、美国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他们侵略方式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

5月 马林从莫斯科来到上海。他携带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特别训令，由瞿秋白译成中文。训令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扩大与国民党的合作，并建议尽快在广州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训令，立即着手筹备中共“三大”的召开。瞿秋白参加了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不久，他

便南下广州。中共中央在广州东山住宅区临时租赁了一幢房子。马林住在附近一幢房子里，瞿秋白、张太雷和马林同住，任他的助手。^①

6月2日 作《中国之资产阶级的的发展》，署名屈维它，发表于7月1日《前锋》创刊号。文章论述了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发展状况和特点，以及同“外国资本主义之冲突”。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指出：“中国的宗法社会遇着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侵入，而起崩溃，方开始有真正的‘资产阶级的的发展’，也可称‘资本主义的发展’。”文章详细地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正确地把中国资本主义区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两个部分。指出：“军阀财阀(官僚资本)勾结帝国主义，扰乱经济，为资产阶级的的发展之直接障碍。”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具有反抗性。因为“中国资本主义之出世便受欧美大生产的拥推挤轧”，列强又和封建军阀相结合，“垄断操纵”中国经济命脉，限制、压抑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他一再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对抗力”，“恨帝国主义”，“中国经济之反抗外国资本，必不可免”，“中国实业要求发展而抗帝国主义”。同时也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和妥协性，不敢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说：“资产阶级之中，大商阶级依赖外国资本，每每易于妥协，或者想望一个军阀来统一太平，以应其经济需要，或者竟想利用外国势力驱逐军阀。”

6月12日前 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会期两天)，讨论政治路线，分工起草各个决议案，以及商讨中央委员的人选问题。瞿秋白分工负责起草党的纲领草案。

6月12日至20日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的中心是讨论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的

^① 张运舟：《我的回忆》第1册，第285~286页。

问题。瞿秋白出席会议。他同陈独秀、张太雷、毛泽东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批评了张国焘不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左”的观点，坚持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正确意见。瞿秋白在会上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指明农村的自治运动，农民应当力争参加政权，反对“包办地方事务的乡董”，但是没有为大会所接受。由他起草被大会通过的党的纲领，在付印之前，被陈独秀修改了三处：一、原文：“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改为“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二、原文：“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改为：“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也很难成功”；三、原文：“…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为：“……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①瞿秋白还向大会作了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文件，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和组织形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继任委员长。瞿秋白被推任为宣传委员会委员。

6月 在中共“三大”期间，关于国共合作的问题，瞿秋白先后发表了不少正确的意见，首先肯定，“没有无产阶级参加，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不会成功”。接着正确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他认为资产阶级“会革命”的，“不要害怕资产阶级的壮大，因为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在壮大”，“不能采取与他们分离的办法阻止他们的发展”。他要求要以发展的观点，看待国民党，他说：“国民党从一个没有纲领的政党成长为一个有纲领的政党，现在已接近于一支真正的社会力量”，“已觉察到工人的力量”。他主张要团结改造国民党，“参加国民党”，指出共产党的职责是“领导无产阶级推

^①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二章的“附言”，《六大以前》，第698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

动国民党,使其摆脱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具有革命性”。他认为“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他强调指出,共产党不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那末国民党“就势将寻求军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助”。^①

6月13日 于《向导》第29期发表《冯玉祥与吴佩孚》,署名巨缘。

6月15日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出版,发表瞿秋白撰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新宣言》肯定了《新青年》的历史作用,称她是“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明确指出了《新青年》的伟大使命;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新宣言》指出:“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于是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

6月15日 于《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发表《国际歌》中文译词。当时,《国际歌》已有三个中译歌词,但是都不合乎唱的要求。回国后,瞿秋白根据俄、英、法等文本译出了新词(在莫斯科就着手翻译)。他懂乐谱,会弹琴。一边翻译,一边弹唱,苦心斟酌,几经修改,始将《国际歌》歌词成功地译出来。“英特纳雄耐尔”一句,则照国际惯例保留原音,与乐谱相配。在歌词前写有小序,说:“此歌自1870年后已成一切社会党的党歌,如今劳农俄国采之为‘国歌’,——将来且成世界共产社会之开幕乐呢。”瞿秋白希望“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

^① 李玉贞等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6月15日 于《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发表《赤潮曲》(歌词及谱),署名秋渠,表述俄国十月革命对灾难深重的古老中国所产生的震撼——“惊醒了”中国人民的“沉梦”;歌颂中国工人阶级在俄国革命影响下,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四万万同胞,同声歌颂神圣的劳动”;激发中国人民革命的斗志——“猛攻,猛攻,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奋勇,奋勇,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进而要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实现“共产大同”而奋斗;最后指出光明的革命前景——“光华万丈涌”。

6月15日 于《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发表译作《俄罗斯革命之五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上的演说》。

6月21日 以一个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名义,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瞿秋白考虑到中国的民族运动对世界革命具有重大的意义,向季诺维也夫简要地报告了一些中国的情况。他介绍和分析了中国的阶级状况,说“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不能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在很多情况下助长了盗匪,增加了‘雇佣军’”;“商业资产阶级没有自由,并依赖国际帝国主义”;“工业资产阶级,它还十分年轻,谈不上同国际资本家竞争”。指出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具有两面性:“他们有时接受帝国主义方面的‘帮助’,以威胁督军们,有时向督军们摇尾乞怜”;但是,不能说,“中国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民族革命和民主改革的要求。”他说,中国的无产阶级虽然很年轻,人数少,又同农村和宗法制度有联系,但它是中国“唯一彻底的革命力量,只有它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进而认为,在目前的中国,仅仅依靠如此薄弱的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是“无法完成民族革命的”,必须和国民党合作,并如中共“三大”通过的提纲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有必要担负起改组国民党的任务,以补充劳动人民成分,来扩充国民党,巩固它的革命立场,并以此加强共产党对它的影响。”瞿秋白最后对季诺维也夫说,中

国共产党还很年轻，希望共产国际能给它“指出更正确的道路”，希望苏俄给予“中国民族运动以更大的关注”。

六月下旬 到杭州。在西湖船上，召集浙江省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会议，传达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到会者有徐梅坤、于树德、金佛庄、徐白民、董方城、许白昊等12人。^①瞿秋白还去烟霞洞访问正在那里疗养的胡适。胡适曾嘱他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一个编辑的位置，做些学问。当时，瞿秋白住在岳王村四伯父家，看望了四伯父及寄养在那里的妹妹轶群、弟弟景白。

6月 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至广州。9月初，又迁回上海，在闸北香山路（今象山路）公兴路口的三曾里3号办公。^②

7月1日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创刊号于上海^③出版。瞿秋白任主编，他除发表前已述及的3篇论文外，还以巨缘署名发表寸铁3则：《上海申报馆里的农业国》、《无用的人与东方文化》、《20世纪的绝妙好辞》。

夏 经李大钊向于右任、邵力子推荐，同邓安石（即邓中夏）先后来上海大学工作。上海大学是国共联合创办的一所新型的文科大学。于右任任校长（后由邵力子代理），邓安石任教务长（又称总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陈望道任中文系主任，何世桢任英文系主任，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向警予、萧楚女、杨贤江、蒋光慈、施存统等兼任社会学系教员。瞿秋白为上海大学确定办学方针和教学方案，指导了上海大学的教学工作。他主讲《社会

① 杨之华：《秋白同志年谱》（未刊稿）。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第57页，知识出版社出版，1988年。

③ 刊物版权页上，“出版者”印“广东平民书社”，那是为了蒙蔽敌人；实际上是在上海出版的，共出3期，1924年2月1日停刊。

科学概论》、《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和《现代民族问题》等。他的讲课，特别注意把革命理论和当前的斗争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并能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因而深受学生的欢迎。其他系科的学生及外校的学生都时常来听课，把教室挤得满满的。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期间，同邓安石、恽代英、蔡和森等人，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青年学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为党培养革命干部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夏 经沈雁冰介绍认识了周建人。瞿秋白聘请周建人来上海大学教授达尔文的进化论。

7月8日 根据中共中央通知，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召开了上海共产党员全体会议，由出席中共“三大”的代表传达中共“三大”的决议，并进行改组，改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为中共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会议选出徐梅坤、沈雁冰、邓中夏、甄南山、王振一五人为上海地方兼区执委委员。次日，地方兼区执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邓中夏为委员长。同时将全市党员编为上海大学、商务印书馆、西门、虹口4个小组。瞿秋白和邓中夏、施存统、王一知、贺昌、张春木、严信民、黄让之、彭雪梅、许德良、林蒸等11人编为第1党小组(上海大学)，林蒸为组长。会议还指定瞿秋白和邓中夏负责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纲。会议还决定办劳动夜校。瞿秋白和邓中夏经常到劳动夜校讲授共产主义常识、劳工运动常识。^①

① 茅盾：《文学与政治的交错——回忆录之六》，《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第12～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按：上海党小组于1923年8月12日、9月27日和1924年1月13日又作过调整。与瞿秋白编入第一党小组的先后还有：陈比难、邵力子、刘拜农、向警予、刘剑华(刘华)、张景曾、龙康庄(龙大道)、沈泽民等。

7月 作诗《飞来峰和冷泉亭》，发表于7月20日《民国日报·觉悟》和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2期。

7月23日 作《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发表于8月2日、3日《民国日报·觉悟》，为上海大学制定了一整套的办学方案。瞿秋白强调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指出：中国被称为“远东四五千年的古文化国，现在反而落后，学问艺术无不要求急速的进步，方能加入国际学术界的文化生活。”他认为中国当初，“不但未发生什么真正的社会科学，并且连相当的术语多没制造出来。”因此，他给上海大学提出了明确的办学任务。他说：“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系统——这两件事便是当有的‘上海大学’之职任，亦就是‘上海大学’所以当有的理由。”要求引导学生学习社会科学原理，“确切的了解其所要改造之对象”，投入“改造社会”的实际斗争中去；要求改革中国旧的文学艺术，创立新的文学艺术。瞿秋白作出的办学方案中，上海大学设立两个学院：社会科学院和文学院。社会科学院下设社会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法律学系、哲学系、史学系。文学院下分文学和艺术两个方面，文学方面设中国文学系、英文系、俄文系、法文系、德文系；艺术方面设绘画系、音乐系、雕刻系。办学方案中，还详细规定了课程的设置，列出必修和选修的科目、每周的教时，并强调学习外国语的重要，指出：“在中国现在要研究学术，非有两种外国语不够。”又对不同的对象，作出不同的要求。

7月28日 作《国会选举制宪统一的噩梦》，署名巨缘，发表于8月1日《向导》第34期，指出当时中国的国会“绝不能代表丝毫民意”，断言：“希望国会南下，防止大选，附和制宪，空言统一，——其结果必不免是一场噩梦。”瞿秋白认为，应当排除万难，把各界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组织国民军，与军阀宣战，用革命方法“歼灭一切军阀”，取消国会，“召集全国平民立国大会，制定宪法”，

只有这样，“方能奠定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基础，统一中国，复兴中国文化”。

7月30日 致信胡适，谈到自己如何办好上海大学问题。他说：“就了上海大学的事便要用些精神，负些责任，我有一点意见已经做了一篇文章寄给平伯，平伯见先生时，想必要谈起的。我们和平伯都希望上大能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①

7月31日 《文学旬刊》第81期公布特约撰稿者名单，共26人，瞿秋白名列其中。

8月1日 于《向导》第34期发表《摄政内阁卖国卖民之点将录》，署名巨缘。

8月2日 为郑振铎的译作《灰色马》^②撰序，11月10日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4卷第11号，题为《〈灰色马〉与俄国社会运动》，后印入《灰色马》译本卷首。序文认为“文学是民族精神及其社会生活的映影”，“俄国文学史向来不能与革命思想史分开”。瞿秋白在这里，介绍和评析了《灰色马》作者萨文柯夫，指出：“‘萨文夸夫^③不是一个真实的反抗者，’——译者郑君振铎说的不错。然而他却能做到‘艺术的真实’。”最后肯定了《灰色马》的社会价值，他说：“诚然不错，1922年后，社会革命党差不多已成历史上的陈迹。萨文夸夫的《灰色马》真是此‘社会革命党陈列馆’里很优美的成绩，——真是尽了他‘艺术的真实’之重任。他确实确实能代表俄国社会思想史——文学史里——时代一流派的社会情绪呵”！

8月3日 作《劳农俄国的新作家》，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4卷第9期。本文是为郑振铎所著的《俄国文学史略》而写的，列入

① 《胡适文选书信选》(上)第213页，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

② 《灰色马》是俄国路卜海所作的中篇小说。郑振铎的译本，1924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③ 今译萨文柯夫，笔名为路卜海。

该书的第14章。瞿秋白还校阅了全部书稿。该书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于1924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瞿秋白撰写的这一章，1927年收入自编的《瞿秋白论文集》，题改作《劳农俄国的新文学家》。文章热情地赞赏了高尔基及其《昨天和今天》一文，称誉高尔基是“劳动贫民的作家”。还介绍和评价了俄国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说他是革命后五年中“未来主义的健将”，“以革命为生活，呼吸革命，寝馈革命”，肯定“他的诗才，真足以在俄国革命后的文学史中占一很重要的地位”。瞿秋白认为马雅可夫斯基的天才，不仅表现在“文学之技术的方面”，而且他“有簇新的人生观”，“是唯物派，——是积极的唯物派，而不是消极的定命主义的唯物派”，“是超人，——是集合主义的超人，而不是尼采式的个性主义的超人”。

8月3日 作《大家都是良民，那里来的匪！》，署名巨缘，发表于8月8日《向导》第35期。文章无限同情贫穷农民的悲惨命运，指出他们受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榨，走投无路，“于是只能去当兵当土匪”，继而为其辩解，说“他们都是良民，那里来的匪！真正的匪是外国资本家、军阀、官僚、政客！”同时指出，农民长期受了封建主义奴役，只知“官逼民变”，“而没有结合城市劳工为正当的群众组织及群众运动”。瞿秋白这一分析极为重要，他提出了工农联盟的问题。他说，也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民治运动，才能推翻军阀，解放中国。”

8月7日 作《国法学与劳农政府》，发表于9月25日《东方杂志》第20卷第18期。

8月8日 上海大学全体教职员在上海“一江春”开会，决议组织评议会，推定评议员10人，校长于右任为主席评议员，瞿秋白同叶楚伦、陈德征、邓中夏、洪野、陈望道、周颂西、冯子恭、邵力子九人为评议员，由陈德征担任评议员书记。评议会为该校最高会

议，负责处理全校一切根本重大事务。12月，评议会改为行政委员会，并依据新章程进行改组，于右任为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瞿秋白同何世桢、洪野、叶楚伦、邵力子、曾伯兴、韩觉民为委员。^①

8月9日 作《流浪的狱中日记》，发表于8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学》第84期。作者假托这是三千年后的文章，以曲折的形式，揭露1923年2月7日军阀吴佩孚屠杀京汉铁路罢工工人的凶残和罪行，反映工人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

8月13日 作《新的宇宙》，发表于8月27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学》第85期，纪念1919年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杀害的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文章盛赞卢森堡是一位“诚挚热烈的文学家”，“现代真正的天才”，说她有“评论俄国文学的巨著”。文章引录卢森堡在狱中寄给李卜克内西夫人苏菲亚的几封“朴实可爱”的书札的内容，赞扬卢森堡那“伟大的文学心灵”，“热烈的革命精神”！对这位“时代之花”竟死于所谓社会民主党之手，感到非常惋惜。文章发出叹惜：“我们的‘红玫瑰’（Red rose）死了！”

8月14日 作寸铁4则：《世界的结局》、《康有为与许斯，梁启超与芳泽》、《德谟克拉西的法兰西》、《好容易！》，署名巨缘，发表于12月1日《前锋》第2期。

8月15日 于《向导》第36期发表《中国之所谓“五族共和”》、《美国主张不干涉的好意》、《世界革命中之德国》，署名均为巨缘。

8月20日至25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大会。会议着重讨论如何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并作出相应的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青年团“二大”期间，瞿秋白经施存统的介绍，认识了丁玲、王

^① 《上海大学教职员会》，《民国日报》，1923年8月8日；《上海大学之猛进》，《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5日。

剑虹^①。她们经瞿秋白的鼓励和动员，不久进了上海大学文学系就读。后来瞿秋白经常去看望她们，给她们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犹如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还教她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她们十分敬佩瞿秋白。

9月2日 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党员大会，进行一次小规模改组（因邓中夏等人调动工作），选王荷波、徐白民、沈雁冰、徐梅坤、顾作之为正式委员，选瞿秋白、向警予、林蒸为候补委员。9月4日，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王荷波为委员长，沈雁冰为秘书兼会计，徐白民、顾作之为国民运动委员，王荷波（兼）、徐梅坤为劳动运动委员，因徐梅坤正在生病，会议决定，由瞿秋白暂时代理。会议还调整了党小组成员，指定瞿秋白、蔡和森、施存统、恽代英、向警予、邓中夏6人为党小组讲演员，每人每月讲演一次。^②

9月20日 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举行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党的国民运动委员会继续进行工作。鉴于原有委员大半离开上海，会议作出决定，改派瞿秋白同杨贤江、陈其寿、黄让之、董亦湘、张秋人、邓中夏、施存统等8人为委员。^③

① 王剑虹，原名王淑璠，出生于四川酉阳，后迁居湖南。1917年考入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就读。为了玲同窗好友，五四运动时，就追求进步，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21年入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1923年夏，在瞿秋白的影响下进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念书。她信仰社会主义，热衷于妇女解放事业，并酷爱文学，常在《妇女声》等报刊上发表文章。

② 茅盾：《文学与政治的交错——回忆录之六》；江苏省档案馆史料编研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苏党组织发展简况》，《群众论坛》，1981年，第4期；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第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

③ 江苏省档案馆史料编研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苏党组织发展简况》。

9月21日 作《太平洋问题与美国钱袋里的中国》，发表于12月1日《前锋》第2期。

9月23日 作《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①，署名屈维它，发表于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2期。文章第一次介绍了马克思的《德国之革命与反革命》和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怎么办》等著作的光辉思想，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详尽地论述了民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无产阶级如何正确对待民治主义运动，从而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策略思想。瞿秋白在文章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不仅必须参加民主革命，而且应当与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并在斗争中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他强调无产阶级要“领导全体平民”。瞿秋白正确地分析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明确指出：“只有以世界无产阶级的观点为根据的政党，才能用社会主义的见解及运动方法来促进这一国民运动，或者简直改造国民党。”无产阶级“能彻底革命”，“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他还强调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参加民权革命，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平民之革命民主的独裁制”，并认为“平民之革命民主的独裁制”是中国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9月 受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派遣，鲍罗廷来中国。他经过上海时，会见陈独秀、瞿秋白等共产党人。

9月 在上海加入国民党。

10月4日 作《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发表于1924年6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6号。文章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

^① 《新青年》季刊第2期“目录”上印作《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1927年作者收入自编论文集时，适改作《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文内凡“民主主义”或“民权主义”均改作“民权主义”。

命给人类带来了文艺的春天，开创了世界文艺史上的新时代。文章说：“俄罗斯革命不但开世界政治史的新时代，而且辟出人类文化的新道路。”“春来第一燕，至少是天地回和的朕兆。何况惊蛰之后，雷声震发，百花齐放，那第一燕，正是此后第二第三以至于千千万万的先锋。俄国革命的文化事业，从此更无限量，是世界人类生活之艺术化的先河。”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文学的阶级性问题，他认为“真正的文化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文章还介绍了俄国两位为新文艺时代“漏泄春光的第一燕”、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创造者、后来死于其天责的劳工诗人——菲独·嘉里宁和柏塞勒夸，盛赞他们的革命思想和集体主义精神。

10月5日 作诗《铁花》，发表于10月15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学》第92期。作者抒发对打铁工人的深厚感情，生动地反映打铁工人的悲惨境遇，歌颂他们广阔的胸怀和坚强的性格。同时作者被铁花所激励，表白自己既不留连于“柔和细腻的自然里”，也不陶醉于“繁美华盛之中”，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美好前景的向往和追求。

10月 曹锟以五千元一票的价格贿买国会议员，“当选”为“大总统”。接着在他的操纵下，北京宪法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即曹锟宪法）。当时，《时事新报》张君勱著文《北京新宪法与江苏》，自称江苏省民，对曹锟宪法大加赞赏。11月1日，瞿秋白作《好一个江苏省民！》，署名巨缘，发表于11月27日《向导》第47期，驳斥了张君勱关于曹锟宪法的种种论调。文章分析了曹锟宪法的阶级本质，指出它虽然规定了些好制度，但只是空文一纸。文章说：“军阀钦赐宪法原不过装饰场面；军费不因宪法条文而减，省自治不因宪法条文而实行；至多只有借口裁减异己的军饷，增加小军阀的权势，那里有什么义务兵，有什么省自治！”文章明确指出，宪法是体现阶级力量和阶级意志的，只有国民共同“集合武力，推

翻军阀”，“先有实力证实民权”，才能产生人民自己的宪法。

10月6日 鲍罗廷由上海来到广州。瞿秋白随鲍罗廷离沪赴穗。10月8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产生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正式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顾问。瞿秋白充任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参与草拟国民党“一大”宣言^①等重要文件，经常参与鲍罗廷邀集李大钊、张国焘等中共代表的商谈。

10月上旬 鲍罗廷召集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委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和党团中央驻粤委员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进行改组方法，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②。瞿秋白同谭平山、阮啸仙等人参加了这次联席会议。

10月上旬 由广州返回上海。

10月9日 作《欧文的新社会》。

10月9日 翻译《劳动的汗》（高尔基作），发表于10月15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学》第92期。

10月10日 上海大学举行“双十节”庆祝大会。在会上，瞿秋白满怀革命激情，引亢高唱他翻译的《国际歌》。

10月10日 下午，同沈雁冰、周建人等参加郑振铎和高君箴的结婚仪式，并发表了以《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为题的讲话，提倡妇女解放，恋爱自由。前一天，郑振铎发现母亲没有图章，依照当时

① 宣言分三部分：（一）中国之现状，（二）国民党之主义，（三）国民党之政纲。据亚·伊·赵列潘诺夫忆述：国民党政纲草案，先在上海讨论，参加者有廖仲恺、瞿秋白、汪精卫、胡汉民等；后又在广州讨论了15个小时，参加者为廖仲恺、鲍罗廷、胡汉民、汪精卫、瞿秋白。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2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81年。

文明结婚仪式的要求，结婚证书上须盖双方父母的图章，便给瞿秋白写信，请他为母亲赶刻图章。瞿秋白很快回了信，附上“秋白篆刻润格”一纸，上开：“石章每字二元，7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郑振铎看后，误解为瞿秋白公务缠身，无暇刻章，便请沈雁冰刻制。次日，郑振铎意外地收到瞿秋白派人送来一红纸包，上书：“贺仪五十元”。内装图章3方，郑母1方，郑振铎和高君箴各1方。边款均刻“长乐”^①两字。3方图章限日取件，计48元，加边款2元，恰好是50元。郑振铎和沈雁冰对此不禁捧腹大笑。^②

10月11日 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瞿秋白辞去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的职务。^③

10月25日 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顾作之因办夜校辞去地方兼区执委会委员的职务，提补瞿秋白为地方兼区执委会正式委员。^④

10月28日 作《弟弟的信》，发表于11月19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学》第97期。这是瞿秋白读完弟弟景白寄自杭州一封信以后，写下的一篇感想。文章对郑振铎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欢迎太戈尔》一文中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不能爱一切人，而对那种衣冠禽兽的剥削者，“只该驱逐，难为保护”；“只可使他消灭，不可使他繁殖”。

10月 赴扬州，并在扬州作《荒漠里》，署名陶畏巨，发表于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2期。瞿秋白在这篇评论中，首次提倡新文学的大众化，指出，“中国的现代文还没有成就”，“文学的白话，

① 郑振铎和高君箴均为福建长乐人。

②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226页。

③④ 江苏省档案馆史料编研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苏省组织发展简况》。

白话的文学”口号，“都还没有着落”。他批评当时不少文章，还不够口语化，象是“翻译过来的”，没有“丝毫现实性和民族性”，成为“外古典主义”。因而使“许多奋发热烈的群众”的精神生活，仍旧处于“荒凉的沙漠”里。瞿秋白强烈要求中国文学家要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冬 一个傍晚，同王剑虹、丁玲及施存统夫妇一道去宋教仁公园散步赏月。在此前后，同王剑虹恋爱。丁玲为他俩传送心声。^①

11月1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南市小北门民国路振业里第1弄的弄口11号(今人民路1025号)正式成立了第二个^②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该书店曾出版过《向导》、《前锋》、《新青年》(季刊)、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科学讲义》第1至4集等。^③

11月3日 作《现在的满洲经济》，署名屈维它，发表于1924年2月1日《前锋》第3期。文章论述了满洲的殖民化、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经济的控制、大连和海参崴的竞争、日本的“大连市政策”对中国农民的严重影响及俄国革命后日本对北满的政策。

11月4日 作《俄国经济政策之剖析》^④，发表于1924年2

①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文汇报增刊》1980年第2期。

②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发行机构是1921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人民出版社。

③ 丁景唐：《瞿秋白同志与上海书店(1923~1926)——为纪念瞿秋白同志90诞辰而作》(打印稿)。此文经删改发表于1989年6月22日《新民晚报》。据该文谓：1989年“在南市区人民政府和市区文化局的支持下，上海文化生活技艺专修学校和文教界有识之士，为纪念瞿秋白同志90诞辰和繁荣文化出版事业，特选择在革命历史纪念地、瞿秋白同志地下斗争活动处之一的‘上海书店’旧址开设‘文化生活书店’，用意良深。”

④ 1927年作者收入自编论文集时，题目改作《俄国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

月1日《前锋》第3期。文章着重阐述和分析俄国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和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其重要意义。瞿秋白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后，“因内外阶级斗争之剧烈”，“国内国外的反革命引起新战争，和平政策暂不能行，‘遂提高其主义’而行军事的‘共产主义’。”他认为：“这是必须的，非此不能拥护住苏维埃政府。”“是俄国历史上所不能免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指出某种失误，他说：“有许多小企业不宜于集中，并且不宜于国有。一切生产分配完全受中央的命令，亦与（于）经济建设并无益处。这种制度仅仅利于统一的军各供给计划而已。”一针见血地指出俄国经济政策的失当之处。瞿秋白这一批评很正确，颇有见地。

11月7日 于《民国日报·觉悟》发表《十月革命与经济改造》。介绍和分析苏俄十月革命后工业、农业的经济政策及其变化，评论经济政策对发展生产、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要意义。瞿秋白从苏俄十月革命后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中，认识到经济改造和经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只有经济改造事业，普遍于全世界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指出，“发端于俄国的社会革命，已经保证世界上一部分无产阶级的政权，使他们能从事于经济改造的事业。”他切望“其余各国的劳动平民必须继起力争，共谋建设那真正博爱、自由、平等的将来社会。”

11月8日 作《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发表于1924年1月10日《东方杂志》第21卷第1期。文章对东方文化派作有力的批驳。瞿秋白辩证地分析了现代资产阶级文明，认为资产阶级文明比封建宗法时代文明要先进，它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并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深刻地批判东方文化派的“科学无能”、“科学破坏”的谬误和“农村立国论”等复古“向后转”的思想。同时瞿秋白还揭露了资产阶级科学文明的弊端，他说，资本主

义特别是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事实上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因此新文明的影响而更不平等，所以思想上的民权几乎等于纸上谈兵，——科学使人享法律上的平等而消失事实上平等的可能，科学文明使人类社会的阶级分划得更清楚。”瞿秋白进而指出，资本主义时代的科学文明，不能“解脱人类之一切痛苦”，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来解决”“文明问题”，“彻底变易人类之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生活”，社会主义取得胜利，“那时便能克服社会现象里的‘自然性’，求得各方面谐和的发展，——那时才能得真正的对于自然之解放。”

11月15日 作《那个城》，发表于11月24日《中国青年》第1卷第6期。本文是节译高尔基所作的《意大利故事》的第五章。发表时文前写有《记者按》：“这是象征小说，那个城即俄国大革命，大破坏后的光景，那个小孩即是指的中国。”

11月15日 作《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署名巨缘，发表于12月19日《向导》第49期，肯定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历史功绩：缔造了中华民国，“历年以来任劳任怨为平民争权利，反对北洋军阀”。同时指出，国民党曾经“只偏于军事方面，不能不想运用无聊的政客，——结果吃力不讨好，反受人民的漠视。”但是国民党“经过几十年的苦斗牺牲”，“已经觉悟，如今决计宣言大改组，号召全国平民来共同组织，共同奋斗：‘凡是爱国的人，都联合起来罢！’”文章在分析了列强如何侵略中国和军阀如何压迫人民以后指出：斗争形势要求全国人民必须“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而当务之急是“赶紧组织国民党，集中我们的政治势力。”瞿秋白要求同胞“赶快加入国民党”，重新认识国民党，他说：“以前的国民党，或者有些人怀疑他的组织及行动方法，如今国民党之明确的宗旨，坚毅的决心，已经有改组宣言及党纲草案、党章草案表示出来。”他认为，“只有积极的加入国民党，共同的实行国民革命运动，

中国才有复苏的希望。只有那时，此次国民党的改组才真是中国民权运动的新纪元。”

11月15日 作《猪八戒——东西文化与梁漱溟、吴稚晖》，发表于11月17日《中国青年》第1卷第5期。

11月15日 作《最近俄国的文学问题——艺术与人生》，发表于1924年8月文学研究会会刊《星海》上册。

11月16日 致信抱朴，发表于11月20日《民国日报·觉悟》。

11月24日 作《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发表于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2期，批驳张君勱、梁启超等玄学派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和丁文江、胡适等所谓科学派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指出这两派都在攻击马克思主义科学——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年的2月间，张君勱在清华大学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演说，4月间，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抨击张君勱，由此而展开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瞿秋白有鉴于此，便撰写上文。他揭露论战的双方都回避了论战的实质问题，明确地指出：“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别的都是枝节。”文章系统地论述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规律性、自由和必然、历史的必然和有意识的行动、个性和社会等问题，抓住争论的中心问题有力地批判了他们的唯心主义。文章最后指出：“人要从‘自然之奴’进于‘自然之王’，必须知道自然律；人要克服社会的自生自灭性，必须知道社会律。”

11月24日至25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一律加入”，并决定在国民党中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通过成立党团性质的秘密小组，贯彻党的纲领和政策，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

位”。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王荷波、李大钊、项英及鲍罗廷出席了会议。瞿秋白为鲍罗廷作翻译。

11月 魏金斯基来华接替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常驻上海。

12月20日 于《新青年》季刊第2期发表诗作《过去》（署名巨缘）和《天语》（署名双莫）。前者表达诗人乐于为革命而不惜牺牲自己的高尚思想；后者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黑暗社会，反映诗人对劳动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关注。

12月23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全体党员大会。汪精卫致开幕词，胡汉民作关于改组国民党的报告，廖仲恺作关于广州改组国民党工作情况的报告，大会选举了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后来，瞿秋白曾叙述了他对这次大会的观感。他说：“大会之前，局势是非常复杂的，参加会议的人员是各式各样的。但会上仍然感到热情洋溢。简直不能设想，在国民党二十年的全部历史中竟从未开过一次全体大会。大家都情绪高昂地怀着过节的心情来开会。”瞿秋白介绍参加大会的对象中，“有很多海员、手工业者、工人、铁路员工”，“上海大学的学生尤其多，中学教师不多，商人更少”。他还说：“到处都是佩带着国民党徽章的管理人员……他们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学生运动的代表……”^①

12月 在广州给女友王剑虹写信，并附诗一首。诗曰：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冬^② 作《失题》、《寄××》诗两首。作者生前从未发表。1939年5月20日由上海《鲁迅风》第14期刊出。

^①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52、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

^② 或1924年春。按：《寄××》是一首未完成的诗作。

本年 在上海大学主编《社会科学讲义》共4集,分《现代社会学》、《现代经济学》、《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和《社会哲学概论》等6个部分,其中《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概论》为瞿秋白撰写。该讲义于1924年1~4月间,由上海书店印行,同年3~6月间再版;1927年1月由汉口长江书店重版。

在《社会哲学概论》中,瞿秋白概括地介绍和分析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基本思想,指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的关系问题,划分唯物论、唯心论两大对立的派别。特别令人注意的,是瞿秋白在论述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时,探索了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问题,他认为“‘意识’的正确与否,全在乎他与自然界是否符合,——意识是外界的反映”,“一切科学及思想都应当时时和具体的现象相比较对。”瞿秋白在中国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和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指出事物的矛盾及其互相转化的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没有矛盾互变便没有动,没有动便没有生命及一切现象”,指出质量互变规律与否定之否定规律有密切的关系,也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公律”。瞿秋白的哲学思想,为在我国建立无产阶级哲学思想体系奠定了一定基础。

在《现代社会学》中,瞿秋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了社会学的对象及其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社会科学的原因论与目的论、社会现象的有定论与无定论、社会现象的相互联系与相互矛盾、社会现象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等等,向读者宣传和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本年 作寸铁5则:《中国的花车和美国的公使》、《近东的中国就能如此,远东的呢?》、《这也是“国学”》、《社会主义行好事假客气》、《小小一个罪恶》,署名巨缘,发表于1924年2月1日《前锋》第3期。

本年 在上海与叶圣陶相识。常在郑振铎家里与其会面和交谈。后来,叶圣陶也曾到顺泰里访问瞿秋白。①

① 叶圣陶:《回忆秋白先生》,《忆秋白》第124页。按:1949年杨之华曾对叶圣陶说,瞿秋白有一些材料,遗嘱说可以交给他作小说。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甲子)

二十五岁

1月1日 与陈独秀、恽代英、蔡和森和鲍罗廷等出席中共中央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在上海举行的联席会议,讨论共产党和青年团在帮助国民党改组中的方针问题。

1月初 与王剑虹结婚。时住上海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彬兴里306号,与住在过街楼上的丁玲为邻。瞿秋白弟弟云白在家中帮助料理家务。瞿秋白婚后即回广州继续参加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

1月5日 李大钊从北京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临时特别会议。会议讨论了参加国民党“一大”应采取的态度问题,并根据陈独秀的提议作出决定,由李大钊、张国焘与已在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组成一个指导小组,指导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①

1月10日 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考虑到瞿秋白已经去了广州,根据他的来信,批准他辞职。^②

1月10日 于《小说月报》第15卷第1期发表译作《好人》

① 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219~2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14页。

② 江苏省档案馆史料编研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苏党组织发展简况》。

(契诃夫作)。

1月12日 给王剑虹写信,连呼王剑虹为“梦可”!

1月13日 给王剑虹写信,认为“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①。

1月20日至30日 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瞿秋白同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瞿秋白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瞿秋白同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②国民党“一大”之后,瞿秋白暂留在广州,在鲍罗廷的指导下,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交往,经常来往于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国民党工作,积极从事党的统战工作。

1月21日 列宁逝世。

1月22日 给王剑虹写信,叙及“天下的庸人太多,实在看不惯”。

1月25日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悼念列宁的决议,决定休会3日,以志哀悼。

1月28日 给王剑虹写信。

1月31日 孙中山在广州召集中国国民党第一届执、监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五地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部,指挥监督当地的党务工作。会议决定委派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汪精卫、叶楚傖、于右任、张静江,候补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3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

^② 据国民党党史资料记载,当时候选名单,都是由“总理提出的”(见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8、9辑)。

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邵元冲、沈定一、茅祖权、瞿秋白组成上海执行部^①，同时派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吴稚晖、谢持负责上海地方的监督工作。

1月 杨之华^②同瞿秋白初次见面，并开始听瞿秋白的讲课：《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哲学概论》等。^③

1月 于《民国日报》特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之第二篇》^④，阐释了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和新三民主义的要点。指出三民主义产生的社会原因、发展过程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他说：“三民主义是整个的，是浑然一体的，是不能分开的，必须完全达到三民主义，然后可以说革命成功。”他对新三民主义作了科学的解释：“民族主义：中国民族的解放独立，世界各民族的平等；民权主义：中国平民群众的政权，使政府真能代表全民族；民生主义：中国最大多数民众（工人、农民）的生活之保障，使有真正参政之可能，使得到从事于征取经济权之一切必要条件。”瞿秋白对国民党“一大”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这次大会是“中国革命史之新篇”的“第一页”，并盛赞大会宣言，他说：首先“大会宣言是以前所没有的，三民主义因此得有

① 上海执行部统辖江、浙、皖、赣、沪四省一行。

② 杨之华，浙江省萧山县人，生于1900年1月23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二月二十三日），又名杏花、文开、杜宇，曾在浙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同宣中华等办农村小学，做农民工作，在此期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22岁时，与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结婚。后来，两人感情一直不合，杨之华只身来上海。1923年底杨之华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她在瞿秋白和俞警宇的帮助教育下，于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瞿秋白是她的介绍人之一。

③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3页。

④ 本文是瞿秋白1924年1月16日在广播向青年团骨干分子作关于新三民主义问题的演讲记录，作者收入自编论文集时，题名为《中国革命史之新篇》。

良好的界说,是数十万国民党员共同意志的第一次表现”;其次“宣言里有一般平民的政治经济要求——国民党对现在政治的政纲”;再其次“宣言明白说出国民党力量在于农民、工人身上”。

1月底2月初 同鲍罗廷、尼古拉·捷列沙托夫、雅可夫·格奥尔曼弗拉基米尔·波里亚克和亚历山大·切列潘诺夫来到孙中山的官邸。孙中山在百忙中,接见了他们。①

2月7日 由广州回到上海。

2月12日 致鲍罗廷信②告知他已回到上海,当天见到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维尔德。瞿秋白说,他到达上海后就病了,怕受风,躺了两天,但还是将国民党“一大”的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央对大会深表满意”。他认为“只要不建立上海执行部,工作就开展不起来”。致鲍罗廷的信还汇报了他“到《民国日报》编辑部③去过几次”,同叶楚伦、邵力子谈及“订购印刷机器、改组编辑部和聘请新的人员”问题,及“需要制订上海大学党的工作计划,找到教‘政治常识’课的教员”等问题。

2月13日 在家里翻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材料。④

2月13日至15日 于上海《民国日报·觉悟》连续发表《国民革命之土耳其》,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4期转载。瞿秋白在篇末声明说:“此篇根据克略仁(Kriajin)1923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做的——原文登在《新东方》第3期上。”

①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55页、第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

② 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

③ 上海《民国日报》编辑部地址在上海英租界山东路(即望平街)D字第163号。

④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388页。

2月15日 作《国民党与下等阶级》，署名屈维它，发表于2月20日《向导》第55期。文章阐述了当时的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及其性质，指出：“中国的国民党，——以前是同盟会，联合了受上等阶级咒骂的种种会党而成立的。”文章分析说，会党正是许多穷苦的下等阶级受尽官僚富豪的压迫而结合起来以图反抗的团体，具有“革命性”。会党因历史原因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弱点。随着近代经济的发展，中国下等阶级里出现了进步的“城市工人”。国民党又顺应革命潮流，进行了“大改组”，“继续国民革命的事业”。文章通过对事实的分析而作出结论：“国民党始终是下等阶级的政党，是革命的政党，是代表大多数平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政党。”

2月21日 作《中国承认苏俄与东交民巷》，署名巨缘，发表于2月27日《向导》第56期。

2月28日 作《〈时事新报〉之理藩政策》，署名巨缘，发表于3月19日《向导》第57期。

2月 上海大学行政委员会先后召开第二、三次会议，瞿秋白先后被推定担任上海大学丛书审查会委员、经济学系筹备员等职。

2月底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决议规定，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中的“极腐败的分子”，“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努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关于共产党的活动，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主张。

3月1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叶楚伦为上海《民国日报》编辑委员会委员长，胡汉民、汪兆铭、瞿秋白、邵力子为委员。^①

3月6日 同毛泽东、于右任、胡汉民、叶楚伦等出席国民党

^① 《民国日报》3月1日中执委会第十次会议记录》，转引自罗家伦

主编：《国史系选》，第107页。

上海执行部召开的第二次执行委员会议。议决组织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大力开展平民教育。^①

3月9日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及所属分部、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学生总会等30余团体联合在上海小西门中华路少年宣讲团通俗会场举行追悼列宁大会,到会者300余人。会上,瞿秋白作了列宁生平革命活动的报告,邵力子等发表演说。会后编印《上海追悼列宁大会特刊》,刊瞿秋白、恽代英等悼念列宁的文章。^②

3月13日 同毛泽东、汪精卫、叶楚傖、胡汉民等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的第三次执行委员会。讨论和决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上海负责招考黄埔军校学员。^③

3月15日 上海大学学生编的《孤星》旬报第4期(追悼列宁专号)出版,发表瞿秋白的论文《历史的工具——列宁》(代社论)。瞿秋白在文中正确地阐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时代的产物,指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在推进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他颂扬了列宁崇高的国际地位及其伟大之处:“列宁不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指挥者,并且是一切平民受压迫者的革命运动之组织者。”“列宁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在于他能明悉社会进化的趋向,振作自己的革命意志,指示出运用客观的环境以达人类的伟大的目的之方法。所以他是全世界受压迫的平民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3月20日 作《苏联宪法与共产主义》,发表于3月26日《向导》第59期,驳斥心史的《俄国宪法上共产主义之变化》。心史于3月14日、15日在《申报》上著文说:“俄自我民国六年革命,七年七月宣布宪法,纯为共产主义,至十一年十二月再宣布大联合,新

① 《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第59页。

② 《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第59页。

③ 《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第60页。

宪法则为新经济主义。”瞿秋白指出心史有二个错误：一个是“以为联盟条约是苏俄的新宪法”；一个是“以为他所谓旧宪法是纯为共产主义”。瞿秋白说苏联是联邦制国家，1922年12月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盟（苏联），由各苏维埃国家订一个联盟条约，作为大联盟的根本法，同时各国仍有自己的宪法。所以“苏俄的宪法（一九一八年的）仍旧有效……亦无所谓新宪法与旧宪法”。又明确指出1918年的宪法仅表现为“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权”，“着手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不就是共产主义”，而是“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新经济政策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第二步”。他特别强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决不能误解为“废弃共产主义重新收回没收政策”。

3月24日至31日 上海《民国日报》连续登载了《本报附刊部特别启事》，启事说：“本报宗旨，注重在发展民治，宣扬文化……除物质的设备尽力改良以外，首努力于附刊部之改进。第一次编辑委员会，即议决分附刊为两种：甲种为日刊，以原有之《觉悟》充之；乙种为周刊，按日发行一种专门性质的刊物。现已筹备完竣，次第出版……另又增加星期特刊《评论之评论》^①一种，于每星期日出版。”

3月25日 于《东方杂志》第21卷第6期发表《李宁与社会主义》^②再次悼念列宁，赞颂列宁。瞿秋白认为列宁“是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一人”，他比起其余的许多社会主义思想家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便是他最能综合革命的理论 and 革命的实践”，“第二便是列宁最能觉察现实”，“第三便是列宁的组织力和训练力”，“第四便是列宁征取政权的决心和相反相成的策略的运用”，从而肯定了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功绩。最后称颂列宁“虽死犹

① 副刊《评论之评论》共出了44期（从1924年3月24日至1925年2月1日止）。

② 1927年编者收入自编论文集时，“李宁”改作“列宁”。

生”，认为列宁与其他英雄伟人绝不相同。他说：“他（列宁）不仅留一个‘名’，留一个‘人格’、‘道德’、‘精神’与后人敬仰；他留下了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无产阶级的新国家，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

3月 作《过去的人——泰戈尔（《家庭与世界》^①）》，发表于4月19日《中国青年》第27期。文章讽刺泰戈尔是一个“后时的圣人”，批评他“竭力否认政治斗争”，认为他的思想“已经向后退走了几百年”。

4月3日 作《太戈尔的国家观念与东方》^②，发表于4月16日《向导》第61期。文章批评印度诗人、作家、社会活动家泰戈尔宣扬“东方文化”和“调和东西”的观点。认为泰戈尔“批评国家主义的谬误”，“是很合理的”；又指出他虽反对国家却不肯反对英国人。批评他竭力宣扬所谓“东方的精神文化”，提倡“慈爱忠恕”，批评他“希望资产阶级赏赐和平，赏赐自由”，而不去“鼓励奴隶和平民的积极、勇进、反抗、兴奋的精神，使他们亲密友爱的团结起来，颠覆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组织自己的国家”。瞿秋白认为“这才是真正行向世界的文化的道路”，然而泰戈尔却是背道而驰，一味“想调和东和西”。最后指出泰戈尔与中国孔孟“是一鼻孔出气”，因为他所宣扬的“慈爱忠恕”等思想，与孔孟的“仁爱”、“仁义”都是一样的东西，拉历史向后退。

4月5日 致信鲍罗廷，报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情况。信中说，“上海执行部已经组织了一些地区的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底下将组织‘民众扫盲学校’”，“这种学校将成为国民党与人民群众进行联系的中心”，“还计划为工人开办一些学校”。信中谈及国

① 《家庭与世界》为泰戈尔所著的小说，由景梅九、张墨池合译，1923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② 1927年作者收入自编论文集时，已将“国家观念”改作“国家观”。太戈尔现译泰戈尔。

国民党“一大”宣言已经重印并散发到各区和各小区。但在一次执行部会议上许多人攻击廖仲恺，说他擅自在宣言上加了关于军队和关于租界及土匪的一些条目。信中说，执行部那次会议通过决议，向国民党中央和孙中山提出质询，要求把关于军队的部份从宣言中分出作为另外一个决议，并删去宣言中关于租界与土匪的条目。他们认为无论是中央还是孙中山，都没有权利增加内容。瞿秋白还向鲍罗廷报告，在执行部会议上，还讨论了承认苏俄问题，他说：“目前上海执行部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国民党应该宣传承认苏维埃俄国，但应该由民众和南方政府，而不是由北京政府来承认，我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是错误的。”瞿秋白最后说，决定由我们的同志以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的名义负责编辑《民国日报》副刊《书报评论》，每星期六出版。

4月7日 作《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与外国人的政府》^①，署名巨缘，发表于4月16日《向导》第61期。指出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本来就没有保障，如今外国人在中国上海设立政府——工部局，也侵犯了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当时，取缔印刷附律就是一例。文章说，“工部局俨然是上海政府，一切税收、警察等权完全归他掌握；——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包括前清的遗老，革命党的亡命客曾经当租界是世外桃源），而实际上却完全变成这一外国租界政府之下的臣民——一切都唯命是听。”文章指出，只有收回租界，中国人民才能得自由。任何的抗议都是徒劳的。

4月17日 作《谁是帝国主义者？》，署名巨缘，发表于4月23日《向导》第62期，列举一系列的事实，说明英、美、法、日等列强才是真正“帝国主义”，才是中国人民的“统治者”，进而纠正一些人把“与中国协定归还一切租界，取消治外法权，采用平等税则的苏俄”

^① 1927年作者收入自编论文集时，题改作《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与外国人的上海政府》。

说成“帝国主义”的错误观点。

5月1日 于《民国日报·觉悟》(五一特刊),发表《五一节之四十年(1884~1924)》。

5月4日 上海学联组织30余所学校团体在复旦中学部举行“五四”五周年纪念会,瞿秋白同邵力子、胡汉民到会发表演说。^①

5月4日 于《上海大学周刊》第1期发表《自民族主义至国际主义——五七——五四——五一》,指出1915年5月7日日本对袁世凯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是中国近年来爱国运动——民族主义运动的出发点。而五四运动成为“更广泛、更伟大的民族运动”,指出“五四运动的精神”,正在于学生群众虽然仍是知识阶级,却已不以上书运动自限,而且他们……破坏现在法制而制造‘革命的法庭’,确有几分革命的独裁制的意义。”最后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根本上是国际主义,他认为:“中国的解放如果没有世界无产阶级援助,无论如何不能达到的。中国平民的民族民权主义,没有国际的民主主义是决不能实现的。”

5月5日 参加上海大学举行的马克思诞生106周年纪念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思想。与任弼时登台高唱《国际歌》,深深感动了台下的同学们。

5月5日 上海《民国日报》“言论”专栏里,发表由魏金斯基执笔、署名秋白的文章《字林西报之惩罚中国论》,文章抨击了《字林西报》1924年4月30日和5月1日的两篇社论。

5月6日 致信鲍罗廷,报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虽然“不太活跃”,但“很有成效”,“《民国日报》稍见‘起色’”。瞿秋白说:“我们多次提议组织群众游行,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我们的提议没有被采纳。不过我们还是争取到开展‘一周运动’(从5月1日到9日)。这次运动表现在:国民党领导人(胡汉民、汪精卫等)

^① 《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第61页。

5月1日在大会上发表演说；5月4日(学生运动纪念日)组织了纪念大会，成立了上海学生联合会；5月9日还将召开一次规模很大的群众集会。还应该争取在这一天(5月9日)“以国民党的名义发表一篇宣言，阐明国民党纲领的对外政策。”他还说，他们正在《民国日报》上加紧反帝宣传，已经出版了“五一”、“五四”专刊，将出版“五九”专刊，正在撰写好几篇反帝国主义的文章：“1.《揭露华盛顿会议》(陈独秀同志)；2.《对〈字林西报〉一篇文章的回答》(由维经斯基执笔，由瞿秋白署名)；3.《关税问题》(瞿秋白)；4.《列强侵略行为一览》(恽代英)；5.《治外法权》(申同志)，等等。”信中特别讲到“右派似乎在有组织地活动”，“进行有计划的煽动，不仅是反对我们，而且也反对国民党左派”。一张广州的报纸上说，《民国日报》“维护俄国人的利益”，成了共产党的报纸；瞿秋白因参加了编辑部，成了“俄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执行委员”。

5月6日 于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关税特别会议问题——帝国主义的进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指出实现中国真正经济独立和发展的方向及其途径。

5月9日 同沈玄庐、叶楚傖、邵力子等出席在上海天后宫举行的“五九”国耻纪念会，并发表演说。2000余人出席纪念会。^①

5月14日至16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三届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瞿秋白同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等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问题议决案》等。会议总结了国共合作五个月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指出党内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出现右的偏向，认为“只有发动工人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会议要求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外的复杂环境中，要认识巩固和扩大我们党的重要性，强调要坚持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纲领，并以此为标准，处理国民党左派与右派

^① 《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第62页。

之间的斗争。会议还指出，加强共产党自身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这次会议，对于纠正党内为国共合作中右的偏向，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正确处理同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关系，以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5月22日 于《民国日报》发表《中国解放运动之公敌》。

6月18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谢持、邓泽如、张继等征得蒋介石的同意，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所谓对共产党的“弹劾书”，并上书孙中山，说共产党和青年团有三个文件及《新青年》、《向导》等刊物上，都批评过国民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要求孙中山“督促中央执委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

6月18日 写就《社会科学概论》。这是瞿秋白即将在上海大学等高等学校联合举办的夏令讲学会上的讲稿。同年10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瞿秋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分析了现代社会的状况及其发展规律，论述了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差异及其相互联系、社会的意义，以及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艺术、哲学、科学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最后要求革命者要努力学习和掌握社会科学，指出：“‘社会运动者’——阶级斗争的指导者，在思想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之中当然要具有真正的社会科学智识。”

6月20日 致信鲍罗廷，反映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广州准备反共反俄的动态和上海丝绸业6000名女工自发罢工的概况。说：“我们向国民党建议散发传单，支援罢工工人。国民党拒绝了。叶（楚伦）仅仅同意在《民国日报》上刊登我们的一篇文章。”^①瞿秋白

^① 指邓中夏写的《丝厂女工罢工平议》，后发表于6月21日《民国日报·觉悟》上。

在信中还开列党中央制订的关于新办一个周刊的经费概算和关于为各种机关刊物服务而建立情报室的经费概算，请鲍罗廷审阅并作出答复，“以便为创办周刊和情报室开始作准备”。

6月26日 致信鲍罗廷，告知刘清扬问题，党中央已圆满解决。又谈及派女大学生赴俄问题，说关键在于经费，因为她们必须自费前往。可能不超过5个人。

6月29日^① 致信鲍罗廷，说有人从广州写信来，谈到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张继和廖仲恺在众所周知的问题上发生争论。又据上海各报的消息，广州出现了大概由右派国民党分子组成的所谓“国家意识宣传组”，并给苏联政府发电报，对俄中协议表示抗议。瞿秋白还反映，戴季陶突然返回上海，问瞿秋白能否和他一起去俄国，说孙中山想派他去俄国，作为国民党和广东政府的代表。信上写道：“我党中央当然不让我去，不过这是另外一码事。我们只想知道，您对国民党派代表或代表团赴俄问题的意见如何，孙在这个问题上有何打算。”

6月 作《新经济政策》^②，这是瞿秋白在上海夏令讲学会上的讲演稿，7月14日发表于《民国日报·觉悟》。首先阐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的基本制度、俄国内战时期的状况，接着论述俄国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及其重要意义。

夏 上海大学通过上海学生联合会，联合复旦大学、南洋大学（后改为交通大学）、东吴大学法科等高等学校，共同举办了夏令讲

① 此信未署明日期。据信中有“上海女工的罢工昨天结束了”（指1924年6月14日开始的上海丝厂女工自发性的罢工）一语，6月28日《民国日报》又报道《各丝厂今日一律开工》，由此推定：这封信是1924年6月29日写的。

② 1927年作者收入自编论文集时，题改作《新经济政策之意义》。

学会(7月6日至8月31日),讲学会设在上海大学。邀请社会上名家讲学。瞿秋白全力支持讲学会,并在讲学会上主讲《社会科学概论》和《新经济政策》。

7月11日 遵照孙中山的建议,正式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又称中央政治会议),以辅助孙中山规划政治方针。孙中山自任主席,任命廖仲恺、汪兆铭、胡汉民、谭平山、邵元冲、伍朝枢为委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7月16日孙中山在大本营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谭平山辞去政治委员职务,任命瞿秋白递补。^①

7月14日 致信鲍罗廷,告知他准备过一个星期赴广州,但根据中央的决定,必须等待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发电报来邀请,并正式通知任命之后才能赴广州。信里还叙及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他写道:“国民党在上海的活动沉寂了——戴季陶返故乡去了。党部(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马马虎虎;然而右派在加强准备,蠢蠢欲动;以国民党党员个人名义或联名写信给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声明反对共产党的信件颇为不少,我们不得不在各个方面予以反击。”

7月 王剑虹因患肺病医治无效,于上海病故,瞿秋白极为悲痛。王的棺木放置于四川会馆。此后,丁玲赴北京读书。瞿秋白与丁玲经常有书信往来。瞿秋白在这些书信中,总是要提到王剑虹,说对不起她,几乎每封信都责备自己。^②

7月 蒋光慈离开莫斯科回国。”回国后,瞿秋白曾聘请他来

^① 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第1105页。

^②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按:据丁玲回忆,当年她在北京收到瞿秋白十几封信,并一直保存着,作为研究一个人的材料。后几经转移,被遗失了。她认为这一史料是非常有价值的材料,里面虽然没有宏言说论,但可以看出一个伟大人物性格上、心理上的矛盾状态。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俄语。蒋光慈同瞿秋白的关系很密切。他是瞿秋白家的常客，经常同瞿秋白交谈文学工作等方面的问题，了解革命斗争的情况。在当时，党难以用更多的精力去指导文学工作。蒋光慈曾对此向瞿秋白提过意见。瞿秋白很看重这位中国早期的革命作家，赞扬他关心党的事业，鼓励他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共产党员，要更多地发挥积极作用。^①

夏 在广州，与早年同他一起在莫斯科采访的李宗武相会。^②

8月1日 于《新青年》季刊第3期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这是我国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和批判实验主义哲学的一篇论文。文章揭露了胡适的实验主义的阶级性及其唯心主义性质。指出实验主义是“市侩哲学”，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反对劳动阶级彻底改造现存制度的。文章认为：“实验主义既然只承认有益的方是真理，他便能暗示社会意识以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他决不是革命的哲学。”革命的哲学是“彻底的改造社会”，而不是“安于琐屑的应付”。文章指出“实验主义的宇宙观根本上是唯心的”。

8月6日 同胡汉民、邵元冲、伍朝枢、鲍罗廷参加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决定设立统一训练处，将陆军军官学校等归其训练管理，推孙中山任该处主席。^③

8月13日 同胡汉民、汪兆铭、廖仲恺、伍朝枢、鲍罗廷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会议作出决议，设立联络部，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13页。

② 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第29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

③ 《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转引自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第1110页。

以解决国民党内共产派纠纷问题，另撤销统一训练处。^①

8月13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国共合作的纠纷问题。最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由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各派代表1人组成，负责处理国共合作的纠纷问题，共产国际发给中国共产党员的所有指令，都要先通知这个委员会，并决定8月底，举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进行讨论。瞿秋白在广州立即给陈独秀写信，汇报此事，提出怎么办：对国民党中央的建议，是投赞成票，表示接受，还是投反对票，给予还击？是否还有其他好办法？要求“尽速回答”。陈独秀接信后，同蔡和森、彭述之商量对策，并由蔡和森帮助陈独秀起草给瞿秋白的回信，回信说，国民党常务委员会在8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的那个建议，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接受了它，就等于承认国民党有权连续不断地监视我们党的全部活动。因此，你们必须拒绝这个建议！^②

8月15日至23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一届二中全会。会议讨论了关于国共合作的纠纷问题。瞿秋白出席会议，并先后作了多次发言。他首先提出“三民主义之政党是否能容纳马克思派”、“国民党是否必要容纳一切思想上虽有异同而对于现时中国之政见上相同之革命分子”、“共产派即马克思派加入本党，完全为参加国民革命促进本党之进行，然此派是否有党团行动，此种党团行动是否有害抑系有利于本党之发展”等问题^③，请大会注意

① 《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记录》，转引自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第1114页。

② 彭述之：《中国共产主义的发轫》第1卷，第382页，巴黎Gallinard书店出版，1983年。

③ 《瞿秋白对于8月19日、20日两天之中央全体会议之声明》，转引自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第1116页。

讨论。对于右派弹劾案进行了有力地驳斥,他说:“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有一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之发现乎?……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若此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内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①瞿秋白的发言,受到国民党左派的赞同和支持。会议期间,瞿秋白和孙中山等与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合影留念。

8月20日 同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鲍罗廷出席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草案》。会议批驳了国民党右派,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矣”,“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②8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上述的决议案,否定了所谓“弹劾案”,给国民党右派以很大的打击。后来国民党中央经孙中山裁可而发出的《国民党对于全体党员之训令》又给国民党右派以严厉的训斥,训令指出:“诸党员之反对共产派者,往往激昂过甚,逸于常轨,此皆所谓意气用事,本会于此不能不申以告诫。”^③

9月3日 同伍朝枢、鲍罗廷等参加孙中山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会议作出决议:(一)发表北伐宣言,及

^①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8页,1972年。

^② 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第1118页;《革命文献》第16辑。

^③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29日。

大本营移驻韶关宣言；(二)韶关大本营特设政治训练团；(三)本月七日国民运动大会应宣传之宗旨，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反对北方军阀”，军官学校均加入运动，地址在广州第一公园。^①

9月10日 同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鲍罗廷、宋子文等出席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北伐问题。^②

9月20日 于《民国日报·觉悟》，发表《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国民党》。

9月23日 作《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署名巨缘，发表于10月1日《向导》第85期。报道广东革命政府在英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压迫下面临着危机的局面。当时广州发生了英国买办陈廉伯等制造的商团反革命叛乱事件。瞿秋白针对这一事件写了上述的通信，阐述事件的主要过程，并对国民党左中右派的态度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商团首领陈廉伯、陈恭受都是国民党右派党员，赞助反革命及买办阶级的军人，也都是国民党右派党员”，他们“代表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至于国民党中派，则“游移不定没有决心镇压反革命”，他们“幻想维持政权而又不敢接受平民群众之赞助”，“间接的助长了妥协派以至于反动派的气焰”。而“左派即革命派是代表劳动平民的利益”，他们“决然要求解除商团武装而武装劳动平民”。通信还明确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商团事件严加镇压的主张，说：“立刻武装平民，以卫广州，预备作战，实行减捐民选。”最后，从这一事变中引出一个教训：必须坚持“革命道路”，“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9月 从广州回到上海。先后给上海大学师生做了几次报告，详细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指出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

^① 《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转引自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第1124页。

^② 《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

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揭露国民党右派加紧进行反对共产党,反对孙中山革命主张,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等罪恶活动,同时还阐明了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①

10月2日 作《广州印刷工人罢工之经过》(广州通信),署名巨缘,发表于10月5日《向导》第87期。

10月8日 致信鲍罗廷,寄上中共中央关于国民革命策略的决议及关于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瞿秋白对鲍罗廷说:“从中可以看出,在这些问题上您同中共中央之间有某种程度上的原则性分歧。因此中央决定:‘召集鲍罗廷同志前来上海进行政治磋商,如果鲍罗廷同志认为这是必需的而且他做得到的话。’中央嘱我将上述决定通知您,请您尽快答复。”信上还谈了《民国日报》的改组问题。瞿秋白认为“《民国日报》必须彻底改造”,说中央已决定自10月15日起停止付款。谈到陈独秀请邵力子转告总编辑叶楚傖:如果他同意退出《民国日报》,则经费可以继续拨付,否则陈拒绝协助,同时也反映了叶楚傖的态度。最后,瞿秋白转告鲍罗廷说:“中央请您尽快在广州解决问题,请提出新编委名单并取得中派的答复。如果说‘可以’,就付给经费;如果说‘不行’,就永远停止拨付。”随信附上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国民党的政策》。

10月上旬 即双十节前几天的一个夜晚,上海大学党支部召开会议,全国学生总会的负责人汇报了筹备国民大会的情况和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活动。瞿秋白听完汇报后,要求负责筹备国民大会的同志,要密切注意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团结群众与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穿他们的阴谋,并给准备参加大会的同志布置了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0页。

具体任务。^①

10月10日 上海大学爱国青年学生杨之华等人随同瞿秋白到河南路桥北堍天后宫参加国民大会。途中因得情报，租界当局勾结国民党右派等，准备破坏大会，便要瞿秋白暂时先回家候电话。大会开始，爱国学生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国民党右派唆使政治流氓打伤了许多青年学生，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黄仁受重伤，送白克路（今凤阳路）上宝隆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他们除了殴打学生外，还要假警察之手，企图逮捕瞿秋白等共产党人。11日凌晨零点以后，瞿秋白不顾风险赶到医院，看望黄仁，得知黄仁无救，又安排了黄仁的后事^②。

10月13日 国民党上海执行委员会在上海举行第十六次执行委员会议，讨论关于国民党右派在双十节天后宫国民大会中制造的黄仁事件。大会主席于右任报告黄仁流血事件的经过等。会议讨论了国民党第4区分部、上海大学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大学四川同乡会等单位 and 瞿秋白提出的关于处理黄仁事件的具体条件和要求。瞿秋白提了两项提案，即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应就流血事件发表宣言案和宣传国民党执行部关于黄仁事件宣言的方法案。瞿秋白要求，在宣言中，上海执行部要认定凶殴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演说者和赞成者的行为，是“帝国主义及军阀奸细卖国卖民之反革命行动”，凶手及其指使者，不论是否党员，“本执行部敢以国民党名义正式宣告其为国民之公敌，凡我国民甚速起而讨之”，宣言要强调，本党党员应当“根据本党全国第一次大会及总理最近之反帝国主义宣言，努力宣传本党政纲及主义”，等等。关于宣传方法案，有三点意见：一、国民党各级党部立即召集党员会议，宣传上海执行部关于黄仁事件宣言的内容及其意义；二、本党党报应根据上海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0页。

^② 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辑，1958年7月。

执行部关于黄仁事件的宣言，尽量登载有关的“消息和言论”；三、国民党各级党部应根据宣言，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开展“反对一切军阀及帝国主义之大运动”。^①

10月13日 上海大学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成立上海大学学生会。大会推举杨之华等10人为执行委员，林钧等3人为候补执行委员。^②

10月21日 致信鲍罗廷，汇报10月10日国民党右派分子童理璋和喻育之受卢永祥指使制造“黄仁事件”的发生经过。瞿秋白说，“黄仁事件”发生后，“上海大学国民党区分部召开会议作出决议：一、请上海执行部将童理璋和喻育之开除出党；二、责令上海大学讲师何世楨——上海右派首领之一，在打手打人时他未采取任何行动帮助左派——作出书面说明，解释他为什么不援救被打人；三、抚恤死者家属。”又说，叶楚傖“已向广州国民党中央打电报要求辞职。这样我们便掌握了《民国日报》，让邵（力子）工作到现在。”信上又叙及他和国民党左派遭到何世楨纠集学生的反对，他的名字前被冠以“上海共产党首领”的称号。但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很同情他们，于在执行部坚决主张开除童、喻二人，并宣布如果何世楨及其同伙几个英文教员继续罢教，就另请别人来教。瞿秋白还反映，目前，上海执行部没有一个负责人员，要求“立即派廖仲愷或汪精卫来”。又要求“《民国日报》新的编委会名单必须尽快呈送孙中山”，否则我方在该报的威信将丧失，他认为“叶某一回来，该报就会完全成为右派报纸”。

10月27日 上海大学等30余个团体发起举行隆重的黄仁同志追悼会。陈望道任大会主席。瞿秋白同沈玄庐、恽代英等人

① 《党务消息：上海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十六次会议》，《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5日。

② 《上海大学学生会成立》，《民国日报》，1924年10月15日。

参加了追悼会，并发表演说，痛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暴行。“会场演说极悲壮激昂之至，闻者色动焉”。^①

10月 黄仁被害事件掀起轩然大波。上海大学以社会学系共产党员为代表的左派和英文系国民党右派之间的斗争激化，社会学系学生反对英文系主任何世桢，英文系学生反对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结果，瞿秋白和何世桢同时辞职离开了上海大学，后由施存统和周越然分别继任社会学系主任、英文系主任。但瞿秋白以后仍不时到上海大学给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作政治报告，有时参加党支部会议，传达和贯彻党中央的决定，解答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

上述斗争，同时反映到上海民国日报社里。当时瞿秋白在报社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斗争结果，革命的力量在报社占了优势，并迫使国民党右派领袖叶楚傖退出了民国日报社。^②

11月1日 作《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发表于11月7日《向导》第90期。

11月18日 与杨之华在上海慕尔鸣路结婚^③。沈雁冰与孔德沚夫妇等人参加婚礼。年底，瞿秋白的家，从慕尔鸣路迁到闸北宝通路顺泰里12号，与隔壁11号的沈雁冰家为邻。他们彼此交往甚频，经常在一起交谈政局和党内等问题。瞿秋白常代表党中

① 《民国日报》1924年10月28日。

② 《访问郑超麟记录》，1980年4月。

③ 杨之华曾与国民党左派法玄庐儿子沈剑龙自由恋爱结婚，并生一女（即独伊）。后双方感情长期不合，1924年冬，自行协商离婚。杨之华遂与瞿秋白结婚。他们三人于1924年11月27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分别登出3条启事：“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1924年11月18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1924年11月18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1924年11月18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史去参加在沈雁冰家里召开的商务印书馆党支部会议。当时，沈雁冰为党支部书记。

11月30日 于《评论之评论》第37期发表《国民会议与商人》。

12月2日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记录了瞿秋白等共产党人近期的革命活动，反映了帝国主义者对瞿秋白等人频繁的革命活动甚为惊骇。该日《警务日报》记录：“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布尔什维克之活动有显著之复活，颇堪注意。这些过激分子的总机关设在西摩路132号上海大学内，彼等在该处出版排外之报纸——《向导》，贮藏社会主义之书籍以供出售，如《中国青年》、《前锋》。该大学之大学部分教授均系公开的共产党人，彼等正逐渐引导学生走向该政治信仰。教授中计有：邵仲辉，又名邵力子，《民国日报》编辑，彼系共产党人已几年了；社会学系教授瞿秋白，瞿系中国布尔什维克领袖之密切友人；……”^①

12月8日 杨之华同钟复光、刘清扬、向警予等18人，被推定为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

12月20日 《新青年》季刊第4期发表署名沫云的文章《黎明期的台湾》。该文作出“台湾将不要经过资产阶级性的民族革命，即全民族的国民革命，而只要直接行向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论断。瞿秋白在该文末尾加上按语《记者附注》指出，“这未免有点左稚病”，提醒读者注意。按语认为：“因为在现时的台湾状况之下，在最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台湾，只要作到全民族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已经是不容易了，何能遽谈无产阶级的革命？”指出：“列宁主义教训我们，凡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须得经过一个全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给宗主国的帝国主义的一个普遍的打击，才

^① 《上海大学瞿秋白等活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1924年12月。

能进一步行到无产阶级革命。”按语给台湾无产阶级指明当前的任务：“站在第三国际之下，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去领导一切被压迫的台湾民众，作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

12月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搜查了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上海大学和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瞿秋白的寓所。但包探扑个空，没有找到瞿秋白。他们就把瞿秋白保存的《新青年》、《向导》等书刊（包括瞿秋白从苏俄带回的许多俄文版书籍）搜索一空，付之一炬。当时瞿秋白已秘密转移到北四川路底兴业里1号先施公司职员孙瑞贤家，住在三层楼的阁楼上，继续领导革命斗争。当他听了杨之华向他汇报他们的住所和上海大学被搜查及他的书刊被焚以后，气愤地说：“书可以被烧掉，但是，革命的理想是烧不掉的！”^①

12月 翻译《时代的牺牲》（高尔基作），发表于1925年2月21日、28日、3月14日《中国青年》第67、68、70期。

本年 曹靖华把自己的译文《三姊妹》（契诃夫作）从苏联寄给在上海的瞿秋白。瞿秋白认真校审，并作了修改，交郑振铎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那时，瞿秋白与曹靖华有书信往来，曾给曹靖华写信说，他完全是用药养着病，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从事革命工作。曹靖华每逢写信向瞿秋白请教时，瞿秋白总是对每个问题，都认真地予以详细的解答，有时甚至作长篇的论述。^②

本年 经常同施存统、蒋光慈等人到上海大学学生阳翰笙等人的宿舍，被同学们困住。他们之间不讲师道尊严，完全是同志式和朋友式的关系。瞿秋白常常解答同学们提出的种种问题。同学不能理解时，相互就平等地辩论，气氛热烈。有时大家一道饮酒，边饮边谈。有时大家一道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等进步歌曲。瞿秋白教唱《国际歌》，师生关系非常和谐亲切。^③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3页。

② 曹靖华：《罗汉岭前忆秋白》，《忆秋白》第166页。

③ 阳翰笙：《回忆上海大学》，《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4年2月。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乙丑)

二十六岁

1月11日至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讨论党如何加强领导日益高涨的工农革命运动。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周恩来作军事报告。瞿秋白参加大会的领导工作,担任大会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参与起草大会文件,并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对代表们提出的关于政治决议案中若干重要问题,作理论性的阐释。他特别强调了发动群众运动的重要性和国民革命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发言深得代表们的拥护。瞿秋白还为魏金斯基翻译演说词及其为大会起草的文件。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决议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会议还指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但决议对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分析。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于当天同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共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被推举为中央总书记,蔡和森和瞿秋白担任宣传委员会委员。

1月26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动员全体团员贯彻党的“四大”决议,并决定将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2月2日 作《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与一九二五年之“二七”》,

发表于2月7日《向导》第101期，总结“二七”大罢工以来工人运动，充分肯定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历史地位。文章指出：“中国的工人阶级处于军阀制度及帝国主义的两重压迫之下，他的斗争一开始便是革命的，一开始便是政治的——不但是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且是中国民族的民族斗争里的先锋。”他列举事实证明“二七”之后，中国工人运动虽然表面上暂时的沉寂，但是实际上各地工人仍在不断地坚持斗争，“觉悟越发增高”，“团结力日益增进”，工人反帝国主义的行动日趋激昂，由民族意识，而进于阶级意识的倾向日益鲜明。最后指出，两年前的“二七”是职工运动失败而退守的纪念日，要求1925年的“二七”，能成为全国工人运动复兴以至民族革命运动得以发展的纪念日。

2月8日 下《民国日报·觉悟》发表《国际主义者列宁之民族主义》。

2月上旬 上海小沙渡日商内外棉11个纱厂数万名工人，因日本监工殴打工人导致总同盟罢工。瞿秋白同邓中夏、李立三、恽代英、向警予等参加了这次二月罢工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瞿秋白连续发表文章支持工人斗争。杨之华也参加了二月大罢工，同邓中夏、刘华、郭伯和等人到潭子湾工人俱乐部，和李立三一起工作。当时，瞿秋白最喜欢杨之华穿起工人服装到工人群众中工作。他对杨之华说：“我们的爱情就是建筑在这里。”后来，杨之华向他谈了自己在罢工中，看到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深为感动。瞿秋白说：“你才知道工人阶级中有无数的天才，苏联掌握政权的就是工人阶级，他们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正在迅速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又说：“工人学习起来，比知识分子进步快得多，在斗争中他们是最坚强的。”^①

2月11日 作《上海小沙渡日本纱厂之大罢工》，署名双林，发

^① 杨之华：《忆秋白》，第202页。

表于2月14日《向导》第102期。揭露日本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指出“工人稍不听话非打即骂,惨无人道”,“工人日夜轮班每班十二小时”,“工资也很少——最少的只二百余文”,“吃的是喂猪的食料”。同时号召大家援助小沙渡的工人,为工人指明斗争目标,要求严格限制外国人在中国设厂,严格规定最少工资和最长工作时间,特别要规定使用女工、童工的法律,改良工人待遇,供给工人住宅、医药,工人公伤、疾病应由厂方负担保险费等。

2月18日 作《民族的劳资斗争》,署名双林,发表于2月21日《向导》第103期。进一步支持上海工人二月罢工,并分析这次罢工的性质和意义,要求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劳资斗争和民族斗争紧紧结合起来。他指出,“中国境内日本人的纱厂事业,不但剥削中国工人,不但使中国农民破产,而且使中国自己的棉纱业也不能发达。”又指出:“中国不能独立,不能解放,一切中国人迟早总要变成外国资本家的奴隶。为中国争独立,为中国民族争解放——便是现在上海日本纱厂里中国工人罢工的意义。”“中国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这是很明显的劳资斗争,然而也是很明显的民族斗争。”瞿秋白号召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民权主义者,一切中国人都要尽力赞助工人这场阶级斗争。

2月26日 作《帝国主义的佣仆与中国平民》,署名双林,发表于2月28日《向导》第104期。揭露和谴责买办阶级及研究系、国民党右派、反共产主义同盟等对上海二月罢工的造谣和诬蔑,把他们斥之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佣仆”。他们把工人罢工,反对日本资本家,说成是“受共产党的过激宣传和煽惑”,犯了“罪大恶极的赤化罪”等等,瞿秋白予以有力的驳斥,指出:“甚么是赤化?赤化便是革命——中国的民族革命,便是争中国的解放独立,使外国资本家不能奴隶中国人,这在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眼睛里看来,便算是罪大恶极,便算是赤化。”对于上海二月罢工的意义大加赞

扬,指出这次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的阶级斗争,“是继续着近年来继长增高的民族运动”,“是民族运动中新起的巨波,而且表示民族运动里,只有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最后要求中国人民除了要认清帝国主义以外,还要认清帝国主义的走狗,指出:“中国平民不但当认清自己最大的仇敌是帝国主义;并且要知道,这些反对赤化,造谣生事,蒙蔽社会,使不敢奋起帮助纱厂罢工工人,不敢明显地要求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之一切特权的‘中国人’,都是我们平民的仇敌,都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

2月 作《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发表于6月1日《新青年》月刊^①第2号。总结和分析了孙中山出生60年以来的中国政治状况,对洋务派官僚的“富国强兵”的口号和康梁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谋富强”的主张,给予有力的批判,进而指出孙中山能认识到:要反抗列强,便必须革命——推翻满清政府”,“以下层阶级为社会基础,从事革命运动”。充分肯定了孙中山推翻清政府,创立中华民国的历史功绩。但同时指出,孙中山领导的“只是颠覆满清贵族的民族革命,这次革命的唯一胜利只是推倒一腐朽不堪的满清政府”,而结果,“革命平民阶级竟完全失败,而反革命的军阀阶级却起而代替满洲贵族——压迫平民,并做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而民族革命的对象——列强帝国主义,不但没有丝毫损丧,反而利用国内军阀的互争和反动,用尽种种的方法扩张自己的势力”。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瞿秋白认为是当时“没有一个彻底的团结的真正能领导革命的阶级”,又指出:“革命之中而没有革命的阶级做他的社会基础,积极的参加和领导,这种革命当然是不能成功的。”辛亥革命虽遭失败,屡经挫折,但孙中山仍坚持革命斗争。瞿秋白热情赞扬了孙中山,说“在反动潮流很利害的时期”,“孙中山却没有一刻妥协,没有一刻忘掉革命”,最后,“民族革命的政

^① 实际为不定期刊。

党——国民党，在孙中山指导之下，决然改组，容纳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加入”，实行“联共联俄政策”。文末指出：“孙中山的伟大，正因为他在40年来能随着社会内革命势力的增长而日益进于明显的不妥协的革命政纲”，顺应了世界的革命潮流。

2月 改译斯大林所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一部份，题作《列宁主义概论》，发表于4月22日《新青年》月刊第1号。1927年作者收入自编论文集时，题目改作《列宁主义概况》，文字上也作了一些修改和校订。这篇文章是瞿秋白在研究列宁的基础上，对列宁主义所作的简要的概括。精辟地阐述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列宁主义的方法”、“列宁主义与理论”、“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无产阶级独裁制论”及“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的政党”等问题。瞿秋白高度评价了列宁“应运马克思主义实行十月革命，成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说，“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世界范围内的实际的阶级斗争”并获得“如此的成功”，这“是列宁的特点”，充分肯定了列宁主义的世界意义。他认为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说：“列宁主义始终不就是等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中有许多成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原来所没有的，或者虽有亦很不详尽，还未发展的。”他指出：“列宁的理论，正是根据于马克思主义，再从这种实际工作中的经验里锻炼出来的，——所以对于帝国主义时代，世界革命已经可以实际开始时的具体策略问题，如无产阶级独裁制与农民阶级，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与殖民地民族革命之关系等问题，便有格外详尽的研究，发见许多新的原则。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然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前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革命思想之大纲；列宁主义呢，便是无产阶级革命时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的理理。”这篇文章末尾附有说明，表示赞成改译的方法，他说“改译”本为戏剧家洪深所倡，原意是在接近中国读者。周作人当年提

倡的“直译”，实在流毒不浅。他认为郑超麟已译出的斯大林这部著作《列宁与列宁主义》^①“译笔确是很好的”，“读者可以参照而观”。

2月 作《道威斯计划与世界帝国主义》，发表于6月1日《新青年》月刊第2号。

2月 作《世界职工运动状况》。这是瞿秋白为工人读者撰写的通俗宣传小册子，曾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1989年被编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

2月 作《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发表于4月22日《新青年》月刊第1号。

3月1日 作《日本对华贸易之经济侵略》，署名双林，发表于3月7日《向导》第105期。文章开头就指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全靠中国做市场”，“中国是日本商品的大市场”。进而指出，日本资本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决不单是一种经济竞争，而主要的是“靠着外交上政治上种种特权，如1896年之北京条约、1903年之上海条约等，日本在通商上、海运上，都有许多特殊权利，愈一条的要求尤其攫取不少。”文章中列出一表，反映自1913年至1924年的12年间，日本输入中国和中国输入日本及其差额的统计，表明日本对华贸易的侵略趋势，“实在是非常之可怕”，日本对中国的商品输出比较中国对日本的商品输出，“每年至少超过五六千万日金”。文章说：“日本输入中国的大致是纺织制品（布匹、衣服、汗衫等）、纱、糖、纸、火柴、药品、陶器、玻璃等。中国输往日本的呢，却是豆、豆制品、毛、铁、盐、皮、兽类的油等。”此外，日本人还向中国输入资本，“侵入中国的金融界，在中国境内开办工厂，侵占中国的实业，还要享受税则上特殊权利。”

3月12日 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

3月12日 作《胡适之与善后会议》，署名双林，发表于3月

^① 现译作《论列宁主义基础》。

14日《向导》第106期。揭露和批判胡适对封建军阀妥协改良的态度。胡适曾表示同意参加段祺瑞为欺骗人民而提出召开的所谓“善后会议”，并提出一个所谓国民会议组织法草案。瞿秋白剖析了《组织法》剥夺广大工农群众的民主权利的实质性的内容。《组织法》规定：“凡不能解说日用通行之文字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原草案第十一条）瞿秋白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等的‘不识字国’，轻轻的这样一条条文，便可以剥夺百分之八十的中国公民之选举权。其实这大多数不识字的公民，大半都是工人、农民、小商人、女子；他们的工作和劳力是中国全社会生命的基础。”瞿秋白责问胡适：“他们何以不应参预选举及政治呢？”此外，还列举《组织法》第十四条关于推荐候选人办法的规定，剥夺了广大工人、农民等推荐候选人的资格。瞿秋白用上述种种事实，揭露了胡适的所谓“民治主义”的阶级实质。

3月21日于《向导》第107期发表《孙中山之死与孙中山之敌》，署名双林。对孙中山革命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写道：“孙中山是引导中国（走）向光明之路的人”，“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这是全世界人所承认的”。孙中山不幸逝世，这是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不可补偿的巨大损失，举国上下，无限哀痛。但列强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军阀、国贼、民贼等“都幸灾乐祸的高歌起来”。瞿秋白对他们一一加以斥责，指出：他们对孙中山的“诬陷”、“毁谤”、“都是枉然的”！瞿秋白警告帝国主义：“你们不要太高兴了！中山虽死，中国还有四万万的中山，中国平民仍旧要继续国民革命的斗争。决不因中山奋斗未成而失望，决不因你们的造谣谬论而退却。我们中国的‘孙中山’，我们中国平民的目的，——第一步正是破坏——破坏你们帝国主义束缚中国的锁链，那时才有建设中国平民共和国的可能。”同时痛斥了研究系的种种的诬蔑和辱骂。最后指出孙中山虽死犹存，他说：“孙中山先生虽然死了”，但是“孙中

山的革命意志,革命主义及理想”“是永不死的”。

3月21日 于《向导》第107期发表《孙中山辛亥革命后之第二功绩——镇压买办阶级商团之反革命》,署名双林。文章称孙中山是“中国平民革命运动的最早的领袖”,领导兴中会、同盟会,推翻清王朝,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文章指出,“帝国主义者于辛亥革命之后,唯恐孙中山的革命主义实现于中国,使他们不能任意侵略,早就勾结北洋军阀扰乱中国,趁势攫取中国利权。”文章着重揭露英帝国主义“竭力怂恿帮助陈炯明,令攻取广州……可是一两年来根本铲除革命政府的目的始终达不到。于是英国帝国主义进一步,利用广州的买办阶级,暗输军火给他们,组织所谓商团,又阴谋直接扑灭广州革命政府。”接着文章概述了1924年10月间,商团屠杀广州游行示威群众的暴行及孙中山领导“小商、农工平民”对商团叛变的镇压。文章认为孙中山这次镇压商团反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广州政府”,而且在于“以事实指示出近年来买办阶级的发展,已成为卖国卖民专助帝国主义侵略的阶级,广州买办阶级为了香港英资本家的利益,竟曾以武装暴行摧残民众,以助英国铲除革命政府,其他地方的买办阶级自然也会如此”。因此,瞿秋白对孙中山这一革命行动给予充分的肯定,指出:“假使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引导平民反抗君主贵族阶级的第一次大功绩;那么,镇压商团便是孙中山先生引导平民反对买办阶级的第二次的功绩。”

3月25日 作《淞沪特别市和淞沪的民权》,署名双林,发表于3月28日《向导》第108期。

4月1日 作《上海之外国政府与中国巨民——上海纳税外人会议及中国市民之自由权》,署名双林,发表于4月5日《向导》第109期。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在上海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制度;上海纳税外人会议是立法机关,工部局是行政机关,会审公廨是司法

机关。看起来却也很“民主”，但“中国人，是完全没有参政权”。文章又指出：“吴淞口还停着许多外国军舰，租界内还驻着许多外国兵、外国警察，以保障他们这种统治。”文章列举中国实业受“挤轧”、“亏本倒闭”、华商税捐高于外商“好几十倍”、几万童工每天工作“十三四甚至于十五六小时”、外商银行“掌握上海商业金融的枢纽”等等事实，来说明上海决不是什么“乐土”，来说明中国平民是在“忍受这种地狱生活”。上海明明是中国领土，何以产生这样的外国政府来呢？如此残酷地奴役中国人民呢？文章指出，这是帝国主义“强迫中国订立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因而号召中国人民行动起来，为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努力奋斗！

4月27日 作《五七国耻与日本帝国主义》，署名双林，发表于5月10日《向导》第114期。文章一开头就指出：“日本是亚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他的资本主义开始便带凶暴的形态而以军国主义为后盾。”文章将日本帝国主义政策在远东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1895年的中日战争；第二期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第三期是1914至1918年的欧战。”文章分析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在分析第三时期时指出：“日本在这一时期——第三期，不但趁着对德宣战而攫取青岛，而且包藏着单独进攻，鲸吞中国的野心，所以提出山东问题，经营满蒙问题，中国内地设立日警问题等等的二十一条要求，——这是五七国耻纪念的来源。”文章进而总结了中国人民斗争的经验教训，认为10年来的五七纪念，——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差不多至今还只限于“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但“何尝有丝毫效果”，告诫中国人民：“中国要根本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必须实行国民革命，打倒他们利用的一切政客及军阀。”

4月 作《“五一”纪念与共产国际》，发表于5月《中国工人》

第5期。

4月 作《“五一”纪念与国际劳动运动》，署名双林，发表于4月28日《向导》第112期。

4月 作《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署名双林，发表于5月3日《向导》第113期，论述了五四运动的历史。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经过五四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恋爱自由’、‘劳工神圣’的口号，都是五四之后才普遍于社会（尤其是学生群众之中）的。”瞿秋白鉴于五四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終了”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明确指出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说“五四运动爆发，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已开始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他还指出，五四运动发生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上了历史的舞台”，“渐渐成为独立的政治动力”，“要做这个革命中之领袖阶级”。

4月 作《北京政变后的政局与工人阶级》，发表于4月《中国工人》第4期。文章指出，北京政变后，政组后的国民党发表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重造民国的主张，正确反映了全国一切民众的要求，因而得到全国人民同声赞成；而段祺瑞为了使自己统治合法化，并抵制国民会议而提出的召开善后会解决国是的主张，遭到“全国人民同声反抗”。瞿秋白揭露了段祺瑞种种阴谋活动，并指出所谓善后会议，其组织“纯然是军阀官僚的成分，”其目的是“军阀朋分政权”。他总结了北京政变后的基本局势，他说：“北京政府从政变到如今，一步一步的想灭杀民众方面的势力”，“反动的政局已经开始了”。文章还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当前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任务。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是最彻底的最勇猛的反抗军

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要求工人阶级“负起督促全国各阶级努力奋斗的责任，”同时又指出：“各阶级一致共同的民族运动，也应当承认工人阶级是他们的主力军，尽力去赞助他，拥护他，方能防止反动政局的再现，方能达到真正的民族解放——民族革命的成功，中国的独立。”

4月 于《中国工人》第4期发表《评职工运动中的反动派》，署名巨缘。文章指出资本家深知一味的高压手段是永世不能消灭工人运动的，便利用一些流氓或者工会内部的不良分子来破坏工会或罢工运动。这种分子便是工贼。文章说，工贼“表面上还算办工会，替工人奔走的，而实际上呢，他们串通了帝国主义者或本国资本家，遇有罢工，或者工人和厂主冲突的时候，他们一面私通资本家，教他们压迫或欺骗工人的方法，一面在工人里主张让步，主张调和，恐吓工人。”或者“把持着工会”。瞿秋白称这种工贼为资本家的“奸细”，号召工人们：“不但要反对资本家，并且要反对这种资本家的奸细。”

春 到杭州，探望寄居在四伯父家的弟弟景白、坚白和妹妹轶群。瞿秋白的几个弟弟，在他引导和影响下，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景白就是这次被瞿秋白带到上海，进上海大学深造的。^①

5月15日 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厂长)率领打手枪杀中国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10余人。工人罢工反抗，上海学生援助工人，租界巡捕进行逮捕，激起工人、学生和各界群众极大的愤怒。

5月18日 作《日本对华之屠杀政策——上海——青岛——大连》，署名双林，发表于5月24日《向导》第116期。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军阀在上海、青岛、大连等地肆意屠杀工人的暴行。指出：“最近几个月，自从段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势

^① 当时，瞿秋白住在闸北青云路师寿坊上海大学宿舍。

力一天一天的增加起来，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利用亲日派政府的政治力量，不但竭力向中国进攻，侵略中国，剥削中国的劳动者，而且简直肆行屠杀政策——简直以殖民地看待中国。”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青岛、大连等地如何残酷剥削工人，血腥镇压工人运动，屠杀工人群众，指出“日人在中国境内，到处可以随意放枪杀人，显然是以牛马奴隶对待中国人”。瞿秋白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政治压迫政策，要想镇压住中国人的反抗，真是梦想！中国的人民，尤其是劳动群众，决不因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强力剥夺自由而气馁的。各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仍旧进行的非常热烈。”他警告日本帝国主义：“你们不要太乐观了！中国民众不是这种屠杀政策所吓得住的，中国民众必定要推翻你们派来的中国总督，打倒你们的帝国主义！”

5月28日 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决定立即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会后，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向警予等都投入了紧张的群众工作。

5月30日 上海3,000多名学生和部分工人组成演讲队，分头到租界各闹区，并散发传单，遭到租界巡捕开枪镇压，死13人，伤者无数，酿成五卅惨案。瞿秋白同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刘少奇、刘华等领导了这一震动中外的爱国反帝运动。

5月30日 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发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进一步反抗帝国主义的暴行，推动全国的爱国反帝斗争，并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组成行动委员会，立即公开组织上海市总工会。当时，瞿秋白主张再激进一点，动员大批工人和学生连续到南京路上去示威。他认为英国巡捕如果竟敢再开枪，把事态扩大，就会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怒

潮，全世界人民也将同情和支持中国的反帝运动。这一意见因陈独秀不同意，没有得到会议通过。

6月1日晚，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作出决定，由上海总工会联合中华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组成统一战线性质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挥机关。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于6月4日正式成立。

6月4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第一个日报——《热血日报》创刊号出版。编辑部设于闸北宝昌路（近香山路——今象山路口），由瞿秋白和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今名何公超）组成，瞿秋白任主编，并负责撰写社论。各期社论除去6月18日是沈泽民撰写的和陈独秀撰写过几篇外，其余大多为瞿秋白所写。①瞿秋白为《热血日报》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词》。他还以“热”、“血”、“沸”、“腾”、“了”的笔名给《热血日报》写了二十余篇短文。《热血日报》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6月16日该报登出启事说：“出版十期，销数即达三万，投稿通信与亲来接洽者，日以百计。”《热血日报》对团结群众，打击敌人，推动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引起帝国主义者和奉系军阀的仇视。第24期出版后，租界巡捕房封闭了承印《热血日报》的明星印刷厂，《热血日报》遂被迫停办。②

6月4日 英国陆战队占领上海大学。但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许多学生深入到工厂和工人居住区，组织工人群众进行斗争。杨之华被派到浦东区组织工人群众。一天晚上，瞿秋

① 1927年瞿秋白自编的《瞿秋白论文集》中，收入的《热血日报》社论就有20篇。

② 参考郑超麟、何公超、茅盾、杨之华等的回忆。按：郑超麟1980年10月19日回忆说，从当时秋白谈话和文章风格来判断，《发刊词》系陈独秀所写，非秋白文章。详见笔者访问郑超麟记录，刊《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

白听了杨之华谈了工作情况和工人思想后，鼓励她说：“我们知识分子确实需要向工人学习，同他们一起进行斗争，就会体会到共产党的伟大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而个人只是象大机器中的一颗小螺丝钉。”^①

6月4日 于《热血日报》创刊号发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高潮》，署名维摩。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在五卅惨案中的“强暴的寇盗行为”，指出6月1日、2日之后，“西洋人、东洋人仍旧是“到处杀人，死伤惨剧一日数闻”，外国武装“时时刻刻想冲进华界捕人”。瞿秋白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决非偶然，“几十年来他们用武力侵略、外债政策、教会学校等种种方法，进攻中国，屡次强迫订立种种条约，束缚我们中国”，“强迫租借军港商港”，“武力迫开商埠，霸占租界，设立外国警捕，享有治外法权”，“协定关税”，压抑“中国的实业”等等，“操纵中国政治”，“掌握中国经济”。瞿秋白分析说：“中国的贫弱而沦于危亡的根本原因，便在于此。”这次上海工人、学生、市民一致起来罢市、罢课、罢工，反抗帝国主义，他认为：“这是表示中国人已经觉醒了。”最后明确指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方向：“列强的统治者必须根本推翻，一切不平等条约应当根本废除”，“那时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他要求全国人民，“不论这次的成败，大家都要觉悟，必须积极组织自己的力量，实行长期的斗争，实现国民革命。”

6月6日 于《热血日报》第3号发表《外人大屠杀之目的——上海——汉口——青岛——大连》，署名维。痛斥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工人，而且在大连、汉口、青岛等地“到处杀人。”揭露帝国主义杀人的目的是在于“使工人不能反抗”，“永远甘心做亡国奴”，妄想“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要使中国人都做他们的牛马奴隶，替他们做工，而中国的富源物产完全归他们所有”。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40页。

6月6日 于《热血日报》第3号发表《群众歌（大家都要唱熟）》，未署名。^①

6月7日 北京政府派蔡廷干（财政部税务处督办）、曾宗鉴（外交部次长）作为“特派员”来到上海，与帝国主义进行秘密活动，企图限制和破坏人民的反帝斗争。瞿秋白于《热血日报》第7、8、13、14期连续发表《五卅交涉的危机——注意亡国的外交政策》（6月10日）、《政府特派员是何居心？》（6月11日）、《五卅交涉中的民众要求——谨防外交当局的狡谋》（6月16日）和《外交当局的欺人政策》（6月17日）等社论，反对北京政府出卖人民利益。特派员到达上海后，对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要求，不但不据以向领事团提出交涉，反而说什么“此等条件……未可一律看待，亦犹国民拿一桌菜来，我不能一时即吃，尚须有所选择”。社论给予有力的批驳：“这是甚么话！蔡、曾这种口吻，简直是代表外国人向国民宣战，最小限度的要求还要选择，国民方面的主张，竟成了对于大员的贡品，要他们‘赏脸’。”进而指出北京安福政府“显然暴露他们亲日派的真相”，社论分析说：“他们来上海的使命，照此看来，并不是调查五卅屠杀案，也不是办交涉，简直是做日本人的奸细，想破坏罢市、罢工运动，以献媚于他们的主人。”社论还说：“特派员一到上海，立刻便说‘日本领事甚表好意，国人当分别视之’。”指出现在政府特派员的主张，完全是“凑合了英、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严厉地责问他们：“是何居心？”瞿秋白认为这些外交大员，“除卖国误国以外，别无伎俩。”瞿秋白号召人民要坚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及租借地”等等最低要求，“使中国脱离殖民地的地位”，“至少……能给我们中国人民以相当的自由”，瞿秋白反复指出政府及官僚“竭力虚夸外人

^① 本文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

的大量、谅解，自己主张减低要求，缩小范围，地方解决，故意挫折消弭奋起力争的民气，还是那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主义。”呼吁全国人民提高觉悟，“决不能受这种政策的欺骗”，“要“组织起来”，联合起来，“预备和残暴的帝国主义者，决一死战”！“铲除一切卖国罔民的奸贼”！

6月7日 于《热血日报》第4期发表《中国人不要做外人爪牙》，署名维，分析上海租界的性质，指出：“上海租界名说是中国地方，其实和香港有什么分别！工部局里华人是不能参与的，租界的市政华人是不能过问的，立法权只有西人纳税会有；武装势力——军队、巡捕、商团，也都是外人的，总之上海的主人完全是外国人，中国人在租界政府机关里的人只是供外人驱使的巡捕、包探、翻译、西崽。”瞿秋白认为这些人是外人统治中国的爪牙。但又作出具体分析，认为他们是“不幸的同胞”，“为生计所逼而去当人家的爪牙”，进而指出他们当中有些人如西崽、华捕已经“觉醒过来了”，感到“良心上过不去”，而“罢工”、“罢岗”了。文章要求“赶紧组织这些不幸的同胞”，同中国工人、学生、市民、商人等，“一致抵制外人”，“保存我们主人的地位”。

6月8日 《热血日报》第5期发表由瞿秋白撰写的社论：《工商学联合会与上海市民》。介绍工商学联合会的组成及其性质和任务，指出：工商学联合会“是五卅运动中最集中最有实力的指挥机关”，“他应当能代表全上海的市民，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在这次交涉里做积极的主体，监督政府的外交”，“以求得到最大限度的胜利。”社论建议工商学联合会所提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中，再补充三条：“一、撤退外国驻华的一切武装势力；二、中国市民有参与租界市政之权；三、中国职员、工人有同盟罢工之权。”并阐明上述要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特别强调指出：“后两条尤其是必不可少的。”最后，号召工商学三界必须团结一致，坚持斗争，“非达目的不

止”。

6月10日 北京各国公使团派出的由英、美、日、德、意、比六国代表组成的所谓“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的成员樊理礼克、葛林、重光葵、祁毕业、孟都拉、于兰斯来到上海，与北京政府派出的代表就地交涉，施行谈判骗术，欺骗人民，破坏斗争。在此前后，瞿秋白主持的《热血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宣传党的正确主张，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抨击帝国主义的造谣和诬蔑。6月7日发表《当心外国人离间的阴谋》和《公使团与开枪的西捕》两文，前者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惯用的手法，“不但是大炮机关枪军舰来轰击戕杀，而且还有‘和平的’、最恶毒的阴谋”；后者指出：“捕房、工部局、领事团、公使团，他们都是串通一气的。……我们绝不希望帝国主义对此次屠杀主持正义，希望北京公使团主持‘正义’，实是梦想中之梦想。”

6月10日 上海总商会召开会员大会，成立“五卅委员会”专办“五卅案”，并着手删改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十七条交涉条件，另提十三条交涉条件，企图一手遮天，垄断交涉，以“五卅委员会”代替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争夺五卅运动的领导权。瞿秋白针对总商会的阴谋活动，先后于《热血日报》第11、12期，连续发表社论：《上海总商会究竟要的甚么？》（6月14日）、《全中国都要受外人屠杀了！——上海总商会却还要反对民众的团结》（6月15日）等，揭露和批判总商会的“妥协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海总商会另组织五卅委员会，拒绝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其目的是要充当“调人”或“半调人”，“垄断交涉”；上海总商会要删去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三条要求中关于“英日海陆军永久撤退”、“取消领事裁判权”以及“优待工人，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同盟罢工之权”等重要内容，其目的是要“保障外人在华利益”，“完全牺牲民众利益”，“希图讨外人的好”！社论特别着重分析和指责了上海总商会要删去优待工人

的“妥协主张”。指出当时的形势，“简直是全国都陷在恐怖之中，人人都有被杀的危险”。认为“这次运动里第一件要紧的事，是赶紧“把学生、工人、商人都严密的组织起来，甚至于乡村中的农民，也应当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争得平民结社——工会、学生会等——的权利”，把“觉醒的民众，引导到国民革命的持久的斗争道路上去”。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抵抗得住外人这种屠杀政策；我们才能以实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而上海总商会却偏偏要取消民众组织起来的“自由和权利”。社论指出：“上海总商会却特别注意的勾去了工会一条及结社两个字。这显而易见是总商会故意反对中国平民的团结。”

6月11日 秘密参加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上海西大吉路公共体育场举行的10万人市民大会。会议通过市民大会宣言，重申17条的严正主张，“一致誓死力争，不达目的，决不中止”。当时，瞿秋白工作非常繁忙，除了有时秘密参加类似上述的群众大会外，还要经常参加频繁的中央和地方的党的会议，起草中央文件，给党刊撰写文章，给党团员、积极分子作报告。此外，他还具体领导党主办的“国民通讯社”的工作，布置采访要求，听取记者的汇报。^①

6月12日 《热血日报》第9期发表由瞿秋白撰写的社论《警告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社论认为，应当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要求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不要屈服于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官厅的“哄吓诈骗”，再作“让步”。

6月12日 于《热血日报》第9期发表《巡捕房的假证人》、《枪弹究竟应当从哪里进去？》、《上帝呢，还是财产？》、《贼的伎俩》和《蔡廷干的表示》一组短文，分别署名热、血、沸、腾、了。其中《巡捕房的假证人》，指出“公堂”上的所谓证人，一个是工部局医院的华人陈某，一个是外国基督教的教士韦士列特基，都是工部局的人。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41、44页。

6月13日 于《热血日报》第10期,发表《江亢虎辟赤化谣》,署名血。批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江亢虎歪曲五卅惨案中的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和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文章指出:“有人说:‘我们不能以人废言,希望大家莫中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团结,奋起,坚持到底,打倒帝国主义!’可是糊涂的毕竟糊涂——江亢虎的宣言,尽着说‘缩小范围’,期于速了。”文章认为:“真听了他的话,便成了‘软持不到底’!”同日还发表《也是一种爱国的方法》(署名热)和《小吃齐心酒》(署名沸)。

6月14日 于《热血日报》第11期发表《更可怕的十秒钟》、《可爱的梁启超》两篇“小言”,分别署名默、顾。

6月15日 于《热血日报》第12期发表《大家都卖气力了》,署名热。指出五卅惨案后,湖北督军萧耀南、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赵恒惕、奉天警察厅长陶学潜和教育厅长齐彦树等一班刽子手,都起来为帝国主义“卖气力”,他们下令,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说什么“损害外人之生命财产者格死勿论”、“严拿过激党”,禁止游行,对学生进行种种指责等,文章把他们斥之为“帝国主义的忠臣”。

6月16日 于《热血日报》第13期发表《卖国的不但政府》、《蔡督办打扑克》,分别署名热、血。

6月17日 作《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发表于6月22日《向导》第119期。文章概述了1925年初以来国内政治形势和民族斗争的情况,总结出中国国民革命的怒潮里发生了“不可免”的分化:革命派和妥协派。指出,“上海工人、学生及一般商民……是革命派”,“上海总商会……是妥协派”。文章分析了他们之间在有关“对于帝国主义的要求”、“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反抗运动的范围”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和斗争。指出:革命派的主张,是“着眼在民族的利益,根本要中国的解放独立,脱离殖民地的

地位”，力争“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及无产阶级联合……共同反抗帝国主义”，“揭发各国帝国主义联合压迫中国的真相”；妥协派的主张，“只是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争回外人在不平等条约以外所侵夺的东西”，“撇开大多数民众的要求，牺牲平民的自由”，“缩短战线，不敢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制度”，只求“缩小范围”和“就地解决”，“争一个表面上妥协和面子，使五卅大屠杀案早日了结，只求‘平平民愤’，好使反帝国主义运动不能继续增高的起来”。关于反帝战线问题，文章特别强调，革命派并非一定要扩张战线，反对一切外国人。恰恰相反，革命派是主张缩短战线，不但只反对英国、日本等，并且只反对英国、日本等的军阀、财阀。文章认为，妥协派表面上似乎是站在人民的一边，但实际上，他们简直是“卖国背叛民族利益的分子”。而革命派真正是“代表全民族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文章要求各界民众“联合起来”，甚至作好“武装准备”，进行国民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6月18日 《热血日报》第15期，发表瞿秋白撰写的社论《无耻的美国帝国主义者！》

6月18日 于《热血日报》第15期发表《总商会的非合作主义》、《糊涂的〈民国日报〉》、《自由的劳动》、《可恶的上海报界》和《虞洽卿与六十万元》一组短文，分别署名热、血、沸、腾、了。

6月19日 《热血日报》第16期发表瞿秋白撰写的社论《推翻媚外的军阀官僚》。社论痛斥军阀官僚“甘心做帝国主义的走狗爪牙，残杀同胞，压迫平民的爱国运动。”揭露湖北督军萧耀南镇压武汉学生运动和北京交通部严禁工人集会的罪行。最后，动员全国人民“赶紧团结，奋斗！”要求北京政府，“立刻免萧耀南的职，立刻将他正法”；“立刻取消交通部的媚外禁令，免交通总长的职。”

6月19日 《热血日报》发表瞿秋白撰写的社论《官僚商阀之秘密外交——人民快起来打倒他们！》。指出北京特派的交涉使者

“和外国人开秘密会议，隐藏着卖国的黑幕”。严正警告官僚商阀：你们“以秘密外交断送国家及平民的利益，你们的命运，一定和一切卖国贼一样……全国的商民学生工人，都要起来打倒你们！”社论最后指出：“认定这次交涉，要解决中国国际地位的根本问题，决不能让总商会和几个官僚，拿那种妥协的条件，去和外国秘密商量，断送国权！”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起来，打倒这些官僚商阀的秘密外交”。

6月19日 于《热血日报》第16期发表《还希望军阀们来救国么？》、《不如是，势必五分钟》一组短文，分别署名热、血。

6月20日 于《热血日报》第17期发表《外国皇帝的勋章与中国同胞的血》、《一手给钱一手开枪之张少帅》和《大老班们好财运》一组短文，分别署名热、血、沸。

6月20日 《热血日报》第17期发表瞿秋白撰写的社论《交涉破裂后我们怎么办？——全国对外的大罢业》。社论揭开了五卅案中对外谈判的结局：不“惩凶”，不“赔偿”，不“道歉”；交涉是所提的已经妥协到万分的“收回会审公堂、阻止越界筑路等”条件，也被“一巴掌打回”，其余条件以不涉此案为借口，“不肯讨论”。社论揭穿了六国委员为“巡捕房辩护”。社论告诫中国人民，对任何帝国主义都不要抱有幻想，明确指出：“帝国主义联合压迫我们中国”，他们都是“杀人的正犯”，“野心的侵略家”，“只能来压迫，决无所谓‘公判’。”社论发出号召：要求全国各地“外国人的工厂、企业、机关，一致罢业”；进行“大规模的募捐，政府应当拨出巨款，维持持久的罢工”；“要求列强撤退海陆军，交还租界，解散外国巡捕，为开议条件”；“要求列强立刻答应废除种种不平等的协定，收回海关，废除协定关税制度，收回租借地等”；召集全国商、学、工、农各界等全体大会”；“国民团体大会组织临时革命政府实行废约”。社论认为：“只有这样大规模的运动和奋斗，才能争回中国的主权和民众的

利益，才能脱离现在的奴隶地位，才能不受外人屠杀。”

6月21日 于《热血日报》第18期发表《死活只有两条路——全国对外大罢业还是做奴隶？》，署名维一。这时五卅交涉已经破裂，中国人民怎么办？如何继续进行反帝运动？瞿秋白指出：“只有一条生路，就是：全国工人、职员、仆役等对于这种压迫我们的外国人的企业、工厂、机关、公署、洋行、公司、家庭等，一致的罢业；全国商人对于他们实行绝对的经济绝交，不和他们贸易，不进他们的货，不卖给他们原料、食物、用品，不和他们通汇兑，不用他们的钞票……并且应该筹募巨大的款项，规定详尽的办法，以维持全国罢业者的生活，经常持久的抵制！”文章发出警告：谁敢破坏这种计划，谁就是“卖国贼”，要“以极严厉的手段对付。”瞿秋白认为除此以外，只有一条死路：“做奴隶，做牛马。”

6月22日 《热血日报》第19期发表瞿秋白撰写的社论《谁是敌，谁是友？》。社论要求教育中国人民，“应当认清：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一方面他用具体事实论断英日美等列强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列强“联合压迫我们的形势，已经明显到极点了”，一定要去掉幻想，不要以为“美法政府会表同情的”，“日本想先解决纱厂问题，支持正义的”。国内的敌人则是“军阀奸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是世界无产阶级、“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列强各国的民众、工人、农民以及受列强压迫的其他弱小民族，如印度、朝鲜等。”只有他们“才能真正援助我们。”并列举事实，指出五卅惨案后，苏联、日本、法国、印度等国人民纷纷援助中国人民的斗争。社论最后说：“总之，我们民众要靠我们自己，要靠我们真正的朋友，大家合力一致的奋斗，反对我们国内国外的一切敌人，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根本解放中国，不再受人屠杀！”

6月23日 《热血日报》第20期发表瞿秋白撰写的社论《全

国罢工潮与上海开市》。社论指出：上海五卅交涉破裂以后，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全国国民绝交办法，其中所谓“工作绝交”（罢工），比经济绝交尤其重要。这种办法已开始在全国实行。但是，在这全国罢工的怒潮里，上海总商会却在忙于“商量开市”。社论认为：“上海开市的问题，决不是‘罢市只损失自己，尽可早日开市’的简单问题。”上海开市，是事关全局的问题，如果骤然开市而没有明确的表示，“足以引起全国的恐慌，以为上海人完全软化了，各地的运动都要受到恶影响。”所以社论要求上海总商会如果要宣布开市，至少要有极明确正式的宣言：“（一）说明忍痛开市的理由，在于自己想包办妥协，以致外人乘此弱点，突转强硬而交涉破裂，弄得没有持久的国民绝交不能解决五卅案；如今自己承认这一错误，说明——虽然因为罢市不是持久的斗争办法而开市；然而已经根本觉悟，以后一切都与一般民众合作，并且愿意进一步而赞助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根本解放中国的运动。（二）宣誓切实执行经济绝交，请工、学各界参加检查抵制仇货的机关。（三）宣誓切实援助罢工工人，详细宣布挨户摊捐办法，尤其要将这些款项交出，归工学商各界共同组织的机关保管。”社论警告上海总商会：如果不这样做而竟先行宣布开市，因此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完全要总商会负的”。

6月24日 《热血日报》第21期发表瞿秋白撰写的社论《北京政府之修正不平等条约——日本外相之政策可以对照》

6月25日 是全国各地一致大示威的日子。当天，《热血日报》第22期发表瞿秋白撰写的社论《全国大示威的意义——应再有实际上的统一行动》。社论阐明五卅惨案既不是“法律问题”，又不是“地方问题”，而是“全国问题”，“国际上的政治问题”，指出：“今天我们全国一致的罢市、罢工，便是这种意义的表示”。因此，社论要求：（一）“各地的工、学、商、农等各界”，赶紧“组织统一的机关”，“切实进行经济绝交和工作绝交，严重的监督一切汉奸”；（二）“赶

紧召集各地有实力的群众团体”，“开一全国代表会议，举出全国的执行机关——进行全国的运动，并且监督政府的外交”；(三)“应当有全国一致的要求，我们应当抛弃各地及上海单独提出的条件，应当总汇各地各界民众的要求，决定一个统一的要求条件”。全国民众都应当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主张。社论最后发出警告：谁“不顾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而希图自利”“破坏国民的一致而致失败”，谁便是“卖国害民的蠹贼，国民应当一致声讨的”！

6月26日 《热血日报》第23期发表瞿秋白撰写的社论《英帝国主义之阴谋——广州事件》。社论指出，在五卅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广东的民众运动也蓬勃兴起，先后发生香港海员大罢工、广州沙面华员大罢工，取得了反帝的胜利。社论认为究其原因：“一则是广州民众有工会等团体的组织，力量集中，再则是广州政府之下人民有充分的集会结社自由，又能代表中国人民力争”。因此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国帝国主义非常仇恨广州国民政府。社论揭露帝国主义“屡屡帮助陈炯明，想推翻这政府”，“最近他们又借给不少军械金钱给杨希闵^①等，残杀广州人民”，“阴谋扑灭南方的革命势力”，进而“扑灭全国的民众运动”。社论动员全国人民，为拥护全国民众运动及广州政府而奋斗！团结一致决心战胜帝国主义！

6月27日 《热血日报》第24期发表瞿秋白为该报撰写的最后一篇社论《五卅案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社论分析五卅惨案后，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是理所当然的，这决不是什么“赤化过激”。指出：“假如这便是赤化过激，那么，全国四万万人都应当变成过激派！”社论认为：“我们民众一定要督促政府，立时宣言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分别与各国开谈判、订新约；那时，一方面即可“立刻达到撤退外国海陆军、保障中国人民自由等要求，

^① 当时任驻粤滇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

解决五卅以来的沪案、汉案、粤案等；别方面又可以立刻暴露列强的真实态度，使他们不能不宣言赞成废约而不实行。”社论还指出，如果认为废约问题与五卅惨案作一步解决不可能，要在解决惨案以外，另谋解决，“至少应当一方面提出废除条约的具体方案；别方面，先解决五卅以来各地的惨杀案时，仍旧应当提出彻底的切实解决本案的条件”，即应当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的十七条要求为根本，不能根据总商会所拟的十三条。

6月30日 作《五卅屠杀后之奉系军阀》，发表于7月2日《向导》第120期。

6月 《热血日报》先后选登了六首通俗歌谣：《平民歌》、《罢市五更调（上海白）》、《救国十二月花名》^①、《五卅纪念曲》、《泗州调·大流血》^②、《泗州调·国民团结歌》。足见瞿秋白非常重视通俗文学。他在《罢市五更调（上海白）》前面还加了按语：“我们很想收集这种平民作品。因为只有在这种作品里，我们才能够看见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思想和情操。我们现在得到了这一首，先发表出来。如果爱读本报者肯以自己搜集所得的寄来，我们一定择优发表。”

7月1日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任主席，鲍罗廷被聘任为顾问。

7月 瞿秋白幼年挚友羊牧之在南市由上海总工会主办的工人夜校教课。8月间，从高语罕那里得知阔别9年的瞿秋白的住处后，遂登门看望，受到瞿秋白夫妇热情接待。他们会见后彼此亲切叙旧谈心。瞿秋白问了羊牧之的家庭、学习、思想和工作等情况，畅谈列宁那气势磅礴的政治风度、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改组、陈独秀

^{①②} 据茅盾回忆《救国十二月花名》、《大流血》系瞿秋白所作，笔者于1980年、1990年先后数次访问当时《热血日报》评委郑超麟先生，据他回忆，当时瞿秋白并不写这类通俗民歌。

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等,就是矢口不谈自己。在羊牧之追问下,只是谦虚的说:“如果要问我的过去,那只有‘可笑’两字而已。”“对马克思主义仅只懂得点皮毛”。他还坚定地说:“今后,一切贵在脚踏实地,贵在实练明察四个字。”不久,瞿秋白介绍羊牧之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①

7月 戴季陶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公然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工农革命运动。

8月13日 作《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发表于8月18日《向导》第125期。文章着重论述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是“工人阶级的勇猛斗争”的结果,并指出要进一步发展全国各阶级的大联合。瞿秋白首先评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彻底革命性,指出:“中国工人阶级为着抵御帝国主义的压迫,首先开始斗争,他们不但要改善自身的经济地位,而且代表全民族的利益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工人阶级处于最受压迫的地位,他们除锁链而外,真是一无所有,他们不像资产阶级有患得患失的懦弱心理;而且他们知道中国民族处于列强统治之下的时候,工人阶级决不能独得着解放,要解放自己,必须同时解放全民族。”因工人阶级提出了民族解放的总要求,“自然使反帝国主义运动里实际上成立全国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他说,五卅以前,这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社会上一般人都不敢提,甚至被指为“赤化过激”,但五卅以后情势便大不同了。指出:“不但工人阶级一致的提出这一要求,不但全国的学生群众努力的宣传和鼓吹,甚至于段政府都不能不提出修正不平等条约的通牒,上海总商会等类的团体,以及一般商人都赞助这一口号,而且参加运动。”文章还指出工人组织工会、团结一致、英勇斗争的实际行动,促使全国人民的觉醒,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学生、商人都参加了工商学联合会或类似的组织,形成为

^①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霜痕小集》。

广泛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奋起与外国帝国主义者奋斗”。所以文章认为：“如今全国各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得以实现，实在完全因为有工人阶级的勇猛斗争”，“全靠工人阶级做后盾”。文章要求全国人民不但要“巩固我们的联合战线，保持我们已得的胜利”，而且要更进一步“格外扩大联合战线”，“应当赶紧进行全国工商学农的大联合”。他特别强调，要警惕和反对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屈服”，“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最后号召工人阶级“率领全国民众”，坚持“长期的斗争”，“促成全国的统一，实现平民的政权，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等，武装平民，成立全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一定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目的”。

8月27日 作《英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与广州国民政府》，发表于8月31日《向导》第127期。揭露英国帝国主义者曾先后利用陈炯明及杨希闵、刘震寰发动军事叛乱，企图推翻广州国民政府，以扫除侵略中国的一大障碍，但这两次计划都遭到失败。文章说，广州革命政府反而更加巩固起来，指出：“五卅以来全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里，除上海以外，广州方面的运动的确是最持久最伟大的运动；而广州的国民政府不但以实力赞助粤、港的民众运动，而且在政治上领导全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文章又揭露英国帝国主义在进行第三次阴谋颠覆广州政府的计划，指出：“英国帝国主义者开始便说广州政府‘以命令’禁止英、日船入口是违反条约；继之便仍旧勾结广州内部的反革命余孽暗杀廖仲恺先生；再进而香港的英资本家公然主张对广州下哀的美敦书。”文章谴责其主张，说这简直是以武力干涉广州的内政，要解散革命的军队，强迫执行所谓条约义务，以兵力强迫华人购买英货并干涉华人的言论自由。文章最后要求全国人民：“积极的起来反抗英帝国主义，肃清内部的卖国的反革命派，巩固国民政府①。”

8月 受中央的委托,针对戴季陶为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此文编入《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作为向导丛书,公开发行,向党内外进行教育。文章严正地驳斥戴季陶的种种谬论,深刻地揭露戴季陶主义的反动本质,指出,戴季陶提出的所谓“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就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党。瞿秋白指出戴季陶主义的根本点,是唯心论的道统说,宣扬“阶级调和论”。文章说:“他的主张,实际上是只要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知识阶级‘知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文章又说:戴季陶主义“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瞿秋白在文章中,批判了戴季陶提出的所谓团体的排拒性和独占性等反动思想,揭露其反对国共合作、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实质。文章指出:“戴季陶的主张,根本上还是要C·P·完全退出国民党,根本上要消灭C·P·,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瞿秋白还批驳了戴季陶的关于共产主义“不能实现,不适宜于中国”的谬论,明确指出:“中国国民革命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斗争领导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是最合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是解放中国的唯一的道路”。

8月 一天晚上,羊牧之访瞿秋白夫妇。瞿秋白向羊牧之介绍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其最大的特点,是善于组织和发动群众,重实干而说不说空话,讲话、写文章,没有知识分子腔,说理通俗透彻,有煽动力。^①

9月3日 作《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发表于9月7日《向导》第128期。文章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被压迫

^① 羊牧之:《霜痕小集》。

被剥削的阶级——失业的劳动民众，反抗外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称赞“这种反抗的精神是非常之可敬的”。接着批驳了士大夫阶级对义和团运动的诬蔑和诽谤。指出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帝国主义者高压的侵略政策所必然要逼迫出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致使大批手工业者和农民的破产，他们“迫于经济上的困苦，本能的发生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思想”。文章也明确指出了义和团运动的缺点，认为义和团运动实在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没有一个先进的有组织有力量的阶级做主干”；“盲目的‘共信’他们的‘排外主义’”；“拒绝一切‘洋货’，拒绝并且反对一切科学文化”；“主张‘国粹’，相信五行符咒等的‘国民文化’”；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等等。这就给后来中国人民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文章又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发生后26年来，中国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变化，指出“国内民族解放的要求一天一天的迫切起来，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自然一天一天的普遍起来”，到1925年终于暴发了“五卅运动”。文章认为“五卅运动，实在说起来，是义和团的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不过五卅运动的方法、组织、策略，完全与义和团不同了”。文章说，五卅运动有先进的工人阶级做领导，“有极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的观念，绝不是盲目的排外”，“反对中国军阀的压迫和卖国，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和软化”；“提出极具体的阶级的和民族的政治经济要求”；结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联络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五卅运动中的中国工人阶级有很严密的组织，极伟大的团体，绝不是宗教式的结合”；等等。最后，文章论述了五卅运动比义和团运动对于民族解放斗争有着“更大的希望和更远的前途”。

9月7日 上海学生、工人20万人集会纪念辛丑国耻及追悼各地死难烈士。返回时，部分工人经过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时，

巡捕竟阻碍这些工人的游行，并枪击，造成“九七惨案”。瞿秋白为此于9月14日作《五卅运动后之九七屠杀》，发表于9月18日《向导》第130期。严厉谴责帝国主义者“用残暴狡狠的手段来摧残民众运动”，揭露中国的军阀、官僚“受了帝国主义者的嗾使，借着外国老爷的威焰更进一步的压迫民众”，指出：“上海许交涉员不但不提出抗议，反而到领事那里去，声明‘出于意外’，‘防范未周’，卑躬屈膝的道歉。”同时指出：“警察厅布告禁止罢工，戒严司令邹重申禁止一切集会的命令，上海对廖仲恺先生的追悼大会亦在禁止之列。”文章有力地揭穿了官僚、军阀所谓“爱国”、“保护人民”的假面具，号召工人、学生、小商人以及一般平民：应当“积极的去发展自己的组织，反抗一切压迫”，不要被统治阶级“所卖”，“保障自己的权利而尽解放中国的责任”。

9月8日 作《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发表于9月11日《向导》第129期。文章论述了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华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总要求”下，与各革命阶级结成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分析了各个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文章在论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结成反帝联合战线的可能性之后，还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倾向和压迫政策，不能不反抗，不能不实行阶级斗争”，这是“事实上必不可免的”。文章还列举大量事实，驳斥了戴季陶的“阶级调和”论。

10月23日 作《反奉战争与国民革命运动》，发表于10月30日《向导》第134期。文章揭露了奉系军阀北京政变以来的种种罪行，指出奉系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最有力的武器”，认为“奉系军阀不推倒，中国的解放决没有可能”。瞿秋白要求反奉战争要成为“革命的战争”。他还揭露了直系军阀在反奉战争中的野心，指出直系军阀一心想“利用人民反奉的舆论”，“争占着领袖地

位，想和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者面前争宠”，“而不肯为民众利益奋斗”。瞿秋白要求：“人民应当是这反奉运动中的主力军”，“应当自己起来组织人民自卫军”，“应当积极的要求自己的权利，一切政治自由和武装自卫的权利。”他强调指出：人民“只有占领反奉战争中的领袖地位，只有积极的参加战争，才能使一切军阀屈服于民意之下，才能根本的改造中国政治”，他还认为“反奉战争的胜利，应当使国民会议实现，成立真正人民的政府”。

10月 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五卅运动以来的斗争经验，确定了党在革命高潮中领导工农群众运动的方针和任务。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等。第一次在党内提出农民土地问题，制定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土地纲领。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要和农民结合巩固的联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责任。”瞿秋白在会上坚决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根据会议的精神，于10月10日发表《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明确指出：“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要实行“耕地农有”，“那就非农民工人联合起(来)革命打倒军阀政府不可。”

10月 作《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国民党》，后编入《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经济研究会出版，上海新文化书社发行。

11月1日 作《世界社会革命开始后之第八年》，发表于11月7日《向导》第135期。分析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八年来的国际政治基本形势，认为“这八年之中革命潮流已经鼓动了全世界”，“全世界的罢工运动风起云涌，一直波及到资本主义落后的远东、日本，甚至于波及最幼稚的中国无产阶级”。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在“摧残这一世界革命运动”，1919年至1921年间，“赶紧对工人稍稍让步”，利用改良主义者，“暂时把革命运动缓和下去”；

1921年以后“重新向无产阶级进攻，打破一切改良派的幻想”，“新找了一只走狗——棒喝团（法西斯特），以强暴的高压手段来镇压革命运动”。文章最后论述了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和列强国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认为这两者，必须“密切的联合起来”，才能“彻底推翻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权”，然后“同心协力的改造世界的经济制度，有规划的进行合理的生产和分配”，才能“达到解放全人类的目的”。

秋冬 在上海某处作一次讲演，题为《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由上海大学学生马凌山记录^①，后印成单行本散发。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阐述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批驳了国民党右派关于阶级斗争破坏国民革命的论调。指出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所阐明的三民主义，“就是阶级斗争三方面的表现”，主张国民革命的国民党“要把全中国民众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要从横暴的军阀、官僚手里夺到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要使全国十分之八以上的农工群众得到生活的改良”，这三方面都是在“实行阶级斗争”。他责问国民党右派：“这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瞿秋白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国民党真正要实行三民主义，非领导他们（指民众）去实行阶级斗争不可。在实际上看起来，阶级斗争不但不破坏国民革命，而且使国民革命发展，在理论上我们如果反对阶级斗争，就无异抛弃三民主义，而反对国民

① 这次讲演极可能就是羊牧之所回忆的那次在上海大学所作的报告。羊牧之在《霜痕小集》中忆述，瞿秋白曾于1925年12月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大教室作过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报告，时间近3个小时。瞿秋白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揭露了国民党右派林森、居正、邹鲁、张继等人破坏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的活动，批驳了戴季陶主义。羊牧之还说，与会者对瞿秋白透彻的说理，雄辩的口才和善于掌握听众心理的才能，都感到无限的钦佩。

革命。”瞿秋白又引用孙中山的话说：“资本主义之下，一定有阶级斗争，这斗争若要消灭，除非实行新共产主义。”瞿秋白还指出，国民党右派口头上是反对阶级斗争，但“他们自身在实行阶级斗争”。

11月23日 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林森、居正、张继等10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解除顾问鲍罗廷〉等决议案，宣布开除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的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林伯渠、毛泽东等的国民党党籍。

11月27日 作〈沪案重查与五卅屠杀的结局〉，发表于12月3日〈向导〉第137期。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调查，并非要求事实的真相，只不过是各国帝国主义者之间，要想协商出一个一致的态度，来压迫中国罢了。文章郑重地声明：“中国的民众不但决不承认这种调查，决不承认五卅屠杀便可以如此结束，并且在这种重查之中民众得着更重大的教训：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一致进攻，完全由于中国方面的妥协退让，由于高等华人的压迫民众。”因而强调指出：“全国民众的解放运动不但不停止，并且要使反奉的战争，变成民众反抗军阀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扫除一切卖国军阀，建立真正的民众政权，打倒买办、商阀的势力，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解放中国的目的。这才是五卅屠杀案的真正结局呢！”

12月3日 〈向导〉第134期发表了陈独秀的〈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一文，广东大学法科梁明致教授读后，给〈向导〉编辑部来信，对文中表述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提出疑问。瞿秋白以〈向导〉周报记者名义代陈独秀作公开答覆。公开信发表于1926年2月3日〈向导〉第144期，题为〈对于阶级斗争之一个疑问——答明致先生〉。后曾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瞿秋白首先解释什么是阶级。然后，他就几个具体问题一一作了明确解答。梁先生以为“一个人的

关系并不止于经济一种；同是一个人或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的阶级”。瞿秋白答复：“实际上，这是错的。阶级的根基是建筑在经济上面的。无论那一个人各属于某一阶级。在某一定的时期，一个人只属于一个阶级。”先生以为“阶级的关系是平等的”，“资本家压迫工人固然不对，但工人压迫资本家也是不对的”。瞿秋白答复：“实际上，这也是错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不但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不是平等，即在社会进化的意义上也不平等；工人是差不多全体的民众，而资本家只是极少数的人，资产阶级专政是为自己的利益剥削全社会，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打倒少数人的压迫以解放全人类，至少也是催促社会向前进步。被压迫者阶级的解放，人类才能平等。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没有违背平等原则，而且正是过渡到完全平等社会的必要的条件。”先生还以为“阶级争斗与阶级间的联合战线不能并立”。瞿秋白答复：“实际上，这也是错的。在阶级争斗之中，必要时，利害有相同之点的几个阶级仍然可以暂时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别的阶级。”解答上述等等问题时，还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

下半年^① 有一次把父亲世玮寄自济南的一封信给友人羊牧之看。信约有三、四页纸，尽是道家用语，羊牧之看不懂。瞿秋白笑着说：“我们父子俩，是各走各的路。”^② 后来，又批判他父亲“一生无益于社会，太没有价值”^③。

① 羊牧之曾回忆说，1925年8月他见到了阔别九年的秋白。这里瞿秋白所说的话，当是1925年8月以后，12月以前。

② 王铁仙：《瞿秋白论稿》第166、167页。

③ 羊牧之：《瞿秋白同志在武汉》，（江苏）《群众》1980年第1期。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丙寅)

二十七岁

1月1日至19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共产党员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大会决定，继续贯彻执行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等；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邓颖超、夏羲等10余名共产党员当选为执行委员，继续聘请鲍罗廷为中央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大会选举前，汪精卫预拟的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名单中有瞿秋白。汪精卫征求张国焘和鲍罗廷的意见时，张国焘就中共党员为国民党中央委的提名表示了意见，他提出：“中共党员如瞿秋白和我自己没有国民党内担任职务，不必再当选，其余中共党员也可以斟酌减少几个，以符中共中央不愿多占国民党中央委名额的原旨。”当时，汪精卫表示反对，说瞿秋白等都是总理在世时遴选出来的，应当继续当选。由于陈独秀、张国焘坚持妥协退让的主张，鲍罗廷又不表示意见，瞿秋白等人就从二届中委候选名单中被删去。^①致使选举结果，中委、监委里，扩大了国民党右派的势力。这就为后来蒋介石篡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造成了有利条件。

1月12日 作《五卅案重查的结果与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发表于1月14日《向导》第142期。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85页。

1月17日 改译《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发表于1月21日《向导》第143期。这是瞿秋白为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而作。他指出，列宁是胜利的十月革命的领袖，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者。中国人民应当纪念列宁，应当考察中国现时的革命运动之发展同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列宁主义的关系。他说，中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及中国共产党“应当利用十月革命的经验”，“以同样的精神去力争中国的民权化，中国的独立解放，造成革命的国民政府”。他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结合十月革命的经验论述了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列宁说，劳动的完全解放，只有劳动者的武装革命能够达到。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因为共产党指导劳动者组织自己的武力，组织赤军，工人、农民自觉的参加这种军队，能为自己阶级——大多数民众——而作战，所以能扫除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战胜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他认为中国革命也应如此，必须“组织自己人民的武力，才能完全胜利。”指出：“只有巩固的革命势力大同盟（无产阶级、农民、革命的知识界及一般被压迫平民之大联合），组织了国民的武装势力，那时中国民族解放的革命才能有彻底的胜利，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国民会议政府才能成立巩固，一切不平等条约才能废除！”

1月22日 作《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发表于3月25日《新青年》月刊第3号。文章全面地总结了五卅运动的历史经验，详尽地阐述了五卅运动的6个特性。他指出，在五卅运动中，党第一次把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运用于各阶级群众反帝斗争中，使之付诸实现。他说：“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实现，全国各阶级各自奋起而汇合成一空前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一次实现于实际行动上。”瞿秋白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和重要作用，说：“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里无产阶级的领袖地位和政治指导，不但实

现于实际行动,而且在这次斗争里,证实了无产阶级是能解放中国民族的主要力量”,“处处都是工人阶级当先锋,以最勇敢牺牲的革命精神,以实际的群众团结的力量,来争平民的权利,争自己阶级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瞿秋白还从五卅运动中深刻地认识到团结农民和组织武装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工农小商等革命势力巩固的团结,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作战在各地直接的组织武装势力,推翻军阀政府,才能使民族解放运动胜利。”文章肯定了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

1月28日 作《国民会议与联合战线》,发表于2月3日《向导》第144期。

1月29日 作《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之分析——》,发表于3月25日《新青年》月刊第3号,署名屈维它。这时,以戴季陶、邹鲁、孙镜亚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和以曾琦、李璜等人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又称“醒狮派”)向无产阶级进攻,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党,反对苏联,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瞿秋白同恽代英等人在理论上与他们进行斗争。瞿秋白在文中强调指出:只要有“压迫剥削”,“阶级斗争便是国民革命中不可免的”。他列举大量事实揭穿和驳斥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散布的什么“广州政府立刻要实行共产”、“共产党要在中国恢复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共产党否认国家、亲俄卖国”等等的谣言和诬蔑,斥责他们是“无知荒谬不学”,是帝国主义的“灰色工具”,“很恭顺的保护人。”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族民主革命,第二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具体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确定进行革命以达共产制度的第一步政策”。瞿秋白指出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虽然内部有矛盾,但是他们的反动本质是一样的。文章写道:“他们比较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消灭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破坏共产党的政治势力,以民族或国家的笼统名词欺蒙无

产阶级,以口头上的保护劳动社会政策诱惑无产阶级,使为己用而专擅国民革命的指导权。”

1月 在上海大学作题为《现代民族问题》的讲演。讲稿当时没有发表,1927年作者收入自编论文集。瞿秋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讲授了民族的经济基础、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民族运动的性质、民族问题的历史、帝国主义前的民族政策、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的性质及其与殖民地问题的关系、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苏联民族问题等。他揭露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罪行。认为现在世界上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世界的民族问题。指出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强有力的友军”,所以“无产阶级现时的第一革命职任,便是结合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劳动平民,筑成一伟大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他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因为“革命的进行真能解放一般平民的时候”,资产阶级“要保持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利益,终究(究)要和帝国主义者妥协”,指出“资产阶级大都只能在一定的期间一定的问题上参加国民革命,而国民革命最终的领袖总是无产阶级——这却是一个公律。”最后指出苏联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是:“民族自决直至分立国家”,并作出了具体分析。

1月 作《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

1月 作《马克思主义之概念》。

1月 一天下午1点钟,在上海由蒋光慈陪同访问创造社的郭沫若。瞿秋白和郭沫若虽然是初次相见,但彼此交谈很融洽。当时,瞿秋白“面孔很惨白,眼眶的周围有点浮肿”,使郭沫若感到吃惊。瞿秋白对郭沫若说,他才吐了一阵血,出院才不久。那时,郭沫若的“意趣是集中在政治问题上”,正和“孤军派”、“醒狮派”等国家主义者进行论战,“目的总是想怎样地破除他们的国家主义的迷

信和其催眠力”。郭沫若对瞿秋白谈了他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创作计划。瞿秋白认为郭的意见是正确的，表示支持，并鼓励他“趁早把它写出来”，答应给他提供关于土耳其的资料。瞿秋白还向郭沫若介绍了俄国文学，建议他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瞿秋白说：“那部小说的反波拿伯主义（即反对拿破仑主义），在我们中国有绝对的必要。”^①

2月2日至16日 为《新青年》“战壕断语”专栏作《中国革命者的杂记》，署名屈维它，发表于3月25日《新青年》月刊第3号。他在引言中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战线”——一个“战壕”，别的战线同“中国革命的成败是有声息相通的密切关系”。他认为“我们最好能有整部的著作——详细的谍报，因为我们应当知道别的战线上的形势，才能正确的决定我们的战略”。但“战壕生活”不容许立刻“实现这种希望”。他说，只能在“枪声炮火中”，记录些“断断续续的消息，战鼓声中的传语”，认为“这些战壕里的断语，至少对于世界革命战线的情形可以得其一二”。瞿秋白本篇杂记列有下列六个标题：《摩洛哥和叙利亚》、《摩塞尔问题、土耳其、蒙古、爪哇》、《危机中的波兰》、《德国的革命新潮》、《寡头政治的美国》和《所谓大英帝国主义》。

2月3日 于《向导》第144期“寸铁”专栏发表杂文5则：《两副面孔一个公式》、《大家谢了大家》、《日本外交部搬家》、《好个交换条件》和《苏联真无诚意！》，署名它。

2月5日 作《国民应为国民会议而战——张吴联合攻国民军之政局与民众》，发表于2月10日《向导》第145期。

^①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北新书局出版，1936年。按：郭沫若接受瞿秋白的意见后，便着手翻译《战争与和平》，于1931年8月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了第1册（上），可惜译到三分之一便中断了。抗日战争期间，郭沫若与高植重新合译，另行出版。

2月6日 为了配合在“二七”前后开展的“中国职工运动战士大追悼周”的活动，作《中国职工运动战士大追悼周之意义》，发表于2月10日《向导》第145期。文章谴责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屠杀工人群众、共产党人的罪行，歌颂了工人群众和共产党人的“彻底的觉悟和勇猛的精神”。指出敌人的残杀，“惊醒了中国革命的阶级，使他们如潮水一般涌入国民革命的队伍”。他说，无数的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烈士的“勇猛悲壮的精神”，感动了“中国一般平民群众”，“造成全国革命化——‘赤化’的形势”，烈士的血“是为中国工人阶级而流的，也是为中国民族而流的”，因此，他们的死，“是光荣的死”，“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死的啊”！最后号召活着的人们“要痛切追忆我们的死者，努力去奋斗”！

2月10日 于《向导》第145期“寸铁”栏发表杂文4则：《都是犯了圣讳》、《赤化共产真时髦》、《原来唯恐我们不快死不坐牢》、《法统说的由来原来在此！》，署名它。

2月21日至24日 同李大钊、陈延年、任弼时、谭平山等12人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特别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明确地提出了当前党的任务——从各方面积极推动广东国民政府进行北伐，用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瞿秋白坚决赞成这次中央会议所制定的方针，并为中央起草了有关的通告。

2月27日 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声援国民军，同陈延年等领导北京4万多群众，召开了国民大会。

3月6日至4月 先后为《新青年》“战壕断语”专栏（二）作《印度的革命工人》（3月6日）、《蒙古的国民革命党》（4月7日）、《意大利法西斯蒂的侵略政策》（4月7日）、《帝国主义的裁兵和世界的武装》（4月10日）、《法国共产党反对洛迦诺条约》（4月15日）、《德国无产阶级眼中的洛迦诺精神》（4月15日）、《瑞典的共

产主义运动》(4月20日)、《新经济政策下的商业和社会主义》(4月),署名屈维它,发表于5月25日《新青年》月刊第4号。^①

3月17日 以《向导》周报记者的名义在《向导》第146期以公开信的形式,再答广东大学法科梁明致教授提出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若干问题。题为《对于阶级斗争的讨论——再答明致先生》,后曾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公开信把先生提出讨论者总括为:阶级斗争与阶级间联合战线问题、阶级分野的标准问题、阶级与国家问题、蒙古问题等四点。瞿秋白对于前两个问题,在前次回答的基础上,针对先生的看法,作了一些补充。他指出,“在阶级间联合战线之时,阶级斗争仍是必要的”,“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当中,必须肃清内奸”,“非此斗争,国民革命必不能发展以至于成功”。关于阶级分野的标准,他进一步作出解答:“阶级分化根本的标准只是生产机关的占有,不是职业(职业的差别只因工作性质不同,而不是利益的不同),更不是属于筑物的习惯、教育等。这是马克思的阶级分野的标准。”至于“阶级与国家”,瞿秋白认为:“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工具。国家是阶级社会里一种特殊的产物。但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绝不否认国家在现社会的存在。”又说:“我们不象国家主义者,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的国家,乃是大多数人民的国家;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需要打倒帝国主义,需要与世界无产阶级势力联合起来,做到中国的独立,再进一步做到世界大同”。最后回答蒙古问题,瞿秋白认为:“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则我们也应该放弃中国历来对于蒙古的传统的政策。蒙古民族有其自己的意志。我们不自认中国是苏俄煽惑起来脱离帝国主义的统治,我们自然不能说苏俄煽

^① 各分篇写作时间据丁景唐,文操:《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第41、42页。《新青年》月刊第4号“战壕新语”各分篇均无写作日期,只在通篇末尾注有写作日期:“1926年4月。”

惑蒙古，使之自由联合于俄。”

3月18日 作《中国境内之华人参政问题——上海工部局 总董教训总商会会长》，发表于3月27日《向导》第147期。揭露帝国主义者允许中国人参预租界市政是新的“阴谋”。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者的目的是想用市政局（工部局里）容纳几个高等华人的小钱，赚到镇压中国民族运动的大资本”，即“用一便士换一镑”。文章告诫中国人民，“外国资本家的算盘真正精明得很”，“有血气的中国人”，要识破帝国主义者提出华人参政的险恶“用意”。

3月18日 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和其他各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大会通过了驳斥英日帝国主义的最后通牒、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等项决议。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向执政府请愿，遭执政府卫队开枪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为此，瞿秋白发表多篇文章，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谴责帝国主义的罪行，支持群众反帝爱国斗争。

3月18日 经瞿秋白推挽，郭沫若由上海启程赴广州，就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①

3月20日 蒋介石在广州发动了反动阴谋政变——中山舰事件。5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向全会又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案”，限制和打击中国共产党。蒋介石的反叛行为引起中国共产党内发生很大的分歧和争论，有的主张退出国民党，实行反击；有的主张暂时让步，准备新的进攻。当时，以陈延年为代表的广东区委是属于后者。瞿秋白赞成和支持陈延年的意见。他认为：“左派与共产党立时反攻的形势万不可能，因此

① 郭沫若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据郭沫若回忆说：“陈豹隐对我说过，这事是出于秋白的推挽。但秋白自己却不曾对我说过。”（《创造社十年续编》）

采让步政策是对的。”^①蒋介石反叛以后，瞿秋白到了广东，又同国民党右派作了斗争。

3月27日 以《向导》周报记者的名义，代陈独秀于《向导》第147期公开复信陆耀文、江沛，题为《怎样实现国民革命？》，后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瞿秋白在公开信中肯定先生等明了中国国民革命的国际性，同意他们来信中所说：“第一、仅仅唤起国内的民众，而忘记了联络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是不能达到国民革命成功的；第二、仅仅反对一个或二个帝国主义者，如五卅运动中国国民党右派对英不对日的主张，也是不能解放中国民族（的）。”所以瞿秋白认为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道路是：“总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即联合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势力——中国民众自然占重要位置——一致向帝国主义进攻，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3月27日、4月3日 以《向导》周报的名义，代替陈独秀先后于《向导》第148期和149期，公开复信汕头嘉应学艺中学刘此生，题为《苏俄与民族解放》。公开答复刘此生先生提出的关于苏俄和中国民族解放的问题。此信后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瞿秋白首先指出中国的军阀，以至国民党右派，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一致攻击苏俄，说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说苏俄侵略中国”，又指出其攻击苏俄的形式态度虽然不一样，但“总可找出几个共同之点”，并举例加以说明。接着介绍苏俄国家的性质、基本政策和工农地位，突出地解释了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瞿秋白以孙中山对苏俄的认识和孙中山的著述，说明苏俄“不但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真诚帮助中国的民族自决运动”。瞿秋白还详细地解释了中俄的关系，指出十月革命后，苏俄“即向中国民族宣言，放弃旧俄帝国侵略中国所得的种种特权”。重点介绍和

^① 李立三：《党史报告（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见《工运史研究资料》（一），1981年1月10日；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1927年2月。

评析了1924年5月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称它“开中国外交上没有的先例”，说“当时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即宣言此种条约完全有利于中国”。最后又进一步解释了蒙古问题，特别强调：“应该承认蒙古民族之民族自决权，直至于能自由分离而独立。”

春 肺病严重，遵照党中央的决定，进上海宝隆医院治疗。住院一个多月期间，把朋友们送给他吃药的钱，都买了文艺书籍来读。另外，编译《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的大部份。出院后，又挤出时间，将其编译完竣。

4月6日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会议决定杨之华继任区委妇女部主任。

4月7日 作《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发表于5月25日《新青年》月刊第4号。文章从“军事行动”、“宣传力量”、“政治影响”、“改良政策”四个方面，论述了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战略及其“胜利”以后，着重分析了中国各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指出各派军阀各自联合，互相冲突，明争暗斗，“便渐渐的更明显的暴露出来”。他分析资产阶级是“处于中立地位”，“在徘徊犹豫之中”，“如果帝国主义方面，用这么小小的一个真正的让步，中国资产阶级立刻便可以完全背叛平民的革命运动”。至于城市小资产阶级，他说，因受到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倾向革命”，正在迅速地伏流昂进”。瞿秋白非常重视农民的力量，他指出：“五卅之后，不但广州、河南的农民组织发展起来，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锋，并且一般的经济恐慌，预征田赋和灾荒，使农民的地位，窘迫到万分，反抗运动自然而然到处的爆发。”他认为革命政党如果能正确加以领导，这种农民运动“立刻便可以成为极伟大的革命力量”，他还指出：“这一革命的伟大力量正在滋生猛长。”他论及工人阶级时，他说，这一年来，工人阶级正在根据他们“组织工作和斗争经验”，“积极的准备自己的力量，继续征（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他强调指出,要争取革命领导权,必须“去和农民携手”,发展农民运动,建立“工农联盟”。他认为:“工农的革命同盟立刻有切实建立起来的希望,做国民革命的主干”。最后他指出:“国民革命的前途已经放着伟大的光明,照耀那北京屠杀中的血痕!”

4月10日 作《北京屠杀后之中国民族的仁爱性》,发表于4月13日《向导》第149期。

4月12日 作《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发表于5月25日《新青年》月刊第4号。文章分析了北伐战争前夜国内的基本政治形势,总结了革命斗争,特别是“五卅”、“三·一八”斗争的经验教训,针对党内存在的右倾思想,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及其同其他斗争方式的关系。他指出,革命斗争的方式大致有:示威、抵制、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和革命战争。但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斗争方式。他认为当前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和帝国主义短兵相接一决死生”的关头,革命战争“不可避免”,而且“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已经造成武装革命的必要条件。”因而,瞿秋白主张“武装平民”,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的正式军队”。他还特别强调革命党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指出革命战争如果没有“革命党的指导,始终难以战胜”。在文章中,他还批判了妥协派“不承认革命战争的必要”的错误思想,指出:“我们对于革命战争的必要,应当尽力宣传,打破伪和平的幻想,我们对于革命战争的不可避免,应当因此而更加积极准备,以免政治上宣传上战略上的临时疏忽,弄得失败而延长中国革命的难产。”瞿秋白还非常重视革命政权的建立,说:“革命战争的胜利,先行扫灭帝国主义的种种爪牙,打倒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召集国民会议,而建立真正民权的独立国的政府。”

4月20日 作《再论中国境内之华人参政问题》,发表于4月23日《向导》第150期。

4月23日 于《向导》第150期，发表《三论阶级斗争》。

4月27日 作《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发表于5月1日《向导》第151期。文章论述了五月里的几个纪念日“五七”、“五四”、“五卅”、“五一”和“五五”，从实际斗争中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的作用。文章说：“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但能分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能运用这些客观的规律和力量，发展世界革命中之中国运动，——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上政治上的斗争，能领导起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和一般小资产阶级民众，能建立巩固的革命中枢，而实行打倒资本帝国主义。”指出中国革命实践，从“五一”到“五卅”，“处处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济哲学及政治学说，证明马克思主义正在指导着中国革命行向胜利的道路。”

5月4日 作《英日吴张战胜后之中国资产阶级》，发表于5月8日《向导》第152期。文章列举种种事实，揭露资产阶级“撇开民众，只以妥协手段，哀恳一些对于自己有利的敷衍办法”。瞿秋白认为“中国民族现在一切对内对外的要求，从华董问题到废除不平等条约，从整顿吏治到真正人民的政府，都必须要有人民自己的积极的甚至于武装的斗争，革命军队的战争，扑灭一切反革命的军阀，——然后才能达到目的”。

5月10日 作《最近中国之中央政府问题》，发表于5月15日《向导》第153期。指出国民军受列强哀的美敦书的逼胁而战败以后，北方政局已完全在帝国主义支配之下，英日帝国主义的军队——吴佩孚、张作霖的势力，相继进逼而夺到京津。文章深刻揭露英日吴张内部在中央政府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并指出它的阶级实质“是瓜分政权的分赃问题，决不是甚么宪法约法的法律问题。”文章分析说：“护宪的直系军阀，他们的目标是要使英国帝国主义在北京政府里占优势。他们所护的宪法是曹錕贿选的宪法；贿选

国会的恢复当然可以帮助吴佩孚政治上的势力。因此，奉张方面便竭力反对，他的办法是要假借护法的名义，根据旧约法的选举法召集新的国会，如此，奉张和日本的政治势力才能有充分自由活动的机会，才能在政权支配上占得优势。”文章痛斥这种国会只是一种“卖国殃民的机关”，对于一般民众“没有丝毫意义”。最后号召全国民众；组织起来，“反抗军阀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一切护宪护法的把戏”，“抗税抗捐”，“各地人民团体自动的建立地方政权，并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督促革命军队，并准备民众武装的革命战争”——“以达召集真正国民会议，建立人民的中央政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目的”。

5月17日 作《五卅周年大示威中之上海问题》，发表于5月22日《向导》第154期，概述五卅后一年来国内政治形势，指出中国人民的要求，不但“一条也没有达到”，反而更受着帝国主义“极严重的压迫”，资产阶级则是“幻想和平妥协，出卖民众利益”，“哀求帝国主义的让步”。要求上海人民群众要肩负起“极重大的责任”。文章说：“上海不独是五卅运动的发难地，而且上海的民众比较起来是全国最有组织的，便是上海的商人也是全国最有力量的。”所以号召上海民众，要争做全国五卅大示威的“先锋”，为反帝国主义而“决死奋斗”！

5月20日 以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向湖南挺进。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正式誓师北伐。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5月23日 作《五卅周年中的中国政局——五卅屠杀后的民众运动和北京屠杀后的帝国主义统治》，发表于5月30日《向导》第155期。文章指出，五卅屠杀后，上海工商学各界奋起斗争，继之以空前的全国各界联合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北京“三一八”屠杀后，除各地民众悲悼声浪以外，却只看见“反赤的战争，反赤的

械斗，反赤的‘舆论’，反赤的种种压迫”。文章分析了一年来国内基本政治形势以后，进一步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及其改良手段，告戒中国民众，要吸取一年来的“苦经验”，要坚决进行“革命斗争”，要求全国人民，“恢复五卅时的联合战线，建立极巩固的民众革命战线”，反对“犹豫退让妥协或其他种种改良幻想和分裂政策”，团结一致，坚决“反抗英日吴张的联合统治”，实行“抗税抵货的运动，一直到武装暴动和革命战争”。

5月 为《新青年》月刊“战壕断语”专栏(三)作《世界革命年表》，全文3万余字，署名屈维它，发表于7月25日《新青年》月刊第5号(世界革命专号)。年表以纪年体裁纪述了下列内容：(一)“古代各国奴隶平民之暴动”；(二)“中世纪之农奴暴动及农民战争”；(三)“十七世纪之英国革命”；(四)“十八世纪之法国大革命”，(五)“世界各国革命及其无产阶级运动”；(六)“国际无产阶级之社会革命运动”；(七)“二十世纪之世界社会革命”；(八)“中国革命运动”。

夏 羊牧之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同彭述之、郑超麟一起工作。当时，瞿秋白和彭述之在党的会议上，经常发生争论，但瞿秋白在羊牧之面前仍然肯定彭述之的成绩，并支持其工作。瞿秋白曾指着桌上的《向导》不以为然地对羊牧之说：“彭为党做了大量值得赞扬的工作，在这里面，他不是写了很多有说服力的文章么？你应该好好学习。我虽然是中央常委之一，但他是中央任命的宣传部长，今后工作中一些问题要多请示他，而不是取决于我。”^①

夏 赠羊牧之五言古体诗四首，署名梅影^②：

(一)

十年不相见，相见各成人。潘鬓一似旧，举止失天真。君知霜月苦，仆仆走风尘。风尘应识好，坚伐岁寒身。重耳能得

^{①②}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国，端在历艰辛。

(二)

始我七言句，秋气满毫端。芦花不解事，只作路旁看。我意斯文外，别有天地宽。词人作不得，身世重悲酸。吾乡黄仲则，风雪一家寒。

(三)

君年二十三^①，我年三岁长。君母去年亡，我母早弃养。亡迟早已埋，死早犹未葬。茫茫宇宙间，何处觅幽圻？荒祠湿冷烟，举头不堪望。

(四)

出其东门外，相将访红梅。春意枝头闹，雪花满树开。道人煨槽拙，烟湿舞徘徊。此中有至境，一一入寒杯。坐久不觉晚，瘦鹤竹边回。

第一首抒发久别重逢的感慨，勉励友人要努力锻炼自己；第二首，批评友人的七绝^②凄楚，“似属过于萧瑟”，望他扩大视野，投身火热的斗争中；第三首抒发对亡母怀念之情；第四首回忆儿时与友人的同游。

6月1日 作《北京的巨头会议和政治公开问题》，发表于6月9日《向导》第157期。指出吴佩孚匆匆北上，主张召集吴张阎孙四巨头会议，解决中央政府问题。文章揭露和分析了吴佩孚、张作

① 羊牧之在他的《我所知道的瞿秋白》一文中，认为二十三是“二十五”之误。

② 七绝为：“轮泥踏铁几时休，尽把年华付水流。欲问秋月缘底事？芦花无语只摇头。”

霖、阎锡山、孙传芳相互冲突和争执的内幕，指出北京的四巨头会议从表面上看，是“政府组织问题或所谓法律问题”，但实质上是“英日关系的外交问题”，又指出：“北京的巨头会议是英日吴张的分赃会议；是征服中国的英日商议宰割中国，征服民众的张吴商议出卖中国的会议。”文章认为这一会议的主要问题，只是军事上地盘分配以避内部的崩败，外交上英日协商相互让步的问题，那里是宪法问题，那里是“政治公开讨论”、“民意解决国法”的问题呢！

6月7日 午夜，作《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化之斗争》，发表于7月25日《新青年》月刊第5号（世界革命号）。文章论述了国际赤化的前途、欧美日本资产阶级能继续存在的原因、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和中国赤化的世界意义。文章在论及中国赤化运动时，具体分析五卅后的革命形势，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斗争坚决，在国民革命中，是“急先锋”，处于“领袖地位”；香港、上海的罢工，引起了英国的总同盟罢工。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广大农民也“开始发生比较有系统有组织的反抗”，“中部北部诸省都发生农民武装的自卫运动”，文章强调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农民的这种暴动运动。实在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农民已经手里拿着武器要求农民问题的解决。中国革命如果不解决农民问题，是永世也不能胜利的”。文章进而指出：“不但工人农民必然赤化——要求革命”，就是普通“一般平民”、“一般商人始终不得不自己走上革命的道路”，“甚至于虞洽卿，甚至于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极右派，都不能不口口声声说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便是全革命化的明证。”文章论述了中国国民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国赤化运动尤其是五卅之后，不断的打击帝国主义……不但根本动摇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势力——军阀的统治……而且冲破了西欧资本主义最近的稳定状态。”帝国主义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于是便利用中国民族改良主义做他的“续命汤”。文章指出，民族解放运动中这种

“民族改良主义”大致不外乎三种倾向：（一）“梦想以妥协投机”，“希望帝国主义军阀对中国仁爱”；（二）“利用帝国主义、军阀的势力压迫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三）“企图以出卖平民利益，对帝国主义、军阀让步”，“哀恳帝国主义、军阀，想朋分一些政权”，而“抛弃平民群众的参政权，牺牲一般商民的利益”。

6月8日 作《颜内阁之大卖国计划》，发表于6月16日《向导》第158期。

6月9日 作《世界的农民政党及农民协会——赤色农民国际与国际农民运动的历史》，发表于7月25日《新青年》月刊第5号（世界革命号）。瞿秋白大半根据《农民国际》杂志的材料及郭腊罗夫的论文，介绍和阐述国际农民运动史：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农民思想倾向、政治活动及农民组织的状况；二、欧战对农民运动的革命影响；三、欧战结束后农民各种不同形式的组织的成立及其变化；四、农民政党及协会的政纲；五、布加利亚农民政府的经验；六、农民国际联合的发展过程；七、农民运动最近的发展形势。

6月18日 作《日本对华屠杀后之中日亲善论》，发表于6月23日《向导》第159期。

6月19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信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来信说，根据“整理党务案”的规定，要组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他们已选派蒋中正、顾孟余、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5人为国民党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要求中共中央推定代表3人，使联席会议“早日成立”。^①后来，中共中央指派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3人为中国共产党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②。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来信》，《向导》第165期。

②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6页。按：据1926年8月23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两党联席会议通讯》称：共产党复信给国民党，对于举行两党代表联席会议，“甚表赞同”，“特派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三同志……代表本党出席（联席）会议”。复信还说：“理张瞿两同志已决于日内起程赴粤，并已电嘱李大钊同志即行就道。”

6月23日 于《向导》第159期“寸铁”专栏，发表《有利于中国即为侵略》，署名它。

6月 中共中央在宣传部召开会议，讨论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问题。陈独秀反对北伐，彭述之附和，张国焘反对陈独秀的意见，瞿秋白拥护北伐。^①

7月10日 作《上海买办阶级的威权与商民——谈谈上海的商会和上海的“华人”》，发表于7月14日《向导》第162期。文章主要是分析上海总商会的买办性质。指出，上海总商会会员虽然有540多人，可是会董只有35人，这班所谓“优秀份子”会董和纳税会的主持人物，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总商会的会董是些什么“东西”呢？文章揭露说：“一大半是洋行买办，直接的或间接的。各行各业的大商人并不能当选做会董，都有些大公司大银行，和帝国主义军阀最密切的，每每一家占了十几（几）个。这35位天神天将名绅巨贾整天到晚假借代表华人或人民的名义，招摇撞骗，和帝国主义军阀做买卖。”文章指出上海总商会完全被这班买办阶级所“把持”，“包揽一切卖国卖民的勾当，肆行无忌”。文章还列举这些“天神天将似的商会领袖”有时竟向工部局密告普通商人“不安分”的事实来证明，总商会不但不能代表华人，不能代表商人，甚至也不能代表商会会员。

7月12日至18日 同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人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等文件，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的任务。

7月25日 于《新青年》月刊第5号发表译作《世界职工运动之现状与共产党之职任——洛若夫斯基在1926年3月共产国际

^① 《郑超麟回忆录》第130页。

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8月7日 将他在上海一次关于北伐问题的谈话稿整理成文，题作《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并送《向导》编辑部要求发表。由于陈独秀、彭述之不赞成其观点^①，没有被刊用。该文明确阐述了北伐战争的重要意义，指出要反抗“三一八”以来的反动潮流，只有号召发动革命战争，“猛力向帝国主义买办阶级攻袭”。他认为，“广州政府的北伐，实在应当是北京屠杀后中国平民反守为攻的革命战争，是五卅运动之继续发展的中枢。”文章深刻分析了社会不同阶级对北伐战争的态度。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既得相当的领袖地位之后，为求巩固此地位起见，不得不向前进取几步”，赞同北伐战争；小资产阶级“显然的在政治上积极起来”，“渴望着革命的巨潮，来拯救他们于反动高压之下。他们对于革命战争深切的感觉着需要”；农民在五卅以后，已经“奋起”，农民运动正在迅速发展，“不但反抗劣绅土豪等地主阶级，而且很少接受资产阶级‘温和派’改良主义的指导之可能。农民的赞成革命战争，不单是‘用嘴来说’，而且是‘用手来做’的”，农民迫切要求解决“乡村政权归农民”、“武装自卫”、“极大的减租减税”等问题；无产阶级“为自己阶级的经济政治权利而力争民族解放”，“不但需要革命、战争，并且是革命战争的主要动力”，同时“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文章最后，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反对北伐战争、放弃革命领导权的这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坚强地“担负这异常艰巨的责任”，“积极的赞助并主动的参加革命战争”。

8月中旬 同张国焘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离开上海赴广州出席国共两党联席会议。8月18日，他们抵达广州。8月20日，

^① 陈独秀于1926年7月7日《向导》第161期，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反对北伐。

他们前往廖仲恺墓地致祭，参加广州各界纪念廖仲恺、陈秋霖二公殉国周年大会。连日造访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各中央委员等，广泛接触各方面的人士。^①由于国共双方都认为条件尚不成熟，经磋商决定联席会议暂不举行。瞿秋白“在粤停留约两周”。

8月29日 在广州应劳动学院的邀请，作题为《什么是共产主义》的讲演。^②

8月 同毛泽东、彭湃及中共广东区委代表，出席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演说。

9月7日前后 由广州返回上海，并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秋白由粤回来报告》，发表于9月15日《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报告》详细分析了广东的政治形势和国民党各派人物的政治态度，汇报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情况及党的工作等。瞿秋白根据他对广东的调查研究，察觉到蒋介石有野心，于是提出了应当联合左派代替蒋介石的主张。指出：“蒋知到湖北后离本乡太远，自己力量不够，所以他决取江西、福建，以巩固自己势力。”同时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活动，他说：“对于全国政治，蒋正计划各省设特务委员，把军、政、党事均交给特务委，实质是取消了各省党部。”因此，要求对蒋介石要提高警觉，积极防范。他认为，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群众来代替蒋介石，形势发展下去“非常危险”。最后，瞿秋白谈到农民运动时，强调指出：“我们不能站在调停地位，而当站在领导地位，并做整个武装工作，才能与民团斗争。”

① 《两党联席会议近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23日。

② 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第231页。按：劳动学院系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合办的教育宣传委员会于1926年6月28日在广州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其任务是训练教育各工会领袖。院长为邓中夏，教务主任为李耀先，教员皆一时名流、思想界极有权威的人士。第一届录取新生193名，备取28名。

10月23日 上海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暴动。起义遭到北洋军阀孙传芳所部的镇压而失败。

11月上旬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会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

11月22日至12月16日 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并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决议案和演说都主张放弃共产党对农民群众、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决议案明确规定共产党不得实现对国民党的领导权，认为“应当团结(国民党)左派与之密切合作，而不要企图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

11月26日 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12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国共两党在武昌联合组织武汉国民政府，推汪精卫为主席，共产党员苏兆征为劳工部长，谭平山为农民部长。次年元旦开始办公。

11月30日 于《我们的生活》第4号，发表题为《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演讲词。瞿秋白非常重视农民问题，是党内最早重视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他在演讲中阐明中国农民如何受“地主剥削”，“成为债主的奴隶”，分析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和革命性，指出：“国民政府能够得到农民，则国民政府才能巩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能得到胜利；真实拥护工农的党，才能够领导中国革命。”他用历史事实论证革命没有农民参加，便不能获得革命胜利。他说：五卅运动的一大狂澜，因缺少农民参加(虽有红枪会等起来，但是太少，太迟了)，致五卅运动没有结果。他在演讲中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思想，指出：“如其怕农民组织的强大，怕农民暴动而畏缩，不敢提出为农民利益的政纲，不实行为农民利益的政纲，必定因此不能

得到农民的拥护,且要受农民的攻击和反对。”“总之,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瞿秋白还强调指出,农民运动已经“日益高涨”起来了,“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劣绅”,“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瞿秋白还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办法——“耕地农有”,“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农民参加政权”,“严厉的无情镇压买办地主阶级之反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

12月9日 作《中国妇女之白化与赤化——中国妇女运动,恭贺新禧》,发表于1927年3月8日《赤女杂志》创刊号。

12月13日 同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毛泽东等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正在发展变化中的政治形势,以便据以制定党的斗争策略。陈独秀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报告认为,要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强调要限制农民运动,反对“耕地农有”的口号等。他把压制工农运动以谋求同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提到了总方针的高度;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作无原则的让步,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中央特别会议接受了陈独秀的主张,作出相应的政治决议案。这次会议标志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后来,瞿秋白在他的专著《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中,批判了这次会议。他指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汉口会议,则认为‘国民政府有右倾的危险,民众运动又过于左倾’。没有提起土地革命,……没有准备与民族资产阶级破裂之决心,那时,便已经有隐约的退却的阵势之开始。”

12月底 苏联派3位驻华代表——И·那桑诺夫、И·福金、А·阿尔勃雷希脱,来到中国。他们住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瞿秋

白同陈独秀、彭述之、魏金斯基多次来苏联领事馆,和这3位驻华代表一起讨论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策略等根本问题。陈独秀与魏金斯基、彭述之坚持旧的“传统的路线”——由“宣传而组织,由组织而武装暴动”,也即主要以工农群众的武装暴动推进革命。瞿秋白和3位苏联驻华代表则一致主张实行“新路线”,即主要依靠北伐军,群众做向导,报告军情、缴溃散兵的枪枝等“苦力”、“别动队”的工作;党的工作应主要放在支持北伐上。他们反对陈独秀、魏金斯基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张。①

冬 一天上午,友人羊牧之来到瞿秋白寓所访问,见他穿着一件从未穿过的旧皮袍。瞿秋白指着身上的皮袍深有感情地对羊牧之说:“这两天,全亏这件皮袍。这是周恩来去广州时,说到南方用不着了,留给我的。”接着他介绍了周恩来的一些情况,并称赞周恩来是一位永远不考虑个人安危,永远战斗在第一线,永远体贴和关怀别人的好同志。②

① 《H·那桑诺夫、H·福金、A·阿尔勃雷希脱给苏共中央的信(1927年3月于上海)》,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40页,转引自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2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郑超麟回忆录》,第132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6年。

②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丁卯)

二十八岁

1月1日 国民政府命令,以武汉为首都,并开始在此执行职权。2月12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驻武昌,中央党部驻汉口。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于1月7日,在南昌自立中央,召开所谓“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并作出决定:“国民政府于本月18日开始在南昌办公,同时举行庆祝典礼。”

1月21日 于《工人之路》第553期《纪念列宁专号》发表《在纪念列宁当中的一个贡献》,署名启凡。文章称赞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救主”,“无产阶级理论的实行家——马克思主义的奉行者”,指出列宁不仅救活了“俄国的无产阶级”,而且给“全世界无产阶级以一条解放之路”。号召中国工农群众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要坚决相信列宁主义及列宁所手创的第三国际,在列宁旗帜的指引下,团结奋斗,从“严重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1月 译就《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俄国郭列夫作),附译者论文两篇《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和《马克思主义之概念》,同年3月由新青年社出版。后经修改,于1930年3月由明日书店印行,书名改作《唯物史观的哲学》,译者署名由瞿秋白改为屈章,同年9月再版。1941年4月霞社出版,将书名改作《新哲学——唯物论》。1949年11月,又由原野出版社重印出版。本书为我国最早介绍和宣传唯物主义哲学的译著之一。1943年12月24日,毛

泽东曾向刘少奇推荐本书。^①

1月 蒋光慈的新诗集《哀中国》出版。书名为瞿秋白题署。

1月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案》传到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会议，进行了专门讨论。瞿秋白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路线，批评中央过去的路线和国际不合，并强调指出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彭述之则不同，他竭力为中央路线作辩解，并与瞿秋白相冲突。陈独秀站在彭述之一边。会议经过详细讨论和辩难之后，决定接受共产国际这一决议，并相应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

2月17日 编就《瞿秋白论文集》。文集收入他1923年至1926年期间的政治论文，还收入部分文艺杂著。瞿秋白为文集写了《自序》，说明文集出版的目的，介绍文集的内容。《自序》写道：“论文集分八类：（一）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二）帝国主义与中国，（三）买办阶级之统治，（四）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五）北京屠杀后国民革命之前途，（六）世界革命的问题，（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八）赤化漫谈。”瞿秋白又分别就每一类中的重要问题作出理论概括或具体分析。他特别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要应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

瞿秋白有自知之明，能正确对待自己，他在《自序》中说：“无产阶级之革命思想的指导，当然是集体的……工作，然而我确是这一集体中的一个个体。”他又谦虚地写道：“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我这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理论里，可以有许多没有成熟的，不甚正确的思想。”他还说：“我始终亟亟乎将我的成绩同着我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9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

的错误一齐汇集发表”，正是为着“发展中国社会思想的自我批评。”瞿秋白在他离开上海去武汉之前，把自编的《瞿秋白论文集》交给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文集排印到五分之一时，因蒋介石发动政变，没能出版。

2月中旬 为了组织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武装暴动，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了活动分子代表大会。会前，瞿秋白为了防止和纠正右倾错误，贯彻正确路线，争取暴动的胜利，曾正式向党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要求参加大会并作报告，但遭到陈独秀的拒绝。陈独秀指派彭述之参加大会，并向大会作报告。彭述之提出的关于中央对第二次暴动的口号中，没有提到政权的要求。瞿秋白在他的关于上海暴动的提案中，指出彭述之这一错误，认为工人应当参加市政府选举及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陈独秀和彭述之都反对瞿秋白这一提案。

2月19日 上海市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当天，杨之华参加在上海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召开的全市积极分子会议。会后，大家分组到指定地段散发传单，为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暴动作准备。杨之华一组10个人，负责西门一带。杨之华路过十字街头时，发现那里有10几个凶神恶煞似的孙传芳的大刀队员，在用钢刀砍杀市民。她立即去寻找一起工作的伙伴，通知他们赶快避开大刀队，但有几个同志怎么也找不到。她无奈，强忍着满腔悲愤回到家里（时住法租界望志路五丰里5号）。正在家里写文件的瞿秋白，听了杨之华报告上述情况后，非常关心那几位散发传单同志的安全，郑重地嘱咐杨之华再返回去寻找，然后他又赶到中央机关去报告。^①

2月22日 上海工人发动第二次武装暴动，瞿秋白坐镇在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上的冠华里一座三楼二底暴动指挥所——启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56页。

迪中学参与领导。当天的下半夜，周恩来赶到指挥所了解暴动情况。^①由于准备不足，暴动于2月23日失败了。当日晚上，瞿秋白同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任弼时、汪寿华、杨之华等参加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的联席会议。会议总结暴动的经验教训，大家进行讨论，瞿秋白作了较系统的发言。会议作出决定，准备举行第三次武装暴动，组织特别委员会（又称特务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机关。

2月22日 杨树浦区的工人群众，面临白色恐怖，召开了近万人的示威大会。有个绰号叫“小滑头”的工贼，向敌人告密，致使工人领袖刘华等人被捕，罪恶昭彰，民愤极大。当场被工人捉住，经群众公审，立即处死，人心大快。瞿秋白等领导同志称赞工人做得对，做得好。他们认为，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群众的革命审判，表现了工人阶级英勇坚决的革命意志。

2月23日 瞿秋白连夜撰写了著名的《对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于24日提交中央特别委员会讨论。《意见书》毫不掩饰地指出党在领导工作中的严重失误，是导致第二次工人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瞿秋白说：“我意党对于二月念二日暴动，应公开承认此‘事前未及早准备’之错误及中央自二月十七〔？〕至二十一日晨之政策动摇不定与疏忽而不周到之错误。”他特别指出：“尤其重要者为罢工之宣布既未由党正式决定，罢工之后，又不视此次罢工为暴动之开始，小资产阶级之中固绝未有政治宣传，甚至工人群众之中至今对于总罢工之目的尚大半莫明其妙。”瞿秋白又对当时所实行的错误斗争策略，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工人罢工，等候大资产阶级之援助，撇开小资产阶级，而不加以领导鼓动，只想得了钮铁〔惕〕生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军官改变态度），大商肯发命令罢市等种种所谓‘暴动之胜利的保障’

^① 1987年10月6日郑超麟的回忆。按：据郑说，当时他在现场。

后,然后再准备暴动。”他认为这一错误是相当严重的,毫不留情地指出:“这种策略,简直客观上是卖阶级的策略。”瞿秋白列举工人自发的“革命行动”和工人批评的种种事例,说明当时党的领导很不得力,大大落后于群众的革命行动,要求党应从这次暴动中吸取经验教训。

瞿秋白在总结第二次武装暴动经验教训之后,着重强调工人阶级在武装暴动中,要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对于第三次武装暴动,瞿秋白在《意见书》中明确指出,党“亟宜集中政治指导”,“上海市民应以工人阶级为领袖,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而非欢迎),自动召集(以市民公会名义)上海市民代表紧急会议。这就是集合一切革命的行动的分子总机关,在暴动前暴动后,指挥上海革命运动。”接着,《意见书》提出了新政策的策略:“对于大资产阶级保〔持〕相当的必需的联络(使他们加入市民代表紧急会议,而不是使他们来指挥市民会议),逼迫他们服从‘民意’,牵制他们妥协政策”;“对于小资产阶级,应当组织其领袖(及〔国〕民党左派市党部),尽可能引导一般市民群众,使他们做我们反对大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斗争中的友军”;“对于反动派及买办阶级,竭尽全力暴露其罪恶,不断的极急烈的攻击其实国卖民勾当,并攻击帝国主义军阀之一切压迫。”瞿秋白强调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指出,“对于工人阶级,——我们自己应当认定上述之政策意义,竭尽全力(一直到公开的向他们承认党此次之错误)鼓励其武装斗争的意志,指明其夺取参政权之目的,亦即是指引工人应争取小资产阶级的同盟军共同执行民权的群众的独裁之目的”,“工人应当领导小资产阶级力求民权独裁之实现而实行群众暴动,而不是自己独自的干。”瞿秋白在《意见书》中还就政治、宣传、军事、党团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相应的具体计划或纲要。

2月24日晚9点,同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尹

宽、彭述之、周恩来等参加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军事、工人运动和党务等问题。瞿秋白就周恩来的报告作了发言。他说：“周恩来报告中，缺少怎样动摇敌军，怎样联络军队与保卫团二个问题。”他提出：“纠察队之组织，应由工会与党一块工作，要宣传武装使群众心理安全，要有作战计划，有主力军之训练。”^①

2月25日 晚8点，同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尹宽、彭述之、周恩来等参加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党务、军事、宣传、派工人代表团见白崇禧等问题。当讨论宣传问题时，瞿秋白发表意见，认为宣传方法归结为三：“（一）每日新闻。（二）组织宣传队。（三）出上总短小日刊。”^②

2月26日 晚8点，同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尹宽、彭述之、周恩来等参加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会议听取汇报和讨论政治、军事、总同盟罢工等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讨论军事问题时，瞿秋白说：“兵工厂问题，不在于打倒李宝章，而是在于谁取兵工厂的问题。假使我们有力量，就取兵工厂，如无力，则着重代表大会。同时要预先找好地方，然后群众进去拥护。总工会则在代表大会后立即选出临时委员会。”他认为：“在政治上要注意群众组织，在军事上，要占据相当地盘。”^③

2月27日 晚8点，同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尹宽、周恩来、萧子章等参加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会议听取汇报和讨论宣传、军事、党务等问题。讨论宣传工作时，瞿秋白主张“宣委

^① 《中央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2月24日晚9时），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

^② 《中央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2月25日晚8时），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78页。

^③ 《中央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2月26日晚8时），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31、132页。

应与各方面发生关系,尤其是要参加部委会与党发生关系。’^①

2月28日晚7点,同陈独秀、罗亦农、何松林、赵世炎、尹宽等参加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会议听取汇报和讨论党务、军事、工会宣传工作的报告。瞿秋白建议“以后让一飞参加本会议”。

2月写就《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副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4月在武汉公开出版,全书约七万六千字。瞿秋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对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作了详细分析,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与陈独秀、彭述之展开理论斗争,系统地批判了他们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瞿秋白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推翻地主阶级(官僚买办土豪——军阀)的统治。”中国革命的中枢问题是农民问题,故中国革命的性质,“并非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之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但他又强调指出:“他的胜利的前途,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从而驳斥了陈独秀、彭述之的所谓“永续革命”说——即“二次革命论”,指出“这种学说,的确是中国式的杜洛茨基主义,是非常之错误的。”

瞿秋白详细地分析和论述了中国各革命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指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因为他是“最受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压迫的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处于先锋的地位,只有他能彻底实行中国革命中之民族主义的及民权主义的职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非此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因此,他坚决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努力做“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他指出:“农民——其中雇农佃农是最彻

^① 《中央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2月27日晚8时),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07页。

底革命分子，一般小农也极端需要推翻官僚买办阶级之统治”；“农民（及士兵）是革命里最有力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是参加革命的”，“中国革命之中确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之可能”，但同时又指出它有两面性。他说，民族工业资产阶级是“反革命与革命之间的中间势力，这种中间势力的通性是：对于反革命是反对派，对于革命是妥协派”；“店东小资产阶级，日益倾向于剧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在革命之中始终是动摇和犹豫的”，“有时会做民族资产阶级的附庸”；“工匠小资产阶级……他们不但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并且反对士绅”，“但他们的行动习惯使他们只看到小团体的利益不能有独立的政治远见”。瞿秋白认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要实行上述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应当以无产阶级、手工工匠及农民的联盟做进攻统治者阶级的主力军，并且要征（争）取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主义丧失其作用。”

3月1日 晚8点，同陈独秀、罗亦农、彭述之、赵世炎、王一飞、尹宽、周恩来等参加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军事、工运、宣传等问题。^①

3月2日 晚8点，同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彭述之、王亚璋、周恩来、王一飞、尹宽、何松林等参加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工会工作和军事问题。^②

3月中旬 奉命离开上海赴武汉，负责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住汉口旧英租界辅义里27号两层楼房。

3月21日 在周恩来等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暴

① 《中央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1日晚8时），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47页。

② 《中央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日晚8时），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52页。

动,取得了胜利。瞿秋白听到胜利的消息,激动地说:“我们应当感谢恩来、亦农、世炎同志等,我们更应该感谢上海的工人阶级。是他们在上海的上空,树起了红旗,为我党添了光辉。”他还说:“要尽一切努力,为上海的武装起义大造舆论,并严重警告新老军阀:如果他们想要镇压革命,则无产阶级必将以革命的武力对反革命的武力加倍奉还。”^①当时他在给杨之华的回信中,也充满着胜利的喜悦,他说:“上海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独立地拿起武器来争取解放,是有利于发展并完成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新方式。”同时,瞿秋白对革命形势作了冷静的分析,指出:“革命前途光明,但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嘱咐杨之华要坚定地谨慎地进行工作。^②

4月初 中共中央派沈雁冰接替高语罕担任《汉口民国日报》^③总主笔。那时,《汉口民国日报》的编辑方针、宣传内容都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的。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指示当前报纸的宣传重点: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的阴谋;二是宣传革命道理,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当时,瞿秋白对蒋介石的反动已有所警觉。他说此人十分阴险,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还说他已经掌握了军队,又有京沪杭的地盘,完全是个新军阀,为日后一大隐患。汉口民国日报社贯彻了中央的指示。瞿秋白表扬了他们的工作。他说,《汉口民国日报》办得不错,旗帜鲜明,应当坚持下去。^④

4月2日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同谭平山、蔡和森一起到达武汉。

① 李敦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②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61页。

③ 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为共产党所办。社长是董必武,总经理是毛泽民,主编是高语罕(后为沈雁冰),编辑除石信嘉为国民党左派外,其余也都是共产党人。

④ 茅盾:《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4月3日 同吴玉章等人提出，把第四军调到南京，与上海革命势力相呼应，并监视蒋介石的行动。因鲍罗廷反对，未被采纳。

4月4日至20日 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湖北区委三方在武汉连续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中共“五大”的筹备工作问题。瞿秋白同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罗章龙、毛泽东、陈延年、苏兆征、李立三、彭述之及罗易、魏金斯基、鲍罗廷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先后作出下列决定：（一）4月20日召开中央全会，25日召开中共“五大”；（二）在10天内撤销驻汉口的中共中央临时委员会，另成立由中央委员、湖北区委、共产国际代表联合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并推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三人任常务委员；（三）致电上海催促陈独秀速来武汉，并把党中央迁至武汉；（四）以中央名义发电报给各地代表来武汉开会；（五）成立三个委员会为中共“五大”准备会议材料，其主持人为：土地问题委员会是瞿秋白、毛泽东，职工运动委员会是李立三，组织委员会是张国焘。^①

4月5日 陈独秀和汪精卫在南京发表联合宣言。

4月11日 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一书撰写序言。本年1月，毛泽东赴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后来，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报中共中央。从3月5日起，报告全文连载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第35、36期合刊及第38、39期上，又于3月12日在上海《向导》第191期上刊载了一部分。之后，遭到彭述之的反对，不准在《向导》连载下去。^②瞿秋白对此极为愤慨，说：“独秀、述之就怕这篇文章拿出去，进一步激起农民的‘越轨’行动，

^①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六），《党史研究》1983年第2期。按：陈独秀于4月16日（一说17日）到了武汉，主持了18日和20日的联席会议。

^② 有人提出，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由于陈独秀、彭述之的压制，以致未能在《向导》全文连载的说法“欠妥”，“缺乏原始根据”（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闻研究资料》总第53辑蔡铭泽文）。

有损与国民党的合作。什么‘越轨’、‘合作’？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①他把毛泽东的报告全文交给秘书羊牧之送汉口长江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名曰《湖南农民革命（一）》。瞿秋白在序言中热情歌颂农民运动，说农民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肯定毛泽东这篇光辉的著作，指出：“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个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封闭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上海总工会和一切革命团体，捕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到15日被杀的有300余人，被捕的有500余人，失踪的5,000余人。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工人领袖先后牺牲。上海“四·一二”政变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也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宣布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关于建都南京的宣言。

瞿秋白对蒋介石发动政变极为悲愤，说：“我们太幼稚了。这一着棋，输给了蒋介石。我们对不起上海工人阶级，我们对不起牺牲的同志。血的教训，太沉痛了。现在看来，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害了党的事业。”“四·一二”以后，对于革命遭到损失，瞿秋白也作了自我检查。他说：“作为党中央常委的我，也有责任。我深感第一线斗争的经验太少，单是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是干不好革命的。”^②

4月12日晚，杨之华接到组织转来的从武汉拍来的急电和一张轮船票，电报假称“秋白病危”，要她“立即动身去汉”。次日，杨之华参加了党领导的工人群众在闸北召开的大规模的抗议大会并示威游行之后，于当晚离开上海赴武汉。

^{①②}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4月13日至15日 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罗易和鲍罗廷在会上发生了争论，罗易反对立即北伐，主张先进行土地革命，巩固两湖地区后，再行北伐；鲍罗廷则是主张和国民党左派一起，立即北伐，到河南与冯玉祥会师，然后再向北京进攻。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瞿秋白赞成先打南京，并主张攻占南京后，经由陇海路北伐，避免在上海决战；彭述之、张太雷等则赞成鲍罗廷的意见；蔡和森主张有条件的北伐，他提出了四个条件的北伐政纲。^①

4月18日 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在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肯定瞿秋白当时对蒋介石的正确认识。他说：“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认识是我们的中心问题。”“秋白同志对于蒋介石的观察非常明彻，可惜（上海）区委大会没有要秋白去报告，使同志明了蒋之地位，这是一个错误。”他还说，曾两次催促秋白作报告，终因独秀认为危险而未实现。^②

4月19日 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发布通缉令，通缉鲍罗廷、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苏兆征、周恩来、李立三、罗亦农、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杨之华、邓演达、顾孟余、徐谦等197名共产党首要分子、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其他著名活动家。^③

4月19日 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召开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鲍罗廷等共产国际代表，以及武汉国民政府要员都参加了大会。北伐军继续北伐，向河南的奉系进攻。从4月下旬至5月下旬，北伐军同奉军主力激战于豫南，击败奉军。

^① 刘继增等：《武汉国民政府史》第36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

^② 《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第144页。

^③ 《南京国民政府秘字第1号令》；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5辑，第54页。

4月下旬 多次与陈独秀、谭平山、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等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魏金斯基参加中共中央会议。

4月27日至5月9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①举行。大会组织了政治委员会、农民土地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和秘书处，瞿秋白参加了政治委员会、农民土地委员会。陈独秀在会上作了《中央政治和组织的报告》。大会给每个代表发了瞿秋白的著作《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写道：“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如果再不明白的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在会上，他与毛泽东、任弼时、蔡和森、恽代英等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大会仍然选举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

瞿秋白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党的“五大”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以后，各地反映较大。瞿秋白严肃地指出：“尽管独秀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但是—一些重大问题，是经中央集体讨论的，他又没有搞非组织的派别活动。”瞿秋白还说：“有时，我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他从不计较，够得上光明磊落。”^②

4月28日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于北京壮烈牺牲。

4月 郭沫若正在武汉。他常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访问瞿秋白。

^① 开幕式在武昌第一小学举行，次日移至近郊黄陂会馆。

^② 《访问羊牧之记录》，1950年6月13日。

瞿秋白对郭沫若十分敬佩，常说起他敢于面撞蒋介石，具有一种四川人的性格，还说他有些浪漫主义色彩。有一次，瞿秋白和郭沫若同游黄鹤楼，面对东去的长江，共诵苏东坡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名句。瞿秋白感慨地说，在现在这种形势下，当我们未被淘汰去的时候，还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成败且不去计较。^①

4月 汉口“四·三”事件后，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召集了国共两党联席谈话会，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及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参加了谈话会。双方“几次商量的结果”，都认为在外交上应“采暂时退却的策略”。

4月 “四·一二”事变后，瞿秋白在悲愤之余，为了揭露蒋介石的罪行，绘了一幅画。画面上是：一张桑叶形的中国地图上，斜插着一把血淋淋的指挥刀，旁边堆积着无数人头。

4月 译作《世界劳工运动之现状》（洛若夫斯基作），由新青年社出版。

5月8日 于《向导》第195期发表《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文章分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着重指出大资产阶级已由惧怕工农运动到“公然反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屠杀工农，摧残民权，压迫小商及一般平民。”“背叛三民主义，显然帮着帝国主义买办军阀来镇压革命。”他在文章中鲜明地指出土地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中国国民革命应以土地革命为中枢。中国没有土地革命，便决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和剥削的根基。”他主张赶快发动农民群众“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建立农民的政权，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他特别强调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应由无产阶级来担当，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决不能实行土地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必定要领导农民去彻底发展这种斗争”。

^①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5月10日 中国共产党五届一中全会在武汉召开。瞿秋白同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维汉、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当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瞿秋白曾兼任中央农民部部长^①。

5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由谭平山、毛泽东、周以渠、瞿秋白、蔡以忱、任旭、罗绮园、阮啸仙、陆沉9人，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

5月17日 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率部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直抵纸坊。武汉卫戍司令叶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率部平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和武汉工人纠察队配合作战。19日将叛军击退。

5月18日至30日 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专门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作出了《中国问题决议案》。会议期间，斯大林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给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即“五月指示”），要求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改造国民党领导机关；动员两万左右党员、五万革命工农，编成新的军队；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6月1日，中共中央收到这个指示。6月5日，罗易向汪精卫出示这一指示，并于次日给他一个副本，成为汪精卫分共的一个口实。

5月20日至26日 太平洋劳动会议在汉口召开。赤色职工国际、中国、日本、苏联、朝鲜、美国、爪哇、英国、法国等国派代表共30余人出席了会议。瞿秋白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会上发表讲话，简略地介绍了中国五卅运动以后的革命形势。瞿秋白满怀信心地告诉各国代表，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工人、农民已经组织起来了，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是拥护革命的。他特别肯定了国际

^① 据郑超麟1980年4月的回忆：“中共‘五六’后，瞿秋白兼任中央农民部部长。”

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指出:“今天太平洋劳动大会,更是表示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来赞助国民政府,这样共同作战,一定是可以打倒蒋介石和一切反革命的。”^①

5月20日 作《论中国革命之三大问题》,署名美夫,于1928年4月12日作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的附录出版(再版)。文章论述了中国革命中三个主要危险问题:(一)“外部的危险”,即“帝国主义根本一致反对我们”,并“直接统治”;(二)“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有获得革命领导权的可能的危险”;(三)“无产阶级对于革命领导权作用没有准备的危险”。这篇文章反映了瞿秋白的领导权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不仅要领导群众运动,而且要参加革命政权,特别是要掌握军队的领导权。他说:“我们对于过去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现在更要深入,以前所谓领导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以外的,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领导权初创的形式已经不够了,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应使军队中的指挥成份继续由真正忠于革命的成份来代替和补充,使军队本身直接兼顾劳动群众的利益。”瞿秋白还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等在这方面的严重右倾错误,指出,中国共产党内有些人,“最近几年来把自己总是看作‘左野党’的趋向,不求参加革命政府的趋向,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倾向,以致逐渐的消失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并且迟钝了它的斗争——这都不是偶然的现象。”他认为“否认这些错误是不赦的罪过”。

5月20日 同汪精卫、徐谦等出席在武汉举行的国民政府农政部长谭平山就职典礼。

5月21日 深夜,国民革命军何键部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政变,即“马日政变”,解散湖南省工会、农民协会等一切革

^①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7日、28日。

命团体，缴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任意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甚至见到剪发的女子，也乱砍乱杀。6月5日晨，瞿秋白撰写了《长沙政变与郑州开封的克复——革命之胜利与危机》，发表于6月8日《向导》第197期。着重谴责许克祥的反革命罪行，指出，许克祥“一意孤行甘心替张作霖、蒋介石、夏斗寅做走狗而为之内应劫夺米款，断绝军米之供给，助杀帝国主义、新旧军阀所痛恨之革命民众，千方百计的扰乱北伐后方”，文章说：“许克祥是土豪地主的代表，他为维持自己对于农民之剥削起见，借口于保护革命军官的利益以为煽惑之资，而背叛革命了。”文章认为许克祥和蒋介石的叛变，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反动阶级破坏革命的手段”，“客观上许克祥完全是蒋介石所驱使的走狗，和夏斗寅一样。而且长沙政变和夏斗寅的叛变，显然是密切相衔的”。

5月26日 晨5点，写就《五卅两周年纪念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发表于5月30日《向导》第196期。文章论述了四个问题：一、“反革命的屠杀政策”，指出帝国主义为了“扑灭革命”，对中国民众，除了自己动手屠杀外，还厉行“以华制华”的政策，“在中国国内寻找刽子手，来对付革命的民众”。二、“民族资产阶级之变色过程”，指出1925年“五卅”时期结成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五卅后的两年中，从“赤色变成非赤色——黄色，从黄色又变成白党”。文章说，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还可以在联合战线之内”，但随着“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于是“亟亟用军事独裁的方法来抢夺革命之领导权”，进而“居然公开的破坏联合战线而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三、“小资产阶级的的问题”，指出小资产阶级能“积极的参加革命斗争”，“日益革命化”，认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之联合战线，可以成为伟大的力量，足以摧毁帝国主义新旧军阀的锁链”，同时，小资产阶级只有“和无产阶级农民建立革命的联盟，方能够保障自己的利益和解放”。四、“小地主革命军官的问

题”，指出“小地主问题和小资产阶级问题是很相仿佛的”，革命军官大多“是小地主”，主张“农民不特不必立刻要求小地主的田地，而且可以和小地主联盟，组织乡村自治政府，巩固革命的胜利”，进而作出具体分析：“小地主与革命军官，在经济上与贫农相仿佛，同样可以联合贫农而向土豪乡绅等反革命的大地主奋斗；在政治上，他们是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成份，实行和一般农民联合，而去打北方的封建买办阶级的军阀。所以无产阶级、农民和小地主革命军官的联合战线，客观上现在是存在着。”

5月26日、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马日事变”后湖南的政治局势及党的军事工作，决定致电国民政府和湖南省政府，质问解散工会、农会事，并决定派瞿秋白、张国焘赴湖南了解情况，指导工作。^①

5月26日 作《五卅两周年纪念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发表于5月30日《向导》第196期。

5月 中共汉口市委办了干部训练班。瞿秋白应向警予的邀请，到干部训练班讲授关于农民运动的问题。他说：中国革命就是民权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只有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才能推翻封建地主、土豪劣绅的统治，中国革命才能胜利。”^②

5月 鲍罗廷根据斯大林的授意，在汉口旧德租界他的寓所（西门子洋行原址）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一些意见。瞿秋白同其他中央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印度的罗易、法国的多里奥和日本、英国等国的共产党代表。会议一连开了两个晚上。瞿秋白当时曾说：“为了不辜负斯大林对我们的支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第114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89年。

^② 《中央纪委在上海召集的关于瞿秋白评价问题座谈会纪要（1979年7月）》，未刊。

持,为了不辜负兄弟党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得好好干才行。”他要求“赶快把会议记录整理起来。”^①

5月下旬 马日事变后,瞿秋白参加了中共湖北省委和农民运动负责人会议。他在会上发表讲话,极力主张用进攻的手段,反击许克祥等右派的反革命暴动。

5月 汪精卫暗中与蒋介石搞政治交易,已有反叛的迹像。宣传部一同志在草拟的宣传要点中,未经瞿秋白审核,就写上“要警惕武汉政府有人要出卖革命”,“汪精卫要向右转了”。陈独秀看后,批评宣传部“乱弹琴”,“不考虑党的斗争策略”,“给人家抓话柄”。瞿秋白接受并承担了责任。后来他给宣传部同志指出,独秀的意见是对的,汪精卫是个政治上的投机分子,肯定会出卖革命、出卖共产党的,但现在写了发下去,确实不合时宜。他说,不合时宜的正确意见,如同以错误的主张去指导工作一样,都会导致工作失败。^②

初夏 与宣传部一同志去武昌访问郭沫若。当走到民权路口的王家巷码头时,军警戒严,有个师长要由此上岸去河南前线。瞿秋白建议看看这位官儿的威仪。不一会,轮船泊岸,码头所有船只汽笛长鸣,排列在岸边的军队吹吹打打,热闹非凡。当时瞿秋白告诉陪同的那位同志说:明朝正德年间,阉寺当权,官船往来苏北运河无虚日,沿路百姓要随时听候齐集岸边吹打迎送,有位高邮人王西楼写过一首“喇叭”曲:“喇叭、锁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和假?眼见得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得水尽鹅飞罢”。瞿秋白念完以后,两人大笑不已。^③

①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按:羊牧之当时随瞿秋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

②③ 穆之尔:《瞿秋白在武汉的一些片断情况》,《常州教育学院学报》(文科版)1985年第1期。

6月3日 为自己编译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作序，介绍编译的目的、经过，评述俄国革命史的意义。瞿秋白指出，俄国革命运动史对于世界各国革命党人都有借鉴作用，“能够给很有用的教训与经验”。《自序》断言：“俄国的资产阶级不但不能解决农民问题——推翻封建势力，并且不能完成自己阶级的民权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与农民问题的解决，始终是俄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自序》又针对中国革命说：“这的确对于中国现时的革命，有很重要的教训。我希望读者不要把这本书单当做历史读。”该书于同年7月由新青年社出版，由汉口长江书店发售。但尚未发售，该书店“即为汪精卫、唐生智等所封闭，此数千本新书”，“同归于消灭”。同年12月再版。

6月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被增选为常务委员，主管中央宣传部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中央农委委员。^②

6月4日 中央常委会开始由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四人轮流值日，持续到一月下旬。

6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瞿秋白出席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团会议。当时，出席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有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等。6月30日中央常委会开会讨论国

① 这是瞿秋白计划编写的《俄国革命运动史》的第一部分，还有《俄国无产阶级之斗争与共产党》、《自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及社会主义之建设》三个部分。1928年1月《布尔塞维克》第13期为《俄国革命运动史》(全书四册)登出广告，作了专门介绍。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第115页；陈铁健：《瞿秋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8卷。按：据羊牧之回忆：有一次瞿秋白派他到武汉刻字铺刻一只牛角的党报委员会图章，用谐音“当豹韦元晖”，以避国民党右派的注意。

共两党联席会议问题，决定每周举行两次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一次由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 3 人参加，另一次由瞿秋白、张国焘两人参加，陈独秀不再参加。

6月10日 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密谋反共。6月20日、21日，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在徐州举行会议，秘密达成反苏反共、宁汉合作的协议。

6月13日 凌晨3点，作《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危机》发表于6月15日《向导》第198期。文章指出，从蒋介石叛变而开始的国民革命的危机，日益加深，“紧迫到万分”。帝国主义和新军阀结合在一起，进攻武汉，到处屠杀工农及共产党员，破坏革命等等。瞿秋白认为当时革命的迫切任务是争夺“革命领导权”，“集中势力进攻新军阀旧军阀”，“巩固扩大革命的领域”。他说：“武汉的国民政府，应当以扶助农工联共联俄三大革命政策为领导——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而彻底实行推翻封建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又明确指出：“革命的民众与政府必须……团结全国一切革命势力，巩固工农商学兵的革命联盟，实行讨伐蒋介石，击毁反革命中心之南京政府，肃清危害国民政府之一切反动势力，使革命得到真正的胜利，只有这样，武汉政府才能保持其革命的意义，方能歼灭蒋介石以至张作霖，完成国民革命。”

6月18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设宴欢迎北伐凯旋将领，唐生智、于右任、张发奎、汪精卫、谭延闿、吴玉章、高语罕、何香凝、宋庆龄等共约百余人出席宴会。俄顾问鲍罗廷，共产党代表瞿秋白列席宴会。^①

6月中旬 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等140余人的职务。

^①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9日。

6月28日 陈独秀在汉口西门子鲍罗廷寓所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周恩来、张国焘、张太雷、谭平山、蔡和森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何键有今夜举事之说”，研究各机关应如何戒备，并决定，中央机关立刻迁至武昌，同时中共湖北省委也迁至武昌。当即指派蔡和森前往武昌布置机关迁移工作。^①

6月30日 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陈独秀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② 决议承认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资格“参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两党联席会议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依照国民党主义，须武装农民，但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等。^③ 在讨论时，陈独秀提出，“中共党员不仅要退出国民政府，而且要退出国民党。”鲍罗廷表示，“他个人非常赞成，但恐共产国

①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4~95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

② 此《议决案》的起草者有三说：一、蔡和森说是瞿秋白起草的。他说，1927年6月29日，在陈独秀于武昌机关新址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瞿秋白有甚长的书面提议，“大约系说明湖南农民问题所促进之阶级分化的革命危机，主张土地革命所以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保护佃农等为条件，待有武力再实行没收土地，中心问题，仍在贯彻对国民党左派让步政策。”“独秀看完秋白书面提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一正式决议”，提交“中央扩大会”讨论，蔡和森还强调指出：“这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秋白主持的决议和说明书，不过是两个月以来（五次大会后）的摇摆、犹疑、回避土地革命，向所谓左派让步政策之总结罢了”（见《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6~97页）；二、“王若飞说是陈独秀起草的”（见唐宝林等著：《陈独秀年谱》第331页脚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三、张国焘回忆，是“鲍罗廷根据莫斯科的指令所草拟的，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60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55~256页。

际不会允许”。瞿秋白认为，“与其自动退出（国民党），不如让国民党开除我们。”^①后来，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中，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时，又尖锐地批评了《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的妥协退让的错误，指出：这个决议，“是集机会主义之大成，亦是机会主义之顶点。”^②

7月初 一天傍晚，瞿秋白和挚友羊牧之登上黄鹤楼。瞿秋白触景生情，吟着崔颢的名诗《黄鹤楼》七律，并感慨地说：“千百年来，多少文人雅士，英雄豪杰都似江流一去不复返，安知几十年后，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啊！但去要去得有价值。”突然，他沉痛地想起了李大钊，悲愤地说：“大钊同志在张作霖的绞刑架下，英勇地牺牲了。他为人民革命而死，死得光荣。”紧接着，瞿秋白又气愤地痛斥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③

7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讨论湖南局势，商讨如何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

7月8日 于《向导》第200期发表《革命失败之责任问题》。进一步揭露和剖析蒋介石的阶级本性。瞿秋白明确指出，因为蒋介石的背叛、分裂和破坏，导致国民革命的失败。文章进而驳斥了蒋介石自称为“三民主义的信徒”和“讨赤反共是继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的胡言，说：“孙中山先生的主义与政策永久是革命的，永久是代表中国民众求达民族解放民权政治民生改善而奋斗的。”它的精髓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然而，蒋介石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变成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瞿秋白指出，蒋介石决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而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工农群众的“罪魁”。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66页。

② 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120页，1928年6月。

③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7月12日 在鲍罗廷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训令”，于汉口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派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行使中央政治局职权，并决定派陈独秀赴莫斯科决定此后之总政策。“自此陈独秀即不视事”^①，13日，致函党中央，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7月下旬，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后，由于他的声望，也参加了中央常委会的领导工作。

7月13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声明撤出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领导中国人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7月13日 晚，瞿秋白同鲍罗廷离开武汉去庐山。瞿秋白在庐山一边休养，一边同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研究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改组和南昌暴动等问题。

7月14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决议》，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的要求，转变中国革命的政策。

7月14日 宋庆龄发表脱离武汉国民政府的声明，谴责武汉国民党领袖的背叛行为，表示坚决维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7月14日 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和大屠杀的计划。

7月15日 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分共会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在武汉地区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公开背叛了革命。不久，宁、汉合流，第一次国内大革命遂告失败。

7月20日 谭平山在江西九江召集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聂荣臻、叶挺等有关负责人开会，大家分析当时的局势后，决定放

^①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弃联合张发奎的政策，准备实行南昌暴动。会后，李立三和邓中夏带着九江会议的意见，上庐山向瞿秋白、鲍罗廷等人报告了九江会议商定的南昌暴动的计划。瞿秋白当即表示完全赞同，他主张叶挺、贺龙独立行动，并给五人临时中央常委会写信，作了汇报。7月21日，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汉口，又当面向中央常委报告了九江会议作出的准备发动南昌暴动的具体意见，并要求从速决定。

7月23日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来到汉口。当晚与瞿秋白、张国焘晤谈。罗明纳兹自称是共产国际派遣的全权代表，奉命来中国指导中共中央工作，纠正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种种错误。他宣称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决定要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罗明纳兹与张国焘的交谈陷于僵局时，瞿秋白从中作些调解，希望他们不要各走极端。后来话题转到讨论南昌暴动时，罗明纳兹显得茫然。谈话结束后，瞿秋白和张国焘都颇感失望。瞿秋白曾对张国焘说，共产国际为甚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人来当代表，只会反机会主义，提起南昌暴动就没有主意了。

7月25日 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召开扩大会议，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并同意九江会议的意见，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并确定暴动后，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会议还决定派周恩来前往南昌，同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负责暴动的准备工作。同时向共产国际作报告。^①

7月26日 临时中央常委会在汉口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第119页；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160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1986年。

的有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瞿秋白及罗明纳兹、加仑等人。首先由加仑作报告，接着罗明纳兹发言，传达经斯大林决定由布哈林具名发来的共产国际关于南昌暴动问题的复电。复电指示：“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又指出：“张发奎军中的同志尽行退出，派往农民中工作。”中央常委会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经瞿秋白和李维汉的推荐，常委会决定派张国焘当晚去南昌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①

7月27日 鲍罗廷等苏联顾问及工作人员共140多人，陆续离开武汉回国。

7月29日 中共中央发布《致国民党革命同志书》，表示拥护真正革命的民权的国民党，反对背叛革命的假国民党。这个文件后来得到“八七”会议的追认。

8月1日 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革命士兵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8月3日 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确定会议的议程。苏兆征、李维汉^②、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张太雷、林育南等出席了会议。首先由张太雷、李维汉报告了他们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谈话的情况，然后，与会者进行讨论，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张太雷、李维汉都先后发了言。会议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

^① 《张发奎致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信》，1927年11月8日；《中央常委覆张国焘的信》（均载《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1927年11月30日出版）；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82～283页。

^② 李维汉当时叫罗迈。

是中国革命新的转机，应该接受并研究制定新的革命策略；过去中央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中央政治局应当改组，并加入工人分子。因为时间关系，会议没有来得及讨论有关紧急会议的三个草案。^①

8月7日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参加会议代表共21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参加了会议，并就《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转变政策的指示，由瞿秋白作翻译。《告全党党员书》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不断高涨”。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常委会作了关于《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分析了当前革命形势和任务，提出党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他强调指出，要建立革命军队，要用“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组织农民暴动；“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团结真正的左派；要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要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在会上，瞿秋白和任弼时等人，进一步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本质。大会一致通过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起草、瞿秋白翻译并宣读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还通过了由瞿秋白宣读的农运、工运、组织问题等决议案。会议正式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选举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9人为正式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7人为候补委员，组成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②

① 曹雁行：《“八七会议”情况介绍》，《党史研究》1980年第3期；赵朴：《八七会议与党的改组》，《党史研究》1985年第4期。

② 参考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回忆与研究》上第156页）；曹雁行：《“八七会议”情况介绍》；赵朴：《八七会议与党的改组》等。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参加了“八七”会议。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系依得票多少排列的。

瞿秋白主持召开的“八七”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的转折点，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彻底地结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战斗，进一步部署了湘鄂粤赣的秋收起义，从而“使党大进了一步”^①。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却为“左”倾盲动主义开辟了道路。

8月9日 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②会议决定：瞿秋白兼中央农委主任、宣传部部长，并任党报总编辑；李维汉兼任组织部部长，主持秘书厅工作；苏兆征兼任中央工委主任；周恩来兼中央军事部部长（暂由王一飞代）。会议还决定顾顺章任中央交通局局长，杨之华任妇女部部长，郑超麟任中央出版局局长。会议讨论了南方几个省的工作和南方局的组织问题，讨论了北方各省的工作，决定“北方组织政治分局”，王荷波任书记，蔡和森任秘书长。会议还决定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③

八七会议后 同李维汉去看望陈独秀，向他介绍“八七”会议的情况，征求他对中央工作的意见，并劝他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④一天晚上，瞿秋白刚从陈独秀住处回到寓所，对秘书羊牧之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切不可一犯错误就全盘否定。说实话，如果我处在独秀的位置上，也许犯的错误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3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三人常委是平行的，但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较多，比别人先知道重要消息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当时，瞿秋白被视为“一种政治中心和理论中心”，并无总书记的名义。

③ 同第222页注②。

④ 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回忆与研究》（上）第166页。

比他更大、更严重。好否定人的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为了申述他的观点，又列举了列宁是如何正确评价犯错误的普列汉诺夫的例子。^①

8月10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第一次会议，具体讨论了南方局的组成问题。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恽代英、黄平、彭湃、张太雷、陈权、张国焘等七人组织南方局，管理广东、广西及闽南等地党的组织与工作，由张国焘任南方局书记。同时决定，在周恩来未到达广东以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成临时南方局。10月15日南方局与广东省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等6人为南方局委员。

8月21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党的宣传工作，并通过了关于宣传工作的第四号通告。通告贯彻了“八七”会议关于“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按期出版秘密的党的政治机关报，而传播之于全国”的决定精神。通告强调，要加强党的政治宣传和鼓动的工作。要求“整理全国宣传和鼓动的工作成为一贯的系统”。通知各级党部：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主编并出版《中央通讯》；各地省委常委委员会相应出版《省委通讯》；省委以下较大的市委或县委，也须出版党内刊物。通告还通知，对外的“中央机关报《向导》，重新恢复出版”；要求各地省委都要筹办一种类似以前上海的《市民日报》的机关报，规定上海、汉口、广州、天津、长沙的党委所办的机关报，必须是日报，其他各地省委或临委，如果没有条件，可以出二日刊或三日刊。^②

9月19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八七”会议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决定，决议彻底摒弃了

^① 李牧之：《霜痕小集》，《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

^② 《中央通告第四号》。

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本决议案后来得到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追认。会议还正式提出和讨论了中央机关迁移的问题。会议对迁移的去向作出了原则性的决定：若湖南湖北暴动没有大的发展，就先迁往上海，等广东有了头绪时，再从上海迁往广东。9月21日，中央再次讨论了中央机关的迁移问题，决定“派戴琨去(上海)布置”住房，建立机关。与此同时中央机关开始向上海迁移。^①

9月28日 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苏兆征、李维汉、罗亦农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设立长江局、中央机关迁移等问题。会议通过了罗亦农提出的关于长江局组织草案。长江局的人选，经反复讨论，否定了共产国际代表岳尔克反对毛泽东等任长江局委员的意见，通过了瞿秋白的提案，即长江局由罗亦农、陈乔年、任旭、王一飞、毛泽东五人组成，并决定调易礼容任长江局秘书长。会议讨论了中央机关搬迁的具体问题，作出决定：苏兆征于当天启程去上海；瞿秋白于9月29日(或30日)动身去上海。会议还决定：李维汉最后走，待任弼时由湖南返回武汉后，由他召集顾顺章、罗亦农、任弼时等开一次会，最后安排一下中央离开武汉后的有关具体事项，然后启程赴上海；瞿秋白到达上海后，就同邓中夏、苏兆征等商定有关的工作，然后即赴广东，不必等李维汉到沪。^②

9月30日 中央商酌准备由邓中夏、郑超麟、王若飞、陈独秀、李富春等组织上海局。但由于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已赴上海，瞿秋白即将赴上海，遂决定将此问题交瞿秋白带到上海，中央再讨论决定。不久，贺、叶南征部队在汕头失败。中央遂决定，中央机关仍设在上海，不再南迁。因而组织上海局的问题也就中

^{①②} 赵朴：《八七会议与党的改组》，《党史研究》1985年第4期。按：毛泽东，易礼容一直未就长江局委员职。

止了研究和讨论。^①

9月下旬至10月上旬 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陆续迁回上海。瞿秋白由郑超麟陪同，于9月30日或10月1日，乘江轮离开武汉，于10月4日或5日到达上海。杨之华稍后回到上海。李维汉约于10月8日或9日到达上海。至此，中央机关最后完成了由武汉到上海的搬迁任务，并最后决定中央机关留驻上海。^②

10月上旬 即到达上海二、三天后，同李维汉一起去福生路陈独秀住处访问。瞿秋白对待陈独秀的态度同过去一样，仍然是恭敬的。请他经常给中央机关报写文章。陈独秀当即应允。从10月起，他以“撒翁”笔名，在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第1~29期的《寸铁专栏》发表了147篇短文。这次访问，瞿秋白和李维汉再次劝说陈独秀去莫斯科。^③

10月15日 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召开“紧急会议（即后来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问题”。会议决定：出席会议人数，中国同志为20人左右；开会时间

① 赵朴：《八七会议与党的改组》，按：笔者于1990年8月22日访问郑超麟先生，他回忆：瞿秋白从武汉刚回到上海，曾对他说，到叶，贺军队攻下广东后，要将中央机关迁往广州，在上海设立中共中央办事处，并拟任他为办事处负责人。随后，他遵照瞿秋白的吩咐，在上海兆丰花园（今中山公园）东边亨昌路418号（今愚园路亨昌里——愚园路1376弄34号）租了一幢小洋房，准备在此成立中共中央驻沪办事处。后因广州暴动失败，中央机关南迁计划未能实现，设置驻沪办事处一事不复存在。看来，郑超麟所回忆的中央拟设的中央驻沪办事处，极可能就是中共上海局。1991年9月4日，笔者再访郑超麟时，问起他回忆的中央驻沪办事处，与中共上海局是否就是一回事？他否定这两者是一回事，他说，可能是中央拟将谁作为中央驻沪办事处的代表参加上海局的。

② 赵朴：《八七会议与党的改组》。

③ 郑超麟1980年4月、8月两次回忆。

为11月15日至11月20日期间。10月18日，中央常委再次开会讨论召开“紧急会议问题”，改变了开会时间，对出席会议的人员、人数和议程都作出了具体规定。10月19日，发出了《中央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通告说：“中央现决定十一月十二日在沪召集紧急会议，凡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指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均需列席，被指定之重要省委或中央分局亦须派代表出席。”通告还通知了会议议程：（一）政治报告和讨论；（二）党的组织问题；（三）召集第六次代表大会问题。要求“各局各地的代表在赴会以前须准备一工作报告来，以备紧急会议之参考”。10月20日，中央又以“沈保和”签署，发出了《中央关于召集紧急会议的更正》，通知说：“现因其它特殊关系，紧急会议不能在十一月十二日开，决定改在十一月八日（提前四日）开，到会的人务于七号以前赶到上海，过期即不等候。”^①

10月22日 中央常委通过决议，决定出版中央机关报，定名为《布尔塞维克》，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等5人组成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瞿秋白为主任。^②瞿秋白为党报题签刊名。《布尔塞维克》编辑部设在上海亨昌路418号（即愚园路亨昌里）。当时，瞿秋白家住福煦路民厚南里对面弄内，后搬到白克路近池浜路口（今凤阳路近慈谿路口）。瞿秋白每周来编辑部一次，他代表中央常委主持召开党报编辑委员会会议，传达中央意见，指导工作。他又代表党报编委会，向中央汇报机关报工作。从创刊

① 赵朴：《从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六次大会召开以前的组织状况》，《党史研究》1985年第6期。

② 《中央第十一号通告——中央常委决议》，《中央通讯》，第8期，1927年11月7日。按：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把郑超麟从湖北省委调回中央，要他恢复《向导》周报，郑认为有困难，中央采纳郑的建议，另办一个刊物，取名《布尔塞维克》。

起到1928年4月瞿秋白去莫斯科以前，本刊发表的全部社论，除第11期《苏维埃政权万岁》为郑超麟所写外，其余都是瞿秋白撰写的。他还负责撰写纲领性文章。^①

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创刊号出版。瞿秋白为创刊号撰写的发刊词，总结了国民革命斗争，指出“国民党的领袖一批一批的背叛革命，背弃他们自己的三民主义”，从蒋介石起直到张发奎，都“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完全抛弃”。现在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屈服甚至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发刊词认为今后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起领导的责任”，“革命思想方面，比《向导》时期尤加十倍的必须有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布尔塞维克主义的领导”。明确指出：只有建立“布尔塞维克的精神和布尔塞维克的思想，然后中国革命之中方才有强固的健全的无产阶级政党做领导，才能彻底的完成中国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因此，《布尔塞维克》便继《向导》而创刊了。

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创刊号发表瞿秋白撰写的社论《反对南京武汉的军阀斗争！》。社论揭露和批判南京政府和武汉唐生智之间的战争是“军阀祸国殃民的战争”，无论那一方的胜利，其结果都要“加重对于工农的剥削和压迫”。社论号召：“变军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工农民众武装起来推翻南京政府和唐生智，“建立自己的国家和政府”。社论说，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解放我们于帝国主义军阀统治之下”！

10月24日于《布尔塞维克》创刊号发表《民众的革命战争反对所谓北伐》和《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前者指出：“现在的所谓国民党自身只是代表新旧的军阀——豪绅资产阶级，他们的各派：西山派、蒋介石派及汪精卫派，只是代表各系的军阀。”

^① 《访问郑超麟记录》，1980年4月1日。

他们决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反革命的力量,决不是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而是帝国主义的附庸。”认为他们与奉鲁军阀相比较,“简直是毫无区别”。文章分析说,现时的所谓北伐只是军阀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不管那一方胜利,“终归是军阀的胜利而不是民众的胜利”。瞿秋白要求民众组织起来,反对军阀的战争。他指出,“只有民众的武装暴动,创造(立)真正的民众军队,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苏维埃政府),才能解放工农,才能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后者分析了自北伐以来,国民党右派如何由害怕工农到反对工农,直至背叛革命,指出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的农工暴动,已经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他说:“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便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革命。中国现在唯一的革命党,便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他应当是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他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政府,才能“彻底完成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革命”。

10月26日 作《军阀混战的中国与工人阶级》,发表于10月31日《布尔塞维克》第2期。

10月29日 作《“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发表于11月7日《布尔塞维克》第3期。指出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唐生智、阎锡山、白崇禧等右派篡夺了国民党的党权,使国民党变了质,“国民党就是新军阀”。他们奉行的三民主义已经丧失了革命性,而成了欺骗群众的革命幌子。文章揭露说:“民众自己起来实行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却大大反对,立刻屠杀压迫这些民众。”因而“所谓纯粹国民党,所谓‘忠实同志’的国民党,自然只剩得是三反主义的反革命党,丝毫三民主义也没有了。”文章最后引用广州革命工人的话作为结论:“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我们的革命旗帜是镰刀斧头红色旗!”

11月1日 主持召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苏兆征，李维汉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政治通告问题、两广问题、北方问题，着重讨论了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问题。会议对当前的革命潮流是高涨还是低落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分析，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李维汉也支持这一观点。当讨论到党内状况时，瞿秋白说，党的组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定要坚决地提拔工人分子，党不但灵魂要换，而且躯壳都要换。凡旧的同志勉强不好的即请他自己去找职业。^①会议作出决定，由瞿秋白负责起草组织问题议决案草案，提交紧急会议讨论。^②

11月2日 作《中国社会的大破裂》、发表于11月7日《布尔塞维克》第3期，指出当时的中国，“从直隶到广东，无处不是军阀混战，而且大半是在国民党之内青天白日旗之下混战”，宁汉国民党、宁粤国民党都相继分裂。由于新旧军阀的混战和纠纷，所以工农贫民决然“和军阀及国民党宣战”。文章认为：“这才是中国社会的大破裂”。进而论述了工农贫民的革命斗争如何在急速地爆发起来。文章指出：“中国工农贫民兵士的群众武装暴动起来，要扫净中国的地主豪绅资本家军阀官僚政客国民党；这种伟大的社会破裂，伟大的阶级战争，伟大的革命斗争，才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及军阀国民党混战之下！”

11月5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草案》、《土地问题党纲提案草案》、《第六次代表大会问题决议草案》。将紧急会议的议程改定为：（一）政治报告并决议；（二）组织问题；（三）召集第六次代表大会问题；（四）政治纪律问

^① 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回忆与研究》（上）第180、18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1986年。

^② 赵朴：《从十一月扩大会议到六次大会召开以前的组织状况》，《党史研究》1985年第6期。

题；(五)职工运动问题；(六)土地问题党纲提案问题。会议还决定了政治纪律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11月7日《布尔塞维克》第3期发表瞿秋白撰写的社论《十月革命万岁！》。社论阐述了俄国工人、农民如何在布尔塞维克党(共产党)领导下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及十月革命胜利后10年来俄国政治的重大变化，并对比了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现状。指出：“十月革命胜利到如今不过十年，而苏联的强固已经是如此。中国辛亥革命到如今已经十七年，然而中国的现状，却仍旧是新旧军阀、国民党政客、官僚、豪绅、资本家专横混战的局面，却仍旧是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的局面。”他认为必须继续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才能解放。

11月9日至10日 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向忠发、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等参加了会议。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政治报告，瞿秋白作了补充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由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及瞿秋白起草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等。当时，革命已转入低潮，但决议没有正确估量客观形势，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革命运动仍在不断高涨”，要求在敌人统治中心的城市组织进攻和组织乡村农民暴动，而反对作战略性的退却。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实行惩办政策。会议决定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由原3人扩充为5人，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两人为常委。会议决定派陈独秀、苏兆征、李立三为代表赴共产国际。^①

这次会议使“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党中央机关取得了统治地

^① 《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等。

位，给革命事业招致许多损失。

这次会议，决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半之间，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规定了产生代表的办法、党员人数与代表的比例、代表的党龄和青年团中央应出席代表的人数，以及六项会议议程。^①

11月11日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取消南方、北方、长江诸局。”^②

11月14日 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苏兆征、李维汉、周恩来、罗亦农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审定通过了经过文字修改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政治、组织、政治纪律三个决议案，同时根据组织决议案有关的原则规定，改组了中央机关。会议决定中央机关不设部，取消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和中央农委，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下设职工运动委员会、党报委员会、秘书处（11月22日又决定取消）和组织局。^③

这次中央常委会议决定：由苏兆征、向忠发、郑复他、王藻文、陈煜（郁）、项英、胡××（景鄂）、万兴、黄五一、李立三、黄平、郭亮、许白昊、周文雍、张昆弟等组成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由苏兆征兼任，罗章龙任秘书。同时决定，所有委员须经常向中央作个人通讯，提出对职工运动的意见。^④

这次中央常委会议决定：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由瞿秋白兼任，秘书由郑超麟担任。同时大致决定了党报委员会委员的人选。随后经过酝酿研究之后，于12月1日发出了十八号通告。通告说：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事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8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82年。

②③④ 赵朴：《从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六次大会召开以前的组织状况》，《党史研究》1985年第6期。

“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为全党的思想教育机关”，“为使中央编辑委员会能尽到他本身的责任，中央特扩大编辑委员会的组织并决定名单”26人如下：瞿秋白、郑超麟、罗亦农、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黄平、周以粟、任旭、毛泽东、王一飞、任卓宣、周恩来、王若飞、李立三、恽代英、陆定一、刘昌群、罗章龙、刘伯庄、任弼时、尹宽、李富春、罗绮园、夏曦、夏之栩。通告要求每个编委每周至少要为《布尔塞维克》撰写一篇文章，各地省委每周要提供一篇本地通讯。^①

中央常委会议还决定：中央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三人组成，主任由罗亦农兼任，秘书由×（邓）希贤担任；^② 由杨之华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11月下旬，杨之华请求辞去中央妇委主任职务。11月29日，中央批准杨之华的请求，并决定中央妇委由杨之华、邓颖超、李哲时、庄东晓、×月贞等组成，由邓颖超、杨之华、庄东晓、李哲时四人按月轮流担任主任，由邓颖超首轮。^③

11月14日《布尔塞维克》第4期发表瞿秋白撰写的社论《江南农民大暴动之开始》。指出江南是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中心”和“大本营”，因而宜兴、无锡及其他各城镇爆发的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有着“特殊的意义”。社论概述了暴动的特点，说这次暴动“是共产党领导的”，“有固定的政治纲领及明显的政治口号”，“提出土地问题，焚毁一切土地契约”，“杀戮地主豪绅”，“组织农民革命委员会”等。社论认为这次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但仍然要坚持下去。强调指出：不但“不能停止暴动”，而且要“更加扩大暴动的范围，由苏常至浙江以及于江北”，要求“江南乡村农民暴动更将与城市工人暴动联结起来，根本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根据地，攫取其

①②③ 赵朴：《从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六次大会召开以前的组织状况》，《党史研究》1985年第6期。按：邓希贤即邓小平。

政权，建立苏维埃的中国！”

11月16日 作《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发表于11月21日《布尔塞维克》第5期。瞿秋白正确指出，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国民革命并未完成。他认为：“国民革命的任务，至少应当是统一中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之下，推翻封建式的剥削。”但这些任务，“丝毫都没有解决，没有实现”，从而批判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文章进而指出，中国国民革命的任务，“必须工人阶级负起全副的责任，联合最彻底的民权革命的伟大力量——中国的农民来实行”。但是文章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和分析，不承认中国革命经过多次挫折和失败之后已处于低潮，应当组织策略性的退却，而恰恰相反，把局部地区工农斗争的继续发展，看作为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因而文章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剧烈，显然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这一观点，明显地反映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思想。

11月16日 作《最近资本家的进攻与工人阶级的斗争》，发表于11月21日《布尔塞维克》第5期。文章指出，汪蒋合流以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工人“步步进逼，禁止真正工人的工会和罢工，组织工贼会（如上海的工统会，汉口的工会改组委员会，广州的所谓总工会、机器工会、改组会等），屠杀工人……造成全国的白色恐怖”；同时“帝国主义者和中国资产阶级，厂主也好，店东也好，更加向工人进攻了”，文章并列举许多事实加以论证。文章揭露：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工人罢工后，“英国水兵在浦东上陆，严厉的压迫工人”；上海中外纱厂的资本家，“联合起来减少工人工资，开除大批工人”；武汉和沪宁一带的资本家、店东（商会）最近都一致提出“雇工解雇的‘自由’，一致提出取消店员工会的要求”；“广东工人自己

起来恢复真正工会，汪精卫、张发奎等便大施屠杀，立刻解散工人代表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海员工会等”。瞿秋白号召工人阶级不但要领导奋起暴动的农民推翻豪绅地主的政权，而且“更加要努力反抗中外资本家的进攻”，组织“真正工会”，一致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绝对的增加工资，工人监督生产，反对开除工人，反对工贼的假工会”。最后强调必须坚决认定：“只有工农联合起来，武装暴动夺得政权，才能摧毁资本家的威权，实行工业国有，真正保证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

11月17日 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①。会议讨论了广东和北方工作等问题。会议通过《对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组织暴动，建立工农兵代表的政权。会议决定由张太雷、恽代英、张善鸣、黄平、陈郁、黄谦、周文雍组成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还决定撤销中共北方局，派蔡和森为北方五省特派员兼中共顺直省委书记。

11月21日 《布尔塞维克》第5期发表瞿秋白撰写的社论《国贼党徒的离合与工农民众——唐生智下野和汪蒋合作——江苏农民的武装暴动》。

11月27日 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等问题。

11月28日 《布尔塞维克》第6期出版特刊，发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等文件。同时发表瞿秋白为特刊而撰写的社论《布尔塞维克主义万岁》。社论宣传和贯彻“十一月扩大会议”的精神——“左”倾盲动主义，肯定“中国革命虽然受着屡次的失败和挫折，但是工农民众的革命潮流仍旧继续的高涨”，

^① 《中央档案馆关于查证瞿秋白参加过某项中央会议的来信》（1991年7月16日）。

“中国现时已经到了长期的无间断的直接革命形势”。社论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号召全党发动全国工农“起来武装暴动”，“自动手的杀戮豪绅工贼反革命派，自动手的没收土地分配土地，摧毁一切旧的社会关系”。社论还肯定了中央关于党组织建设的“左”倾政策，说“本次会议对于共产党的机会主义，与以极严厉的纠正”，并要“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动摇犹豫畏怯怠工的分子，使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化，无产阶级化”。社论认为中央决定上述的策略，“实在是开辟中国革命史的新纪元”。

11月29日 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并通过职工运动决议案。会议还决定，中央妇委由杨之华、邓颖超等6人组成。

11月30日 作〈反对南京政府的工会条例〉，发表于12月5日〈布尔塞维克〉第7期。文章一针见血地揭露南京政府拟定的所谓工会条例(草案)的阶级实质，指出这是“荒谬绝伦的法令”，“保障资本家的剥削，限制工人的自由”。文章分析说：“这种条例实施起来，简直是完全剥夺工人的生命和自由”，“所谓工会只能替资本家做走狗”。文章号召全中国工人，“应当立刻起来反对这种压迫工人的条例，反对国民党的政府，要求组织工会和罢工的绝对自由”。

11月30日 作〈国民党的中央会议〉，发表于12月5日〈布尔塞维克〉第7期。文章揭露和分析国民党内西山会议派、蒋介石派、汪精卫派等派别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指出：“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中国，实在和旧时国会统治之下的中国，是完全一样，一是军阀猪仔的猪圈，一是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走狗的狗窝。这种狗窝会议之中，甚么分治合作，甚么领袖团结，都是废话，除分赃混战以外没有别的结果。”

11月30日 作〈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策略〉，发表于12月5日〈布尔塞维克〉第7期。文章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中国

社会经济和各阶级的变化,进而指出:“这种形势之中,革命的无产阶级之策略,自然只有坚决的联合广大的农民群众,尤其是贫农,联合极广大的兵士苦力贫民的群众,起来取得政权,绝无犹豫的与已经背叛革命而动摇畏缩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奋斗,勇猛的推翻豪绅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统治。”

11月“十一月扩大会议”后,瞿秋白主持制定了《中央工作计划》,规定3个月内应做到的17项工作及其分3期进行的具体计划。在第一期(从11月20日至12月20日)工作计划中,中央决定派人巡视两湖、江浙地区的工作,部署几个省的工农暴动^①,先后布置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布置两湖和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

11月给蒋光赤(即蒋光慈)的小说取名《短裤党》(该书于本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蒋光赤创作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短裤党》等小说,在落笔之前,都去同瞿秋白商量;脱稿之后,又送请瞿秋白审阅,听取其意见。瞿秋白认为要写出深刻真实地反映革命的作品,必须积极地参加实际斗争,深切地了解革命和革命群众。所以希望他努力克服粗糙、艺术性比较差等缺点。瞿秋白为《短裤党》的创作提供可贵的素材。《短裤党》是蒋光赤所写的小说中最好的一本。它塑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光辉形象,描绘了地下党如何发动工人群众举行三次武装起义,热情地歌颂了党的领导人和英勇无畏的工人阶级。瞿秋白读后赞赏道:“暴民专制正是短裤党那篇小说的理想。”小说中的杨直夫和秋华夫妇,就是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秋华”寓意“秋之白华”,“秋白的之华”^②。

① 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回忆与研究》第204页。

② 羊致之1980年6月13日的回忆;郑超麟:《我所知道的瞿秋白》(未刊稿)。

12月2日 给《布尔塞维克》的读者志益复信。这封信连同志益给瞿秋白的信，都发表于12月12日《布尔塞维克》第8期。瞿秋白在信中就志益提出的关于布尔塞维克党的民主集权制问题作了答复说：“什么是封建式的集权呢？如果说是上级党部或多数的决议应当无条件的执行，就算是封建式的集权，那就不对了。布尔塞维克的党，没有铁的纪律和集权的行动，是不能成功的。”同时又指出：“封建式的集权，必定是以领袖个人的意见威权来集权。这种现象，当然是党内所不容许的。”复信还回答了党内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问题、以及关于造就新领袖问题。他指出：“工农党员群众中，拥出新领袖，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决不能专从解放所谓机械的束缚去造领袖。工农的领袖，只有在严格的党内纪律和党的实际斗争中去造。谁能真正勇猛无畏刻苦的在布尔塞维克政策之上，率领起群众奋斗，谁便是新领袖。而这种行动只有在党的行动中表现出来。”

12月3日 作《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发表于12月12日《布尔塞维克》第8期。文章指出，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已经丧失了革命性，变成为反动的旗帜。文章对三民主义作了历史分析：“三民主义在共产党员未加入国民党以前，还是代表革命倾向的口号。三民主义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后，曾经一时期比较多带着些确定的革命内容，如打倒帝国主义、工农政策等等。三民主义在国民党清党反共之后，便自然要变成反革命的工具。”指出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已经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离开三民主义之革命化”。文章接着对蒋介石的所谓“三民主义”作了详细的剖析，并加以高度的概括，称它“是反革命政策的金字招牌”。

12月5日 《布尔塞维克》第7期发表瞿秋白撰写的社论《广东工农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

12月6日 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党团关系等问题。

12月7日 为《布尔塞维克》第8期撰写社论《反革命的国民党政纲和混战》，于12月12日发表。社论揭露国民党最近召开的中央会议预备会议中各派的矛盾和纷争，但同时指出，不论是汪精卫派，是蒋介石派，是西山派或广西派，他们“对于工农民众和帝国主义的政纲，都是非常之明显而一致的”，在他们的提案政策中，都有“共同反革命政纲”，那就是，取消“国民党以前的工农政策”，“不准罢工”，“对于农民，则连减租也不提起了”，要求“与第三国际主盟之苏俄绝交，并遣其领事出境”，而对于帝国主义，则是“提携友好”。

12月9日、20日和次年1月5日 先后作《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分别发表于12月26日《布尔塞维克》第11期、1928年1月2日《布尔塞维克》第12期、1月16日《布尔塞维克》第14期。文章批评孙中山学说中某些消极以至错误的理论观点。^①

12月10日 作《武装暴动的问题》，发表于12月19日《布尔塞维克》第10期。文章着重论述农村游击战争的前途，也论及城

^① 近几年学术界一些著述，在论述瞿秋白评价孙中山的问题时，认为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以后对孙中山的评价有所改变，对孙中山作了更多的肯定，其论据是1928年《布尔塞维克》第26～28期连载的署名立夫的文章《孙文主义？列宁主义？》，显然，他们认为“立夫”是瞿秋白的笔名。那篇文章在观点上及文风上，与这篇文章及其前后所作的相关文章，迥然不同。1988年初，笔者带着疑点，前去访问当年《布尔塞维克》编委郑超麟先生，他回忆说：“当年在上海的苏联人组成一个写作班子，给《布尔塞维克》写稿，他们写来的稿子，一律署名‘立夫’，……《孙文主义？列宁主义？》决然不是瞿秋白写的，我可以负责地为此判断。”之后，郑超麟撰写一篇文章题为《〈布尔塞维克〉上以‘立夫’署名的文章是苏联人写的》，发表于（北京）《党史研究资料》1988年第5期。

市工人暴动的问题。在论述农村暴动问题时，提出了在农村发展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战略思想。文章分析了中国革命在“斗争方式与发展形式方面”的特点，指出：“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不能成为一个整个儿阶级势力，他们内部分裂冲突，而没有组织成全国家中央集权政府的能力。因此，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所以客观上革命斗争的形势成为“各省农民此起彼落，比较散乱而不相呼应的暴动”。瞿秋白从各地农民暴动和土地革命的实践中总结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并指出这种战争是“客观形势中必然发生的初期暴动的现象”。他认为游击战争有很明显的意义：“当暴动初起，革命方面的武力还很少的时候，对于军事技术精良的敌人——反革命的大队人马，不用显然力不相敌的武装很不完备的甚至于徒手的群众大队，去硬冲硬打；而用分散细小的队伍，使敌人防不胜防出其不意的去袭击，——这就是游击战争，而非正式战争。”要求游击战争“不能和农民群众斗争的发动相离开”，认为“游击战争只有在……发动极广大的群众斗争之中，才能成为有力的武装行动”。瞿秋白还特别提出：“游击战争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他列举海陆丰农民暴动的发展的实例，来证明游击战争只有“进于建立革命地域”，才能取得斗争胜利。瞿秋白提出上述发展农村游击战争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割据思想，是对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作出的重大贡献。

12月11日至13日 根据中共中央11月17日的决定，张太雷、苏兆征、叶挺、恽代英、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部分武装工人于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宣布成立广州公社——广州苏维埃政府。公社设有主席和内务、外交、军事等委员会。苏兆征任主席（苏因病未到，由张太雷代理），张太雷任人民军事委员，恽代英任政府秘书长，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

令，杨殷任人民肃反委员，周文雍任人民劳动委员，陈郁任人民司法委员，何来任人民经济委员。公社发表了告全国工农群众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宣言书，并公布了多项命令。因敌我力量悬殊于12月13日失败，张太雷英勇牺牲。瞿秋白热情地赞扬广州暴动的历史意义。他说，“虽然，广州苏维埃政权只保持了三天，而列宁预言在殖民地国家内进行苏维埃革命的任务已经第一次见诸实行了”，广州暴动给1927年4月资产阶级叛变引起的“谁能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以确实的答复：“在苏维埃旗帜之下的中国无产阶级便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在这次暴动中，“表现出他们伟大的政治军事力量，表示出他们在目前中国社会之中，真正是最富有独立性、最勇敢、最先进的阶级”。^①

12月13日至15日 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议，讨论广东问题。会议决定派李立三前往广东，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事宜。

12月15日 《布尔塞维克》第9期出版“广州暴动特刊(一)”，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广东工农兵暴动建立苏维埃告民众》、《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等文件和文章，并发表了瞿秋白12月14日为广州工农兵举行暴动而撰写的社论《伟大的广州工农兵暴动》。社论热情歌颂12月11日广州工农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暴动的重要意义。认为这次暴动不管成功与否，但“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破天荒第一遭最伟大最壮烈的被压迫剥削阶级之暴动，则可断言的”，证明中国革命，“确实是一天一天的高涨”，“确实是深入而扩大”，“不仅没有失败，而且不是停顿”。社论还断言，“这次广州工农兵伟大的暴动，证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新战略是绝对正确的”，再次肯定“目前是直接革命的形势”。最后号

^① 《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1928年1月3日)，《布尔塞维克》第13期，1928年1月9日。

召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左”倾盲动主义，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全国工农兵将继广州工农兵而起，推翻豪绅资产阶级之统治，建立苏维埃中国！”

12月16日 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江西等问题。

12月18日 为《布尔塞维克》第10期撰写社论《广州工农兵暴动的信号！》，于12月19日发表。

12月24日 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取消原定的当唐生智在宁汉战争中败退时，湖北省立即举行暴动一事。会议确认：唐生智败退时，因为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根本形势并未改变，武汉不能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罗亦农对于湖北的政治指导并没有犯所谓机会主义的错误。^①会议还讨论了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问题，并于12月31日发出了建立党的监察机关的通告。^②

12月29日 为《布尔塞维克》第12期撰写社论《只有工农兵政府能解放中国》，于次年1月2日发表。

12月底 罗明纳兹被召回莫斯科。

本年一次，友人羊牧之在上海访问瞿秋白。在交谈中，羊牧之问瞿秋白还作画否？答：“此调不弹久矣。”接着绘了一幅《风竹图》：疾风中瘦竹数竿，虽被风吹弯了腰，但刚劲挺拔，风格高尚。上面题：“腰可弯，节不折”六字，下署秋白。瞿秋白把这幅画赠予羊牧之，并说：“留着互勉吧。”^③

① 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回忆与研究》上，第207～208页。

② 赵朴：《从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六次大会召开以前的组织状况》，《党史研究》1985年第6期。

③ 抗日战争时，羊牧之全家逃湘，这幅画被失落。

本年 一天晚上，羊牧之访问瞿秋白。瞿秋白从抽屉里取出一张他与列宁合摄的半身照片^①给羊牧之看。列宁立在中间，瞿秋白紧靠着站在右边。

本年 一次，前去设在前清两湖书院的武汉军事政治分校。回来后，咳嗽发热，人很憔悴，但仍约宣传部部分同志开会，研究和分析斗争形势，商讨宣传要点。会散后，同志们都劝他找个地方静养几天。瞿秋白听了，连连挥手，极有感慨地说：“现在没有安静的地方，只怪我身体不争气，搞政治又不在行，但轱已经套上，车，不得不拉。好在同志们了解我，有多少力，就拉多少路吧！”^②

本年 一天，与羊牧之去恽代英的住处。路上，瞿秋白对羊牧之说：“我属狗，可现在放着牛不用，偏要狗来耕田，搞不好，将来要抛荒（常州方言，欠收的意思）。”瞿秋白虽然力不从心，但还是克服种种困难，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常常赶写文稿，通宵达旦。^③

本年 在武汉时，每当听到宣传部或其他中央机关的同志私下议论陈独秀时，瞿秋白总是耐心地告诫他们：对任何同志，都不要背后议论，中央的一些大事情，是集体商定的，有错，我也有责任，不能推给独秀一个人。党的“五大”后，陈独秀仍任总书记，宣传部将党内反应汇集起来送瞿秋白。随后，瞿秋白就约这些同志谈话，指出：大会对独秀的错误，展开了批评，他本人也作了检查，而且有所认识，认识了就行，不准人家继续革命，不好。^④

本年 在武汉时期，恽代英常来瞿秋白住处商讨武汉军事政治分校的工作问题等。^⑤

本年 邓演达多次来瞿秋白住处作客。瞿秋白对邓演达很钦佩，赞赏他有才华，处事果断，了解工农群众，支持共产党。^⑥

① 这张珍贵的照片，几经变迁，早已丢失。

②③④⑤⑥ 穆之尔：《瞿秋白在武汉的一些片断情况》，《常州教育学院学刊》（文科版）1985年第1期。

本年 周佛海等常访问瞿秋白。后来瞿秋白告诉杨之华，说周佛海想恢复共产党党籍，但大家都认为他离党后，一直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打得火热，需要再考察一个时期。^①

本年 有一次杨之华组织妇女前去慰问从河南前线运回武汉的大批伤员时，瞿秋白抱病坚持随行。他听取包扎所负责人的汇报，探望伤员，与他们交谈，询问其家庭情况、前线战斗实况、官兵关系、沿途群众反映和对医疗的意见。还到厨房去查看饭菜，与管理人员共商改善伙食的措施，一直忙到傍晚才回去。^②

本年 工作间歇时，常与宣传部同志谈论常州的诗人。他很欣赏黄仲则的诗，每吟到“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及“怪底桃花半零落，江村明日是清明”等佳句时，辄眯眼摇头，怡然自得。他对秦少游的词也很欣赏，常提到《踏莎行》中“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认为此句虽由前人“日夜东流去，不为怨人住少时”脱化而来，但含意更深邃，更能使人遐想翩翩。^③

本年 极力提倡同志相互间不喊“职务”。瞿秋白说他在莫斯科几次见到列宁，都以同志相称，从没听到有人喊“列书记”、“列主席”。他要求同志们不要喊“部长”、“书记”，而喊“同志”或直呼其名。他认为这种风气，即使到革命胜利后，也应永远传袭下去。有一次他说，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定都南京后，沿袭了封建制度那一套，你“万岁”，他“千岁”，有的还要“万岁，万岁，万万岁”，结果满城万岁声，喊冷了广西老兄弟的心。前车之覆宜鉴。^④

本年 怀念故里。常与羊牧之谈家乡红梅阁前的银杏，天宁寺后的丛林，白云渡畔的垂杨。他对现子苍、舫舟亭、藤花馆、两当

①②③④ 穆之尔：《瞿秋白在武汉的一些片断情况》，《常州教育学院学报》（文科版），1985年第1期。

轩都很怀念。有时,他还谈到家乡的豆渣饼,深夜沿街叫卖的骆驼担、觅渡桥边的楼阁倒影和江阴贤庄的草台班戏。他常说,常州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要多办点学校,把教育办好。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再有20年、30年,革命肯定成功。到那时,我们也要60岁了,建设的事,让年轻同志去干,我们则回常州,力所能及地搞些公益事业。^①

本年 在张静江、吴稚晖等提议下,国民党的非常会议作出决定,开除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国民党党籍。^②

① 穆之尔:《瞿秋白在武汉的一些片断情况》,《常州教育学院学刊》(文科版),1985年第1期。

② 杨之华:《秋白同志年谱》(未刊稿)。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戊辰)

二十九岁

1月1日 和周恩来、罗亦农、王若飞、李富春、任弼时一起同陈独秀谈话,交换对中国革命的意见。^①

1月2日 在《布尔塞维克》第12期,发表悼文《悼张太雷同志》,评价张太雷革命和战斗的一生,说:“他加入党之后,便抛弃一切而为党工作。”“他的坚决与耐苦是一般同志所知道的。”特别赞扬张太雷的那种高度的党性。文章写道:“他受共产党的指挥而组织广州暴动,能够绝对服从党的命令,极其艰苦的工作,暴动的前后,他尤其是非常的劳瘁。”文章把张太雷的牺牲和后来的中国革命胜利连接在一起,说:“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

1月3日 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湖北问题。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湖北党内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长江局反对湖北马上暴动是正确的,认为暴动的条件,“不能单只看到统治者的崩溃,尤要注意工农群众革命的高潮和主观的力量”。会议决定湖北应迅速发展游击战争,造成割据的局面,并派李维汉作为中央巡视员去两湖巡视,停止原定的两湖同时举行阴历年关总暴动,并对两湖的暴动重新加以部署。^②

^{①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第132页。

1月3日 起草《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议决案》，发表于《布尔塞维克》第13期（广州暴动特刊）。

1月8日 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浙江、两湖问题。会议决定成立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为委员。^①

1月10日 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为组织局主任。^②

1月10日 为《布尔塞维克》第14期撰写题为《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的社论，发表于1月16日。社论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纠正郑超麟为《布尔塞维克》第11期所撰写的社论《苏维埃政权万岁》中一个论点。瞿秋白在社论中指出，本报第11期社论《苏维埃政权万岁！》没有经过编辑部主任看过，其论点，“用来解释世界革命中直接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苏维埃政权，一般的是对的。但是，论到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已经是无产阶级独裁制，那便不正确了。”瞿秋白接着运用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所阐述的原理，分析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及其阶级关系，他认为中国可以建立苏维埃，但政权的性质“必定是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制”，而“不是无产阶级独裁制”。

1月11日 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中央告湖北同志书》，指出，主张在武汉三镇马上暴动是错误的。

1月12日 作《蒋介石上台与肃清共党》，发表于1月16日《布尔塞维克》第14期。

1月12日 罗亦农和瞿秋白先后执笔起草了《中央通告第28号》，指出：“不问群众情绪的程度如何，不问党的组织力量如何，不问党与群众的关系如何，一味的主张‘暴动’，无往不是‘暴动’，这

^{①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第133页。

实在是一种盲动主义的倾向。”这一批评是正确的。但通告又不承认革命处于低潮，暴动条件根本不具备，认为只要主观上努力，暴动是可以胜利的，所以通告说：“广州暴动的胜利，主要是能发动群众，造成工农兵三大力量之结合；他的失败，主要的也是发动群众之尚不充分。”^①

1月18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召开中共“六大”的问题。瞿秋白作报告，提出在3至4月召开大会，地址考虑在澳门（多数人主张在香港）。会议决定：参加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为50人；大会议程除十一月扩大会规定者外，又增加了一项《党纲问题草案》。会议要求中央在两周内起草好下列的讨论大纲：

1. C.Y.问题由C.Y.中央起草；
2. 党务组织由罗亦农起草；
3. 工会问题由工委起草；
4. 土地问题由瞿秋白起草；
5. 党纲草案由瞿秋白、罗亦农起草；
6. 政策问题由瞿秋白起草。^②

1月20日 中共中央决定调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邓中夏去代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月24日决定由项英代理江苏省委书记。2月2日决定，项英“每次参加中央常委会议”；2月13日中央又进一步决定，“项英参加中央常委”。^③

1月26日 为《布尔塞维克》第15期撰写题为《最后的假面

① 《中央通告第28号》（1928年1月12日）。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事日志》，《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89页。

③ 赵朴：《从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六次大会召开以前的组织状况》，《党史研究》1985年第6期。

具》的社论,发表于1月30日。

1月27日 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广东、浙江等问题。

1月 在瞿秋白的支持和帮助下,蒋光慈、钱杏村、孟超、杨村人等发起在上海正式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学团体“太阳社”。瞿秋白同高语罕、罗绮园、杨匏庵等参加了成立会议。瞿秋白对太阳社的筹建和成立后的工作,曾提出了一些意见,同意和支持太阳社成立春野书店,出版《太阳月刊》。当时,瞿秋白经常不露面,对太阳社的一般活动都不参加,只通过蒋光慈与太阳社保持联系。^①

2月2日 致信中共山东省委,发表于4月8日《中央政治通讯》第22期。瞿秋白看到山东省委通信第4期刊登王××同志从狱中写出的一封信,信上说,“中国革命的领导在农民不在工人”,即中国革命应由农民领导,并说这是瞿秋白的观点。瞿秋白致信山东省委,明确指出这是王同志误记了他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基本观点,他说:“我在那里(指这本小册子)主要的意思:证明工人阶级应当怎样在民权革命中去争领导权,一直到建立工农民权独裁制,就是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与资产阶级争领导农民的领导权。”他重申,农民暴动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才能取得胜利,胜利了,才能得到巩固,“暴动的城市应当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

① 吴泰昌:《同英忆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中共上海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第173页,知识出版社出版,1988年。按:同英回忆说,瞿秋白经组织允可曾参加了太阳社。据郑超麟回忆,此事“不可靠”,他说:“那个时候,我曾同秋白见面,谈话,但从未听到他说起太阳社。……只有钱杏村的回忆说过瞿秋白参加了太阳社。但钱杏村的回忆是不可靠的。他也说我参加了太阳社。我并没有参加太阳社。”(见郑超麟:《谁领导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

领导者。”同时指出农民暴动的落后性，“如红枪会门、大刀会等原始的农民组织，或是无组织无策略（并且有许多原始的迷信）容易被敌人镇压，或者其中没有明显的阶级意识，而使领导权落于中小豪绅地主手中，他们便常常去和敌人妥协（……），甚至受骗而化为杂色军队”。因而他说，只有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为农民革命提出政权和土地的要求，进行“武装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有革命胜利的前途”。

2月3日 致信罗迈（李维汉）及两湖省委，指出：“无论湖南、湖北哪一省举行全省总暴动，在主观条件上必须要中心城市的群众工作做得很好，中心城市附近各县的农民群众普遍的起来，对于暴动均有相当的认识。”^①

2月6日 《布尔塞维克》第16期发表瞿秋白撰写的社论《从吴佩孚到国民党的杀人政策——一九二八年的二七纪念》。

2月9日 为《布尔塞维克》第17期撰写社论《国民党大出棺材》。

2月9日至2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九次扩大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明确指出当时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批判了罗明纳兹的所谓“不断革命”的错误观点，决议说：“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目前还没有出现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并指出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决议正确规定了当时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但这个决议，直到4月下旬，中共中央才收到。

2月10日 向共产国际作长篇的书面报告，共谈7个问题：“（一）中国的军阀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统治”；“（二）豪绅资产阶级的

^① 转引自叶心瑜：《瞿秋白生平史上的重大贡献》，《瞿秋白研究文集》第6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1987年。

进攻与工农革命潮流”；“(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四)工人运动中的问题”；“(五)农民问题”；“(六)兵士运动问题”；“(七)党内问题”。报告指出，广州暴动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武汉、上海、长沙以及江西、安徽等地实行“极严厉的白色恐怖”，豪绅资产阶级向工人进攻，又指出，在这种反动之中，各地“自发农民暴动正在蔓延发展”，“尤其是广东”，“各地的农民仍是奋勇的起来”，职工运动“仍有不断的经济斗争”，因此认为“革命的潮流显然不是低落的”。报告也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工人的思想状态，说：“最近上海工人之中，甚至工人同志之中，有一种兄弟团、姊妹团的组织。……他们讨厌共产党召集他们去开会，讨厌罢工，这些同志有时甚至说：‘现在不能暴动，你们甚么时候暴动我们是来的；你们要我们来开会、罢工、发传单，我们是不来的——这要砍脑壳的。’”还说湖北地方也有与上海“相象的现象”；“少数急进的分子是要实行恐怖主义”，“多数群众是畏惧与共产党相接触”。报告在谈到党内问题时指出，尤其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党的组织“受着很大的摧残”，“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简直丧失极大部分的干部，书记被杀，北方顺直也是如此”，“城市中组织有削弱的趋势……尤其是上海”，“乡村中没有支部组织，只有个人领袖”，“群众，尤其是上海，觉得党是他们之外的组织，希望党完全解决失业问题、救济问题”。最后指出党内还存在许多问题：“马哈衣主义。便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例如广东省委将广州失败原因，完全归到知识分子的成分上”；“原始的民主主义。……反对集权”；“先锋主义……各地 C. Y. 反党的空气，还是存在着”；“盲动主义。……以硬打手段逼迫工厂罢工”；“有许多同志以为现在既然提出苏维埃革命，那当然是社会主义，不会是民权主义独裁制而是无产独裁”；等等。^①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83年。

2月12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政治谈话会，讨论关于国内革命形势的估量问题，瞿秋白同周恩来、罗亦农、项英、王若飞、陈乔年、刘伯坚、郑覆他等人参加了谈话会。与会者就“中国革命潮流到底是高涨还是低落”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瞿秋白作了两次发言。他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了当前的严重困难，他说：“我们的斗争确是很困难的。八七会议后我当时想，以为或者可以似洪杨那样发展，但结果不然。现在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力量比敌人弱，需要休息一下，自然不是永久休息。”但后来一谈到革命潮流是不是高涨时，他又武断地说：“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整个的革命潮流是高涨的，农民自发的暴动是很多的。如果说是低落，工农一定是很灰心的。”又说：“自然说高涨，并不是今天说明天就要暴动的。”“我们可以说客观上的革命潮流是高涨的，一省与几省夺取政权的目标仍然是要有的。”^①周恩来，罗亦农也都强调中国革命是高涨的。

2月13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出席会者有罗亦农、周恩来、苏兆征、黄平、傅茂公、王藻文等。会议讨论了全总派代表团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问题，决定由苏兆征、何武（务）光（广东）、张之钰（上海）、赵武（北方）、陈国梁（武汉）五人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②

2月15日 为《布尔塞维克》第18期撰写题为《中国革命低落吗？》的社论，发表于2月20日。文章坚持“不间断革命”的观点，不承认中国革命已转入低潮，错误地认为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中国革命无疑在高涨”，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总路线：“发动群众斗争，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士贫民苏维埃的总策

^① 《政治谈话会记录》（1928年2月12日），转引自金冲及：《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

^② 赵朴：《从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六大大会召开以前的组织状况》，

略。”

2月16日 为了准备中共“六大”，中共中央召开部分中央委员谈话会。瞿秋白和周恩来一起，同张国焘、罗章龙、刘少奇、汪洋楷谈话，讨论当前国内政治形势问题。瞿秋白明确表示：“中央常委认为革命潮流一直高涨。”周恩来发言说：中国革命是不平衡的发展。他认为，依照日前中国工农很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的潮流并未低落，是高涨的。^①

2月19日 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广州起义和总政策等问题。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等继续强调革命潮流是高涨的。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起草《中央通告第36号》。通告指出：“目前统治阶级正在日益崩溃”，“革命是正在高涨无疑”，暴动后的武汉得“变为全国的革命中心”，通告附文认为：“中国革命既是高涨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策略，不但仍旧是目前的问题，而且夺取一省或几省政权的问题更加紧迫起来。”此外，还错误地批评了持正确意见的同志，说什么“有些同志竟有怀疑革命高涨的意见”，“例如上海，却说现在这种状况不但是上海革命潮流已低落，就是全国的革命潮流也已经低落了，这应当采取保守策略了”。指责这种意见“显然是错误的，显然是陷入机会主义的观点。”^②

2月20日 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知识分子作用等问题。周恩来批评了李立三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观点，他说：立三提出的在党的指导机关中把知识**分**子的作用降到极

^① 《张国焘在中共六大前的政治谈话会上的发言(1928年6月15日)》，转引自金冲及：《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中央委员谈话会记录(2月16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第136页。

^② 《中央通告第三一六号》及《附文》(1928年3月6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83年。

小限度的意见是不对的。党的改造是一个积极的无产阶级化的问题,对知识分子也应领导他们无产阶级化。

2月24日 为《布尔塞维克》第19期撰写题为《两个国内战争》的社论,发表于2月27日。社论指出,当时中国有两个国内战争,一个是人们所指的“南北军阀的混战”,另一个是工农贫民反对军阀统治的“国内战争”。社论说,统治阶级内部有无数的矛盾和冲突,必然要“互相混战”,从而又必然要“破坏一般民众生计”。社论指出,民众要摆脱贫困,必须进行“革命的阶级的战争”。社论认为,虽然大革命失败了,广州暴动也失败了,但工农群众“仍在全国继续这种革命战争”。特别举了海陆丰的工农暴动,说他们“已夺到政权”,并继续在和“反革命势力搏斗”,说他们“从古以来第一次在自己政权之下过新年”。社论号召全国工农群众要像海陆丰那样,认真的“武装自己”,“团结群众”,“准备暴动”,只有这样,才能“得着胜利”,“得着解放”。

2月27日 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上海等问题。会议决定由项英、王若飞、李富春、徐炳根、黄平组成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李硕勋代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3月5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讨论土地问题。

3月9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讨论两湖等问题。3月10,中共中央致信湘、鄂、赣三省委。

3月12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讨论江苏等问题。

4月初 译就《历史的唯物主义》(德国摩陵作),委托郑超麟送交上海创造社出版部,译者署名屈章^①。次年1月正式出版,印数2,000册。瞿秋白在译著前加了引言,对作者作了扼要介绍。他

^① 郑超麟1986年10月29日的回忆。

说,摩陵的名著是《德意志社会民主派其历史与学说》,他著这部书的时候,还不完全与社会民主派同一政见,但这部书已经很有科学上的价值,其论断纯粹是客观的。引言指出,后来摩陵与社会民主党日近,到19世纪90年代,入考茨基所办的《新时报》,当编辑,成了马克思派的理论家。瞿秋白认为摩陵这篇《历史的唯物主义》是“为唯物史观的简明解释”,可作中国读者初学马克思主义的“阶梯”。

4月2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由任弼时传达共产国际3月间关于召开中共第六次大会的决定。共产国际指定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立即赴莫斯科;并指定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参加党的第六次大会。中央常委会作出相应的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负责筹备召开党的“六大”,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人留守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5月起,各地代表陆续前往莫斯科。到6月中旬,多数代表到达了莫斯科。^①

4月中旬 主持召开《布尔塞维克》编辑委员会会议。会议根据创造社的请求,推派郑超麟去指导创造社的工作。^②

4月12日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再版。中国共产党党报委员会为该书写了序言,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是第一次比较涉及各方面的尝试。虽然这书中对于土地问题仍旧没有充分明晰的观点,然而他大致的讨论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前途,中国革命的党纲策略战术等问题。”序言还指出:“即使这书的论断(对于中国社会政治及阶级关系之马克思主义的分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事日志》,《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89、70页;叶心瑜:《瞿秋白在党史上的重大贡献》。

^② 《郑超麟回忆录》第177页。

析),其中关涉太复杂而详细的问题,还有许多未成熟的思想,不能认为定论——这些问题本来还要有更深的学理与有事实材料之研究——那么,至少,他是一本很重要的历史文件,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前之策略等问题的争辩。因此,我们决定将他出版。”在此之前,该书已在莫斯科出版了俄文译本。^①

4月15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罗亦农被叛徒告密,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望德里被敌人逮捕。21日在上海西郊英勇就义。罗亦农等人的被害,使瞿秋白更加反思,进一步认识到党组织已经不适应于秘密工作的特殊环境。

4月20日 作《卖国和剥削的战争》,发表于5月30日《布尔塞维克》第20期。

4月28日 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李维汉、邓中夏、项英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刚收到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大家认识比较一致,所以瞿秋白说:“革命性质以为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央是没有不同意见的。”但讨论到农村斗争同城市斗争的关系,即相互如何配合的问题,大家则有不同认识。有的认为,中国与俄国不同,“在中国形式(势)下很适宜的配合是很困难的,要这样必致引到乡村的等待,这是不好的。”瞿秋白说:“国际的意见是先配合后发动。中央以前的缺点是过去自然是无意中忽略了城市工作,但我们承认得很早,忽视工运也有其原因。”他认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以等到大会(指中共“六大”)讨论”。^②这次会最后决定起草一个通告,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二月决议。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第44号通告,表示“接受这一决议之一般方

^① 《六大以前》第670页。

^② 《中共中央第十二次政治局会议记录(1928年4月28日)》,转引自金冲及:《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

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间,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议决案必要的具体步骤”,承认盲动主义在城市“玩弄暴动”,在农村反映“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①号召全党反对和纠正盲动主义。至此,“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4月30日 秘密地离开上海去苏联。由上海乘船至大连,经哈尔滨,越过边境山区,一路通过不少关卡,始入苏境,于5月中旬抵莫斯科。随后,杨之华携女儿瞿独伊同李文宜(罗亦农爱人)一道也前往莫斯科。在苏联期间,瞿秋白夫妇都忙于工作,把女儿送进一家孤儿院,后来又送到国际儿童院。他们在莫斯科长期住在特维尔斯卡娅大街(今高尔基大街)刘克思旅馆。

5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第47号通告。这个通告是瞿秋白、周恩来出国前与留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经过共同研究作出的对国内工作部署。《通告》规定了关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组织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的9项具体办法。6月4日,中央又根据他们出国前作出的决策,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必须领导民主革命,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的盲动主义,指示红四军在湘赣边界以“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还指定以毛泽东为书记组成前委,在前委领导下组织以朱德为书记的红四军军委。

5月 中共中央通知各地区、各省党组织推派代表,或由党中央指定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6月1日 专著《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由中共中央出版。全书8万多字,全面地总结了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革命运动。

^① 《中央通告第44号》(1928年4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83年。

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简单的民权主义革命，主要的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而以彻底的土地革命为其社会的内容，有确定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的趋势。”剖析了中国各个阶级，特别指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只有中国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的土地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必须争得革命的领导权”。全面地总结了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着重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过去这种机会主义，应当要说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受三次失败之主要原因之一。”以专节回顾及论述“八七”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指出：“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机会主义斗争的新纪元”，“开辟了共产党的新生命”。同时，瞿秋白又指出党到后来犯了新的错误：“八七会议之后，除旧有的那些机会主义余毒还时时发现外”，“又发生了新的危险倾向——盲动主义（Putschism）。”该书最后还分析了中国社会政治状况，分析了当时中国存在着的五大矛盾，并指出：“这许多矛盾的错综纠葛，并没有得着丝毫妥协改良式的解决，并且更加深入与激烈起来。”进而根据历史的经验，提出了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和任务，指出了历史的沉痛教训：“工农兵革命的胜利，在中国要求长期的努力和牺牲，不是一击而中，可以如此痛快而容易的。”

6月7日 同苏兆征、周恩来召集已到莫斯科的近60名中共“六大”代表举行谈话会，讨论关于中共“六大”政治、组织、职工、农运等决议案的起草问题，确定于6月12日前后，成立大会秘书处和各个委员会，并开始工作。

6月9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中共代表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黄平等人，米夫和陈绍禹也在场。斯大林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他说现在中国形势不是高潮，而是低潮。李立三插话，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中国各地还存在着工人、

农民的斗争。斯大林针对李立三的观点，又补充他的意见，说在低潮时，也会有几个浪花。明确地指出，革命高潮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斯大林还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二月革命为例，加以说明。他强调地说：在任何时候，农民是不能领导工人和革命的，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①

6月14日、15日 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在莫斯科召集政治谈话会（实际上是中共“六大”的准备会议），瞿秋白同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关向应、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等21人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围绕着中国革命的形势、经验教训、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党的工作路线、城市和农村的工作、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谈到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问题时，瞿秋白坦然地说：“中央对国际决议^②是有不同见解的。”“然而中央与国际见解之不同尚未达到如何巨大的程度。所以可以不必提出于中国下层党部讨论，而且应当先和国际讨论，再交大会以及全国党部。”^③与会者还讨论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准备提交中共“六大”审议的政治报告。^④

6月16日 中共“六大”筹备处发出通告，通知：代表大会日期已近，17日下午召开预备会议，要求从速组织各代表团并选出

① 《周恩来年谱》第141页；《访问黄平记录（1980年7月8日）》；《斯大林谈话记录（6月9日）》，转引自金冲及：《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

② 指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

③ 《瞿秋白在六大前的政治谈话会上的发言》（1928年6月15日），转引自金冲及：《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

④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事日志》，《中共党史资料》1928年第3辑第90页。

负责书记。还通知：各代表及参加大会的同志均已编定号码，以后大会发言、领取物品，均用号码，不用真实姓名。^①

6月17日 晚8点，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大”正式预备会议，各省代表、中央委员、特约代表、C·Y·中央代表和指定参加者共6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大会议程，大会主席团、秘书处、代表资格审查员委员会的组成和名单。^②

6月18日至7月11日 在共产国际直接的领导下，瞿秋白同周恩来在莫斯科郊区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代表党员4万余人。^③

6月18日 下午，举行中共“六大”开幕式，主席团成员有：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蔡和森、邓中夏、苏兆征、向忠发、关向应等，布哈林、米夫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会词，指出中国革命从蒋介石叛变革命起，虽经“三次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中国工农群众，团结于自己的周围，与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作坚决的斗争，这一点是含有很伟大的历史意义的”，无数烈士的血，没有白流，创造了伟大的光荣历史。他说，在“八七”会议之后，党“开始走上了布尔塞维克的道路”，但还有“机会主义的残余”。他要求“大会全体同志都能充分的发表意见，使党得以纠正一切错误，成为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而消灭一切无产阶级的倾向”。

6月18日 晚，主持召开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共16人，会议讨论决定了大会议程、会场规则、议事细则。

6月19日 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长篇政治报告，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承

^{①②③}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事日志》，《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90、91、92页；廖盖隆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43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91年。

认中国共产党所说的共产国际犯有错误，批评了鲍罗廷、罗易、陈独秀、瞿秋白等人。

6月20日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共“六大”作长篇政治报告，又向大会提交一份约8万余字的书面报告，即同年6月由中共中央出版的单行本《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的报告》。他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就是以这份书面报告为基础，并作了发挥。从6月21日起，代表们用7天的时间，讨论了布哈林和瞿秋白的政治报告^①。大家畅所欲言，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批评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会议充分体现了会议主持人瞿秋白等人的民主作风。

6月21日 下午，苏兆征主持召开了中央“六大”主席团第三次会议，报告各个委员会的组成。根据决定，瞿秋白先后任大会政治、组织、职工运动、苏维埃运动、宣传、农民土地及湖南问题、南昌暴动等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并任政治委员会的召集人，负责起草大会的决议案。他先后参加了关于组织、农民与土地、职工运动等问题的讨论，并作了重要发言。

6月22日 中共“六大”通过由瞿秋白起草的、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法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贺电。

^① 先后发言者有：第五届中央委员周恩来；中央妇委邓颖超；团中央代表李子芬、华少峰；江苏代表项英、徐锡根、陈治平、王若飞等；广东代表李立三、王灼、周秀珠、江慧芳、苏兆征、阮啸仙等；广西代表胡福田等；浙江代表夏曦、章松寿等；湖北代表金茂怀、任旭、向忠发；湖南代表何资琛、丁继盛、陈海清、罗章龙等；四川代表刘坚予等；云南代表王茂廷等；顾直代表王藻文、王仲一、王子清等；满洲代表唐宏经、张任光等；江西代表张世熙等；河南代表李鸣等；安徽代表龚德元等；福建代表罗明等；特约代表张国焘；列席代表胡炳琼、胡大才、郭寿华等。

6月28日 在中共“六大”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瞿秋白在结论中，进一步检查了自己，分析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危害性及其所犯错误的根源。他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认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应由中共中央负责，而不能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至于中共中央的责任，究竟应由谁来承担，是否由陈独秀一人来负呢？他指出，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在政治意义上说还是应由他个人负责”，“在武汉他有机会主义的政策，妨害了甚至出卖了工人阶级”。但当时，中央政治局也有责任，应由中央政治局和他“共同负责”。同时，瞿秋白没有因此而抹煞陈独秀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认为陈独秀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指出，陈独秀“自办《新青年》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能说陈独秀个人犯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瞿秋白对陈独秀作上述的评价是公允的。

6月29日 在中共“六大”上，布哈林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

6月30日 在中共“六大”上，周恩来作《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之后进行讨论。瞿秋白发言时，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他说，现在党的阶级基础“异常薄弱”，在中共“五大”以前，知识分子占多数，工人分子占少数；现在知识分子虽然走了许多，可是工人比例降至10%，农民占绝大多数（80%）。他指出，不能因为是土地革命，就以农民作为党的阶级基础。贫农、雇农只有“接受了无产阶级的意识”，“无产阶级化”，才能“允许他入党”。要求今后应在产业工人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瞿秋白还指出，要正确处理党和群众的关系，党是工人阶级最先进的一部分，工会和其他群众团体，要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要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命

令主义。^①

7月1日 在中共“六大”上，李立三作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次日大会进行讨论。瞿秋白发言时，解释什么是绅士，他认为绅士都有官职，“甚至是科举的人”，他们属于“士大夫阶级，带有贵族性”；“资本主义侵入了中国后，商人渐成绅士了。商会会长及会董等都是绅士”。他谈到农民分化问题时，认为应当根据经济地位划分农民各阶层，这才合乎马克思主义。接着说明什么是富农、雇农、贫农、中农。指出“农村中最有力的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是最好的先锋”，要领导他们反对地主。对于富农，主张使其“中立”，因为事实证明，“富农与其他农民无大的利害冲突”。他反对农民运动中的乱烧乱杀的行动，他说：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大烧大杀不是我们革命的目标”。^②

7月4日 晚7点，蔡和森主持召开第十一次主席团会议，出席会议者19人。会议讨论决定了关于六届中央委员选举等问题。根据决定，瞿秋白同蔡和森、李立三、苏兆征、项英、余茂怀和共产国际代表共7人组成选举委员会。

7月6日 晚，职工运动决议草案讨论结束后，瞿秋白发表讲话，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武汉时期职工运动总方向是“脱离了阶级斗争”，甚至犯了“阶级妥协”的错误。认为当时革命还没有“新的高潮”，但革命高潮“快要来到”。谈到罢工问题时，他指出，命令罢工，或命令不罢工，都是错误的，都不是“政党的行动”。关于黄色工会问题，他认为对待黄色工会与对待官办工会要有区别。凡有群众的黄色工会，要加入，去争取群众，领导群众，反对黄

① 《中共六大关于组织问题讨论的记录（1928年6月30日）》，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

② 《中共六大关于农民土地问题讨论的记录（1928年7月2日）》，存中央档案馆。

色工会领袖的“妥协与出卖阶级行为”；至于对待反动的官办工会，则是“打倒他，暴露他”。他特别强调，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铁路工人、海员、五金工人、大工厂工人等产业工人身上，忽视这一点“是危险的”，但同时指出，也决不要“丢弃了手工业工人”。此外，还谈及委派制、工厂委员会、团结小资产阶级等问题。^①

7月9日下午，在中共“六大”上，宣读由他起草的政治决议案^②，经讨论修改后，一致通过。决议案通过时，全场掌声如雷，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并高唱《国际歌》。政治决议全面总结了革命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革命性质，提出了党的总路线和主要任务。明确规定：“党底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决议不仅进一步批评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而且还着重批评了“十一月扩大会议”关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决议指出，十一月扩大会确定土地问题的策略，准备武装起义，是非常对的，但它“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不正确地采用了‘不断革命’的名词，于是就解释革命是不断高涨着，由此就得到不正确的策略”，“过于忽视敌人力量”，这些就“成为盲动倾向底根据”。瞿秋白再次分析了盲动主义及命令主义的危害性。

瞿秋白还向大会宣读《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关于党纲的决议草案》、《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草案》等，并获得大会通过。《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反映了瞿秋白、周恩来等人对国内党的工作十分关心。《电稿》及时传达了中共“六大”的基本精神，要求“坚决反对盲动主义，决不能削弱（对）农民的游击战争之指导。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及加紧组织红军。”提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统一群众、团结群众于党的主要口号，加紧日常工作，尤其是城

^① 《中共六大关于职工运动问题讨论的记录（1928年7月6日）》，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

^② 米夫、布哈林作过修改，但之后，瞿秋白又修改了一次。

市产业工人之中的工作。”^①

7月10日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瞿秋白同向忠发、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等23人当选为中央委员，邓中夏、罗章龙等13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7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瞿秋白同周恩来、向忠发、苏兆征等出席了大会闭幕式。向忠发致闭幕会词，少共国际代表讲话，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讲话，新中央代表苏兆征演说，湖北、湖南、C·Y·代表分别致词，周恩来、王若飞等分别讲话，最后由执行主席向忠发宣布大会闭幕。

中共“六大”在党的历史上有重大的功绩。它全面总结了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比较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斗争任务和革命策略。实践证明，中共“六大”提出的革命任务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缺点和错误是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因而仍然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并列起来，错误地断定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城市小资产阶级也由动摇而堕入反动营垒。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重要意义等问题，仍旧认识不足，继续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

7月17日至9月1日 同苏兆征、周恩来、王若飞、邓中夏、蔡和森、张国焘等30余人组成一个大型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职工大厦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瞿秋白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决议案起草委员

^① 《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1928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

会。最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7月18日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六大”上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随后，大会根据布哈林的报告通过了《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提纲^①。提纲提出了当前世界形势已发展到“第三时期”的理论，认为“这个时期必然要通过资本主义稳定中的各种矛盾的不断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瓦解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指出当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制止日益逼近的帝国主义战争，保卫苏联，反对干涉和瓜分中国，保卫中国革命和殖民地起义。”强调“右倾”是当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同时又指出：在中国存在着“左”倾冒险主义情绪，转而又说，“现在脱离正确路线的倾向是右比‘左’更甚”。^②这一提法导致当时中国“左”倾冒险主义日益加剧。

7月19日 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由共产国际直接提名而组成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政治局设委员7人，候补委员7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设委员5人、候补委员3人。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接受布哈林的提议，决定瞿秋白、张国焘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讨论这一决定时，周恩来提议，他们驻共产国际应是短期的，并应：（一）在短时间内为中国共产党起草出党纲；（二）将近几年中国革命的情况、斗争经验写成小册子向国内外宣传介绍；（三）将各国和国际革命斗争的经验介绍给中国共

① 报告提纲草案由布哈林起草后，受到联共（布）代表团的批评，复经重大修改，始获联共（布）中央的同意。故通过后的报告提纲，反映了联共（布）中央的意见。报告提纲于1928年8月29日第45次会议上通过。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570、573、3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

产党；(四)沟通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以及各国共产党的关系。^①

7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了中央常委和各部的组织与分工。^②

7月26日 共产国际“六大”代表开始讨论布哈林的报告。瞿秋白就国际性问题结合中国革命实际作了发言。他对共产国际提出的所谓“第三时期”的理论，表示不理解，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承认“现在总的形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稳定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日益增长。我们面临着战争危险”。同时又指出，共产国际“只是轻描淡写地谈了一下新经济形势对农业、对亿万农民现状的影响。这方面的分析是浮光掠影或不够清楚的。”因此，瞿秋白认为：“既然我们在提纲中得不到有关农业、殖民地和太平洋问题的明确答案，那么，所谓第三时期和第二时期似乎就区别甚微了（有人插话：对！）。”布哈林批评了瞿秋白这一发言，说他认为“第二时期和第三时期之间没有区别”的看法，是错误的。瞿秋白作解释：“我根本没有说第二时期和第三时期之间没有区别”，说他的意思是要求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事日志》，《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112页；《周恩来年谱》第144、145页。按：（一）当时有委员建议，“应淘汰原有政治局委员，另行选举新人参加”，认为“旧有委员都犯有严重错误，而且彼此不和谐”。布哈林当即指出：这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除没有参加大会的人（指陈独秀），只好置之不论外，其余的都有资格参加政治局。他认为，如果没有原来政治局委员参加，或者没有反对过去中央的人参加，都不能组成一个有力的政治局。（二）共产国际“六大”以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张国焘，同中国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及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王若飞共五人合组为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瞿任团长，张任副团长。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事日志》，《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113页。

对“这两个时期的区别，必须更清楚、更确切地分析”，^①要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瞿秋白在谈到倾向问题时，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观点，即右倾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他联系中国革命实际说：“在中国确实存在着很大的盲动主义危险。……但是在济南事件以后，当城市反帝运动开始有些活跃，小资产阶级群众趋向‘左’倾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发生新的右倾——机会主义重新抬头。”^②

8月14日 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在共产国际“六大”上，作《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报告》。8月15日和8月23日，瞿秋白先后作《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及关于这一问题的总结发言。他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和基本经验，着重阐述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特点、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革命动力、土地问题、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革命统一战线、革命领导权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他说：“我们把中国革命称作伟大的革命，但是，你们都知道，领导这场革命的是一个还很年轻的共产党。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便可以看到，我们犯了多少机会主义的错误，尤其是在武汉时期。”瞿秋白肯定了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经验不仅对殖民地国家，而且对各国共产党都可引为借鉴”。^③

8月15日 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致信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对米夫组织陈绍禹宗派集团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及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制造所谓“江浙同乡会”反革命组织案，提出了意见，对苏联当局处理这一事件的做法表示有不同看法。同时给中共中央写信，说明有些江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79、411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83页。

③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432页。

浙籍的同学对某些问题持有不同观点，不能认为是一种有组织的宗派活动。后来，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布)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瞿秋白和周恩来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共同审理这个案件。审查结果作出结论：所谓“江浙同乡会”，事实上并不存在，否定了陈绍禹制造的假案。^①

8月 译就《无产阶级政党之政治的战术与策略》(司徒垮夫作)，同年由新青年社出版。该书的翻译和出版，对指导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当年1月9日第13期《布尔塞维克》刊登的《出版预告》对该书作了介绍：“中国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革命，但究竟那几种阶级能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同盟者，及此斗争的形式与方法又当如何？这一部书就是从理论上答复这些问题的。”1938年由新时代出版社重版。

8月至9月 翻译《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②的小说》(P·帕甫伦珂作)，完成于苏联敖德萨。瞿秋白生前未发表，1935年9月16日《译文》第2卷第7期据鲁迅保存的手稿发表了出来。

9月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产生了由布哈林、库西宁、莫洛托夫、皮亚特尼茨基、瞿秋白等人组成的政治秘书处^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7页，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1989年。按：1927年春，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的斗争，使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国劳动大学”)第一任校长(托派)拉狄克被免职，遂由副校长米夫继任校长。米夫非常欣赏陈绍禹等人，支持他们在学校进行宗派活动，陈绍禹等人捏造事实，说学校里有一个所谓国民党“江浙同乡会”的反党小组织，中共“六大”结束之后，他们乘有些代表还未回国的机会，举行几次报告会，陈绍禹在会上作反对“江浙同乡会”斗争的报告，向忠发回国前，还郑重其事地要求瞿秋白等人要重视这件事。

② 现译莱蒙托夫。

③ 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1919—1943)》第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

瞿秋白自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国际主要成员以后，经常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东方部的会议，特别是讨论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更非到不可，有时还为共产国际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等。

9月上半月 偕夫人杨之华随出席共产国际“六大”的各国代表到苏联南方地区参观，游览了巴统（黑海商港）、第比利斯（南高加索工商业中心）、巴库（黑海石油区）、罗斯托夫（黑海商港，北高加索铁路中心）、乌法（黑壤农村区）、哈尔科夫（工商业区）等地。因筹备和主持召开中共“六大”，紧接着又出席共产国际“六大”，工作劳累过度，旧疾复发，在苏联南方参观后，被迫留在巴库休养。

9月14日 在巴库疗养期间，给当时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谈到他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的收获“的确是不少”，“政治上的认识……增加很多”。着重讲了如何贯彻中共“六大”的总路线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意见。在职工运动方面，他明确提出，要竭力防止和纠正脱离群众的坏倾向，不要“空洞地否认国民党及黄色工会之影响”，而要深入地“做群众的党团工作”，要坚决“肃清一切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的余毒”，“反动盲动主义复活与机会主义，发展党内群众的讨论”。在农民运动方面，他认为，“苏维埃区域中必须实行土地革命，创造红军，领导一般农民的琐小斗争到推翻豪绅政权的斗争——游击战争”。为了克服“左”右倾机会主义，他强调了加强干部教育的重要性。瞿秋白还向周恩来讲了他在养病期间的工作计划，他说：“理论的重要与教育干部的重要是显而易见的。我将在最近两礼拜间，想一想此地的工作计划：①马列选集，②国际经验，③国际时事，④苏联时事，⑤中国革命问题的编译。至于国内则此次决议的通俗（宣传）宜速进行。”他在信中建议由一些同志负责进行通俗地宣传“六大”决议的工作。不久，瞿秋白带头写了一本通俗政治读物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出版，用群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中国人民所以要革命的道理、革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革命的前途及今后的革命任务和政策、策略。^①

9月 中共“六大”选出的新中央在上海开始办公。总书记向忠发并不掌握实权，大权由宣传部蔡和森掌握。蔡和森在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前，曾征求瞿秋白的意见，《布尔塞维克》交给谁编好，瞿秋白推荐仍由郑超麟继续编下去。蔡采纳了瞿秋白的意见。不久，李立三掌握中央实权，同郑发生了几次磨擦，结果排挤了郑，派潘文育接替郑的《布尔塞维克》编辑部的工作。于是郑辞职闲居。后来陈独秀对彭述之说：“如果瞿秋白在中央，郑超麟不会落入这个命运的。”^②

10月1日 作《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广州暴动周年纪念》，发表于12月1日《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2期。

10月初 周恩来离莫斯科回国。

10月4日 作《战争暴动革命之时代》，发表于1929年1月1日《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3期。

10月13日 作《世界无产阶级之独裁——共产国际纲领问题》，发表于1929年3月1日《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5期。

10月中旬 经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的提议，组织了包括斯大林、米夫和另一位斯大林身边的中国问题的秘书在内的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负责草拟对中共中央的指示。东方部讨论有关中国问题的会议记录，统交这个三人委员会处理。

11月初 一天晚上九点，斯大林约瞿秋白、张国焘在他的办公室会谈中国革命问题，时间达3小时之久。斯大林问：像宋庆龄这样的人，如果在中国大城市的街上，发现了共产党员，她会不会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88、89页。

^② 《郑超麟回忆录》第271页。

叫警察逮捕这位共产党员？又问：陈独秀是否能筹集一笔资金和获得其他条件，来办一张报纸？前者是为了解中共是否还有非共产主义的同盟者；后者是为了解陈独秀在中国是否有反对共产国际的活动能力。当然，他们要作回答。瞿秋白还向斯大林报告了一些东方部关于中国问题讨论的基本内容，并陈述了他个人的见解，请斯大林予以指示。斯大林认为有中共“六大”的决议已经够了，他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斯大林和张国焘交谈时，瞿秋白为他们作翻译^①。

11月上旬 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致信共产国际，提出要给中共中央发一指示，其内容是强调中国革命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不可过分估计新的高潮会迅速到来，要中共中央继续执行中共“六大”决议。东方部根据这个指示信的要点，就中国苏维埃区的经济问题、对待俘虏问题等，分别作出了决议和指示。^②

11月底 被蒋介石排挤的汪精卫派，同陈公博、顾孟余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一般称作改组派。他们标榜“恢复1924年国民党改组精神”，“提高党的权威”，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推翻蒋介石统治，重建革命政府”。实际上，他们是同蒋介石争权夺利，同时，也反对共产党“作乱”。瞿秋白曾发表文章对汪精卫及其改组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本年 一天傍晚，同曹靖华在莫斯科大教堂附近的莫斯科河畔散步。他们边走边谈，瞿秋白给曹靖华介绍国内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各方面的情况等。曾谈到王一飞、罗亦农等人的被害，最后又谈到中国迫切需要苏联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这时，瞿秋白要求曹靖华专力进行这方面的介绍工作，并当作庄严的革命的政治任务来完成。^③

^{①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424~427页。

^③ 曹靖华：《罗汉岭前吊秋白并忆鲁迅先生》，《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1日。

本年 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来到莫斯科以后，为了集中精力工作，把女儿独伊送进幼儿园。独伊是杨之华前夫沈剑龙所生。可是，瞿秋白对待独伊完全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每逢周末或假日，和杨之华前往幼儿园看望独伊，并带去独伊爱吃的食品等，同独伊痛快地尽情地玩，共享天伦之乐。夏天，在树林里采蘑菇，给独伊画图、折纸。冬天，同独伊在厚厚的雪地上玩雪车，独伊坐在雪车里，瞿秋白拉着雪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跑不动，有时假装摔一跤，惹得独伊拍手大笑。杨之华见到瞿秋白如此疼爱独伊，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后来，杨之华深情地回忆说：“秋白无论在我和独伊的面前，或者在别人的面前，总不使人感到独伊不是他亲生的女儿。独伊从小也没有感到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① 这是何等高尚的革命情操呵！

^① 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辑，1958年。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己巳)

三十岁

1月1日 于《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3期发表译作《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与共产党之任务》(德曼尔作)。

年初 中国劳动大学附属中国问题研究所成立,不久创办了学术性的俄文季刊《中国问题》,由瓦尔加、威格尔、库秋莫夫、马札亚尔、米夫、斯特拉霍夫^①和沃林组成编辑委员会,沃林为研究所所长兼编辑委员会主任^②。瞿秋白在《中国问题》第2、3期上先后发表过论文《中国职工运动问题》、《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

1月 于《共产国际》第1期发表《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欢呼“毛泽东红军万岁”!

春 因肺病加重,赴莫斯科南面数百英里的马林诺列宁疗养院休养。休养期间常与黄平一道学习滑雪^③。

2月7日 给杨之华写信。叙及“精力不够”,想帮助她学习,可是“能做到的是如此之少”,“念念只想如何的弄好生活的秩序”。^④

2月8日 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致中共中央关于中国

① 这是瞿秋白1928年到苏联以后取的俄文化名,全称是维克多尔·斯特拉霍夫,意思是战胜恐惧,克服困难。

② 《中国问题》从1930年第2期起,由米夫任该刊编委会主任。

③ 《访问黄平记录》。

④ 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辑,1958年。

革命形势、前途和任务的指示信。^①指示信批评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认为立刻就会有革命高潮和另一部分同志认为“革命高潮将长期推延”，都是不对的。指出，“在当前情况下，特别危险的是右倾”，“这种右倾，在党内和党外职工运动中都存在，如失败主义情绪和合法主义倾向等”；同时又指出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左”倾的残余。指示信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威信和领导作用；争取群众，积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2月14日 在列宁疗养院给在苏联森林学校读书的女儿独伊写信，表达了他对女儿的怀念和关切之情。说自己的病“快要好了”，不久要回莫斯科，到时，一定要去看她。瞿秋白经常给女儿写信。

2月24日 苏兆征在上海病逝。26日，中共中央电告共产国际。正在列宁疗养院疗养的瞿秋白获悉这一噩耗，“震惊不堪”。他在给杨之华的信中，赞扬苏兆征是“最直爽、最勇敢”的工人领袖，他的死，是党的一大损失。苏兆征病逝后，瞿秋白经常责备自己：“我没有坚持说服他留在莫斯科，是一个不能挽回的错误。”^②

2月26日 在列宁疗养院给杨之华写信，说这几天“兴致好些”，“要运动，要滑雪，要打乒乓”，“想着将来的工作计划”，还想着如何帮助杨之华“读俄文”、“练习汉文”等。同时附一封给女儿独伊的信。

2月28日 给杨之华写信：“最近精神觉得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正经的工作及书，都不能想起，不能想做。”

2月 拟订了《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同年6月，署名 Страхоб，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共印200份，

^① 杨之华：《秋白同志年谱》（未刊稿）。

^② 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3辑，1958年。

样本保存在列宁格勒国立公共图书馆东方部。后来得苏联汉学家郭质生的帮助，又对方案作了修改，于同年10月10日改定后，更名为《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于1930年春署名瞿维托，发表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附属中国问题研究所主办的《中国问题》季刊第2期上。后又交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用汉文、俄文和拉丁化汉文印刷，共印3000册，它的正文分三个部分：（一）谈汉字采用拼音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二）谈标明声调是否必要；（三）方案和字母的拼写法。正文之后，有两篇汉字与新文字对照的读物，还有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威妥玛式拼音的对照表，以及《汉语拼音表》。这次出版的方案较前有所改进，放弃了标调。此书出版后在华侨中试行，引起文化界广泛的关注。

3月13日 在列宁疗养院给杨之华写信，叙及身体的重要，希望夫妇俩都要“经常的注意身体”，“养成健全的身体和精神”。

3月15日 给杨之华写信，信中题赠女儿独伊诗一首^①。把独伊比作蓓蕾，祝愿她茁壮成长，表现了瞿秋白对革命下一代的热情关怀，寄以美好的希望。

3月19日 在给杨之华的信中，述及汉字改革问题。瞿秋白在疗养期间，继续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他在信中说：“我最近又常常想起注音字母，常常想起罗马字母的发明是很重要的。”“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这或许要五十年、一百年，但发端是不能怕难的。”他要求杨之华同他“一起研究”，帮他“做许多工作”。^②

3月 译苏联著名的《三八妇女节之歌》，以纪念国际三八妇女节。

4月2日 作《“清校问题”》长篇报告，严肃批评中国劳动者

①② 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辑，1958年。

共产主义大学支部局，明确指出：“我们向来不赞助支部局的那些政治上的错误。”“支部局不但不改正他的政治错误，反而利用托派的挑拨手段，客观上无论如何不能不是助长派别纠纷——扩大学校中的派别纠纷到中国党里去，牺牲一部分学生同志及对中国党中央委员会的派别成见，想借此把中大不能保证（培养）布尔塞维克干部的糟糕情形的责任推御到中国党的代表团身上。这是我们要提出极端严重的抗议，我正式提到国际监察委员会的。”^①

5月1日 于《真理报》头版，发表题为《中国革命万岁！》的贺词，署名瞿维它，并附中文，庆祝国际五一劳动节。贺词说，中国劳动者将继续向苏联兄弟学习革命经验，确信中国工人阶级“在新的革命高潮之中，一定在国际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精神之下获得最后的胜利，建立苏维埃的中国”。

6月初 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召开的会议，讨论中国富农问题，并参与起草《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1929年6月7日）》。当时，苏联正在加紧反对富农。以米夫为代表的共产国际，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党，也要推行反对和消灭富农的严厉政策。瞿秋白在他起草并经大会通过的中共“六大”决议中，曾指出，中国在农村“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无产阶级要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不要“故意加紧反富农的斗争”。^②在这次东方部关于中国富农问题的讨论中，瞿秋白坚持中共“六大”决议的精神，反对米夫的意见。他们之间，“反复辩难，相持不下”。最后由于某种原因，瞿秋白不得不勉强同意接受共产国际这种错误意见。自然这个意见反映到《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里。

① 转引自陈铁健：《瞿秋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

② 《瞿秋白选集》第438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

6月26日 于《真理报》发表《中国共产党现状》，署名瞿维它，迎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召开。文章总结了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两年来的基本政治形势，指出中国工农运动已取得初步的恢复，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方志敏所领导的游击队活跃在湘、赣、闽等地区，上海、天津等地的工人运动继续在开展。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同时，应该开展反对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斗争”，开展反对“已经露头的右倾思想的斗争，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进而要求在党内实行起极其严格的集中和纪律，“使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得到充分的利用，使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得到完全彻底的贯彻”。^①

6月 作《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及东方》，发表于《共产国际》第23、24期。

夏天 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举行学年总结大会，中共代表团与米夫、陈绍禹集团之间发生一场激烈的斗争。瞿秋白出席了大会，并发表演说，批评了陈绍禹集团，支持了大多数同学对米夫、陈绍禹等人的斗争。

7月3日至19日 同蔡和森、邓中夏、陆定一、王若飞等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瞿秋白同斯大林、莫洛托夫、库西宁等12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7月6日，瞿秋白在会上发表题为《共产国际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的演讲^②。在当时苏联反对右倾斗争的影响下，承认共产国际中存在“右倾危险”，他说：“我以为共产国际中右倾危险，不仅从宗主国的问题中表现出来，而且也从殖民地问题中表现出来”，认为“机会主义者的殖民地弟弟，比其宗主国的哥哥走得更远”。

^① 安徽大学：《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大事提要》第208页。

^② 演讲词发表于1930年1月15日《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1期。

7月10日 国民党破坏中苏协定,张学良部队占领中东路,非法解除中东路苏联局长、副局长等人职务,查封苏联远东贸易局等机构。中东路事件发生后,瞿秋白组织学生到远东去教育被苏联红军俘虏的张学良军队士兵。

7月11日 中共中央致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定由瞿秋白、张国焘、陆定一、王若飞、蔡和森等组成党纲起草委员会,以瞿秋白为书记,负责起草中共“七大”的党纲。中央要求:“限三(个)月完成,六(个)月内送中国,委员会的人得由代表团与东方部决定就地增加,俄国同志的加入亦然。”^①此信于12月才寄到莫斯科。当月15日,瞿秋白复信中央,建议党纲起草委员会由“莫洛托夫、库西宁、米夫、沙发洛夫、秋白、中夏、国焘七人”^②组成。

7月30日 于《亚洲赤色海员》第9、10期合刊发表《纪念五卅的责任》,署名双林。

8月19日 作《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约3万5千字,次年3月15日发表于《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2、3期合刊上。这篇论著简要阐明了中国工人组织的产生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揭露和谴责了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压榨,着重针对工人运动中存在着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详细地论述了当前工人运动的根本任务和斗争策略。瞿秋白在论著的结尾总结性地指出:“中国工会运动的布尔塞维克的策略,就是:用全力去巩固和发展秘密工会;建立下层的组织上巩固团结的小组;参入国民党黄色工会去争取群众;创造赤色工会的召开的方式;参入一切同乡性质小团体性质的兄弟姐妹团等,运用他们的线索而改造他们到工会小组的工作路线上来,广大的坚决的去实行斗争委员会罢工委员会的组织职工运动的方法,实行工厂委员会的运动,以及女工代表会和青工童工会议等运动;实行反对黄色领袖,反对强迫仲裁……”

^{①②} 转引自陈铁健:《瞿秋白传》第350页。

等的斗争；特别注意重要的工业（纱厂，铁路，矿山，海员），同时努力在手工工人，店员之中工作，在旧式行会之中工作和行会主义斗争，而争取手工工人群众的领导；这样去争取每一次劳资冲突和罢工的领导。”这些意见，无疑对纠正当时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错误，进而正确地开展工人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8月24日 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由于叛徒白鑫的出卖在上海被捕。

8月 与瞿景白合编《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①

8月 翻译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党纲》，不久又翻译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这两个重要译文汇辑成册，于1929年11月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共产国际党纲及章程》。

9月4日 作《世界革命高潮之前——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体会议》，发表于11月《共产杂志》创刊号，及12月5日《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1期。文章评述了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会对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后一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及对党内状况的考察，认为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体会议完全证明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决议的正确，证明大会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指出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很明显的表示着高涨起来的形势”，但也承认“现在还没有直接的革命形势”。文章在论述殖民地革命运动时，认为中国当时虽然“还没有革命的高潮”，但正在“走向革命的高潮”，指出：“中国一年来的罢工潮流日益紧张，农民暴动和游击战争继续发展。”并论述了中国革命对于东方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所发生的“极伟大的影响”。文章最后指出，世界革命高潮之前，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争取群众，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以便“去解

^① 丁景唐、文操：《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第52页。

决工人运动的新阶段上阶级斗争剧烈起来的新任务”。

9月6日 给中共中央写信,对彭湃、杨殷等同志被捕一事,表示极大的关切。他说:“得彭、殷被捕之电,究竟情形怎样?此事宜亟设法,究竟用武力劫狱,或贿买狱卒,或其他方法,救济,你们应能就地决定,如需特费,宜速来电声明。”^①9月15日再给中央写信,又问及彭、殷的情况,万分焦急地问:“彭、杨如何,急死人!!”^②

9月8日 作《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发表于11月《共产》杂志创刊号及1930年5月15日《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文章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枢纽,是农民的土地革命。”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取得对于农民群众的领导权,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才能够真正彻底地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文章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村经济特点,及农民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关系。论及富农问题时,一方面表述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一方面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比较详尽地剖析了中国富农的特性和阶级本质。他认为“中国的富农,极少实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而多数是地主封建剥削系统的代表”。瞿秋白指出:在中国农村,“豪绅地主和农民的对抗,是主要的矛盾”,党要以“贫农为基本力量,巩固和中农的联盟”,“与富农争取对于中农群众的领导”。他批判了“整个的中国农民运动都成了反对富农的斗争”的错误观点,认为:“这是表面上左倾的空谈,实际上亦是右派的中心政纲”,“这是抛弃反对地主的斗争,投降地主,而要实行所谓‘乡村经济主义’的策略”。^③当时,富农问题的争端,影响很大,瞿秋白被视为以所谓“右倾路线”与所谓“共产主义的正确主张”相抗衡。米夫一伙更多方攻击他,指责他联络鲍罗廷和其他不

①② 转引自陈铁健:《瞿秋白传》第346页。

③ 《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第146、134~135页。

满共产国际的分子，互为声援，不忠于共产国际。

9月下旬 在莫斯科获悉彭湃、杨殷等人于8月30日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噩耗，对彭湃、杨殷等同志的牺牲表示无限的悲痛，对敌人的罪行表示无比的愤慨。他抱病于深夜写了《纪念彭湃同志》的悼念文章，发表于苏联《真理报》上，沉痛地追忆彭湃革命的一生，充分肯定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贡献，热情赞扬彭湃的高贵的革命品质，文章说：“他是做群众运动工作的模范，他是真正能深入到群众里面去的同志。他的勇敢、果决的精神，工作的能耐，在从来未有的中国白色恐怖之下工作，这是党内同志无论那一个都是极端的佩服他的。他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的、顶尊重的领袖，在海陆丰农民的眼中，看得像父母兄弟一样的亲热。恐怕除湖南农民的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文章指出：“彭湃同志已经死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极大的损失啊！”号召大家：“要完成彭湃等同志开头做了的事业！”接着，瞿秋白又在莫斯科编辑出版了《纪念彭湃》一书，内容包括彭湃的遗著《海丰农民运动》。瞿秋白的《纪念彭湃同志》一文，经他修改作为该书的前言，署名屈维它。他对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这长篇报告作了很高的评价，称誉这本著作“是中国农民运动第一本最有价值的著作”。^①他还要求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要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彭湃的这篇报告，赞颂毛泽东是湖南农民中的“王”，彭湃是广东农民中的“王”，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和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②

10月5日 作《中国革命新高潮和国民党改组派》，发表于1930年2月《共产》杂志（中文）第2期，后改题为《论国民党改组派》，发表于同年5月15日《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文

^① 《瞿秋白选集》第446、448、449页。

^②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73、74页。

章对汪精卫改组派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指出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已经代表大资产阶级”，而汪精卫国民党改组派却成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瞿秋白说，当时汪精卫“并没有取得政权”，“落到了所谓‘中间营垒’，他们对于豪绅地主买办及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得不立在‘在野党’的地位。”文章具体地分析了改组派的阶级实质，指出他们既是“南京政府的反对派”，与蒋介石争权夺利，同时又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政纲蒙蔽群众，努力阻止群众的革命化，并且要利用群众达到自己‘分赃’的目的，引导群众离开推翻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整个统治的斗争”。称汪精卫是“蒋介石第二”。瞿秋白又强调指出，对于反动派的斗争要讲究策略，区别对待，承认有“中间营垒”，与他们争取群众。他说，认为“中国只有两个营垒：一是国民党，二是共产党，绝对没有‘中间营垒’”，“反正除共产党以外，一切都是一模一样的反动派，反正他们是没有群众的”，都是“非常错误的”。

秋 和黄平出席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发表演说，呼吁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①

10月9日 作《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

10月9日 作《军阀混战和汪精卫》，发表于1930年3月15日《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2、3期合刊。文章在分析了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之后，进一步批判了汪精卫的改组派，着重揭露改组派的投机性和欺骗性，指出：“汪精卫不是在为反对军阀封建势力而斗争，却是为着要建立别的军阀独裁，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罢了。”

10月2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瞿秋白起草的《共产

^① 《访问黄平记录》。按：关于开会地；另一说在法国巴黎。笔者认为上述一说可信。

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①。该信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基本形势，认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式的工农专政”，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的紧急口号。来信指出，国民党改组派是“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利益的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中间派”，“是妨碍工农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主要危险”，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改组派“实行最坚决的斗争”，“开展一次运动，揭露国民党和‘改组派’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真面目”。

深秋 赴列宁格勒，并访问曹靖华，在其寓所畅叙半日。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见。^②

11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在此前后，陈独秀曾连写三信给中共中央，后又发表声明，攻击中共中央路线，反对党领导的中国土地革命，反对武装斗争和建立根据地。瞿秋白对此种种，极为气愤。他立即写了《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一篇长文，系统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文章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现在已经是解放中国、统一中国、肃清封建的民族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中国革命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阶级，是不能胜利的。而没有农民来赞助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他们。”因此，党发动和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与武装斗争，是恢复和发展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而陈独秀等反对土地革命，反对红军革命战争，表明他们已经从社会主义

① 杨之华：《秋白同志年谱》（未刊）。此信曾发表于1930年2月《共产》杂志第2期。

② 曹靖华：《罗汉岭前吊秋白并忆鲁迅先生》。

变成取消主义，根本取消中国革命。他并提出，必须对这种取消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①

11月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主办的《共产》杂志创刊号在莫斯科出版，瞿秋白任总编辑，为该刊撰写了《发刊词》和《编后》。^②《发刊词》说，本志的主要任务是：（一）“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分析目前所处的阶段，阶级力量的对比，研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尤其是获得胜利了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建设的经验”；（二）“应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状况，在理论上武装起来，迎着新的高潮走向坚决的战斗”；（三）“在理论上拥护中国革命，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彻底批评各派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估计，无情的攻击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国际帝国主义的奴才的理论，揭破中国托洛茨基派的反革命的面目”。此外，还规定本志，“一面要在国际及中国革命问题上教育干部，一面要登载对于本校建设问题的讨论，我们生活的论述，中国革命实况的记载，国内外的通信等等。”

12月18日 开始到列宁学院^③讲授《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共12讲，每月去该院二、三次，课程表排到1930年6月。中共“六大”之后，瞿秋白经常到列宁学院讲解中共“六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介绍中国苏区和白区的斗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他把国内外革命斗争的经验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高度进行总结，使大家受到很大的教育。

① 《反对陈独秀和机会主义》，1930年，莫斯科版。转引自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第367、36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

② 据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共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居维廖夫（中国名石克强）的考证，此项资料及其考证，均系陈铁健同志提供。

③ 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的一个高级党校，当时约有学生300人，都是各国共产党选派来的，其中中国学生10余人。

12月 作《在中国苏维埃的旗帜下》，发表于《共产国际》第52期。

年底至次年春 斯大林发动了全苏俄的大清党运动，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派。共产国际指定专人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清党委员会，开展清党运动。在清党委员会的支持下，米夫和陈绍禹宗派集团趁机打击瞿秋白及其他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同志。他们诬蔑瞿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等等。其他同志，凡是反对学校支部局的，除了少数几个工人以外，都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团籍，或者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等处分。^①就在这时，正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读书的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一气之下，把党证退给联共区党委。当天，他突然“失踪”了。^②

本年 致信岚兄，署名维嘉。从在莫斯科看到上海《社会日报》上登出天津小报均“以文艺为重”、“日销三四万份”、“深受劳动群众欢迎”的“惊人的消息”，谈到文艺大众化问题。瞿秋白主张“先采用群众现在所看惯的那种体裁，去创作新派的大众文艺，然后渐渐提高这种文艺的程度”，强调一定要注意“文艺技术”，以吸引群众。认为大众文艺“可以用普通话写，也可以用方言文写”。前者给全国群众看，后者给一定地方的群众看。号召学习和研究天津的经验。

① 陆定一：《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

② 据王凡西回忆，后来瞿景白在莫斯科患精神病而死，见《双山回忆录》第89页。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庚午)

三十一岁

1月15日 于《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1期发表《共产国际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在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月16日 致信中共中央，报告自己健康状况很坏。他说：“去年12月至今，我又是到了‘冬蛰’的状态，简直不能做什么!!!国际如果不能给我长期疗养，并使静静的工作，则将来身体一天天的坏下去，严重的工作，如党纲、党史之类，简直没有希望!”^①

2月 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②。会议通过了《世界经济危机和日益迫近的殖民地革命高潮》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共产党和赤色工会，争取国民党工会中的群众，保证工人阶级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决议反复强调“要克服作为主要危险的右倾”。

3月初 周恩来离开上海，经欧洲前往莫斯科。于5月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他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参加讨论和解决有关中国革命等问题。

3月2日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成立。当年，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国后，也参加了“左联”。^③

① 转引自陈铁健：《瞿秋白传》第350页。

② 杨之华：《秋白同志年谱》(未刊稿)。

③ 冯夏熊整理：《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春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清党接近结束时，学校清党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瞿秋白和张国焘等参加了会议。清党委员会一成员（共产国际监察委员）报告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清党的经过，严厉地指责和打击了瞿秋白。他认为在中国学生中，长期存在着一个托洛茨基的秘密小组织，而中共代表团对此一直采取放任的态度。说瞿秋白曾让刘仁静这个托派领导人回国途经土耳其时，会见托洛茨基，请示机宜，回国后从事托派活动；又指出其他若干托派分子，也是经瞿秋白的提议，一一派遣回国的。还指控说：“中国学生中的不可靠分子，与其他代表的来往较少，与瞿秋白的来往独多。”当时张国焘曾为瞿秋白作辩解，说瞿秋白是忠实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因为他是代表团的首脑，所以接触面很广，处理事情也多。几天之后，米夫约请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飞四人在他的办公室开会，宣读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决议，即《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的议决案》，议决案诬陷中共代表团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助长学生的纷争和妨碍学校党组织的正常工作的进行，助长所谓托派小组织和其他反党倾向的发展。还指名道姓地说，中共代表的多数如瞿秋白等一直坚持这种分裂活动，从未改悔。^①不久，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被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3月 陈绍禹（即王明）等28个布尔什维克开始离开莫斯科回上海。

5月 和苏联汉学家郭质生、尤果夫组成了一个专门小组，对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继续进行研究。

6月11日 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案》（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提出：“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408、409页。

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还规定了组织政治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和兵士暴动,猛烈扩大红军,号召红军发动进攻的策略路线。这次会议,使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机关,给党和革命力量造成严重损失。

6月19日 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看到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案后,认为不妥,说周恩来、瞿秋白目前不在国内,中央领导力量很弱,要求中共中央停发这一决议案。中共中央政治局当即举行会议讨论,决定拒绝执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坚持要发出6月11日的决议。20日,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共中央,再次要求停发决议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向忠发的名义致信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种种理由,表示不能接受远东局提出的关于停发6月11日决议的意见。

6月 即“左联”刚刚成立不久,国民党中央党部唆使一些文化党棍,打起“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旗号,公开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个“运动”的大头目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电影检查委员会委员王平陵,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委员朱应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上海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范争波,中央军教练团军官黄震遐等。他们纠集一帮政客、流氓、特务、文痞作喽罗,出版《前锋周报》、《开展月刊》和《前锋月刊》发表宣言和文章,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宣传,攻击“左联”,说什么“那自命左翼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又是那样的嚣张,把艺术拘囚在阶级上”,宣称:“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鲁迅和左联的一些革命作家,立即给予回击。不久,瞿秋白从苏联回国,也直接参加了文艺战线上这场斗争,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揭露和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反

动实质。

7月16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举行扩大会议，针对李立三“左”倾错误，讨论当前中国问题。瞿秋白同周恩来、张国焘参加了会议。7月23日，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即《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决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底新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同时，决议仍然承认中共中央“有着一般的正确路线”。共产国际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7月下旬 瞿秋白同周恩来先后离开莫斯科回国。行前，他们联名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正式通知他们：在中共中央未作出新的决定以前，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代表。^①

杨之华随瞿秋白同时回国。他们回国之前，为保密起见，托称去南俄工作，把女儿瞿独伊托付给鲍罗廷夫妇照管。

在苏联两年多期间，瞿秋白校阅过列宁的重要著作中文译本《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翻译过不少重要文件；他还参加了《共产国际》中文版编辑委员会。此外，他研究了苏联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

8月1日 归国途中，与周恩来参加柏林八一失业工人节两个示威大会，一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的，一是德国共产党召开的，两个大会斗争很激烈，德国反动当局处处保护社会民主党，破坏德国共产党会议。他们在柏林逗留时，还参观了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与德国党报编辑交流了经验；参加了党的区委会议及工厂支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第184页。

部会议。

8月19日 周恩来回到上海。当即参加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决定，扩大中央总行委和主席团，增加周恩来、瞿秋白等为总行委和主席团的成员。

8月26日 瞿秋白回到上海，住在刘少文家。杨之华回国后，担任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秘书。

9月6日 出席中央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早日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选举中央政治局。

9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接受7月30日共产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电，并报告“中央即开扩大会议，接受国际七月决议与这一电示，将立即恢复党、工会、团的经常领导机关”。

9月9日 出席中央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召开苏区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9月16日 同周恩来等出席中央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瞿秋白起草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草案。瞿秋白报告说：第一、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是一致的；第二、中央在策略上有相当错误，主要是对工农斗争力量的估量、红军力量的配合，犯有冒险主义的错误。^①

9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②。会议通过《中央工作大纲》，酝酿三中全会的补选问题，决定补选毛泽东、顾顺章、李维汉、温裕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③

9月24日至28日 根据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里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

^{①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第188页。

^③ 《中央档案馆关于查证瞿秋白参加过某些中央会议的来信》（1991年7月16日）。

三中扩大全会。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作《传达共产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问题的报告》，李立三作自我批评的发言，瞿秋白作《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会议讨论通过了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起草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及《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决议批评了李立三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左”倾政策，指出六月决议犯了“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地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所以冒险倾向的轻易暴动的布置，代替了切实创造武装暴动前提的斗争”。会议补选了中央委员 15 人（正式委员 7 人，候补委员 8 人），审查委员 2 人，改选了中央政治局，瞿秋白继续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

瞿秋白在《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中，谈了关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党对目前形势估量的错误、苏维埃区域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他特别批评了“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他说：“‘左倾’决不会比右倾好，像某个地方党部总觉得‘左倾’比右倾总要好些（我记不得谁昨天说的），所以宁可以左一点，不要右了，这是不对的！”指出：“右和‘左’的倾向都要反对。”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纠正和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错误。但是，三中全会没有彻底清算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实质，没有指出李立三所犯错误的性质是路线错误；错误地强调右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提出要集中火力打击右倾的口号；在组织上，继续实行宗派主义和过火斗争的政策，错误地打击和处分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些缺点和错误，瞿秋白负有一定的责任，但共产国际负有更大的责任。

9月29日 主持召开经六届三中全会改选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一次会议^①。由周恩来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起草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总结通告。

9月30日 为《红旗日报》^②撰写社论《辛亥革命纪念和苏维埃政权——拥护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0月3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③。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3人组成中央常委会。^④

10月5日 为译就的《现代经济政策之趋势》(俄国杜洛斯基作)撰写序言。译作分上下两卷,共30余万字,同年由上海南华书店出版。瞿秋白在序言中对该书作了评述,说该书详尽地叙述了“近世纪最感困难而不能即予解决的经济问题”;“提纲挈领”,“明瞭而清晰”;“忠诚地维持其史家的客观态度”,“不夹意气,不杂感情”。他说,这些也是他翻译这部书的主要原因。瞿秋白所以要翻译这部书,还因为中国缺乏这样“经济一类的书”,并以此诱引我国学术界“有更完善”的经济译著出世。瞿秋白还谈及译述的方法和态度,他说:“至于译文,务期不戾于原笔,不漏不溢,必清必明,是译者兢兢自守的。”

10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关向应关于红军两次进攻长沙的情况汇报。

10月17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⑤。会议决定由

①③ 《中央档案馆关于查证瞿秋白参加某些中央会议的来信》(1991年7月16日)。

②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1930年8月20日,由《红旗》和《上海报》合并,在上海创刊,从第162期起改为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1931年3月8日终刊,共出182期。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第190页。

⑤ 《中央档案馆关于查证瞿秋白参加过某些中央会议的来信》(1991年7月16日)。

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及当地两位同志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任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会议还决定，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贺龙、黄公略、周逸群、叶剑英、张云逸、邓中夏、曾中生、邓发、邓小平、黄甦、袁国平、刘伯承、周恩来、关向应、恽代英、李富春等 25 人组成苏区军事委员会。^①

10月17日 于《红旗日报》第60号发表《反对国民会议的欺骗》。

10月30日 《实话》^②第1号发表瞿秋白撰写的社论《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的意义》。

11月2日 作《中国革命战争的组织 and 领导问题——长沙战争的教训和苏维埃根据地建立的任务》，发表于1931年《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1期。文章分析了革命运动发展的形势，总结了长沙战争的意义和教训，指出：“他的教训是要求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政党，去极大的加强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就是坚决的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巩固革命的后方，而认真的来组织已经开始的革命战争——有计划的有系统的集中的巩固的向前发展。”认为苏维埃根据地的中心问题是：（一）“建立和扩大群众密切联系的政权”；（二）“改造和加强工农红军。使他成为政治上绝对坚定的，共产党有最高威信军队”。此外，“必须彻底实行适当的经济政策（容许自由贸易，实行劳工监督生产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工人的阶级斗争（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和劳动保护法），取消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文章强调，要巩固红军，必须改良红军的社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第191页。

^②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机关刊物。1930年10月30日在上海创刊，五日刊，随《红旗日报》秘密发行。现今能见到第1期至第13期（第13期于1931年3月5日出版）。

会成分,加强工人干部的领导,提高党的威信。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在革命战争中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

11月13日 陈绍禹、秦邦宪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说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相容的。指责“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就在对于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三中(全会)后,中央没有采取必要方法迅速传达国际路线到下级干部中去”,认为中央的政策“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上的继续”,要中央“以布尔塞维克的勇气和自我批评承认差误”。

11月16日 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0月间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共产国际的来信,批评李立三是犯了路线错误,指出立三路线是“与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团所共同制定的路线对立的”,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指责中共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国际来信还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当前的战略任务。

11月18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①。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中共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错误性质是路线错误,而采取了调和的态度。

11月中下旬 陈绍禹获悉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后,便和博古(秦邦宪)连续写信给中共中央,批评三中全会。他们公然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指责中共中央已经“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接着抛出《两条路线》(后来经增订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

^① 《中央档案馆关于查证瞿秋白参加过某些中央会议的来信》(1991年7月16日)。

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说什么“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他们煽动罗章龙等党员联名致信共产国际,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彻底改组中央领导机关。

11月22日 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①,继续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进一步清算和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瞿秋白在扩大会议上作报告^②,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立三路线如何违反列宁主义?”详细指出立三如何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成立总行委”),布置各地进行“暴动”,使党“遭受着很多的损失”;分析和批判立三暴动的理论,认为他的理论是“发狂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是“小资产阶级的拼命主义”,其实质是“‘左倾’掩盖下的机会主义”。二、检查三中全会的“缺点和错误”,他说,“三中全会时没有更深刻的揭露立三同志的错误路线,指出非列宁主义的路线”,“确采取调和态度”,承认“这确是很大的缺点和错误”,明确表示,现在必须把立三的路线错误“指出和揭发出来,以便全党明了,以教育全党”。同时,瞿秋白认为共产国际代表在三中全会上发言时,“也没有充分抓紧这一路线问题的重心”。三、指出“党内问题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认为,现在党内仍然存在着惩办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残余”,“忽视了党内民主的执行,和真正政治上的巩固路线”。进而批评陈绍禹等人的错误,指出他们“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并批评陈绍禹等人提出的关于讨论立三错误问题的提议,以“成见”为出发点,其观点是“算旧帐

① 《中央档案馆关于查证瞿秋白参加过某些中央会议的来信》(1991年7月16日),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30年11月22日)》,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按:会后,瞿秋白曾审阅了这份会议记录,并作了批语:“记录极草率,无可再整理,这只能作为不完全的记录稿了。”

的方式”，“与国际信中的意思没有相同之处”。瞿秋白在报告中，反复强调，“如何使党成为无产阶级集体的党”，“使党更巩固、更发展”。

11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即《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十月来信，指出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决议说：“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但“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

12月初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听取和讨论东方部提交的《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报告重点是攻击瞿秋白，指名道姓地指责瞿秋白所领导的三中全会，“没有尽到他的责任，没有揭露和纠正以前的一部分政治局领导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对于国际的指示，运用两面派的手段”，从而全面否定了三中全会的功绩。报告最后指出：“一、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二、三中全会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三、三中全会没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阶段的真正教训；四、三中全会没有提出并解决革命现在阶段的现实任务；五、三中全会对于全党同志没有解释领导机关所作的错误，反而模糊了这些错误的实质；六、三中全会没有责备在一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国际不同意的时期，所表现的那些反共产国际的言论；七、三中全会上表现了领导机关之中有不健全的小团体的两面三刀的空气。”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会议在审议和讨论这个报告时，首先听取了李立三的检查发言，然后主席团委员苦秋莫夫、马其亚尔、萨活洛夫、马努伊斯基、白腊昆、库西宁及张国焘、蔡和森、黄平等相继发言，都异口同声地批评瞿秋白，甚至指责他在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就曾“领导过不少次小团体的斗争”，

是“真正小团体的代表”，制造“无原则的党内纠纷”，对待共产国际采取“两面派的手段”，“无原则地领导了三中全会”，“掩盖立三的错误”，等等，要求“召集四中全会来改正三中全会的错误”。主席团极力吹捧陈绍禹，称他是“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的、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很好的同志”。^①

12月4日 翻译《中国革命之前途》（斯大林作）。

12月4日 作《吉安之取得和丧失——立三同志路线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影响》，发表于12月9日《实话》第2号。

12月6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②，讨论党内斗争等问题。

12月9日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紧急会议的决议》，承认三中全会虽然一般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是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去接受的”，三中全会的路线是“不正确”的；决议表示：“必须通过新的政治议决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

12月中旬 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突然来到上海，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他先后会见陈绍禹、罗章龙、徐锡根、余飞等人，批评三中全会和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否决召开紧急会议。12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召开四中全会，中心是反右，竭力为陈绍禹、秦邦宪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创造条件。

12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③。会议在米夫的支

①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1931年5月10日。

② 《中央档案馆关于查证瞿秋白参加过某些中央会议的来信》（1991年7月16日）。

③ 《中央档案馆关于查证瞿秋白参加过某些中央会议的来信》（1991年7月16日）。

持下，决定撤销李立三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通过了《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

1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①。会议通过瞿秋白起草的《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96号)——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②在米夫的压力下，通告全面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对三中全会和以后的中央作了全盘的自我否定。承认六届三中全会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接受共产国际的路线，“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承认11月25日和12月9日两个决议案中，“还是保持着调和主义态度”。通告还决定，“改造各级指导机关”，“引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

12月下旬 王克全等人坚持要开中央紧急会议，成立临时中央。他们认为中央发出的紧急通告，仍是调和主义，现在的中央不能信任，应当开除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贺昌的中央委员职务，并立即停止瞿秋白、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委员职权。

12月下旬 瞿秋白和周恩来在承担三中全会所犯调和主义错误的责任以后，又提议他俩一起退出中央政治局。他们认为自己在处理立三路线问题上，“既已错误，就应团结各方面过去曾反对过立三错误的人在一起，来一起执行国际路线”。为此推荐何孟雄等去见米夫，要求在讨论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名单时，提名何孟雄，但未被米夫采纳。对瞿秋白、周恩来的去留问题，米夫的态度是“留周拒瞿”。当时，瞿秋白曾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

① 《中央档案馆关于查证瞿秋白参加过某些中央会议的来信》(1991年7月16日)。

② 《周恩来年谱》记：《中央紧急通告》是周恩来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结果起草的。

担子。”^①

12月末 一个夜晚，和弟弟云白来到上海鲁班路上丁玲寓所访问。在此之前，曾托胡也频带给丁玲一封信，信末署名“韦护”。丁玲没有回信，也无法回信。瞿秋白此次来访，丁玲感到很突然。瞿秋白带点抑郁笑着对她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现在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了。”瞿秋白还看了看丁玲的孩子，问起孩子的名字时，他笑着说：“应该叫韦护，这是你又一伟大作品。”顿时，感慨万分地朗通道：“田园将芜胡不归！”因为他想起多年来对于文学的荒疏。后来，丁玲得知瞿秋白当时的困难处境，更加难过。^②

本年 于莫斯科《中国问题》（俄文版）第3期发表《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署名 Справоб。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第198、199页。

②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文汇》增刊第2期，1980年。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辛未)

三十二岁

1月1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等通过《全总党团决议案》，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共产国际代表另组织临时中央机关，召集中央紧急会议，并声称对于在党的历次错误中负有严重错误的主要责任的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应执行铁的纪律，立即离开指导机关，照章予以组织上最严重的制裁”。

1月7日 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陈绍禹等人突然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扩大全会。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任弼时、秦邦宪、顾顺章、何孟雄等37人出席了会议。向忠发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政治报告，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了会议的全部进程。陈绍禹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完全抹煞六届三中全会的功绩，说三中全会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指名批判瞿秋白，说瞿秋白与李立三的错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进而要求全面彻底改造党等。周恩来、关向应、瞿秋白、李维汉等相继发言。政治局成员发言之后，何孟雄、王稼祥、罗章龙等10几个人又相继发言，批评立三路线，批评三中全会，强调要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有人甚至要求瞿秋白等人立即离开中央。米夫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作会议的结论，支持陈绍禹等人的观点。会议通过了由米夫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在米夫操纵下，补选了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瞿

秋白同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了政治局，向忠发、陈绍禹等 16 人进入政治局，向忠发名义上继任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实际上陈绍禹等人掌握了中央领导大权。以陈绍禹为代表的比李立三更“左”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着统治地位，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灾难。

1 月 7 日 瞿秋白在四中全会上的发言，主要是被迫作自我批评。他进一步检讨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和对国际代表意见的不尊重”。首先分析立三路线的实质及其危害，进而检查三中全会的错误——“调和主义的立场和路线”，承认“三中全会和此后的政治局，不能领导党实行路线上的大转变”，“实际工作上立三路线仍旧能够继续着，甚至占着统治地位”，并检查这种调和主义给党造成了种种的损失，甚至说：“在一定的意义上，调和主义比立三路线更坏。”他还分析这种错误“不是偶然的”，他说：“对于许多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我从六次大会以前直到三中全会前后，都有好些和立三同志大致相同的观点。”谈到错误的责任问题时，勇敢地表示，他“负有特别主要的责任”。瞿秋白在发言中，除了检查自己以外，还继续在关心革命的事业和党的团结。他指出，中国革命正处于“很紧要的困难时期”，“摆着许多困难”，有些落后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染着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或者拼命的情绪”，因此，他要求党“应当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战胜这些动摇，而吸引他们积极的加入斗争”，“坚决的实行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他还要求党“要坚决的无情的反对机会主义的一切表现”，揭穿他们的“假面具”，战胜“许多不正确倾向”，从而维护党的团结。^①

1 月 7 日 在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虽然遭到陈绍禹等人的恶意攻击，但他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会后有人问瞿秋白：“为什么

^①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记录(1931 年 1 月)》。

你对那些无中生有的诬蔑，不置一词，不为自己辩解呢？”他回答说：“我个人的问题，算不得什么，这些都是枝节问题。我倒是担心革命的前途啊！”^①

1月17日 致信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中央，表示对于四中全会“决议案的全部，是完完全全的拥护”；对于四中全会对他的“指斥”，是“完完全全的接受”。进一步检查了他对共产国际代表是如何的不尊重。信上说：“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三中全会的前后，屡次提出立三同志在冒险主义政策之下走向反共产国际斗争的道路上去。可是，我和当时政治局都不赞成他这种意见。”瞿秋白承认这种对于国际代表意见的不尊重的态度，更使调和主义的错误加重起来，他说：“因为当时并没有清楚的提出不赞成的理由，而且含混的简单的不把国际代表的意见写入三中全会的政治议决案。这样使当时国际代表没有可能及时来纠正当时政治局的调和主义错误。”瞿秋白在信中，称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②

1月26日 译毕《第十四个年头——苏联革命十三周年纪念时候的世界形势》。^③

1月27日 米夫、陈绍禹控制的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贺昌等同志问题的决议案》^④，责令瞿秋白写书面声明，表明自己要积

① 《中央纪委在上海召集的关于瞿秋白评价问题座谈会纪要（1979年7月）》。

② 《瞿秋白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信（1931年1月17日）》，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该信的主要内容发表于《党的建设》第3期，1931年2月15日。

③ 本篇与《布尔塞维克的进攻和机会主义的新活动》，曾由作者编为《茂声集》（一），迄未出版，手稿现存中央档案馆。

④ 《党的建设》第3期，1931年2月15日。

极反对右派和李立三错误的政治态度。瞿秋白被迫再次向中央政治局写了声明书，表示“完全抛弃自己的一切错误”，“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来为党为革命而斗争”；表示拥护四中全会关于“反对立三路线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反对罗章龙等右派小组织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并尽力参加上述的斗争；表示自己的“调和主义的错误，是和莫斯科代表团对于‘学生问题’的错误相联系的”，对小组织“采取了保护态度，以至不但不能反对派别斗争，反而自己陷于派别斗争的泥坑。”这一错误是自己的“非布尔塞维克的整个立场之中的一部分”。^①

1月31日 译《高尔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2月7日 致信莫斯科友人郭质生，署名史继，并随信寄赠《国语字模范读本》一册，在信末还说明秘密通信的方法，即把来信先寄天津某地、某人收，信内说明（须用英文）请换用信封代寄某地、某人。瞿秋白在信上特别提请注意：“此两地址，请勿告诉任何人。”

2月20日 米夫、陈绍禹控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关于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再次谴责瞿秋白“对国际路线的接受采取两面派的态度”，“对于国际代表也表示极不尊重的态度”，批评瞿秋白犯调和路线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早在莫斯科时就一贯不尊重国际等等。同时，他们还向全党公布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1930年春通过的《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及《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记录，借以打击瞿秋白，证明他们一贯坚持国际的正确路线。

2月28日 译《布尔塞维克的进攻和机会主义的新进攻》（苏

^① 《瞿秋白同志声明书》，《党的建设》第3期。

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21期社论)，署名启凡，发表于《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2期。

3月12日 致信郭质生，要求经常给他寄一些俄文书刊：“小说、短篇小说、新的或是旧的文学作品都可以。还要各种文艺杂志（哪怕是《小说报》等等也好），以及有关阿拉伯文拉丁化的材料。”瞿秋白请郭质生马上查找下列书刊：“1. 中国短篇小说（发表在《小说报》上的）；2. 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3. 托尔斯泰的《三姐妹》和《一九一八》；4. 几种新期刊。”^①

春 先后两次致信迪兄，署名范易。这两信的主要内容，都是谈新的文学革命的问题。第一封信里，他因病“没有完全好”，“坐久了，腰就痛起来”，对文学问题谈得简略。所以后来又写第二封信。他认为文学革命是“十二年前的老话”，但旧问题要“新解决”。所以指出：“新的文学革命不是‘五四’的简单的继续，而是它的‘辩证法的开展’。”两封信都是针对茅盾对白话文问题的看法而写的讨论性的意见。信的中心是讨论“用什么话写”的问题，普通话对方言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大众化的文艺作品，必须“用现代的普通话写”，也就是说，“不要古文，不要古代的文言，不要古代的白话，不要夹杂着古代的文言或者古代的白话的假白话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一定要用普通的白话，这就是不要方言，不但不要广州、上海、福建……等的方言，并且不要北京的方言。”

春 致信新兄，署名易嘉。信中着重讨论白话文的问题。瞿秋白提出了白话文和假白话文的区别，他认为：“凡是说得出来的白话文，都是‘活人的话’，都是真正的白话文。凡是说不出来的，读出来听不懂的——不象说话腔调的——就都是假白话文。”他说“夹着文言”的白话文，就是“骡子话”。他申明，并非主张“不要文言”，而是主张要根据中国活人口头上说话的文法习惯去运用文

^① 《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言，即“要把文言的字眼变成白话”。信中还叙及他对茅盾有关白话文问题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

春 致信伯新兄，署名范易。信中着重讨论白话文的问题。伯新兄曾给瞿秋白的信中，问起所谓“骡子话”的问题，并说，茅盾不应该把“为主义而牺牲”那样的句子也当着文言——当作“骡子话”。瞿秋白在这封复信中，就针对茅盾对于真正白话和骡子话的区别的观念，作了具体分析，提出不同的看法，并指出“骡子话”具有四个特点。他认为假白话文加以“改造一下”，“肃清那些特点”，就变成“真正的白话文了”。

4月4日 作《“茅盾”的继续》(小说)，本篇作者生前从未发表过。1938年5月被编入《乱弹及其他》，由上海霞社出版。

4月下旬 茅盾和夫人孔德沚连续两次来到上海大西路两宜里访问瞿秋白和杨之华。那时，瞿秋白受到陈绍禹打击刚刚不久，又犯肺病，心情不好，见到他们来访，格外高兴。第二次访问时(相隔两天)，茅盾带来自己的长篇小说《子夜》写作大纲和已写好的前几章，请瞿秋白提意见。瞿秋白和茅盾从下午一点，边看边谈。瞿秋白向茅盾解释党的政策，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建议茅盾据以修改《子夜》中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的部分，一直谈到傍晚6点钟。正在吃晚饭时，邮差送来一封信，信上写着：你们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快回去看看吧！这是党中央向瞿秋白发出的警报，暗示党中央某机关遭到敌人破坏，要瞿秋白夫妇立即转移。于是，茅盾急忙把瞿秋白夫妇带到愚园路树德里自己家里避难。杨之华次日再转移到别处住。瞿秋白则在茅盾家住了一两个星期。那时，彼此天天谈《子夜》，瞿秋白又提了一些宝贵的意见。^①

^① 茅盾：《怀念秋白烈士》，《红旗》，1980年，第6期。按：文内原说秋白到茅盾家避难时间为1932年夏，时间回忆有误。后经笔者去信问茅盾，茅盾把秋白到他家避难的时间订正为1931年4月底5月初。

5月初 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到茅盾家，把4月25日刚出版的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创刊号送给他。正在茅盾家避难的瞿秋白，第一次和冯雪峰见面。瞿秋白对《前哨》刊载鲁迅所写的关于追悼被杀作家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倍加赞扬：“写得好，究竟是鲁迅！”^①过了几天，冯雪峰又来了。瞿秋白问他有没有可靠的社会关系，想请他找一个能比较长时间居住的地方。还说因身体不好，组织上要他休养，自己很想借此休养的机会，翻译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②

5月5日至17日 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宣称实行法西斯主义，赞“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是非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规定“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

5月10日 于《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发表《国民会议上蒋介石说些什么？》

5月下旬 沈雁冰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行政书记。

5月30日 作《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论述中国文学革命与白话文的关系，倡导大众化语言。瞿秋白认为，要实行文学革命，必须实行所谓“文腔革命”，那就是“用现代人说话的腔调，来推翻古代鬼‘说话’的腔调，不用文言做文章，专用白话做文章”。他指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他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他指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的建立，是“文学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有这样，

^{①②}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26、1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2年。

才能产生所谓“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瞿秋白进而概括而明确地指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有一个总的原则：“适应从象形文字转变到拼音文字的过程，简单些说，就是只能够看得懂还不算，一定要听得懂。”最后，要求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必须是真正现代化的”，“应当用正确的方法实行欧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

5月 作《中国文学的古物陈列馆》。

5月 翻译列宁名著《卡尔·马克思》中的《马克思底学说》、《哲学的唯物论》两部分，1939年2月收录在《社会科学概论》，由上海霞社校印。

春夏之交 瞿秋白与夏衍初次相见。当初，瞿秋白没有介绍自己的真实姓名。但经几次交谈后，彼此都心领神会。后来，夏衍回忆说，在他与瞿秋白断断续续的将近两年的接触之中，丝毫感觉不出瞿秋白在受陈绍禹宗派集团打击之后，有委屈、不满的情绪。在任何情况下，瞿秋白始终是那样的乐观、潇洒、幽默，一接触到党的工作，是那样的生气勃勃。他对敌人、对旧社会具有那样的敌汽和仇恨。^①

春夏之交 受中共中央的委托，曾一度代管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的工作^②。瞿秋白主持文委工作期间，曾邀约“左联”行政书记沈雁冰晤谈，提出改进“左联”工作意见；继续办好《前哨》，作为“左联”的理论指导刊物；另外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专门发表创作；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和1928年以来的普罗文学运动进行

① 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文艺报》，1955年第2号。

② 唐天然：《瞿秋白和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上海《革命史资料》，1986年第1期。按：据沈雁冰、夏衍等回忆，都说瞿秋白于1931年春夏之交开始领导文委工作。

研究和总结。^①

6月10日 作《学阀万岁》，着重论述了新文学思想内容的问题。指出自“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革命产生了一种“骡子文学”，为什么叫“骡子文学”呢？瞿秋白说，它既不对旧文学宣战，又不敢对旧文学讲和；既不完全讲“人话”，又不会真正讲“鬼话”；既创造不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又不能运用汉字的“旧中国文”。所以把它称为“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进而分析和批判了所谓新文学阵营里的“绅商文学”，“市侩式的请客文学”，“无赖文学”，揭露其阶级本质及其反动作用或对社会的消极影响；颂扬了萌芽中的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即“所谓普罗文学”，指出无产阶级文学的任务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帮助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人”和“领导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罢工、抗租、兵变、抗税、赖债”，组织红军“准备以至于实行暴动”，以“大贫”推翻“小贫”，推翻西洋文明民族对于中国的“治理”。

6月 冯雪峰安排瞿秋白住到上海南市区紫霞路68号谢澹如家。瞿秋白化名林复，剃了光头，穿着短裤和布鞋，杨之华也着农民服装。他们假称刚从乡下来的。房东谢澹如是冯雪峰的朋友，在钱庄做事，爱好文学，同情革命，亲戚和社会关系都在商界。他十分谨慎地掩护着瞿秋白的革命活动，保证了瞿秋白夫妇的安全。^②瞿秋白夫妇在这儿居住时间最长，将近两年（其间，因“一·二八”事变发生，瞿秋白夫妇同谢家曾一度临时搬到法租界毕勋路

① 沈雁冰根据瞿秋白的意见，同鲁迅、冯雪峰研究了两次，《前哨》改名《文学导报》继续出版，专门发表文艺理论文章；又决定创办一个以发表文艺创作为主的文艺刊物《北斗》，由丁玲主编。

② 在瞿秋白夫妇搬进之前，为迷惑敌人，由谢澹如先生出面在报纸上登了一则“余房招租”的广告，瞿秋白住下后，谢澹如借辞谢绝朋友到他家去，并且不让他母亲和妻子知道瞿秋白夫妇的真实姓名和亲历。

(今汾阳路)毕兴坊10号,住到5月,又一同迁回紫霞路)。在这期间,瞿秋白深居简出,过着严格的秘密生活。冯雪峰每隔几天就到瞿秋白住处去一次,和他谈左联与革命文学运动的情况,取稿件,沟通瞿秋白和鲁迅的联系。鲁迅为瞿秋白提供了俄文材料。瞿秋白就一面养病,一面坚持翻译、著述。后来,由鲁迅为瞿秋白收编为两卷装的《海上述林》,其中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①

6月 中共河北省委遭敌人破坏。当时,中央决定派瞿秋白去担任河北省宣传部部长。7月,瞿秋白接到中央决定时,表示:“党中央决定我去河北,我坚决服从。只要革命需要,去哪里,干什么,我都诚恳接受。”^②后因瞿秋白在平津的熟人很多,考虑到瞿秋白和组织的安全,中央撤消了原决定,另改派他人。

上半年 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以便加强文件的管理工作,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恩来,特地关照中央秘书处的同志:“要阿秋(即瞿秋白)提出几条整理文件的规定出来。”^③瞿秋白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为中共中央机关制定了《文件处置办法》^④。这是我党最早的关于档案文件管理的一个指导性文献。文长约1200字,共7条,对中共中央档案文件的收集、整理、销毁、保管等原则和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规定了中

① 丁景唐:《瞿秋白住在上海紫霞路的时候》,《新观察》1955年第12期;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27、128页。

② 马辉之:《怀念瞿秋白同志》,《北京日报》1980年4月7日。

③ 参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专业展览》,《光明日报》1956年5月23日。

④ 见《档案工作》1961年第4期,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按: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成立秘密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次年中央决定设立文件保管处,专门负责保管中央文件。至1931年初,保管处已集中了20多箱档案文件,但都没有分类编目,难以查阅。为此周恩来便委托瞿秋白拟制了这份《文件处置办法》。

央和地方档案文件的搜集归档的具体范围，规定了档案资料整理的若干类别(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规定了分类编目、分类编号及各类文件排列的具体要求。瞿秋白预见到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以后，档案文件对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在《文件处置办法》的末项特别写了一个“总结”：“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周恩来在《文件处置办法》上面作了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并作了补充规定：文件要一式三份，一份放在上海市内保存，一份放在上海郊区农村，一份送存中央苏区。^①

7月24日 作《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

7月 作《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

8月10日 作《画狗吧》，署名董龙，发表于9月20日《北斗》创刊号，对7月刚出版的张天翼的小说《鬼土日记》进行了评论。文章说：“张天翼的《鬼土日记》，替我们描画了一顿鬼神世界。天翼的小说，例如《二十一个》之类，的确有他自己的作风，他能够在短篇的创作里面，很紧张的表现人生能够抓住‘斗争’的焦点。”但文章着重批评《鬼土日记》的缺点，认为它令人失望。指出小说的“题材”“未免太大”，内容“不真切”，“图式化”。又指出，鬼并不是不可以画的，但最好去画现实生活中的鬼，“画禽兽世界”。他说：“袁世凯的鬼，梁启超的鬼，……的鬼，一切种种的鬼，都还统治着中国。……我们要画鬼，为什么不画这些鬼呢？”

8月15日 作《哑吧文学》，发表于9月20日《北斗》创刊号。

8月18日^② 作《猫样的温文》，署名 V. T.，发表于10月19日《文艺新闻》第32号，后作者编入《乱弹》时，改题为《猫样的诗

^① 参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专业展览》，《光明日报》1956年5月23日。

^② 这里的“8月”，或为“9月”之误。据《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75页。

人)。瞿秋白批判了徐志摩在新月派创办的《声色》创刊号上发表的《一个诗人》，称他是“猫样的诗人”，象一只“不撒野的温文尔雅的猫”，捉老鼠时，是“很凶狠的”；见着主人时，则是“很顺服的”。指出徐的作品，不过是“一个清客”，对其主子“吃租阶级”奉献的“歌声”和“色情”。

8月20日 于《文学导报》第3期发表《屠夫文学》，署名史铁儿，后作者编入《乱弹》时，改题为《狗样的英雄》。文章一针见血地揭露“民族主义文学”的阶级实质，指出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即中国绅商买办资产阶级所鼓吹的“战争的小说”，“杀人放火的文学”。瞿秋白通过对两篇典型作品，即黄震遐的小说《陇海线上》和万国安的小说《国门之战》的具体分析，对“民族主义文学”作了有力的批判。指出：《陇海线上》是描写蒋阎冯中原大战的小说，战争的双方都标榜是“为民族而战”，但他们并不把人民视为自己的民族，而当作“奴隶”、“牛马”，混战中被杀戮者多为平民大众。瞿秋白认为，“民族主义的文学，不过在那些四六电报宣言布告之外，替军阀添一种欧化文艺的宣传品，去歌颂这种中世纪式的战争。”《国门之战》是描写“剿杀‘苏联红匪’的小说”，鼓吹屠杀民众的所谓“剿匪”战争，煽动人们：“不要懦怯，不要顾惜！……你们打倒了赤俄，你们到了莫斯科，前进！”瞿秋白揭露了“民族主义文学”派对共产党和苏联的刻骨仇恨。

9月3日 作《一种云》，以种种象征，勾画出黑暗的旧中国。文章最后写道，天边出现了虹，响起了“小小的雷电，打开了层层乌云，让太阳重新照到紫铜色的脸”，预示中国人民革命必将胜利。此文与《苦力的翻译》（9月3日作）、《乱弹》（9月7日作）、《吉河德的时代》（9月8日作）、《非洲鬼话》（9月9日作）、《世纪末的悲哀》（9月10日作）共六篇，合为一组，总题作《笑峰乱弹》，以《乱弹》篇作为代序，署名笑峰，发表于10月20日《北斗》第1卷第2期。

9月6日 作《青年的九月》，署名 Str.（史铁儿），发表于9月13日《文学导报》第4期。文章着重揭穿“民族主义文学”利用“民族意识”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人民革命战争的反动实质，指出：“文艺上的所谓民族主义，只是企图同化异同的国族主义，只是绅商阶级的国家主义，只是马鹿爱国主义，只是法西斯主义的表现，企图制造捍卫帝国主义统治的所谓‘民族’的‘无上命令’，企图制造服从绅商的奴才性的‘潜意识’，企图制造甘心替阶级仇敌当炮灰的‘情绪’——劳动者安心自相残杀的杀气腾腾的‘情绪’。”

9月中旬 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陈绍禹提出秦邦宪（博古）进入中央负总责^①。商议结果由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下旬在上海成立。

9月18日 “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指示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不久，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国运动。

9月20日 由丁玲主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北斗》杂志创刊号出版。^② 瞿秋白非常关心和支持《北斗》，并为该刊写杂文《乱弹》等。

9月 作《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署名史铁儿，发表于9月28日《文学导报》第5期。文章说，“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民众的热血。这种沸腾的情绪需要文艺上的组织。强调指出当前大众文艺的主要使命，就是“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反对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反对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卖国镇静，投降和平，对于帝国主义无抵

^① 陈绍禹即将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② 该刊为文艺月刊，出版发行11个月，共出版了两卷8期，1932年7月20日，第2卷第3、4期合刊出版后被迫停刊。

抗，而对于中国民众的屠杀。”又指出，要“宣传中国民众的唯一出路——只有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统治”，“组织真正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的革命战争”。最后要求作家：“写的时候，说的时候，把你们的心，把你们真挚的热情多放点出来，不要矫揉做作。”

9月 为了研究文艺大众化，瞿秋白几次化装去上海南市城隍庙，听民间艺人的说书和演唱，后来又写了一些通俗的大众化作品。9月28日发表于《文学导报》第1卷第5期上的《东洋人出兵（乱来腔）》就是代表作之一。这是用北方话和上海话两种口语写成的一首长歌。揭露“日本出兵占了东三省”，“在那里大杀人”，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原来是大资本家地主的假名称”，“卖国卖民”，“赌咒发誓去打红军”；指出“帝国主义世界有理讲不清”，“国际联盟还是帮助日本人”；指出“全中国的工农兵，大家起来大革命，革命才能打退日本人，国民党叫咱们镇静是送命”。这首长歌曾风行一时，深受劳动人民的欢迎。瞿秋白还曾作《可恶的日本》、《十月革命调》、《苏维埃歌》等10几篇类似的诗歌小调。这些诗歌小调语言都口语化，通俗易懂，思想新颖，含意深刻，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学运动的新方向。

9月 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召开。大会以瞿秋白在莫斯科写的《中国拉丁化字母》为基础进行讨论，正式作出了中国新文字的新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瞿秋白对中国汉字改革的研究，“为中国新文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①。

10月21日 作《陈独秀的〈康庄大道〉》，署名史铁儿，发表于10月30日《红旗周报》^②第22期，批判陈独秀发表的《抗日救国

① 吴玉章：《纪念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49年6月18日。

②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1931年3月9日在上海创刊。从1933年8月起改为半月刊，1934年3月1日终刊，共出64期，另有附刊13期。

运动的康庄大道》一文。陈独秀在文章中写道：“以革命的民众政权（这一政权将经过全国抗日救国会而实现……）代替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战；同时以长期的排货，——由工人和学生组织大规模的检查队，排货能收实效——给日本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瞿秋白指出这个“革命的民众政权”就是托陈取消派的宣传大纲里的“工农商学联合起来”的主张，认为“这个工农商学大联合的迷梦，证明陈独秀先生等又在幻想第二个五卅的民族统一战线”，指责他们“要和资产阶级妥协，要引诱工人去投降资产阶级”。陈独秀说，“经过国民会议，或者苏维埃而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瞿秋白批判这种观点是“百分之一百的机会主义”，说陈用了“或者苏维埃”的词句，是一种“迷魂汤，麻醉剂”，“企图蒙蔽群众”。

10月25日 作《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署名史铁儿，发表于1932年4月25日《文学》半月刊^①第1卷第1期，后作了一些修改，辑入《乱弹》。文章突出强调，中国文艺大众化，不能再停留在“空谈”上，而“应当立刻实行，应当认真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文章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大众文艺有关问题，对1930年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作了系统总结，较详细地阐明了大众文艺的语言、形式、内容及创作方法，对如何进一步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发展，提出了具体意见，诸如大众文艺“用什么话写”，“写什么东西”，“为着什么写”，“怎么样去写”，“要干些什么”等等。文章特别强调，要实现文艺大众化，“革命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给群众服务”，“在思想上，意识上，情绪上，一般文化问题上，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文章论及文艺题材时，强调指出，普洛大众文艺应当“首先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生活和斗争，罢工，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当然是主

^①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之一。

要的题材。”还具体指明大众文艺既要写阶级斗争，也要写劳动群众的私人生活。同时又强调指出，大众文艺对于绅土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一切丑态，一切残酷狡猾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一切没有出路的状态，一切崩溃腐化的现象”，则应无情地“揭发”和“暴露”。这篇文章在第二次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但是文章贬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对于“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在语言上的成就评价不足。

10月 受鲁迅的约请，为曹靖华的译作《铁流》补译了一篇序文。瞿秋白把译好的序文送给鲁迅时，附上一封给鲁迅和冯雪峰的便信。这是瞿秋白和鲁迅最早的通信。鲁迅亲自为《铁流》校对，并写了编后记，对瞿秋白赶译的序文热情地赞赏说：“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少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①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又指出：“读者倘将这附在卷末的《我怎么写〈铁流〉的》都仔细地研读几回，则不但对于本书的理解，就是对于创作、批评理论的理解，也都有很大的帮助的。”^②

秋 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即“文委”）拟写一份指导性文件——《苏维埃的文化革命》，规定了“文委”的任务：“在文化战线上，动员广大民众来参加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苏维埃革命。这就必须发动和领导苏维埃的文化革命。”文件要求发展大众新闻，建立工农兵通信制度，要在大众之中，发展普洛的革命的文学、话剧、美术、音乐等的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大众化的运动。文

^① 苏联文学评论家，他为涅拉托夫摩维支的长篇小说《铁流》撰写了一篇长序。

^② 《鲁迅全集》第7卷，第3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

件强调指出,要为“实现无产阶级对文化运动的领导权”而斗争。文件末尾附有“文委”所属的“社联”、“左联”、“教联”、“剧联”、中国新闻学术研究会等联盟的工作计划纲要。

11月7日至20日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政府宣言、宪法大纲等。经选举产生了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①

11月10日 于《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6期发表论文《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系统揭露了以胡适之、罗隆基等人为代表的人权派的真面目,提醒人们不要受他们的蒙蔽。文章写道:“中国的人权派表面上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自由,实际上却不是反对什么国民党,并不是反对什么压迫和剥削,而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压迫剥削的不得法!”“人权派绝对不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绝对赞成国民党的枪炮,飞机,炸弹,瓦斯等等……的一切杀人方法,认为这些不但不违背‘自由’和‘民治’,而且还有所不及。”文章还指出人权派的所谓“理想”,“充其量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民治’——国会制度,带上一层民选的假面具的资产阶级独裁,更聪明更敏捷的剥削劳动者的政治制度”。

11月10日 于《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6期发表《托洛茨基派和国民党》。

11月20日 鲁迅以隋洛文笔名在《北斗》第1卷第3期上发表译作卢那卡尔斯基的著名剧本《被解放的堂·吉珂德》第一场(据日文本翻译)。后来,鲁迅得到俄文原本,认为瞿秋白俄文水平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由他翻译最合适不过,于是,再请瞿秋白从

^① 齐夫:《介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号布告》,《革命文物》,1980年,第5期。

头译起。瞿秋白欣然答应。同年12月20日《北斗》第1卷第4期开始发表瞿秋白(署名易嘉)这一译作,从剧本第2场起连载下去。但至1932年7月20日《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登完第3、4场以后,译作就和《北斗》的停刊一同中止了,没有全部登完。后来,鲁迅把“辗转觅得未刊的译稿”珍藏起来。一年多以后,鲁迅又将瞿秋白译稿全文送上海联华书局出版,亲自补译《作者传略》,代选毕斯凯莱夫の木刻插图,并于1933年10月28日,为该书撰写了长篇《后记》,并给瞿秋白的译文以很高的评价。《后记》说:“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的本子”,“中国又多一部好书,这是极可庆幸的。”^①

11月24日 作《巴黎会议和瓜分中国的阴谋——进攻苏联的积极步骤》,署名范亢,发表于12月4日《红旗周报》第25期。指出满洲事变发生之后,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的两次会议,充分地暴露其所谓“国际正义公道”的破产,事实上对日本是竭力的偏袒。文章说:“英法等国还装腔作势的要求日本撤兵,这其实已经是用国际公道的迷魂汤,来欺骗世界的劳动群众,替日本做个缓兵之计,替自己留个从容布置的地步。”文章指出:“最近,国联的巴黎会议更彻底的显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而且是联合进攻苏联的积极步骤。”

11月25日 作《美国的真正悲剧》,发表于12月20日《北斗》第1卷第4期。

11月27日 第一届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下设军事、外交、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人

^①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36页。按:瞿秋白于1932年5月15日将剧本《被解放的堂·吉珂德》译完。

民委员会。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瞿秋白当时仍在上海）。

11月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是同年10月间，冯雪峰在瞿秋白的指导下草拟的。决议尽力排除当时“左”倾的影响，提出了若干正确的根本原则，指导了“左联”后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活动。在“左联”的历史上，它标志着“左联”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后来茅盾指出这是瞿秋白“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等功”。^①

12月5日 读了鲁迅送给他刚出版的译作《毁灭》之后，写信给鲁迅，热烈“庆祝这个胜利”，信上说：“你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象爱自己的儿女一样。”瞿秋白在信中着重同鲁迅讨论了翻译问题，还特别提到他们两人的革命情谊。瞿秋白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时，他们两人还未曾见过面）^② 这封信被鲁迅推荐，以《论翻译》为题，发表于12月11日、25日《十字街头》第1、2期。12月28日，鲁迅给瞿秋白回信，以“敬爱的同志”相称，就瞿秋白提出的翻译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相互讨论。在信的临末，对瞿秋白所提出意见表示感谢。^③ 后来，鲁迅把瞿秋白的来信和自己的复信，都编入杂文集《二心集》，题为《关于翻译的通信》。

12月6日 作《斯大林和文学》，未在报刊上发表过，后收入8卷本《瞿秋白文集》第3卷和6卷本《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

① 茅盾：《“左联”前期》，《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② 《鲁迅全集》第7卷，第370～379页。

③ 《鲁迅全集》第7卷，第379～386页。

卷。文章介绍苏联普洛作家联盟(简称“普联”)根据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阶段对于文学提出的新要求,“正在改造:正在转变自己的工作到思想的创作的方面来”,公开承认自己的缺点,“注意纠正那种忽视文艺组织的特殊任务的倾向,纠正那种抄袭非文艺组织的工作方法”,“注意普联是思想教育的组织的特性,而加紧注意自己工作的特殊形式和方法。”文章联系了中国文学界的实际,认为中国普洛文学运动有“许多弱点和错误正需要坚决的斗争和勇敢的自我批评来纠正”。号召中国读者,要以苏联无产阶级的文学斗争为模范,应当深刻去了解“苏联普洛文学运动之中的新的任务”,“应当会应用他们所研究出来的原则到中国的普洛文学方面来。”本文对当时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策略转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2月8日 作《五年前是“到黄埔去”——现在是到哪里去?》,署名樊梓生,发表于12月19日《中国与世界》周刊第3期。

12月10日 于《红旗周报》第26期发表《国民党的两个四全大会——反革命的大竞赛》,署名范亢,指出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南京派和广东派,最近都开了所谓第四次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章揭露和分析了他们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及两个大会的反动本质。指出:“南京的四全大会之下发现好些某某护党大同盟,某某护党救国联合会等”,选举时,“贿买代表,简直和当初北洋军阀时代的猪仔国会,一般无二”;“广东的四全大会,更公然的分裂,汪精卫派,胡汉民派,西山会议派等”,彼此“纷争不已”,“象当初什么护法国会里的政友系,大孙系,小孙系的打架”。文章认为“这些都充分表现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的分崩离析”。文章进而指出南京和广东的两个四全大会“是个走狗比赛的跑狗场”;第一“是卖国竞赛”,南京四全大会的时候,“内幕的秘密谈判一天天的显露出来”,“中国当局自己提议恭请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军驻扎到锦州一带,在中日之间设立所谓中立区域”。广东的四全大会之下,“有陈友仁的外交

方针的宣言”，“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权，答应满洲的一切铁路都由中日合办，答应日本享有满蒙土地的商租权……”。第二“是屠杀竞赛”，南京的四中全会，“很起劲的商量着第四次第五次进攻红军的计划”；广东的四中全会“大声疾呼的申斥”蒋介石“打不了红军”，“特别提出‘铲除赤匪’的议案”。第三“是欺骗竞赛”，蒋介石声言“立刻北上”，仿佛要对日宣战似的，又大谈什么“和平统一”，汪精卫则在大谈什么“民主政治”，还有“南京的什么经济建设，广东的什么整理财政”等，都是一派胡说，完全是一种欺骗。

12月12日 于《中国与世界》周刊第2期发表《恭请列国联军》，署名樊梓生，抨击中国当局的卖国行为。1931年11月22日，日军进攻锦州，国民党政府向国际联盟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由英、美、法、意派军驻扎。文章揭露，中国当局的外交方针，是适应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的阴谋。当局恭请国际调查委员会和列国联军来中国，是“瓜分中国”、“屠杀压迫民众”，“好好筹备进攻赤匪，以及赤匪的祖国——苏俄。”号召青年丢掉幻想，依靠人民的团结和力量，驱逐“列国联军和中国军阀”。

12月12日 作《注意巴黎会议的结果——瓜分中国和进攻苏联的急进步骤》，署名范亢，发表于12月17日《红旗周报》第27期。

12月15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作出关于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的决议。当天，北平南下学生请愿团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遭到机枪扫射，当场有30多名学生代表被打伤。上海各大报，在国民党当局的指挥和监督之下，掩蔽了这一消息。次日，瞿秋白立即作《南京新政府的下马威》一文，署名范亢，发表于12月17日《红旗周报》第27期，猛烈抨击南京新政府。他指出：“事实总归是事实。上海的外国文报纸，以及中文报纸的字里行间，已经是够我们认识事实的真相，即使不完全，不清楚，也至少可以证

明南京新政府的第一天的政绩，就是实行对于革命的学生大施屠杀。”瞿秋白驳斥了南京新政府对学生代表的诬告，揭露“首先开枪”的是国民党自己，他们“故意派遣包探奸细在群众之中来开枪，以造成屠杀的‘口实’”。明确指出：汪精卫、胡汉民、林森、陈铭枢等的新政府，“仍旧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仍旧是在准备着新的军阀激战，仍旧是努力进行卖国外交，——赞助国际联盟瓜分中国的阴谋，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政府，是一模一样”。一针见血地揭穿他们玩弄所谓“民治宪政”以骗欺民众的一套鬼把戏。

12月17日 作《〈铁流〉在巴黎》，署名 Smakin，发表于12月25日《十字街头》第2期。文章赞赏苏联绥拉菲摩维支小说《铁流》的寓思想于真实描写之中的写作特色，指出：“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也没有宣传，没有标语口号。”认为“事实的本身就是最有力量的宣传。任何故意宣传鼓动的小说诗歌，都没有这种真实的平心静气的纪事本末来得响亮，来得雄壮，——这是革命的凯旋歌”。

12月17日 作《满洲的〈毁灭〉》，署名 Smakin，发表于1932年1月5日《十字街头》第3期。文章评述由鲁迅翻译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小说《毁灭》的思想内容。热情颂扬1918年到1920年被日本占领的俄国东海滨省（包括海参崴、伯力、赤塔等地）莱奋生游击队英勇战斗的精神，赞扬他们如何“为着新的生活去死，为着建设去破坏”。指出，莱奋生的队伍虽然被敌人“毁灭”了，但“产生着几千几万几十万的莱奋生”，最后毁灭的，“始终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白党的势力”。文章联系到中国，说中国的“莱奋生”已经产生，在“战斗着”、“改造着”。要求“要有满洲的《毁灭》”，但指出，“毁灭的可并不是满洲”，而是“一切种种的猎人、一切种种的猎狗”，即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卖国贼。

12月25日 胡秋原在他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阿狗文艺论》，以“自由人”面目出现，说什么“文学与艺术至死也

是自由的”，不许“强奸文学”等等。次年3月，苏汶（杜衡）在《现代》杂志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自称是“第三种人”，支持胡秋原。接着，胡秋原又在《文化评论》上连续发表《勿侵略文艺》、《答谭四海君》、《文化运动问题》等文章。左翼作家与他们展开一场大论战。瞿秋白同鲁迅、冯雪峰、周扬等一道分别发表文章，批驳“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文艺理论。

12月25日—28日 作《民族的灵魂》与《流氓民德》（12月25日作）、《鹦哥儿》（12月26日作）、《沉默》（12月26日作）、《暴风雨之前》（12月27日作）、《新鲜活死人的诗》（12月28日作）共六篇，合为一组，总题为《水陆道场》，署名司马今，发表于1932年1月20日《北斗》第2卷第1期。《民族的灵魂》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政府以“民族意识”为幌子，卖国投降、奴役人民的丑恶灵魂。《流氓民德》和《鹦哥儿》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主奴关系，和国民党御用文人胡适的帮凶嘴脸。《沉默》和《暴风雨之前》，主要是歌颂人民的反抗精神，预示革命的暴风雨即将到来。《新鲜活死人的诗》抨击“民族主义文学”反对语言大众化的反动性。

12月26日 于《中国与世界》周刊第4期发表《流氓政策和立宪政策》，署名樊梓。文章指出，“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呼声日益高涨，“请愿的恭顺游行，变成了全国的示威的风潮”，而国民党政府的屠杀政策，“一时竟有点儿难于奏效”，于是采用“新鲜花样——流氓政策”，指使流氓来“硬打、硬捉”，“殴打、绑票”。文章揭露其卑鄙的用心：“事后可以推诿，说是出于‘误会’，‘私人冲突’，‘激于义愤’，而实际上达到杀人捉人的目的。”文章痛斥这种流氓政策是镇压民众“最卑鄙、最龌龊、最懦弱、最无耻的手段”。当流氓政策被民众识破以后，国民党当局又要了另外一套“更新鲜更巧妙的把戏”——“就是立宪政策”。文章一针见血地揭露，所谓“训政快要结束，宪政就要实现”，南京政府的所谓“国难会议”

的筹备,汪精卫的所谓“国民救国会议”的号召,等等,其实都是“欺骗手段”,用以“维持地主资本家的卖国统治”。文章号召民众,“要团结,要斗争,要达到建立真正自己的政府的目的”。

下半年 译完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的长篇小说《新土地》,在书前写有“并非乌托邦!”五个大字,作为序文。原版书是曹靖华从苏联寄到上海托鲁迅转给瞿秋白的。译稿原交《小说月报》,拟在该刊1932年第4期上发表。“一·二八”战争中,商务印书馆被焚毁,上述译稿也同时被焚毁。只留下译者的未定稿几页残篇。

年底 把他在莫斯科写的《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修订为《新中国文草案》一书。

本年 作《种地的乡下人怎么样过活呢? (中国农民的生活)》。① 文章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农民一年到头是怎样的“辛辛苦苦的做活,还是吃也不够,穿也不够,住的屋子里冷得要命,弄得不好还要卖男鬻女”,“进了活地狱”。文章进一步指出农民贫困的原因是“田地归地主私有”,“政府在地主资本家手里”,从而给中国农民指明一条唯一的正确出路:在“工人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把国民党的军阀政府推翻”,“把国家大事的权柄,拿到劳动群众自己的手里,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大家平均分配中国的田地。”

本年 作《农民要的是什么? (中国农民的要求)》。

本年 作《苏维埃是什么? 红军是什么?》,以问答的形式和较长的篇幅,详细地解答苏维埃基本制度,介绍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性

① 本篇与《农民要的是什么? (中国农民的要求)》、《苏维埃是什么? 红军是什么?》、《组织女工代表会的根本原则》、《中国无产阶级要做什么?》、《反对国民党的鬼法律》、《工农兵会议的劳动法》、《谁要国民会议!》、《工农兵会议大革命!》、《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苏联是工人的祖国》共11篇,曾由作者编为《茂声集》(二),迄未出版。1991年编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手稿现存中央档案馆。

质和国民党的国民会议的根本区别，苏维埃制度下劳动群众享有的各种民主权利，中央和地方各级工农兵代表会议的产生和权力，中央和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组织和职能，还具体介绍了苏维埃政府劳动法、土地法的基本内容，以及关于青年、妇女、少数民族和外交等政策。文章介绍中国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武装起来的军队，是完全受工农兵会议政府的指挥的”，还讲解了红军和军阀军队的根本区别。文章因受时代的限制，不免有某些“左”的成分，如没有把资本家区别为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对于富农和地主剥削阶级及其子女，也没有加以区分，等等。

本年 作《组织女工代表会的根本原则》，阐述了女工代表会的重要作用，指出女工代表会是共产党联系广大女工群众的一种方式，女工代表会应当是“共产主义的最初步的学校”，“教育女工的先进阶层，在实际工作上去锻炼她们”，“吸引全部的工厂妇女群众的注意”，“听从女工代表会议的决定”。

本年 作《中国无产阶级要做什么？》，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真是苦极了”；“工钱少”，“劳动条件坏”、“工作时间长”、“工作来得繁重”、“失业”、“没有自由”等，过着人间“活地狱”的生活。文章号召中国工人，“要结团体”，“组织赤色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齐心协力进行斗争，争取解放。

本年 作《反对国民党的鬼法律》，揭露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工会法和工厂法的反对工人和保护资本家的阶级实质。文章指出国民党的工会法“不准工人自由组织工会”、“不准工会领导罢工”、“不承认工人和资本家订的条件”；指出国民党的工厂法规定“手工工人、小工厂工人，完全不适用工厂法”、“大工厂的工作时间，照法律也可以延长到十小时，甚至十二小时”、“照法律礼拜可以不放工，休息的时间和日子非常少”、“资本家‘官厅可以随便规定最低工资’”等等。

本年 作《工农兵会议的劳动法》，介绍苏维埃劳动法的主要内容，说劳动法规定“工人完全自由结工会，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还要监督资本家。工人罢工、怠工完完全全有自由”，“一律只做八点钟工……一礼拜一定要放四十二点钟的假，并且要给工资”，“女工生育期间要放她十六个礼拜的假，工钱要照给”，文章还介绍许多优待童工、青年的具体规定，以及劳动保护、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规定。文章认为“这才是真正保护工人的法律”，要求大家“要拥护”。

本年 作《谁要国民会议！》、《工农兵会议大革命！》、《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苏联是工人的祖国》。

本年 译《德国革命的失败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问题——从苏联共产党第十三次大会到第十四次党务会议》和《苏联发展的总路线和新经济政策的“重新估价”》，迄未发表，曾由作者收入自编的《英雄死后》（一），但也未出版过。前一篇，1991年被编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①

本年 译《列宁主义克服托洛茨基主义——苏联共产党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斗争》和《从恢复时期到建设时期——从1926年到1927年苏联的经济政治状况》，迄未发表，曾由作者收入自编的《英雄死后》（二），但也未出版过。1991年均被编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②

①② 手稿现均存中央档案馆。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壬申)

三十三岁

1月2日 于《中国与世界》周刊第5期发表《三民主义的清算》，署名樊梓生。

1月9日 作《论弗理契》，署名宋阳，发表于9月15日《文学月报》^①第3期。文章论述了苏联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弗理契的艺术理论及普列汉诺夫对其影响。文章称弗理契是“专门研究文艺科学的第一人”，在马列主义的文艺科学上有“很大的进步”。赞扬他在文艺方面的功绩是“非常之伟大的”，“留下了真正有专门科学价值的著作”。但文章着重分析了弗理契受普列汉诺夫的影响。指出，弗理契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是俄皇的专制时代，其理论上的出发点大半还是普列汉诺夫的学说。虽然后来他批评了普列汉诺夫，参加了“反对各错误的倾向的斗争”，但“普列汉诺夫对于他的影响是太大了”，“始终还没有完全脱离普列汉诺夫的影响”。所以弗理契常常“自己和自己矛盾”，“他的几部极有价值的大著作，例如《艺术社会学》、《欧洲文学史大纲》等等，也不免包含着机械论的错误”。文章认为弗理契艺术理论中的一个主要错误，即所谓“逻辑主义”，就是受普列汉诺夫的影响。指出弗理契“没有充分的估

^①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之一，1932年6月20日于上海创刊，姚蓬子、周起应(思扬)先后任编辑，1932年12月15日，第1卷第5、6期合刊出版，后被国民党查禁停刊，该刊出版发行6个月，共出版了1卷6期。

计艺术发展的历史的具体性，而只想找出一条最一般的发展公律”，“忽略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条件”，不承认“艺术功用的内容是随着各种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同的”。文章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承认有“逻辑主义”这种科学的，列宁对于普列汉诺夫的这种“逻辑主义”，曾经给予“极严厉的批评”。

1月15日 于《中国与世界》周刊第6期发表《有国大家卖》，署名樊梓。

1月16日 作《苏联文学的新阶段》，迄未发表，后编入8卷本《瞿秋白文集》第3卷和《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

1月17日 作《国民党各派的一致和矛盾》，署名狄康，发表于1月21日《斗争》创刊号。

1月18日 作《当前的重要问题》，署名樊梓，发表于1月29日《中国与世界》周刊第8期。

1月21日 蒋介石重返南京，同汪精卫联合执政。

1月28日 日本侵略军在上海闸北、江湾、吴淞发动进攻，蔡廷锴等率领十九路军奋起反抗。这就是有名的“一·二八”事变。1月31日起，沪西区日商纱厂工人连日举行大规模的反日大罢工。

1月 作《财神还是反财神》，发表于《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文章突出地描绘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狰狞面目，指出他们勾结中国地主资本家吮吸着劳动人民的血汗是中国灾难的根源。文章说，“英美法日的大财神”，“垄断着中国的市场，支配着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资本家则是拼命地为外国财神收罗他们需要的中国的土特产等，并与他们“竞赛”：“谁剥削工人，剥削得凶些。”“于是乎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工人，从五六十岁到五六岁，从天亮六点钟到天黑六点钟，甚至从鸡叫到三更，都在天天挤出自己的血汗，替中外财神‘造产’。”

有财神就有反财神。文章热情地歌颂了反财神的中国人民“反

抗运动”的力量。把这种力量描绘成“从地心里喷出的火山”，喷出的万丈火焰，将“烧掉一切种种腐败龌龊的东西”。

2月10日 作《太平洋战争中的上海问题》，署名樊梓，发表于2月26日《中国与世界》第10期。文章分析了上海事变发生后，各帝国主义对华的政策、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同时指出：上海事变之中，“已经看见帝国主义列强真正一致的镇压中国的革命民众和反帝国主义运动——一致同意日本占领上海华界和禁绝反日运动等等，尤其一致的是奖励日本加紧准备反苏联的战争。”文章说：美国必然要趁日本增兵上海的机会，“立刻调动大批的军舰和很多的军队到上海来”，“英、法等国也都派兵”，“准备太平洋战争”。文章动员中国民众，“应当赶快团结起来，和兵士共同组织自己的武装势力，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并且打退美国、英国……的帝国主义军队”。

3月1日 作《谈谈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署名范亢，发表3月11日《红旗周报》第31期。强调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的重要性，并提出如下的意见：第一、工厂小报，“一定要用口头读出来普通工人可以懂得的话来写”，即用“真正的白话”、“浅近的白话”来写；第二、消息要“具体”、“切实”、“不夸大”、“不吹牛”，能“鼓动群众起来斗争”；第三、“工厂小报要根据党的政策，运用这些具体的事实，去动员群众”，“要登载简单明了的论文”；第四、“工厂小报要组织自己的访员、自己的通信员”，“工厂小报的编辑委员会要吸收非党的工人参加，要讨论而共同决定对于事变的态度和政策”，而后写成社论；第五、上面的意见“都可以应用到一般的群众报纸”，第六、“群众报纸和工厂小报都需要发展工人通信员运动”；第七、“群众报纸和工厂小报都应当组织读者的读报会”。

3月5日 重写《大众文艺的问题》。

3月6日 作《国民党出卖上海的无耻勾当》，署名范亢，发表

于3月18日《红旗周报》第32期。

3月10日 作《谈谈〈三人行〉》，署名易嘉，发表于5月1日《现代》月刊第1卷第1期。文章评价了茅盾小说《三人行》，指出这部小说写得不成功，对人物的刻画，“脱离着现实的事变，并且没有构造一种假定的事变来代表社会的现实”，采用了“机械主义的公式的写法”，而且“没有中心的，没有骨干的”。对侠义主义、虚无主义、市侩主义的暴露和批判，都不够深刻，明确指出“《三人行》的暴露虚无主义的斗争是失败了”。因而“作者的革命的政治立场，就没有能够在艺术上表现出来”。但是，文章最后肯定了茅盾是当时杰出的作家，“他的思想的水平线和科学知识的丰富，超出于许多自以为‘写实主义文学家’之上”。文章作出上述的评析当然是正确的，但对《三人行》失败原因的分析，在提法上有所失误，文章要求作者“用极大的努力，去取得普洛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方法”，把“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混淆了起来。

3月10日至20日 作《新英雄》，此为总题，由如下小题组成：《不可多得的将才》（3月10日）、《拉块司令》（3月13日）、《小诸葛》（3月15日）、《老虎皮》（3月18日）、《“匪徒”》（3月20日），发表于5月20日《北斗》第2卷第2期。

3月11日 于《红旗周报》第31期发表《从马占山到蔡廷锴》，署名范亢。对马占山2月曾一度被迫投降日军，参与发起成立所谓满蒙独立国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文章因受当时党内极左路线的影响，错误地否定了蔡廷锴在“一·二八”事变中率领十九路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爱国行动。

3月12日 作《国民党还配谈领导权吗？》，署名范亢，发表于3月25日《红旗周报》第33期。

3月16日 于《红旗周报》第32期发表《国民党出卖上海的

无耻勾当》，署名范亢。

3月16日 作《江北人拆饼头》(通俗唱词)，与所作的另一篇《英雄巧计献上海》，曾收入1940年1月1日霞社出版的《街头集》。1986年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

3月26日 作《工人阶级和上海和平会议》，署名范亢，发表于4月8日《红旗周报》第35期。文章谴责国民党政府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妥协退让的卖国勾当。指出：国民党政府不但“故意不派救兵到上海来”，反而“用欺骗和压迫的手段，故意把上海和吴淞送给日本，出卖英勇作战的兵士群众”。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在和日本帝国主义开停战会议，答应“从上海退出的中国军队驻在现在的地点，不得开回上海，以待日后解决”。文章在叙述“上海的兵士群众牺牲了成千成万的性命”之后，特别歌颂了工人群众在这次淞沪战役中的重要贡献，文章说：“上海的，尤其是杨树浦、闸北的工人，牺牲了几千几万的性命，20几万的工人失业，两个月的饥饿和遭难，没有吃，没有住，丧失最后一点衣服被铺，他们英勇的不顾一切，自动的组织武装游击队，自动的加入军队，去打日本资本家派来的军队。”最后，要求中国工人阶级反对“所谓停战会议”(即所谓“和平会议”)和“国联调查团”，“领导中国的一般劳动民众和士兵起来斗争”。上海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民众，“应当组织武装的力量，开始进攻日本军队的游击战争”，通过选举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作为“临时的政府”，“进行统一指挥”。文章认为，这样“就一定能够打胜仗，就一定能够解放中国，就一定能够打倒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

3月30日 修改杨之华译稿：苏联绥拉菲摩维支的小说《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并撰写这两部小说的《译者后记》。这两篇译作曾由鲁迅编入1933年3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均署名文尹。1954年曾据以辑入8

卷本《瞿秋白文集》第8卷。1986年辑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4卷。

3月 作《上海战争与战争文学》（后由作者编入《乱弹》时，改题为《战争文学》），署名同人，4月25日发表于左联机关刊物《文学》第1卷第1册。文章谴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揭露和批判了抗日救亡运动中各种反动和错误的文学流派，指出所谓“民族主义”，就是卖国主义。“民族主义文学”是“欺骗民众”的把戏。文章提出了革命文学的新使命，号召“大家都要赞助以至于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但是，同时必须反对压制和出卖‘革命的民族战争’的中国地主资产阶级。”

3月 中央文委负责人潘梓年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的一间雅座里，举行了玲、叶以群、田汉、刘风斯等人的入党仪式。瞿秋白代表中央宣传部出席，并讲了话，对新入党的同志给予热情的鼓励。

春 在上海得到一本俄文书《中国故事》，非常高兴，特别喜欢其中的《八月四日夜晚》这一节。这一节是描写武汉国民党的土地委员会开会的情况，揭露汪精卫叛变前武汉那一伙国民党要人在农民革命运动面前暴露出来的丑恶嘴脸，写得活龙活现。作者是身临其境的一位俄国人^①。瞿秋白向杨之华赞扬这本书，说：“故事是真实的，人物刻划得很深刻，描写得很生动。这不只是苏联朋友写得好，主要是我们农民兄弟干得好！”并鼓励和帮助杨之华把《八月四日夜晚》这一节译成了中文。瞿秋白对译文逐字逐句作了校正。^②

春 “一·二八”之后，上海明星电影公司邀请夏衍、郑伯奇、

^① 据杨之华回忆，作者可能是武汉时期一位国民党土地问题顾问（俄国人）沃林。

^②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72、73页。

阿英去当编剧顾问。当时，党内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瞿秋白发表意见，认为将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电影——共产主义电影，可是现在还有困难，在资本家那里不能搞无产阶级电影，只能在条件许可下，一有机会就塞进去一点进步的思想。最后瞿秋白说：“好吧，不妨试一试。认识一些人，做一些工作，培养几个干部。不要急于求成，困难是很多的。”他还提醒大家要警惕，不要和电影界同流合污。^①在瞿秋白的指导下，组成了电影界第一个党小组，由夏衍负责。

4月1日 于《红旗周报》第34期发表《中国的假革命党和中俄复交问题》，署名范亢。

4月9日 作《国难会议和民宪协进会的丑态》，署名范亢，发表于4月25日《红旗周报》第37、38期合刊。揭露国民党召集的“国难会议”和国难会议的部分议员所组织的“民宪协进会”的反动本质，指出这是“地主买办军阀资产阶级进攻工农的两种策略”。文章分析了国难会议的两项议程——御侮、剿匪、救灾，指出“救灾”是一种点缀，至于“御侮”，政府说：“御侮必先剿匪，剿匪即是御侮。”因而国难会议实际上“完全是商议进攻苏维埃红军，屠杀工农，压迫反帝国主义的民众革命运动”。而民宪协进会的宗旨，“和国民党国难会议是没有丝毫的不同的”，他们提出的所谓“实现宪政”，也同样是对民众的一种“欺骗”。

4月18日 作《日本对苏联的不断挑衅》，先后发表于4月20日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油印本）第10期、5月15日《红旗周报》第40期，前者署名狄康，后者署名范亢。文章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设立所谓满洲“独立国”，其主要目的还在于“进攻苏联”。文章揭露了日本政府进攻苏联的军事计划，并列举事实

^① 夏衍：《追念秋白同志》，《文艺报》，1955年第12号；《历史的回顾》，《文艺研究》，1979年，第4期。

证明日本正在为实现这个侵略计划而积极进行准备：“派张海鹏去打黑龙江”；“暗中接济马占山的军火”，“反过来说苏联接济马占山，造出许多稀奇古怪的谣言”；“进攻齐齐哈尔，包围并且截断中东路”；“日本军队开进哈尔滨”；“成立满洲‘独立国’”；“在满洲组织‘白俄军’”；“用飞机侦察苏联边境”；“中东路上发生许多炸弹案”，并诬称“这是赤党的行为”，“是苏联的指使”；等等。文章要求“日本和中国的工农群众，要动员自己的力量，为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也就是为着反对（日本）进攻苏联的战争而斗争”。

4月22日 为华汉的小说集《地泉》^①作序，题作《革命的浪漫谛克》，评价华汉的三部曲——《深入》、《转换》、《复兴》。文章批评《地泉》的描写“最肤浅最浮面”，“不但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事业，甚至于也不能够‘解释这个世界’”。指出，“一切人物都是理想化的，没有真实的生命”，“文字是五四式的假白话”。但序言分析的结果，却又得出一个错误的提法：“浪漫主义是新兴文学的障碍”，“应当走上唯物辩证法的现实主义的路线”。显然，这个提法反映了瞿秋白受到苏联的“拉普”派的一些影响，把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混同起来了。

4月24日 作《申报的武断宣传》，署名范亢，发表于5月2日《红旗周报》第39期。

5月4日 作《“我们”是谁？》，通过评述郑伯奇以笔名何大白发表的《大众化的核心》这篇短论，批评当时一些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的“病根”——“脱离群众”、“蔑视群众”的错误态度。瞿秋白严肃地指出：“这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决心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还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教师，而根本不肯‘向大众去学习’。”对于大众化的口号，他们是“口头上赞成”、“事实上

^① 《地泉》于1932年7月25日出版，华汉即阳翰笙。

反对”和“抵制”。瞿秋白要求文学家必须“解决所谓生活大众化的问题”，必须“走到群众里去”，“向群众去学习”。瞿秋白强调，文艺大众化运动，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使之成为“劳动群众自己的运动”。他要求文学家要组织群众并同群众一道去“创造出革命的文艺”，要用“最浅近的真正白话文，创作广大的群众读物，销行到广大的贫民区域”，要经常批判“反动文艺”，批判“反动意识”。他还要求文学家要“发展工农兵士的通信运动，培养工人作家”。

5月5日 作《欧化文艺》，迄未发表，1953年编入8卷本《瞿秋白文集》第3卷，1985年编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文章认为欧化艺术的特点，在于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反映资本主义的社会艺术，表现许多新的现象，提出许多新的问题，进而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受到挫折，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但不能完成民权革命政治上的任务，同时也不能完成“民权主义的文化革命”。他说，资产阶级公开叛变革命以后，中国文艺战线上，特别是欧化艺术之中发生了激烈的阶级分化：“资产阶级的欧化艺术在内容方面完全投降了买办的封建的意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开始发展出来。”因此，瞿秋白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开始有系统的斗争，去开辟文艺大众化的道路。只有这种斗争能够保证无产阶级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权，也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能够保证新的文艺革命的胜利；打倒中国的中世纪式的艺术，取消欧化艺术和群众的隔离状态，肃清地主资产阶级的艺术影响。”欧化艺术如何实现“大众化”、“革命化”？瞿秋白认为：第一，“必须继续完成中国的文学革命”，“要用真正的中国白话文”，“读出来的时候可以听得懂”；第二，要注意“一切作品的体裁”，“像《静静的顿河》那样，运用平常的不怪僻的形式”；第三，“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和国际革命艺术的创作，也都要用大众化的方法介绍到中国来”。

5月6日 译高尔基的论文《冷淡》，发表于7月20日《北斗》

第2卷第3、4期合刊。

5月8日 作《中国大革命史应当是这样写的吗?——对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的批判》，发表于7月《布尔塞维克》第5卷第1期。

5月18日 作《“自由人”的文化运动——答复胡秋原和〈文化评论〉》，发表于5月23日《文艺新闻》第56号(未署名)。文章批判了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和“艺术至上”的思想，指出：“胡先生叫着：‘Hand off arts!’——不准侵略文艺！你是叫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不准侵略文艺？而事实上，中国的，以及东洋西洋的统治阶级，地主阶级或者资产阶级，都在用文艺做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你的叫喊，事实上，说客气些，客观上是帮助统治阶级——用‘大家不准侵略文艺’的假面具，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文章还以1926—1927年发动的伟大的民众的文化革命的实际，否定了胡秋原指出的“现在要‘自由人’的‘知识阶级，负起文化运动的特殊使命’，来‘继续完成五四之遗业’”的错误观点，指出，事实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着这新的文化革命”，“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

5月21日 作《中国的经济和阶级关系——对于方亦如的批评》，署名何史文，发表于7月《布尔塞维克》第5卷第1期(即终刊号)。本篇和另两篇，即《孙倬章先生的土地问题》、《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曾由作者编为《战鼓集》(一)，迄未出版，1991年被编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手稿现存中央档案馆。《中国的经济和阶级关系》一文针对方亦如在当时《研究》杂志第1期发表的《中国经济问题》，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文章说，方亦如“是个学究主义的‘英雄’”，否认“用阶级关系去考察社会的经济性质”。文章认为方亦如在许多地方“曲解马克思主义”：(一)“把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隔离开来”；(二)“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分割开来”；（三）“把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分割开来”。指出方亦如没有明白回答当时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争论，但在“实际上始终暴露了他否认封建势力的统治”。最后瞿秋白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中世纪式的剥削关系”，“封建残余势力仍占着优势”，因而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的基本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彻底的完成民权革命的任务。”

5月30日 作《孙倬章先生的土地问题》，署名 A·T·T，迄未发表，曾被作者收入自编的《战鼓集》（一），也没有出版过。1991年被编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孙倬章先生的土地问题》一文针对孙倬章先后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中国经济的分析》、《中国土地问题》，揭露和批判孙倬章“反对现实的土地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文章说，孙倬章先生“不看见中国经济上因为封建性的土地使用关系还占着绝对的优势”，否认“中国是半殖民地的特点”，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不承认中国“还有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对抗——封建性的阶级对抗”，更不承认“农民群众要求没收地主的现实的斗争”。文章批判孙倬章先生“把中国的土地私有制度之下租佃关系的封建剥削等等，完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关系混淆了起来”，认为这是他“曲解、瞎缠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5月31日 作《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署名 A·T·T，迄未发表，曾被作者收入自编的《战鼓集》（一），也没有出版过。1991年被编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上理论上的武器”，无产阶级运用这种武器，“不但要去认识世界，并且要去改造世界”。文章说，王礼锡、胡秋原等曾开办《读书杂志》，征求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文章。瞿秋白批判王礼锡等的这种所谓“唯物辩证法”，实际上“是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

变成折衷主义的诡辩法”。

5月 译《马克思》(列宁作)

5月 作《列宁的青年时代》、《马克思的学说》。

5月 茅盾中篇小说《路》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茅盾在《〈路〉校后记》中说:《路》是“因为《教育杂志》的主持人希望小说的内容和教育有点关系,所以我就写了学生生活。本来写的还是中学生,后来有位朋友以为应当是大学生,我尊重他的意见,也就略加改动,使由‘中’而‘大’。”这个朋友就是瞿秋白。瞿秋白看了书稿开头几章,认为应当把中学生改为大学生,茅盾采纳了他的建议。《路》出版了以后,瞿秋白通阅了全书,又提出书中某些恋爱的情节可以略去,后茅盾于该书再版时,删去了三四页。^①

5月 作《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署名易嘉,发表于5月20日《北斗》第2卷第2期。文章肯定五四运动为中国的文化“的确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五四式的新文艺总算多少克服了所谓林琴南主义”,批判了守旧派。接着指出文化运动发生了“阶级分化”;“中国的绅商——地主资产阶级,再也不需要什么文化革命”,他们拼命地要“咬死新兴的真正巨大的文化革命”,五四时主张推翻礼教的人,也拼命地反对“乡下人劈掉神主牌位,打掉泥塑菩萨”,“反对真正的民权主义”;新兴的中国无产阶级继续成为“伟大的五四精神的社会力量”,继承了“五四的宝贵的遗产”,“彻底反抗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并将文化运动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新的文化革命已经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发动起来”。文章在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奴才性的‘精神文化’”以后,提出了新的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革命,“应当反对一切封建残余的文化上的束缚,肃清封建残余对于群众的意识上的影响,打

^① 见梦花:《瞿秋白和茅盾》,《瞿秋白研究资料》,下册,江苏省社联等编印。

倒一切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奴才思想，……彻底的完成五四所开始的伟大的斗争。”文章论及当前文艺创作方针时，特别强调：“一定要能够表现革命战斗的英雄”；“一定要能够揭穿一切种种假面具”，“剥削制度”，“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等。

6月1日 于《中学生》第25号发表传记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列宁》，向广大青年学生介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家世、青年时代的生活和他们的革命活动。在这一期《中学生》中，还发表了他的传记文章《托洛茨基》，批判托洛茨基的英雄史观。

6月10日 给鲁迅写了一封近6000字的长信，亲切地称呼鲁迅为同志。瞿秋白在信中首先对鲁迅送他一本《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杨筠如著）一书，表示感谢。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谈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整理问题。此信对研究中国文学史具有重要价值。瞿秋白在信中阐述了中国门阀制度（即等级制度）的“长期的历史和转变”，分析了等级制度和文学史的关系。他说：“中国的等级制度既然有这样长期的历史和转变，有这样复杂的变动的过程，它在文学上是不会没有反映的。文言文学和白话文学的划分，显然带着等级的痕迹。”他在信里还分析了“贵族文学”和“市民文学”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关系。瞿秋白在信里还谈到研究资产阶级文学的“史前时期”的重要性。他说：“从元曲时代到五四以前，可以说是现代的（资产阶级式）文学的史前时期。”“这部分的历史比较更加重要。我想要写文学史必须把这部分特别提出来，加以各方面的研究，象现代各国的文学一样，从这种文学的言语，体裁，技巧的进展，一直到很细腻的内容上的分析。”

6月19日 父亲世玮（即稚彬）于山东济南正宗坛逝世，葬于济南第二公墓。墓碑上刻写：“先考稚彬公之墓”，“民国壬申仲夏五月十六日申时寿终”，“珪、铨立”。^①

^① 王毓仙：《瞿秋白论稿》，第168页。

6月20日 致信鲁迅,再次讨论翻译问题。该信曾发表于1932年7月10日《文学月报》第1卷第2期。

6月 作《怎么干那个“怎么干”?》。

7月 作《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署名宋阳,发表于10月15日《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与茅盾(止敬是茅盾的笔名)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讨论。

7月 作《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署名易嘉,发表于10月1日《现代》第1卷第6期。文章根据列宁的观点,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批判了胡秋原、苏汶的文艺观。认为胡秋原的所谓“自由人”的立场,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他的所谓“唯物史观”,实际上,是“变相的艺术至上论”,是“一种虚伪的客观主义”。进而指出胡秋原论点的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文艺的阶级性,否定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服务,文章说:“他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瞿秋白还着力批判胡秋原的“文艺只是消极反映生活,没有影响生活的可能”的观点,明确指出:“一切阶级的文艺却不但反映着生活,并且还在影响着生活;文艺现象是和一切社会现象联系着的”,“在相当程度之内促进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瞿秋白在文章中,也批评了苏汶否认文学的阶级性的理论。苏汶把文学比作“卖淫妇”,说每个阶级都“想占有她”,认为在阶级斗争中最吃苦的就是所谓“第三种人”的“作者之群”。瞿秋白予以反驳,指出,“文学并不是卖淫妇”,“文学是附属某一个阶级的,许多阶级各有各的文学,根本用不着你抢我夺”。瞿秋白否认有“第三种人”的“作者群”,他说:“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该文和同类的文章发表后,深得鲁迅高度赞赏,他说:“真是皇皇大论!”

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①就是被批判的胡秋原对瞿秋白的批判文章，也不得不表示佩服，他曾说：“我赞美易嘉先生的态度，倘若左翼理论家都能这样平心静气地讨论真理，我想，大家一定愿意参加。”^②

8月 翻译苏联别德纳衣的讽刺诗《没工夫唾骂》，发表于10月15日《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

夏秋间^③ 一个清晨，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由冯雪峰陪同来到上海北川公寓三楼，第一次和鲁迅会面。两人一见如故。为庆贺初次相见，瞿秋白虽然忌酒，但破例小饮些酒。彼此倾心交谈，至晚始别。

9月1日 上午，鲁迅夫妇携海婴到南市谢家瞿秋白居处回访瞿秋白夫妇，“在其寓午餐”^④。

9月14日 瞿秋白夫妇到北川公寓访问鲁迅，鲁迅“留之饭”。^⑤

9月18日 鲁迅收到瞿秋白的信和赠海婴的金铃子等礼物。^⑥

10月24日 鲁迅购买《现代散文家批评》两本和《文始》一本赠送给瞿秋白。

11月8日 作《美国的“同路人”》。

11月10日 应冯雪峰之约，为他代写《并非浪费的论争》一

①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31页。

② 转引自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32页。

③ 丁景言：《关于瞿秋白和鲁迅第一次见面的问题》，《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按：据许广平回忆，瞿秋白和鲁迅初次相见是1932年“春末”或“夏初”（见《回忆鲁迅》第118页），笔者认为丁文可信。

④ 《鲁迅全集》第15卷第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

⑤⑥ 《鲁迅全集》第15卷第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

文，署冯雪峰的笔名“洛阳”，回击胡秋原。^①

11月11日 作新打油诗二章《向光明》。

11月15日 一个署名芸生的人，于《文学月报》第1卷第4期发表长诗《汉奸的供状》。当时，冯雪峰认为“这是完全违背党的策略的”，建议“公开纠正”。瞿秋白同意冯雪峰的意见。鲁迅也认为这是流氓作风，应主动“公开纠正”，于是写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发表于《文学月报》第1卷第5、6期合刊。^②

11月下旬 杨之华被叛徒盯梢，瞿秋白得到警报，立即只身到鲁迅寓所避难。当时，鲁迅已去北平探母，至30日始归。瞿秋白和鲁迅彼此相处，“实在融洽之极”。他们都很关心杨之华的安全，请一位同志找到杨之华，并甩掉“尾巴”，来到鲁迅家。^③

11月 作《非政治主义》，当时未发表，1953年、1985年先后编入8卷本《瞿秋白文集》第2卷、《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文章首先认为，每一个文学家其实都是政治家。艺术在任何时代，都是一定阶级、一定派别的“意识形态的得力的武器，它反映着现实，同时影响着现实”。进而批驳新月派非政治倾向，超阶级文学。指出：“有些作家的作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没有丝毫的‘政治臭味’。这种作家其实也是政治家。”责问他们：用“为艺术的艺术”的假招牌和“虚伪的旁观主义”诱惑读者，使读者“有点儿特殊的消遣”，“避开严重的政治问题”、“避开对于社会问题的答复”，“这难道不是政治”？瞿秋白认为新月派，“口头上否认着政治，实际上正

① 胡秋原曾于1932年《现代》第2卷第2期发表《浪费的论争》，冯因忙于其他工作，托瞿秋白代写此文批驳胡文。

② 据冯夏熊：《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按：长期来，是阿英把“芸生”误称为“瞿秋白”，查芸生是邱九，宁波人，当时是共产党员。

③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33—134页。

在实行着自己的政策,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更方便些,更巧妙些,更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论及进步的文艺家与宇宙观、社会观的密切关系。他说:“有些艺术家主观上甚至于是革命的”,但是“他们以为只要客观的描写出现社会的现象,艺术家的任务就完结了。至于社会的发展,那自然而然的是光明的势力将要占优势的,艺术家何必有什么‘目的意识’呢!”瞿秋白予以否定,他指出:“自然,单有革命的‘目的意识’是不能够写出革命的文学的,还必须有艺术的力量。然而运用艺术的力量,又必须要有一定的宇宙观和社会观”。他认为,如果是资产阶级的宇宙观和社会观,那所谓“客观的描写”,所谓“艺术的价值”,必将“间接的替现存制度服务”,同时,“那种替‘纯艺术’辩护的态度,恰好被反动阶级所利用”。^①

11月 译作《不平常的故事》(高尔基作)由上海合众书店出版,译者署名史铁儿。另有龙虎书店版。1947年5月诚文出版社翻印,译者署名石人。

11月 将诗文四题《“Apoliticism”——非政治主义》(11月)、《美国的“同路人”》(11月8日)、《“爱光明”》(11月10日)和《“向光明”——新打油二章》(11月11日)编辑成集,名曰《骷髅杂记》,并作一篇短序。作者生前,该集从未发表过。1953年、1985年先后被编入八卷本《瞿秋白文集》第2卷、《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

12月7日 以魏凝署名给鲁迅录赠他青年时代的旧体诗一首。诗曰:“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诗后附题跋:“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情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录呈鲁迅先生。”瞿秋白与鲁迅推诚相见,并勇于剖析自己。后来许广平评述说:瞿秋白“在诗后说明是青年时代带有颓唐气息的旧诗

^① 《瞿秋白选集》第520--523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

体。以他后来的积极进行革命工作，无疑是否定了前期思想的不正确成分的。但我们若从‘雪意凄其’之句来看，不仍是对此时此地遭遇压迫的写照吗？而末句说‘犹折梅花’，则是梅开十月，已属小阳春节气，也即‘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意思。”^①

12月9日 瞿秋白夫妇以高价托人在某大公司买了一盒积铁成象玩具，作为礼品赠给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瞿秋白料到自己随时会有不测，说：“留个纪念，让小孩大起来也知道有个何先生。”^②

12月10日 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发表后，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等4人在《现代文化》杂志第2期上发表一封公开信，反对鲁迅的观点，说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等。瞿秋白看到首甲等人的文章后，很有意见，便写了《鬼脸的辩护——对于首甲等的批评》，支持鲁迅的正确观点，替鲁迅进行辩护，他说：“‘恐吓决不是战斗’的鲁迅决没有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而自己愿意戴上鬼脸的首甲等却的确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他认为鲁迅提出“辱骂决不是战斗”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指出“替这种辱骂来辩护，那才不知道是什么倾向的什么主义了。可以说这是和封建‘文化’妥协的尾巴主义。”最后瞿秋白又分析说：“这种恐吓和辱骂显然不能够揭穿什么奸细的漂亮外衣，显然反而降低了普洛文化运动的任务。”而鲁迅那封信，“倒的确是提高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值得我们的研究。”他希望首甲等人不要空喊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要正确了解和纠正自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12月11日 译就《高尔基论文选集》，并写了前言，后由鲁迅辑入《海上述林》上卷《辨林》，于1936年5月出版。《论文选集》内收入高尔基的书信、论文、随感共23篇和一篇自序。瞿秋白对高

^{①②}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124页，作家出版社，1961年。按：何先生是瞿秋白到鲁迅家时，鲁迅对他的称呼。

尔基及其作品给以极高的评价,指出:“高尔基是新时代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他……决不会把现实主义解释成为‘纯粹的’客观主义”,高尔基的作品是“三四十年之中的俄国历史的反映”、“反映着世界的伟大战斗的各方面”,“反映着新的社会建设的过程”。他肯定高尔基的作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瞿秋白还突出地以高尔基的“两种真实”论,阐发了他对于真实的看法。他概括介绍高尔基在“真实”问题上的基本论点,高尔基认为真实有“两个”:“一个是临死的,腐烂的,发臭的;另外一个是新生的,健全的,在旧的‘真实’之中生长出来,而否定旧的‘真实’的。”瞿秋白希望这本论文集将对中国发生积极的影响,“能够帮助一般读者了解苏联的各方面的社会现象,了解国际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能够帮助中国的文学界更深刻的提出许多从来没有人注意的问题。”

12月11日 瞿秋白夫妇即将离开鲁迅家。当晚,鲁迅夫妇特别烧了好几只菜,招待冯雪峰、瞿秋白夫妇,鲁迅三弟作陪。

12月中旬 一天深夜,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受党的委托,乘坐黄包车来到鲁迅家,把瞿秋白夫妇接出,转移到安全地方去。鲁迅非常担心瞿秋白夫妇和陈云在路上的安全,便问陈云:“深晚路上方便吗?”陈云回答说:“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分别时,鲁迅还有些不放心,又对瞿秋白说:“今晚,你平安到达那里,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瞿秋白应声后,和鲁迅夫妇告别了。①

12月12日 鲁迅致信曹靖华,告知别德纳衣的《没工夫睡骂》已由瞿秋白译出,发表于《文学月报》上。还说,原想另出单行本,加上插图,而原书被光华书局失掉(疑是故意没收的),所以鲁迅希望曹靖华再觅一本有插图的寄来。鲁迅还附上瞿秋白信一张。②

① 史平:《一个深晚》,《救国时报》,1936年10月30日,按:史平,即陈云。

② 《鲁迅全集》第12卷,第129~131页。

12月25日 下午,鲁迅收到瞿秋白的来信及其赠送的火腿爪一枚,并回赠文旦馅两盒。鲁迅当即复信,表示谢意。^①

12月26日或27日 作一首无题旧体诗:“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畔新名士,正为西门促自由。”诗后附跋。不久,瞿秋白把这首诗书赠鲁迅。这首诗,讽刺了当时上海一些无聊的文人,指责他们在民族危难之际,不但不面向当前的民族斗争,反而在宣扬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麻痹人民的斗志。同时,对改革后的《申报·自由谈》^②的不良倾向表示不满,提出尖锐的批评。瞿秋白在跋语中严厉指出:“欧化白话文艺占领了《自由谈》,正象国民军进北京城”。

12月28日 下午,鲁迅收到瞿秋白的来信和诗,即复。^③

12月 订正1931年所写的《新中国文案》一书,使之更系统化,为后来的汉语拼音打下了基础。该方案共分十个部分:一、绪言,二、字母表,三、声母表,四、韵母表,五、拼音规则,六、书法大纲,七、文法规则,八、拼音和书法的说明,九、拼音表,十、汉音检音表。瞿秋白在“绪言”中论述了文字改革的必要性,指出:“中国的几万万民众,差不多有极大多数是不识字的,即使识得几个字,也还有许多人仍旧不能够自由运用自己的言语和文字。这里,除开根本的原因,还有中国文字本身的困难:汉字的复杂和紊乱,以及文言或者假白话的不能够成为口头上的言语,以至于文字和语言几乎完全分离。所以最彻底的文字革命是十分必要的了。”瞿秋白还认为这种文字革命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正在逐渐的扩大。

^① 《鲁迅全集》第15卷,第44页。

^② 《申报》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刊,是中国近现代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至1949年5月27日终刊。《自由谈》为该报副刊,在1932年12月1日至1934年5月9日期间,《自由谈》由黎烈文主编,锐意革新,登载民主自由的言论。

^③ 《鲁迅全集》第15卷,第45页。

《新中国文案》写成后，瞿秋白曾叫杨之华抄了一份，通过地下交通送到中央苏区去。^①

12月 译就《高尔基创作选集》，并写了《后记》。次年10月由生活书店出版，译者署名萧参，后多次重版。《后记》着重对高尔基的《海燕》（散文诗）、《莫尔多姑娘》、《不平常的故事》3篇作品作了分析，阐明高尔基的作品具有强大的艺术力量，指出高尔基的书“是惊醒我们的书，这样的书‘教会我明天怎样去生活’。”

本年 根据苏联共产主义学院主办的《文学遗产》第1、2期的材料编译了《“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约15万字。内中译文有：恩格斯致巴尔扎克和易卜生的两封信，普列汉诺夫的论文《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唯物史观的艺术论》，拉法格的论文《左拉的〈金钱〉》，瞿秋白根据有关材料编译的评介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等。瞿秋白在《后记》里高度评价了恩格斯所论的两封信，指出：“这里包含着很宝贵的指示，可以看见恩格斯以及一般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现象的观察方法，并且说明文艺理论不但要‘解释和估量文艺现象’，而且要指示‘文艺运动和斗争的方法’。文艺理论不但要说明‘文艺是什么’，而且要说明‘文艺应当怎么样’。”瞿秋白的编译文章，正确介绍和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论述、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等；正确论述了普列汉诺夫的功与过；正确评价了拉法格及其文艺批评。

本年 田汉曾请夏衍向瞿秋白请示，可否把上海百代唱片公司负责人任光争取过来，以便把进步电影歌曲和一些抗日救亡歌曲由百代公司录制唱片广泛发行。瞿秋白对田汉这一意见，表示完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20页。

全赞成,他说,“这是一个好机会。”随后,《渔光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的歌声响遍了中国广大的土地。^①

本年 作《新古董——一篇散文》,迄未发表过,1984年第1期《文献与研究》(内部刊物)曾经登出,1985年编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这是瞿秋白拟将他1927年4月11日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所写的序言编入《乱弹》一书附录时所写的说明。他说,最近在旧书摊上发现“一件新古董——这是一本小书”。书还是1927年4月出版的,但是,“事情仿佛象隔了一个世纪”。他认为书“虽然是新的,可是始终是古董了”。他还认为“那书上的一篇序言,似乎还是篇过得去的散文,读起来怪有趣的,所以把它抄在下面,当做《乱弹》的附录”。

本年 作《上海打仗景致》、《英雄妙计献上海》。

本年 作《当前的问题》,此文没有发表过,1991年编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文章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基本政治形势,指出帝国主义依然要用“战争的手段挽救自己的危机”,详细分析了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中各帝国主义相互利用、相互矛盾和冲突的错综复杂的形势,强调指出:“无论英、美、法、日之间的矛盾有多么大,冲突有多么厉害,他们对于进攻苏联和中国革命,总是共同努力的”,“共同一致的”。这是第一个问题。文章论述的第二个问题,是国民党各派别对待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指出:国民党各派别、各帮口尽管“互相排挤、倾轧、混战”,但他们“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走狗,都是事实上赞助瓜分中国的‘功臣’,自然,也是一致赞助进攻苏联的”。他们“互相竞争着”,以“求得主人的宠爱”。文章揭露日本走狗臧式毅等如何卖国,揭露蒋介石等如何实行“无抵抗主义,缴械,投降,退却”,揭露国民党各派如何“想法子来欺骗民众,维持自己的统治”。

^① 夏衍:《左联杂忆》,《人民日报》,1980年3月1日。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癸酉)

三十四岁

1月28日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瞿秋白十分关注。

1月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

2月初 中共江苏省委提出党组织要帮助共青团“赶上党、超过党”，号召全体党员完成“一个党员发展一个团员”的任务。2月5日，瞿秋白于《列宁生活》第18期发表《帮助团赶上党超过党》，署名铁儿。他认为“团的组织应当比党的(组织)要广大的多”，“它应当吸收更广泛的青工群众参加团的组织”，“建立团的支部”，“争取青工的大多数，围绕在党的周围”；同时要求响应党的号召，“发动最好的团员自动写请求书到(给)党，要求入党”，“发展党的支部”。

2月上旬 因为又一次发生“警报”，瞿秋白夫妇急忙最后离开隐居将近两年的紫霞路住所。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部长黄文容(即黄阶然)护送，再次来到北四川路底鲁迅家避难。这次避难时间较长些。瞿秋白与鲁迅朝夕相处，促膝谈心，十分融洽，详细研究当时文艺界的斗争动态和左联的工作情况。

2月17日 英国著名剧作家萧伯纳来到上海。正在鲁迅家避难的瞿秋白夫妇和鲁迅夫妇合作，连夜选译编写了《萧伯纳在上

海》一书。瞿秋白辑译上海中外报刊上对萧伯纳的不同评论，加上注释和评语，并写了引言《写在前面——他并非西洋唐伯虎》。鲁迅作序。于3月由上海野草书屋出版，署鲁迅的一个笔名乐雯。

2月18日 《申报》发表两篇关于萧伯纳与梅兰芳会见的报道，上海其他报纸和刊物也都发表了这一消息和评论。瞿秋白读后，作《两雄吟》诗一首，描绘萧伯纳和梅兰芳会晤的情景，对他们的相会给以评价。

2月21日 摘译2月15日《字林西报》发自北平的《特约通信》，瞿秋白称它为《〈字林西报〉之北京通信》，原文的小标题是《伪造的监狱书信——并未证实的事件——严刑拷打说毫无根据》。这是一篇反面资料，系该报记者访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盟执委会主席胡适的综合报道。^①后来瞿秋白和鲁迅合作的杂文，引用上述译稿中胡适的话，批判了胡适。

2月21日 日本侵略军和伪军共10万人进攻热河。国民党守军约20万人，完全有力量抵抗日军的进攻。但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奉行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于3月3日率部不战而放弃省会承德，逃到滦东，日军128人进占承德。这就是所谓的“热河战争”。为此，瞿秋白和鲁迅合作写了好几篇杂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

2月25日 署名铁儿，于中共江苏省委编的《列宁生活》第21期发表《我们帮助了团些什么？》，指出团的组织对共青团江苏省委根据省委的指示而发出的“关于‘一二八’发展团员的号召”，“异常冷淡”，发展团员的成绩，“非常不能令人满意”。文章要求，党应当领导并帮助团“开展团内反关门主义的斗争”，积极宣传“争取青工大多数的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要求在“赶上党、超过党的运动周”

^① 参考唐天然：《战友情深——有关瞿秋白和鲁迅的三件史料》，《瞿秋白研究资料》下册，江苏社联等编印。按：译稿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

的最后五天，“紧急的动员起来”，采取积极行动，切实地“完成省委给予每个党员的一个党员发展一个团员的口号”。

2月 在鲁迅家避难时，画一幅《阿Q手执钢鞭图》。这幅阿Q画像系由10个Q的字母组成，画于一页稿纸上面，稿纸为4公分见方，画面上题有阿Q经常得意地唱起的那句唱词：“我手执钢鞭将你打！”^①

3月初 鲁迅托内山夫人为瞿秋白夫妇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东照里（又称日照里）12号，租了日本人住家的一间向南的房间。瞿秋白把房间布置得“俨然家庭模样”。后将鲁迅书赠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挂起来。3月6日下午，鲁迅访问瞿秋白夫妇，并赠杨之华一盆堇花。瞿秋白因住在这里环境比较安定，从3月5日至4月24日相继撰写了许多杂文。这些杂文都经与鲁迅交换意见，由瞿秋白执笔，鲁迅修改而成，并用鲁迅笔名发表于《申报·自由谈》或《申报月刊》。^②

3月5日 同鲁迅合作撰写《王道诗话》，署鲁迅笔名干，发表于3月6日上海《申报·自由谈》。通过转述胡适在《人权论集·序言》中引用明代周栎园所著《栎园书影》中“鸚鵡救火”的故事，进一步揭露和批判胡适的阶级本质，文章再次指出胡适搞欺骗的一手，更着重揭露和剖析胡适又在鼓吹镇压的一手。文章引用了胡适2月21日的谈话：“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接着明确地指出：“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吗？”揭露胡适在向国民党反动派出谋献计。文章末尾又用4首七言绝句，深入揭露胡适。诗曰：文化班

① 见唐天然：《战友情深——有关瞿秋白和鲁迅的三件新史料》，《瞿秋白研究资料》下册，江苏省社联等编印。按：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126～128页；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38页。

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千古同心有孟轲，也教肉食远庖厨。能言鸚鵡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3月7日 与鲁迅合作撰写《苦闷的答复》，署鲁迅的笔名干，发表于3月9日《申报·自由谈》，发表时由鲁迅改题为《伸冤》。指出：“最近的热河事变，中国方面也同样的尽在‘缩短阵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放弃省城，仓惶逃跑，丧权辱国的罪行。

3月9日 与鲁迅合作撰写《曲的解放》，署鲁迅的笔名何家干，发表于3月12日《申报·自由谈》。以戏曲的形式，进一步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在“热河战争”中的卖国政策，揭露其丢掉热河全境的真相，对蒋介石集团进行了有力的挞伐。

3月10日 与鲁迅合作撰写《〈子夜〉和国货年》，署鲁迅笔名乐雯，发表于4月3日《申报·自由谈》。给茅盾的作品《子夜》以很高的评价。文章说：《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长篇小说”，“中国文艺界的大事件——《子夜》的出现——很滑稽的和所谓‘国货年’碰在一起。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国货年呢，恐怕除做《子夜》的滑稽陪衬以外，丝毫也没有别的用处！”文章热情地赞扬茅盾的文学成就，指出他“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文章也实事求是地肯定《子夜》“还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

3月14日 与鲁迅合作撰写《迎头经》，署鲁迅的笔名何家干，发表于3月19日《申报·自由谈》。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自“九·一八”以来一连串的卖国罪行，指出：“日军到沈阳，迎头赶上北平；日军到闸北，迎头赶上真如；日军到山海关，迎头赶上塘沽；日军到承

德，迎头赶上古北口……。”文章还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抗日义勇军的镇压，热烈赞扬了抗日义勇军英勇抗日的爱国精神，称义勇军“的确是极勇敢的小百姓。正因为这些小百姓不懂得圣经，所以也不知道迎头式的策略。”

3月14日 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日。当日，瞿秋白作《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该文一直没有发表。1991年编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文章开头摘录列宁的一段话作为小引，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全世界无产者的关系。正文论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其对中国革命的重大影响。指出，1905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已经在革命党人中流行着”，“到了五四……发生了广大的社会主义‘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很快的‘征服’了许多最优秀的革命青年。此后马克思主义深入群众……而成为伟大的力量。”文章对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各阶级的态度作了较详细的分析。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慌”，他们主张马克思主义“和平化”、“温和化”，甚至说“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是不合国情的革命理论”。文章还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绅士和市侩起先是想借用，随后是想反驳，临了就想一棍子打出去。”中国劳动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是持何态度？文章说，中国几万万群众把马克思主义当成自己谋求解放的“唯一正确的指导”，认为“中国革命也只有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够得到胜利。”文章比较详细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实践意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和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特点，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领导权、工农联盟等根本性的问题，联系实际，揭露和批判了种种冒牌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指出了中国“老革命党”的某些缺点。

3月22日 同鲁迅合作撰写《出卖灵魂的秘密》，署鲁迅笔名何家干，发表于3月16日《申报·自由谈》。

3月 作《一笔糊涂账》、《孙文和“孙文主义”》。

3月 《文艺自由论辩集》由现代书局出版，同年12月再版。集内收入瞿秋白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自由人’的文化运动》、《大众文艺的问题》、《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等6篇作品。

春 蒋介石提出“制定宪法草案”和“召开国民大会”，以结束“训政”，准备实施“宪政”。3月30日，瞿秋白同鲁迅合作撰写《最艺术的国家》，署鲁迅笔名何家干，发表于4月2日《申报·自由谈》。运用迂回曲折的笔法，借谈“艺术”，以“男人扮女人”的艺术表演作隐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宪政民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象艺术，搞变戏法，愚弄群众，要把他们独裁统治的国家“扮成宪政国家”。文章又列举事例，从外交、经济方面，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两面手法——演戏，“而大都是扮演得十分巧妙两面光滑的”。文章最后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作了辛辣的讽刺：“中国真是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

4月1日 于《现代》第2卷第6期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

4月2日 于中共江苏省委编印的《列宁生活》第26期发表《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组织到赤色工会中来》。

4月8日 在编就《鲁迅杂感选集》后，撰写约一万七千字的长篇序言。^①序言对鲁迅的杂文和思想作出了科学评价。瞿秋白是中国最早能全面地、正确地评价鲁迅的人。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评析了鲁迅的思想发展过程及其杂文。序言写道：“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

^① 瞿秋白是于1933年4月8日在上海写《鲁迅杂感选集·序》的，但在写作时间后面署“北平”二字，这是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

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历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瞿秋白肯定了鲁迅“在思想斗争史的重要地位”，给鲁迅的杂文以很高的评价，称赞鲁迅的作品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要求作家向鲁迅学习，和鲁迅一道前进。^①同时，瞿秋白对鲁迅的缺点，也作出中肯的批评和分析。后来许广平回忆说：“鲁迅读了，心折不已。‘只是说得太好了，应该坏的地方也多提一些’。这是鲁迅的感动的话，也是党给予鲁迅的鼓励。”^②同年7月，《鲁迅杂感选集》由青光书店出版。该书的出版震动了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序言》受到社会好评，曾被众多名家引用。

4月10日 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中说：“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史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还说什么“剿匪要领，首须治心”。次日，瞿秋白和鲁迅合作撰写《内外》，署鲁迅笔名何家干，发表于4月17日《申报·自由谈》。揭露了蒋介石提出的“安内始能攘外”政策的反动实质，指出蒋介石的“攘外”是假，“安内”是真，文章说：“对外要安，对内就要攘，或者嚷。”即对日本帝国主义要妥协退让，就必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军事“围剿”。文章还引用何香凝同年3月18日对日日社记者的谈话：“当年唯恐其不起者，今日唯恐其不死。”揭露蒋介石集团迫害革命者的罪行。作者最后深刻分析了蒋介石的“治心”说，指明蒋介石的思想统治彻底失败。

4月11日 鲁迅全家迁至东照里对弄的大陆新村9号（今鲁迅故居）。这样，瞿秋白和鲁迅过往更加频繁。瞿秋白每隔一夜或两夜就要去鲁迅家，而鲁迅几乎每天要到东照里瞿秋白家。彼此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

② 许广平：《秋白同志和鲁迅相处的时候》，《语文学习》，1959年，第6期。

纵情交谈，从政治、时事，到文艺等等，无所不谈，有时两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常常乐而忘返。

4月 同鲁迅合作撰写《透底》，署鲁迅笔名何家干，发表于4月19日《申报·自由谈》。

4月 同鲁迅合作撰写《关于女人》，署鲁迅笔名洛文，发表于6月15日《申报月刊》第2卷第6号。

4月 同鲁迅合作撰写《真假董·吉河德^①》，署鲁迅笔名洛文，发表于6月15日《申报月刊》第2卷第6号。把蒋介石及其一伙，隐喻为假堂吉河德。文章首先区分了真假两种不同的堂吉河德，指出真的堂吉河德是“十分老实的书呆子”，“傻相可掬”，“可怜可笑”；而假的堂吉河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愚弄堂吉河德式的老实人”。作者进而揭露假吉河德故作傻相，以欺骗群众，指出，明知“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明知“国货运动”振兴不了民族工业，他们还要搞什么“国货年”，明知“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他们却偏要高喊“民族精神”，“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文章最后要求人们提高辨别真假堂吉河德的能力，对假堂吉河德的傻相，“要认真和他辩驳”，防止受骗上当。

4月24日 同鲁迅合作撰写《人才易得》，署鲁迅的笔名干，发表于4月26日《申报·自由谈》。发表时鲁迅将题改作《大观园的人才》。文章把吴稚晖比作《红楼梦》大观园里的刘姥姥——老旦，“老气横秋”，“手里杀杀杀，而嘴里却需要‘自由，自由，自由’，‘开放政权’”；把汪精卫比作“玩笑旦”，“会媚笑”、“会撒泼”、“会打情骂俏”、会“油腔滑调”，“是花旦而兼小丑的角色”。文章通过对吴稚晖、汪精卫这二个政治舞台上的戏子的揭露，反映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演戏，“压轴戏”虽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

^① 现译堂吉河德。

“戏了统治”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6月初 瞿秋白夫妇从东照里搬出，搬到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楼上的中共江苏省委机关里，与冯雪峰同住一处，帮助通讯社审查和修改稿件，替党报写文章。由于党的机关常遭敌人破坏，瞿秋白夫妇的住处，经常转移。环境是相当紧张而险恶的。但瞿秋白早有献身革命的准备，他常对杨之华说：“我俩既然搞革命，被捕是很难免的，革命难免有牺牲。”因而对献身革命作了充分思想准备。^①

6月20日 于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油印本）第45、46期合刊发表《国民党棉麦大借款的目的》，署名狄康。瞿秋白揭露国民党政府向美国借贷价值5千万美金（2万万圆）的棉麦大借款^②的主要目的在于“进攻中国的工农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屠杀工农民众”，“增加警察，增多那些最无耻的奸细制度的秘密侦探，大批的暗杀，捣毁一切革命团体”等。瞿秋白分析了麦棉大借款对中国社会发生的严重影响，指出，“美国棉花的大批进口，必然要使得棉花的价钱大跌特跌，纱厂的生产更加要‘过剩’，中外资本家会因此而更加加重对于工人的剥削，制造更广大的失业。”同时指出，美国棉花和小麦的大批进口，“要引起中国农村里更大的恐慌”，因为“大批的农民群众，不能够不用最低价格出卖自己的棉花和小麦，为的要去做偿还高利贷的利钱，去交纳苛捐和田赋，去付田租”。文章说，这次大借款，“使得中国长期经济恐慌，尤其是根本上的无可救药的农业恐慌，更加深入，更加迅速的走到‘天崩地陷’的绝路。工人、农民以及一般民众的生活，要因此更加恶化。”文章还驳斥了国民党申明棉麦借款是用来“从事生产事业”、“赈济灾民”等无耻谎

① 《中央纪委在上海召集的关于瞿秋白评价问题座谈会纪要》（1979年7月）。

② 美国的借款并非现金，而是四分之三的小麦和四分之一的小麦。

言，揭露美国借款的秘密条件，分析这次大借款对英、日、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暗斗的影响。

7月16日 写文学评论《读子夜》，发表于8月13、14日《中华日报》副刊《小贡献》，对茅盾小说《子夜》再次给予热情的赞扬，充分的肯定，认为它的出版，具有开辟性的意义。文章说：“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它不但描写着企业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义、军阀混战等等，它更提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它都很细心的描写与解决。从‘文学是时代的反应’上看来，《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文章概述和分析了《子夜》的主要内容，提出五点具体意见，并指出它的不足之处。

7月20日 于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油印本）第48期发表《从公债到外债》，署名康。文章揭露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大借外债；对内榨取工农血汗，大发公债的罪恶阴谋。指出国民党在“华北停战”以后，借了2万万美国麦棉借款，在此之前两个月曾借了8千万德国借款等等。又揭露南京政府成立以来共发行了12万万以上的国内公债。

7月20日 于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油印本）第48期发表《临死的呼号》，署名康。指出国民党因对苏区的军事围剿遭到红军粉碎而“埋怨、劝告、诅咒、祷告、感叹……，不过是临死的呼号罢了”。文章说：国民党的军阀政客、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呼号奔走，互相劝告着说单纯的军事讨伐是不够的，必须有‘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瞿秋白对此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他们的所谓改革，“目的只在于谎骗民众”，“缓和人心”；他们进行的“新政”，“不过是更加残酷的屠杀和轰炸的辅助方法。这些‘改革’恰好是箝制和压榨民众的新式手段”。

7月20日 于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油印本)第48期发表《“自动的”卖国》、《瓜分混战之下的中国西部》,署名康。

7月21日 作《母亲——诗中的故事》。

7月下半月 因机关附近发生可疑迹象,瞿秋白夫妇冒着大雨,乘坐黄包车第三次到鲁迅家避难。在鲁迅家住了一个短时期后,又回到中央局机关里居住。一个多月后,一天凌晨两点钟,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突然接到警报,赶紧又离开住地,先后坐着黄包车前往鲁迅家避难。他俩几乎是同时到达,一个急敲前门,一个急敲后门,造成一场虚惊。但鲁迅夫妇,一如以往,准备了夜餐,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①

7月30日 于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油印本)第49期发表《庐山会议的大阴谋——“有组织的饥饿政策”》,署名康。揭露蒋介石、汪精卫及国民党各军事将领最近在庐山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的罪恶阴谋。文章说,“最近庐山会议的结果最重要的就是议决严密的封锁苏维埃区域”,并引用庐山会议“川赣剿匪”问题的决议:“实行对于匪区的严密封锁,一切药材、煤油、电料、盐等都严禁输入匪区。”文章严厉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说这是“有组织的饥饿政策”,“造成活地狱的政策”,“是在用极残酷的手段弄死这千百万民众”,还讽刺地说:“这就算他们的‘仁爱性’的表现了!”文章认为国民党反动派施行这种“饥饿政策”,正说明他们的虚弱,“表示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7月30日 于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油印本)第49期发表《又是一笔卖国帐》,署名康。文章利用帝国主义在掠夺中国的过程中因“互相攻讦而透露出来的一些消息”,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政策,诸如“宋子文游外,成立巨额借款,……与国联之技术合作,亦为进一步导中国于国际共管”;“宋子文氏对英接洽借款,……共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40页。

计 786.8 万镑”；等等。

7月30日 于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油印本）第49期发表《国民党的“理论斗争”》、《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新鲜把戏》和《四川的军阀混战和上海废战同盟》，署名康。

8月7日 于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油印本）第50期发表《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瞿秋白在肯定《红色中华》报的主流以后，提出六点意见：（一）党的领导作用反映得“非常之模糊”，“只有‘苏维埃建设’，而没有‘党的建设’。同样，工会的作用更看不见。”（二）“自我批评”“已经有相当的发展。但是还不够。”他又指出：新闻报道，正反两方面，都要具体。（三）新闻报道只偏重于鼓动性的胜利消息，要求必须对“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都有明晰的叙述”，“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明了战斗的总阵势”。（四）要加强社论和论文的“指导作用”，做好解释和说明工作，“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反对官僚主义的恶化”。（五）要开展“工农兵通信运动”，组织“工农兵通信协会”，发动群众写通信。（六）建议中央局另出版一种《贫农报》，要求文字浅近，通俗易懂。

8月14日 于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油印本）第51期发表《这回不“自动”了！》，署名康。文章驳斥汪精卫对卖国行为的辩解。汪精卫的报告说：“至于国联技术合作委员会，据宋（子文）部长来电郑重声明以下两事：其一，绝对不涉政治；其二，由我国自动绝不自行提议。如此，则亦何致损及主权，更与共管云云毫不干涉。”瞿秋白指出：“事实上，国联是英法等列强帝国主义政府的联合办事处，它本身就是百分之一百的政治机关。”他认为“请国联派委员来，就绝对不会不涉政治”，“‘不涉政治’的说法，已经可笑极了”！批驳“绝不自行提议”，就不会“损及主权”，是“荒唐之至的鬼话”。

8月14日 于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油印本)第51期发表《狗抢骨头吃!》，署名康。文章指出美国给中国价值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象是美国财政资本抛出来的一块肉骨头，中国的军阀、官僚和资本家，就象一群哈叭狗，大家起来你抢我夺。南京国民政府屡次指天发誓：“决不以此款移于增加军费”，“此次借款用途限于农业、工业之建设”。文章对此加以揭露，指出：“国民党的所谓建设，都是奖励资本家做公债生意，做‘改良的’买办生意，搜括钱财，供给军阀混战，供给屠杀民众的‘剿匪’战争。任何真正发展农业、工业的建设也不会有。”讽刺军阀、官僚、资本家这些狗崽子在“建设”的名义下，为了“分赃”、“大抢其骨头吃”，“是多么‘勇敢’”！

8月14日 于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油印本)第51期发表《国民党的“仁爱”》，署名康。文章从武汉的“剿匪”司令最近发出的一道命令，揭穿国民党的“仁爱政策”。命令说，“匪区”的老人和儿童不应当杀，而且是说的“不宜多所杀戮”。文章分析说，第一，证明以前已经“多所杀戮”，而且连老人儿童都杀了不少；第二，命令只说“不宜多所杀戮”，而“少少的”杀戮些老人儿童还是适宜的、必须的；第三，这命令其实只是骗骗白区的群众，其实6年来的“剿匪”期间，不知道下过几十次这一类的命令，也不知道杀掉了几千几万的老人和儿童。文章指出，这就是国民党的“仁爱”的“民族固有道德”。

8月14日 于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油印本)第51期发表《宁可送热河，不可失南昌!》，署名康。

8月22日 作《最大的奸商——国民党政府!》，署名康，发表于8月27日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油印本)第52期。文章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农民群众因为这次棉麦借款而更加要破产”。指出今年农民的麦子没有销路，其原因就是“市场上一下子拥到美国借来的麦子”，全国麦价“受着这个影响而大跌特跌”，中国资本

家趁机大大压低收购市价，“故意不向小农去收买，甚至于拒绝收买。……强迫小农用再低的价钱出卖，以便他们赚着一大笔利钱”。而汪蒋的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主要是“保护奸商”，农民只好大受其害。文章又揭露，是国民党的汪蒋政府借进美国棉麦大贷款，他们希望用这批棉麦大做生意，赚一笔大钱去屠杀苏区，所以指责“汪蒋的国民党政府不过是最大的奸商！”

8月22日 作《国民党的所谓统制经济》，署名康，发表于8月27日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油印本）第52期。文章分析和批判了国民党的“统制”政策，揭示其阶级实质。文章认为，国民党的所谓“统制经济”，所谓“食粮统制”，完全是加深空前的经济恐慌的政策，完全是搜括中国民众的汗水去供给帝国主义——偿付外债利息，完全是要镇压革命运动而想用饥饿来摧残真正反帝国主义的苏维埃革命。

8月22日 作《国际反帝大会——反对国民党的外债政策》，署名康，发表于8月27日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油印本）第52期。文章呼吁每个工人和革命团体，都要向即将于9月30日在上海举行的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代表大会，向国际反帝大同盟代表团，向各国劳动者和其他革命者的代表，表示“对于国民党外债政策的抗议”；呼吁各国的工人和其他革命者，“一致的起来反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借给国民党政府巨大的外债”。正告帝国主义：应当知道借款给中国国民党政府，要负屠杀中国民众的直接责任，应当受着自己国内革命民众的最后的惩罚！

9月22日 陈绍禹控制的中央作出《关于狄康（瞿秋白）错误的决定》，再次打击了瞿秋白。诬陷瞿秋白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看不到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力量”，与中央“相对抗”等等。责令他在党内公开检查什么“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求全党对他“开展最无情的斗争”。

9月27日 在9月22日中央决定的高压下写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署名康，被发表于10月15日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油印本）第56期。瞿秋白首先声明，“经过中央的指示”和“同志们的批评”，“我才认识了我的错误”。他承认他最初写给《斗争》的那封信（《我的错误》）里，不但“没有认识错误”，反而“加深了错误”。接着上纲上线，分析自己错误的性质。他说，在《斗争》上发表的那些短评，背离了“中央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是个“机会主义的立场”。检查自己没有正确估量“阶级力量的对比”，“抹杀红军战斗力的大大提高”，低估了“革命力量”；同时“没有指出敌人力量的削弱，没有指出统治阶级的困难是崩溃中的困难，是死亡中的困难”。最后承认自己是从“‘左’的错误到右的错误”，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央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指示”。《斗争》编辑委员会在这份检查后面加上批语，认为“狄康同志这次承认错误是比较彻底的”，“一般地是满意的”，但又指出：“狄康同志应当不但口头上，而且在实际工作上，来改正自己的一切错误。”

9月28日 同鲁迅合作撰写《“儿时”》，署鲁迅笔名子明，发表于12月15日《申报·自由谈》。文章深刻阐明生命的意义：“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末，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

9月29日 作《“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署名陈遼，作者生前从未发表过。1953年、1986年先后被编入8卷本《瞿秋白文集》第2卷、《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

9月 作《择吉》，署名陈遼，作者生前从未发表过。1953年、1986年先后被编入8卷本《瞿秋白文集》第2卷、《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

9月 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国的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100万兵力、200架军用飞机，开始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9月28日，敌人占领了中共苏区北方重镇——黎川。

10月1日 于《现代》第3卷第6期发表译作《伯纳·萧^①的戏剧》(M·列维它夫作)，署名萧参。原文发表于1933年5月《国际革命戏剧联盟》第5期。

10月25日 同鲁迅合作撰写《中国文与中国人》，署鲁迅笔名余铭，发表于10月28日《申报·自由谈》。

10月30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第61期发表题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的社论，指出，要完成当前的战斗任务，“必须大大的发展党内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对于狄康(瞿秋白)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必须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必须给以最严重的打击”。社论认为瞿秋白“在党指出他的错误以后，他仍然表示不愿意承认他的错误，而且加深了他的错误。”于是错误地利用高尔基的话说：“敌人不愿意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它。”

10月30日 《红旗周报》第61期发表署名浪的文章《粉碎五次‘围剿’与反倾向斗争》，作者在陈绍禹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下，在文章中以一半的篇幅约6千字，批判瞿秋白在《斗争》上各篇文章中的种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什么“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呀，“过分估计敌人的力量，轻视革命力量”呀，“把军阀战争作为时间的中心，忘记了中国两个政权的对立”呀，等等，对瞿秋白的观点任意加以歪曲。文章披露瞿秋白曾向《红旗周报》编辑委员会写过一份声明书，其中说到他“流露了”一个错误，原因在于“过分估计了革命形势”。文章指责瞿秋白在声明中“没有指出他的错

^① 以译自伯纳。

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系统的”；“没有承认他的错误是有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与党的路线相对抗的”；“不承认他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不相信红军的力量，不相信革命的力量”等等。文章最后提出，对瞿秋白的“一切机会主义错误”，“必须无情的打击”、“彻底揭露”。

10月 根据《普拉夫达报论高尔基集》翻译《高尔基——伟大的普洛艺术家》（V·吉尔珀汀作）。又据此论集翻译《高尔基的文化论》^①（A·S·布勃诺夫作），翻译日期不详。这两篇译作均于1936年由鲁迅辑入《海上述林》上卷《辨林》。

11月3日 作《社会浪漫和社会现实》、《两个五年计划之间》、《“能量”》、《认识》。

11月7日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在瑞金正式开学。何长工任校长兼政委。第一期学员有六七百人，当时在高级指挥科学习的有程子华、彭雪枫、宋任穷、张宗逊、周子昆等；在高级政治科学习的有刘道生、韦国清、苏振华、唐亮、郭鹏等。不久，瞿秋白来到瑞金，经常应邀来红军大学讲授《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等政治理论课^②。

11月10日 鲁迅得瞿秋白的来信及其文稿两篇。^③

11月12日 作《房龙的〈地理〉和自己》，署名商霆，发表于1934年1月1日《文学季刊》第1卷第1期，发表时题改作《读房龙的〈地理〉》。本文是瞿秋白读了历史学家房龙（H·W·Vanloon）著作《世界地理》之后，写下的一篇读书杂记。认为《世界

① 本篇是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长布勃诺夫在高尔基从事文学事业40周年纪念大会上演讲的速记稿。

② 参考曹湫著：《瞿秋白研究》第233页，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

③ 《鲁迅全集》第15卷，第108页。

地理》是一本“值得读第二遍的书”，“这样的书现在太少了，尤其是中国人自己的创作”。赞它“象一幅浮雕的壁画，把世界的各国区域的地势很生动的显现在你的面前”。文章接着对房龙作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房龙也同一切‘前期’科学家一样，他虽然忠实于他的科学，但是更忠实于他自己，——说得精确些——是更忠实于他自己的阶级。”指责房龙把日本向中国扩张的“野蛮的表现”，“当作‘日本的需要’”，“是一种需要的美德”，文章认为，“照房龙想来，日本的夺取满洲、热河，却有十足的理由”。

11月 作《关于高尔基的书——读邹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署名商廷发，发表于1934年7月《新语林》半月刊第2期。文章开头引用高尔基的一段话：“……想着，也许这是一——一本好书，诚心诚意地写了的，不少人读着它而感动了，争论了，学习了思想；也许，它用新的思想使得一些人丰富起来，用自己的温暖使得许多人在冷酷的孤独时间暖和起来。（高尔基：《书》，《高尔基文集》卷8，238页）”瞿秋白认为邹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的确是这样的一本书，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总之，这本书里，读者——譬如我罢——可以得到文学，社会，以至政治上的许多智识，引起我的许多感想：那陈旧腐败的俄皇政府，那卑劣残酷的市侩主义社会，用尽了一切力量和手段来反对高尔基，压迫高尔基，——现在到那里去了呢？”

11月 作《“非政治化的”高尔基——读《革命文豪高尔基》之二》，署名商廷发，发表于1934年7月《新语林》半月刊第2期。瞿秋白再次评价邹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这本书，着重指出该书的缺点。该书说高尔基自《新生活报》^①停办以后，“留在俄国

^① 该报具有孟什维克倾向，高尔基曾参与创办，并为该报撰稿。革命初期高尔基在该报上，曾表示些对于革命的失望，到1918年5月，他论文里的情绪，已经表现着相当的转变，该报于1918年7月16日停办。

的其余时间,都完全用于非政治性质的工作”。瞿秋白认为“非政治性质”这句话会引起人们的误会。他用许多事实论述了高尔基的转变。指出:“‘十月’之后的高尔基虽然经过一些时间的动摇,可是不久就坚决的担负了伟大的‘政治工作’。”瞿秋白说,高尔基编辑许多种文化杂志、丛书等等,难道这不是政治工作吗?尤其是1918年以后,高尔基参加《共产国际》(Com. International)杂志的编辑,团结和组织许多革命同路人的工作等,都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他还指出邹的书对“高尔基的创作生活的变迁”反映得“太少了”。文章最后申明:“指出这本书的几个缺点,目的只在收集一些材料在这里,帮助别的读者的判断。”尽管邹的书存在不足之处,但瞿秋白仍然肯定“这本书对于读者还是一件宝贵的赠品。尤其在中国现在——介绍和学习世界文学的参考书如此之少的时候”。

12月2日 重译讽刺诗《市侩颂》(高尔基作)。^①

12月10日 致信^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谈五中全会召开的意义与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意义。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瞿秋白怀着对党的事业十分关切的心情,给党中央写了这封信。在信的末尾,道出了他当时的心情和想法。他说:“可惜,我关于实际的具体的问题不能够有什么贡献,又不幸不能够来出席(五中全会)而受着直接的教训!只能够写这一点空话,希望能帮助大家想起一些问题。”信中所写并非是空话,而是有针对性的正确的意见:(一)“在残酷的,复杂的,广大范围的阶级决战之中(……),不断的产生着许多实际的具体的问题,要求党动员新的力量,运用新的斗争方式,新的组织政策”;(二)“在帝国主义军阀

^① 1922年2月26日瞿秋白在莫斯科曾翻译过这篇讽刺诗,后收入《赤都心史》,题为《阿奈陀佛》。

^② 原信现存中央档案馆,1991年编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

的巨大军事力量直接控制之下的最大城市，以及一些落后的省份里，斗争还在比较初期的方式之中，需要艰苦的日常的争取群众的工作”；（三）“苏区和白区斗争之间的联系显得十分重要，我们的努力是要怎样使得白区的工作，同红军的战争，苏维埃政权的一切事业很好的联系起来”；（四）“下层统一战线的实行，领导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以及马列主义的广大宣传——都需要许多改善和刻苦的努力，使得我们党的政治影响不但更加迅速的扩大，而且在组织上更加巩固起来”；（五）“党须要更有系统的养成许多方面的专门干部，能够懂得每一种工作和事业的专门技术和知识”。

12月20日 鲁迅致徐懋庸信，向他推荐瞿秋白编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称赞这本书编译得“很好”。

12月 一个傍晚，冯雪峰和袁孟超（即袁家慵）来到上海黄陂路鸣琴坊内某号三楼瞿秋白寓所，传达中央调瞿秋白去中央苏区的电报通知。瞿秋白听后马上高兴地说：“想去很久了！”又问：“之华可以回去吗？”第二天，得到组织的回答：“之华要等有人接替她的工作后才能去，请你先走吧。”^①后来去苏区的交通断绝，杨之华没有去成苏区，也无法同瞿秋白通音讯。

12月 翻译高尔基小说《马尔华》，署名陈节，发表于1935年9月20日《世界文库》第5册。

12月 翻译高尔基小说《二十六个和一个》，署名陈节，发表于1934年3月1日《文学》第3卷第3期。

冬 翻译普希金长诗《茨冈》，因即将离上海赴瑞金，最后一部分未译完（新中国成立后由李何补译完）。

^① 袁孟超：《一九三三年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4年第4期；杨之华：《日记秋白》，第147、148页。

年末 编就《笑峰乱弹》。瞿秋白曾亲自设计了一帧封面，该书作者用笔名“司马今”。

本年 翻译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论文《列甫·托尔斯泰象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L·N 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以及《列宁全集》（苏联版本）编者 V. 亚陀拉茨基等的《关于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的注释》。这些译作使中国读者了解到列宁是如何正确评价托尔斯泰及其作品的，列宁是如何正确应用唯物辩证法，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去观察文学、艺术、道德等问题的；还使中国读者了解到列宁关于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与文学之间的重要观点。列宁的文章精辟地分析了托尔斯泰学说及其创作的本质，对托尔斯泰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既批判了托尔斯泰的乌托邦学说的反动性，又肯定了托尔斯泰是“伟大的艺术家”，赞赏托尔斯泰作品的重要价值。瞿秋白翻译列宁这两篇文章，对于纠正当时左翼文艺批评的简单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年 作《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认为“文艺应当是改造社会底整个事业之中的一种辅助的武器”，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指出，文艺必然要影响“社会的意识形态”，“在认识现实的过程之中去辅助现实的改造”。瞿秋白指出，对于“一切过去的文化遗产和文学遗产”，“必须继承”，但是“一定要有批判的精神，一定要有阶级的立场，一定要努力学习新的阶级底宇宙观，而在克服可能的错误底过程之中，去达到真正科学的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现象底认识。”对于一切古代的文化遗产，既要继承，又要发展。

本年 翻译《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苏联 P·帕甫伦珂作），发表于 1935 年 9 月 16 日《译文》第 2 卷第 7 期。

本年 根据 1931 年《国际革命文学》第 4 期转译《爱森的袭击》（德国马尔赫维察的小说）。当时，瞿秋白曾拟以单行本出版，

因受反动当局的禁止，未能如愿。1953年、1988年先后被编入8卷本《瞿秋白文集》第8卷、《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6卷。瞿秋白在译作后写了《后记》，对小说作者和这篇小说作了扼要介绍。说作者是矿工出身，经过工人通讯运动而成为作家的。《爱森的袭击》是他的成名作，是德国的“第一部普洛小说”。这篇小说所描写的是1920年的事实。作者亲身参加了这次事变。小说反映了作者不但“有充分的艺术力量”，而且“有很正确的意识”。

本年 翻译《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高尔基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第一章的开端（以下部分未译），1936年由鲁迅辑入《海上述林》下卷《藻林》。

本年 大约就在这一年，根据苏联《链环》杂志第2册（1933年）翻译了《哥德和我们》（L.卡美尼夫作），并加了“注”。在注释中，介绍了作者简单的经历，说作者“是个老布尔塞维克”，曾犯过错误，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初，苏共产党承认了他的确抛弃了他的错误立场，而恢复了他的党籍”。瞿秋白这篇译作于1936年由鲁迅辑入《海上述林》上卷《辨林》。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甲戌)

三十五岁

1月4日 晚上,因即将赴中央苏区,特地去大陆新村同鲁迅、茅盾^①告别。去时,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无论如何要去和鲁迅、茅盾告别,跟他们好好谈一谈。”瞿秋白同鲁迅畅谈至深夜。鲁迅留瞿秋白住一宿,并特别表示了惜别之情,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安睡,自己和许广平睡在地铺上,“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②瞿秋白将编就的《乱弹》文集稿本交给鲁迅保存。瞿秋白同茅盾夫妇告别时,也谈了许多话。他还谈起沈泽民的病故,他同沈泽民的深厚情谊及前年两人分手时的情形^③,等等。5日晚上,瞿秋白平安地回到家里,笑容满面地对杨之华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指鲁迅)和茅盾身体都好,海婴也没病。”^④

1月6日 鲁迅致信苏联木刻家希仁斯基等。这封约三千言的信件,是鲁迅请瞿秋白翻译成俄文寄出的。^⑤

① 当时茅盾家已搬到大陆新村,与鲁迅为邻。

②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130页。

③ 万树玉:《茅盾年谱》,第17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

④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41页。

⑤ 丁景唐:《鲁迅和瞿秋白的革命友谊》,上海《社会科学》1979年第3期。

1月6日 杨之华参加一整天的会议，散会后帮助瞿秋白一道整理东西。瞿秋白叹息着说：“可惜《茨冈》没有译完，来不及完成了。”当天瞿秋白一夜没有睡觉，继续整理东西，为杨之华订了半年的读书计划，并整理好要她读的书。时而轻轻地踱着步，或者坐着抽烟沉思。快要天亮的时候，向杨之华谈了当前的工作和别后对她的种种的安排，并深情地说：“我们能很快在一起工作就好了！”杨之华说：“我们一定会很快在一起工作的！”瞿秋白突然紧握杨之华的手说：“之华，我们一起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被捕牺牲是意料中的事。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周文雍、陈铁军夫妇一同英勇上刑场的照片吗？即使我们不能共享胜利的喜悦，那样牺牲也是无尚幸福的。”杨之华紧紧拥抱着瞿秋白，激动地回答：“万一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瞿秋白兴奋又严肃地说：“我一旦被捕，敌人要审判我的时候，我要这样回答敌人：‘你们不配审判我，我要审判你们！’”①

1月7日或8日 晚上，杨之华和同她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叫了一个菊花火锅，买了些苹果，准备了一顿较丰盛的晚餐，为瞿秋白赴中央苏区瑞金饯行。深夜11点，瞿秋白离开寓所前往轮船码头。在寒风大雪中，依依不舍地同夫人杨之华告别：“之华，我走了！”杨之华激动地应答：“再见，我们一定能再见的！”往前边走边说。在昏暗的路灯光下，一直凝视着瞿秋白的身影消失在黑魆魆的大街的尽……②

1月9日 鲁迅“夜复宜宾信”③。

1月22日至2月1日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48～149页；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辑，1958年。

②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50页。

③ 《鲁迅全集》第15卷，第18页。按：宜宾，瞿秋白化名，由凝冰转音而来。

江西瑞金举行。大会总结了两年来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提出了苏维埃今后的历史任务，讨论了红军建设、经济建设与苏维埃建设等重要问题；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及上述各重要问题的决议案。瞿秋白虽未赶到参加此会，但被大会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月下旬 杨之华收到瞿秋白赴瑞金途中托人带给她的一封信，上面写道：“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杨之华看了便信，好像听到瞿秋白的笑声，舒了一口气，庆幸他即将脱离险境，踏上解放的土地。后来，杨之华两次托人带药品给他，其中有一种药品，还是鲁迅亲自为他买的^①。

1月28日 鲁迅收到瞿秋白离沪后半个月在赴瑞金途中的来信。^②据许广平回忆说：秋白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后，鲁迅“常常挂念秋白同志已否到达苏区，常常挂念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胜利。”^③

1月 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博古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等。1月18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等文件。这次会议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全面肯定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等等，使“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

2月3日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府的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询、朱地元、邓发、方志敏、罗迈、周月林等17人组织中央政府主席团，为执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50、151页。

^② 《鲁迅全集》第15卷，第130页。

^③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130页。

行委员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国民经济、粮食、司法、内务、教育、工农监察 11 个人民委员部,为中央行政机关。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①又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②

2月5日 瞿秋白到达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瑞金,住沙洲坝。在中央苏区期间,任教育人民委员、艺术局负责人,国立苏维埃大学校长,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③ 编务等。

2月7日 曹靖华到上海鲁迅的寓所。鲁迅把曹靖华引到三楼一个小房间里。窗前一张铺着雪白台布的条桌上,摆着铅笔、毛笔、墨盒、信封、拍纸簿等等。桌前放着一张靠背椅,后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鲁迅从容而低沉地说:“这是秋白逃难住的房间,一切布置照旧,你就住在这里吧!”^④鲁迅用生命掩护了瞿秋白,又以崇敬的心情怀念着瞿秋白,充分反映了两人之间的深厚的友情!

3月12日至14日 出席在苏区瑞金召开的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各县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并在会上作关于新的教育政策的报告。大会在听取瞿秋白和省教育部长关于江西教育工作方针的报告之后,通过了一项详细的决议案,明确规定了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

①②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红色中华》,第146、148期,1934年2月9日、12日。

③ 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1933年2月起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联合机关报。1937年1月29日,改名为《新中华报》。

④ 曹靖华:《罗汉岭前吊秋白并忆鲁迅先生》。

的方针任务，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批准实施。决议案贯彻了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服务的方针，强调了教育文化工作与当前中心工作“应当切实的互相联系起来”。^①

3月29日 于《红色中华》第186期发表《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署名维嘉。文章指出，面临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环境，“节省粮食”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他说，节省粮食能够“保障红军给养，保障广大群众在今年青黄交接时粮食的供给，预防今年的粮食困难。”文章动员每个苏维埃公民积极参加“节约粮食运动”。最后提出，必须以最大的警觉防止地主、富农、奸商“私藏粮食，操纵米价，毁坏公谷，偷运粮食出口，破坏粮食合作社运动等等阴谋”。号召革命的工人和农民们，“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提出的每一任务，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红军，来争取战争的胜利，从胜利中来争取自己阶级的彻底解放。”

3月 鲁迅编的苏联版画选集《引玉集》由三闲书屋出版。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介绍苏联艺术家的版画选集。鲁迅编选时，瞿秋白正在鲁迅家避难，或住在鲁迅家附近的东照里12号。瞿秋白为《引玉集》中的亚历克舍夫作高尔基《母亲》的14幅木刻插画作文字说明。这些文字说明，瞿秋白颇费一番心力。他按木刻插画的艺术形象，与夏衍翻译的《母亲》译本进行对照，经过鉴赏，摘引译本中能反映有关艺术形象的文句，来作木刻插画的说明。瞿秋白摘引的文句非常精当，恰如画龙点睛，活活地传达出木刻插画的生命。瞿秋白还帮助鲁迅从苏联《艺术》杂志上译出楷戈达耶夫(A. D. Chegodaev)的《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作为《引玉集》的代序，署名陈节。鲁迅在《引玉集》的《后记》里说：“我毫不知道俄国版画的_{历史}；幸而得到陈节先生摘译的文章，这才明白一

^① 丁景唐：《纪念瞿秋白同志的一些史料》，《解放日报》1962年6月18日。

点十五年来梗概,现在就印在卷首,复作序言;而且作者的次序,也照序中的叙述来排列的。”《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十五年来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的成就与历史的发展,苏联版画大师们的优秀的艺术作品与多种不同的艺术风格。^①

3月 主持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制订《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重订《俱乐部纲要》,批准《工农剧社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等。这些文件被编入《苏维埃教育法规》,4月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正式颁布。^② 高尔基戏剧学校是中央苏区创办的第一所戏剧学校,学校的名称就是根据瞿秋白建议而以高尔基来命名的。瞿秋白亲自参加剧校工作计划的制定。他曾指出:“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他还推荐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和戏剧《下层》,认为“那真正是表现劳动人民的小说和戏剧”。又借用鲁迅的话,鼓励当时戏剧学校校长李伯钊等人,继续办好戏校:“路是人走出来的。”又勉励大家:“革命的戏剧学校在苏区是初生的婴孩,慢慢抚育吧!不要性急。”^③

后来,瞿秋白还要求:“戏校要附设剧团,战时要经常到火线上去巡回演出,平时按集期到集上作流动演出;戏校除了普通班外,还应增设红军班和地方班,为红军和地方培养文艺工作干部。他说:“没有戏剧骨干就谈不到什么工农戏剧运动”。^④ 当时戏校任用了经过考验的擅长艺术与舞台装置或导演的被俘来的白军军官当教员。学生们不欢迎他们上课。瞿秋白便劝告学生们:“白军军官已

① 丁景唐:《关于〈引玉集〉——鲁迅和瞿秋白友谊的一例》,《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第2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59年。

② 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苏区文学研究室:《江西苏区文学史》,第20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11月。

③④ 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50年6月18日。

经缴枪，替红军做事了，不应讨厌他们，瞧不起他们”。又说，他们有专门知识，你们没有，要虚心跟他们学习。同学们终于被瞿秋白说服了。瞿秋白还常去戏校亲自给戏校教职员讲政治课，解答时事问题。^①

4月1日 国立苏维埃大学在瑞金举行开学典礼，瞿秋白兼任校长（徐特立为副校长）。他在开学典礼上作报告，略谓：“大学开学的战斗任务，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每个学生同志，都应深刻的了解自己的伟大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而斗争。”^②当时徐特立是苏维埃大学副校长。他后来回忆说：“秋白同志对文化教育工作十分热情负责。苏维埃大学的直接负责人是我，但秋白对政治教育的每一课程，和每一次学习的讨论题目，都给予原则指示。当时的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他的身体又很衰弱，但秋白把一切困难都忘却了，一心认真工作，精神上十分愉快。”^③

4月3日 《红色中华》第170期，发表瞿秋白撰写的社论《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社论首先指出当时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发出的关于春耕运动的决定是建筑在群众的革命要求上的，开展春耕运动是为改善群众“自己的生活”，“充裕红军的给养”，“粉碎敌人的封锁与‘围剿’”。社论要求各级组织要广泛动员群众开展春耕运动，要克服“官僚主义”，不要“空喊”，不要“抑制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与劳动热忱”；同时不要放松“阶级警觉性”。社论号召苏维埃公民，“最大限度发扬革命热情，广泛的开展农业生产竞赛，劳动合作，以及农业技术的研究运动。”社论强调在春耕中要优待红军

① 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50年6月18日。

② 《红色中华》第170期，1934年4月3日。

③ 转引自扬之华：《回忆秋白》，第152页。

和军属，“劳动力首先要投在红军公田和红军家属的土地上，使红色战士在前方毫无顾虑的进行战斗。”

4月12日 于《红色中华》第174期发表《纪念“五一”与援助华北工人斗争》，署名维嘉。

4月 译作《解放了的董·吉河德》（苏联卢那察尔斯基剧作）由上海联华书店出版，译者署名易嘉。

5月20日 作《阶级斗争中的教育》于6月2日发表于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62期。文章明确指出：“教育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教育才能够真正赞助革命战争；如果稍微削弱这个阶级的领导，稍微削弱工农的民主专政，那么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就会利用我们的教育系统来进行他们的‘阶级工作’；破坏苏维埃的教育制度，传布反动的复古思想，甚至于公开的进行反革命的活动。”瞿秋白在文章中一方面强调苏维埃教育必须坚持阶级路线，“苏维埃的教育是阶级的教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教育”；另一方面，又指出：“自然，在教育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并且应当利用旧知识分子，即使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也可以利用。”“我们反对‘吃知识分子’主义，我们还要继续反对这种左倾的机会主义。”

6月23日至7月7日 于《红色中华》第206至209、211期，连续发表《中国能否抗日？》，署名维嘉。瞿秋白引用大量材料，具体分析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军事、经济、人民组织程度等条件，揭发国民党散布的“中国无力抗日”的无耻谰言，揭露国民党拥有百余万现代装备的军队，不但没有派“一兵一弹”去抗日，反而派重兵去进攻“苏维埃红军”，这是国民党的“卖国辱国勾当”。文章分析了日本武装力量后，作出论断说：“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有着精良的器械，但是战争的胜败不完全决定于器械，而决定于使用器械的人。”瞿秋白综观中国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和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的种

种弱点,得出结论说:中国“有力抗日”。他要求:“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们,必须抗日,必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以争取自己的生存,中国所有的工农士兵群众,所有的武器,如果都用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那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

10月10日 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00余人从瑞金出发,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长征之前,高级干部谁走谁留一律*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曾向张闻天表示“要求同走”,张表示同情,并向博古提出,但博古反对。^①于是,瞿秋白“服从组织的命令”留在江西。为了和老战友们话别,瞿秋白邀请了李富春、蔡畅、刘少文、傅连暲、徐特立等同志吃了一顿饭。瞿秋白举起酒杯风趣地说:“这酒杯是之华在上海给我的纪念品,让我们一起为革命胜利干一杯!”长征出发时,瞿秋白还把自己的良马和身强力壮的马夫换给徐特立。^②

长征开始以后,中央苏区设立中共中央分局(后改为东南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

①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按:据伍修权回忆,这次战略大转移,当时的中央领导核心“早有准备”,并非是“仓促行事”,但“严格保密”。这一重大战略意图连中央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有的高级领导人如项英、陈毅等也都不知道。伍修权回忆说,有的左倾路线领导者便趁机把他们所不喜欢的干部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他们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区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也是这样牺牲的。最初连毛泽东也不准备带走。后因他是苏维埃主席,在军队又享有很高威望,才允许其一起长征。伍修权还说,事实证明,象董老(必武)、徐老(特立)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红军主力行动,都被保存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1辑,第175~17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② 扬之华:《回忆秋白》,第156页。

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潭秋、毛泽覃等组成，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贺昌任军区政治部主任，陈毅和梁柏台分别任中央政府办事处正副主任，瞿秋白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央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继续主编《红色中华》。

本年 经过调查，曾拟订了一个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计划，并召集教育人民委员会会议进行讨论。当时，由于瞿秋白不同意在“左”倾路线指导下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和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曾发生了分歧和争端。^①

本年 在瑞金创办一个图书馆，收藏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党和苏维埃区域出版的书籍和刊物，还藏有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图书和各种报刊。这些藏书和报刊主要供给党政军机关干部阅读。瞿秋白经常在这里工作或写作，回答读者的问题。当时被陈绍禹“左”倾路线排斥于中央领导之外的毛泽东，常来这里看书。瞿秋白和毛泽东“常在一起谈笑咏诗”。红军准备转移时，毛泽东和聂荣臻等特地前去看了瞿秋白及其所办的图书馆。^②

本年 经常去红军大学讲授《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等课程。

本年 撰写《送郎参军》、《红军打胜仗》、《消灭白狗子》等小调歌词，并在瑞金、兴国一带流传着。^③

本年 红军长征后，瞿秋白把工农剧社编成“红旗”、“红星”、“战斗”三个剧团，补充了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干部。发动和指导剧社干部进行集体创作。他说：“现在需要大家动员起来，担负起战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51页。

② 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第562页；《聂荣臻回忆录——红军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第5辑，第95页；庄晓东：《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忆秋白》第337页。

③ 庄晓东：《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忆秋白》第336页。

斗任务,集体创作剧本、歌曲、鼓词,每个人都不要轻视自己,什么困难都难不倒革命者。我也尽量帮助你们。”在瞿秋白的鼓励和帮助下,解决了剧本荒的问题,大家写了很多话剧、歌舞剧和歌曲、小调。^①

本年 为了工作需要,在苏区学着骑马。一次骑着马飞跑着去看望正在养病的王稼祥和其他几个同志。他们非常感动,并说:“你带病来看病人,我们病好后一定去看望你。”当时瞿秋白三日两头发高烧,傅连璋医生经常给他看病、开药、打针。他病重卧床,还要看文件,处理日常事务,令人感佩。^②

本年 常常感慨地说:苏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太低了,一定要积极想法扫除文盲。他提倡根据苏区的特点,开展扫盲运动。他说,除了办学校以外,要发动群众搞扫盲运动,互教互学,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人较快地提高文化水平。他曾同徐特立苦心研究和筹划,创办了识字班、训练班,提倡丈夫教妻子,儿子教父亲,能者为师。瞿秋白还亲自编写通俗课本。^③

本年 高尔基戏剧学校所属的中央剧团曾演出了由瞿秋白领导创作的《无论如何要胜利》,群众被感动得高呼:“打倒白匪!”。演出后,瞿秋白召开了作者、导演、演员的会议。盛赞这个戏演出成功。他说:“这一出戏应当到边沿区到处去演,解决群众斗争最尖锐的矛盾,暴露白军的残暴,鼓励群众如何同白军作斗争,增加边沿区群众胜利的信心。”同时也指出剧本存在的缺点,认为主要是台词生硬、抽象,听不入耳。他要求:“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本上的死句子。务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欢喜听。让群众闭上眼睛听,也能听出来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56~157页。

② 庄晓东:《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

③ 刘英:《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北京日报》,1980年6月16日。

讲话”。指出“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①

年底的一天晚上，杨之华去拜访鲁迅。见鲁迅身体不佳，似大病初愈，便问他身体为什么这样不好。鲁迅没有回答，却心情沉重地反问：“听说秋白在苏区病死了，这个消息确实吗？”杨之华听后，顿然心神不安起来。她镇静之后，对鲁迅说，我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这个消息不见得确实。这时，鲁迅不胜感慨：对中央调瞿秋白去苏区一事，表示有看法。他说：“象秋白这样的身体，去苏区是不适宜的，应该去苏联才对啊！”后来，杨之华向来自苏区的同志打听得知瞿秋白健在，随即写信告诉了鲁迅。^②

① 李伯制：《回忆瞿秋白同志》，《忆秋白》，第306页。

②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41～142页。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乙亥)

三十六岁

1月1日 陈丕显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分局驻地见到瞿秋白。当时瞿秋白身患疾病,脸色很不好,还有些浮肿,自己正在动手煮稀饭、煮鸡蛋。柴草很湿,满屋是烟,瞿秋白不断地咳嗽着。陈丕显看到此情此景,十分怅惘,他想,象他那样的身体,怎么能坚持打游击呢?①

1月6日 鲁迅致信曹靖华,叙及对瞿秋白惦念,信上写道:“它嫂平安,惟它兄仆仆道途,不知身体如何耳。”②

1月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陈绍禹“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离开中央苏区后,一直挂念着留下的老战友们。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曾拍电给中央苏区中央局,要求妥善安顿瞿秋白等负责干部。③

2月上旬 亲自组织新指导工农剧社所属的火星、红旗、战号三个剧团,在中央分局驻地江西雩都小密附近的一个山村举行大

①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中共党史资料》第2辑,第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82年。

② 《鲁迅全集》第13卷,第9页。按:它,即瞿秋白;它嫂,即杨之华。当时鲁迅以为瞿秋白已参加红军长征,而不知道他被留下。

③ 庄东晓:《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

型公演。这次公演，盛况空前，山村的群众，十几里外的农民及中央分局领导人项英、瞿秋白、陈毅、毛泽覃、陈潭秋、何叔衡、刘伯坚等都来观看演出。演出的节目有《牺牲》、《女英雄》、《李保莲》等话剧，《搜山》、《突火阵》、《缴枪》等舞剧，还有江西、福建的山歌，台湾同志演出的《台湾人民反抗殖民主义者》的草裙舞，都深受群众的欢迎。演出时，虽然下着大雨，但群众和中央局领导人都坚持看完演出。演出结束，已接近拂晓。次日，瞿秋白主持评奖，对演出作了总结。这次会演再次体现了瞿秋白曾提出的“要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样形式，为工农服务”的文艺方针。会演后不久，根据斗争的需要，演员分散到部队里，参加游击战争。几天后，由于形势极其危急，项英不得不同意陈毅的建议，决定疏散留下的负责干部。于是护送瞿秋白突围，离开中央苏区。出发之前，把会演节目选编成戏剧集，名为《号炮集》，并写了序言，油印 300 份发到全区，还准备想办法把《号炮集》带到上海出版。^①

2月11日晚，同邓子恢、何叔衡、张亮(项英妻)等人化装成商人和眷属，离开瑞金向江西省会昌和福建长汀、武平交界处的四都山区转移。2月18日，瞿秋白等一行来到山区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坑之汤屋。福建省委从省委政治保卫局特务大队、省军区冲锋连等单位中选调数十人组成一个连的武装队伍，护送他们转道广东到香港或上海。先期到达汤屋的周月林(梁柏台妻)随行。^②

① 石联星：《秋白同志永生》，《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按：瞿秋白离开中央苏区前，住在农民家的一间茅屋里，窗户很小，窗前放着一张不大的桌子，桌上堆放文件和书籍。告别中央苏区的那天晚上，他正在发烧，前不久还吐了血。

② 参考当时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兼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温仲春1980年3月的回忆；阮铁健：《瞿秋白的被擒和就义》，《人物》1980年第1期；陈君邦：《瞿秋白被捕经过之考辨》，《瞿秋白研究》（瞿秋白纪念馆编）第3辑，第285页。按：瞿秋白被捕日期，长期来相传为1935年2月24日，据阮君那一文中的考证，应作“2月26日”，《年谱新编》采用此说。

2月24日 福建省国民党保安司令部保安第十四团团长沙钟绍葵率领5个中队在汀江两岸搜查共产党。25日宿营濯田区水口。^①

2月26日 上午，瞿秋白等一行渡过汀江，来到水口乡小径村牛庄岭附近。渡江后被敌人发现了行踪。下午保安第十四团第二大队队长李玉奉钟绍葵的命令，率特务三中队追击，瞿秋白等及护送队数十人立即转移到山上丛林中，敌人严密包围了这座山。瞿秋白勉励大家说：“为着苏维埃，流尽最后一点血是光荣的！”双方激战半小时，护送的同志大部牺牲。最后决定分头突围。何叔衡见突围不成，又跑不动，便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即举枪自尽，未果，从山崖上跌落下去。后被敌特务中队排长曾起率部搜山时发现，而遭杀害，壮烈牺牲。邓子恢是当地人，熟悉地形，与几个警卫战士突围脱险，回到省委机关。瞿秋白、周月林、张亮3人因体力不支，被敌人搜山时俘获。当日，他们3人被押送至上杭，囚禁在县监狱里。在水口和上杭，瞿秋白遭到敌人严刑拷问，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②

3月9日、4月15日 在狱中先后写了一份《自供》和一份要求保释的《呈文》。他为了求得脱身，化名林祺祥，伪造经历，说自己原是国民党军医，与红军作战被俘虏过去的，要求保释。瞿秋白在上杭用林祺祥化名给鲁迅、周建人写信。给鲁迅的信上写道：“现在我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释放我。”给周建人的信，写他在上杭被捕，在狱中衣服单薄，夜间很冷，食物又少，受冻挨饿；还说，管监狱的人告诉他，如果有殷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可以保释。杨之华看了信以后，通过以牧师身分作掩护的秦化人请一个旅馆老板，出具了铺保证明，然后由杨之华连自己亲手做的两条

^{①②} 见本书第384页注^②。

裤子和鲁迅送来的 50 元钱，一起从邮局寄给了瞿秋白。鲁迅也曾设法筹资，计划开一个铺子，营救瞿秋白出狱。事未办妥，报上登出消息，瞿秋白身份已被认出。鲁迅木然坐着，低着头，默默无语。后来，蔡元培秘书许寿裳对鲁迅说，瞿秋白被认出后，南京国民党中央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要不要杀害瞿秋白，蔡元培认为瞿秋白是中国的才子，不可多得，主张不杀，但是蒋介石、戴季陶等则坚决要杀害瞿秋白。当时，鲁迅托周建人把这个消息转告了杨之华。^①杨之华曾写信给宋庆龄、鲁迅、茅盾、柳亚子、陈望道、郑振铎、周建人等人，请他们设法营救瞿秋白。柳亚子回信说：“接来信，依然。孙夫人被监视，我也一样。心有余力不足，事与愿违。千万保重身体。”郑振铎也曾为此奔走。但都无结果。^②

4月10日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妻子被国民党第八师捕获，她供出了瞿秋白在濯田地区被俘。第八师立即电告国民党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蒋鼎文旋即电令长汀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和管辖该地区的第二绥靖区司令李默庵，要他们立即在俘虏中追查，讯核上报。宋希濂迅即召集会议密筹此事。敌参谋罗开甲和军法官吴松涛在所属保安第十四团所造名册内，发现林棋祥可疑。^③

① 温迎春 1980 年 3 月的回忆；陈铁健：《瞿秋白的被捕和就义》，《人物》1980 年，第 1 辑；杨之华：《忆秋白》；周建人 1980 年 3 月的回忆。按：瞿秋白被捕后，国民党中央在南京组织了一个处理瞿秋白委员会。有一次开会讨论时，戴季陶竭力主张立即杀害瞿秋白，他咬牙切齿地说：“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②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 163 页。按：柳亚子先生为此一直伤痛愤慨。他于 1949 年 3 月 13 日由香港到北平，在火车上和杨之华偶然相遇，给杨之华写一首五律诗：“太息王丞相，无由救伯仁，遗书问真贗，热泪总酸辛。犹见僧之史，相怜后死身。恩私何以报？尽瘁为斯民。”在附记中再次提及当年未能营救瞿秋白的事。说这是他“引为终身遗憾之一，甚说他日无以见秋白于地下也”。

③ 据凶手前国民党三十六师少将参谋长向贤矩、宋希濂亲信陈定的口供等。

4月25日左右 钟绍葵奉命将瞿秋白解往长汀三十六师师部。

4月30日^① 钟绍葵奉命将瞿秋白解往长汀。

5月4日 钟绍葵向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发出密电,谓:“……职部在水口俘获男匪林祺祥一名,经派传达二名由船解汀,到否乞电示。近查该匪有云似系瞿秋白,乞严讯。女犯周莲玉^②已供系项英之妻,陈秀英^③据俘匪称似系梁柏台之妻,刻仍在审查中。该二犯拟于鱼日连同俘获枪械派员解送龙岩区司令部讯办。……”^④

5月6日 周月林、张亮由钟绍葵亲自押送离开上杭监狱。8日,到达龙岩。^⑤由于张亮在途中告密,敌人始知林祺祥就是瞿秋白。

5月9日 瞿秋白被解到长汀,囚禁在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长汀西街福建省立第七中学)。次日,敌军法处处长吴松涛等人对瞿秋白进行审讯。敌人将叛徒郑大鵬(曾在中央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过)带到法庭上。被叛徒指认后,瞿秋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哈哈一笑说,既然被你们认出了,话是没有什么好说的,过去的呈文、供述,算是我做了一篇小说。

5月11日 国民党电台广播了瞿秋白等被俘的消息,同日《中央日报》刊登新闻称:俘获共产党首领“瞿秋白及项英妻张亮、梁柏台妻周月林三人”,“瞿秋白伪名林祺祥”。钟绍葵家乡福建武平《醒报》也作了报道。

① 据陈君邦:《瞿秋白被捕经过之考辨》。

② 张亮化名。

③ 周月林化名。

④ 转引自:陈君邦:《瞿秋白被捕经过之考辨》。

⑤ 陈君邦:《瞿秋白被捕经过之考辨》一文注释称:“该绥靖区总收发有一纸条为证。”

5月13日 在长汀狱中，写了一份所谓《供词》，真实地反映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面貌，热情地歌颂中共中央，同时谴责国民党的罪行，驳斥国民党的种种诬蔑和诽谤。《供词》指出：“那些‘下等人’”，即工农群众掌握着苏维埃政权。他们“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纠正着自己的错误”。苏区“经济建设方面”取得“可惊的成绩”。工农群众拥护苏维埃政权，说苏维埃政府两次的“扩大红军”和“收集粮食”的计划都完成了。《供词》指出，苏区生活，原来“还是相当安定和充足的”，由于后来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造成“盐贵”、“布缺”，“生活就一天天的苦起来”。他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斥之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战争”。《供词》又以亲自目睹的事实，驳斥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种种诬陷，严正指出：“在中央的决定之中，决没有以残杀为原则，‘越杀多越革命’、‘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几岁的小孩子都要杀’的事情。”又指出：“在苏区没有亲眼见着‘杀得满地是尸首’的现象。”《供词》特别声称：“党中央的政策和路线没有什么错误。”瞿秋白在《供词》的最后部分，还进一步表明他的革命立场和科学态度，说：“我所写的都是我心上真实的感觉，我所见，所闻，所作，所想的。至于我所没有见过的，没有觉到的，或者违背事实，捕风捉影的话，我是不写的。我不会随声附和骂几句‘共匪’，更不会装腔作势扮成共产党的烈士——因为反正一样是个死，何苦自欺欺人呢？”^①国民党反动派虽获得这份《供词》，但始终不敢公开发表。

5月14日 钟绍葵给蒋介石发出邀功请赏电。后来，国民党中央行政院院长汪兆铭给钟绍葵的保安第十四团复了嘉奖电。^②

5月17日 鲁迅致信胡风，告知瞿秋白被捕事，他说：“那消

^① 转引自陈铁健：《最后的斗争——瞿秋白就义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② 陈君邦：《瞿秋白被捕经过之考辨》。

息是万分的确实的，真是可惜得很。”^①

5月22日 鲁迅致信曹靖华说：“它事^②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③

5月22日 瞿秋白在长汀狱中写就《多余的话》。这是一篇自传性文章，全文分七个部分：《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本文总结了自己的一生的历史，坦率地剖析自己，暴露内心世界，批判自己的弱点，歌颂革命，又承担历史的责任。《多余的话》和他在狱中写的一些诗词、信件，虽然流露了低沉、伤感、颓废的消极情绪，但《多余的话》决不是自首书，而是写给同志们的《绝命书》，其内容没有讨好和吹捧蒋介石国民党，没有诋毁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更没有出卖同志和组织。总之，瞿秋白写的《多余的话》没有乞降求生之意；相反，是抱着必死的念头，向自己的同志告别。不久，国民党特务机关刊物《社会新闻》在选登《多余的话》时，编者按语写道：“瞿之狡猾恶毒，真可谓至死不变”，“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问”^④。

① 《鲁迅全集》第13卷，第129页。

② “它”，即瞿秋白：“它事”，指瞿秋白被捕一事。

③ 《鲁迅全集》第13卷，第132页。

④ 1935年8、9月，《社会新闻》第12卷第6、7、8期，曾公开选登了《多余的话》三节，即《历史的误会》、《“文人”》和《告别》。1937年3、4月，《逸经》第25、26、27期连载其全文。郑振铎曾通过关系去《逸经》杂志社查阅过那篇所谓“全文”的底稿，并非是瞿秋白的笔迹。《多余的话》迄今未发现手迹。长期来，人们对它褒贬不一，争论甚多。不少人怀疑它是国民党伪造的，或作过某些篡改。近年来，史学界对《多余的话》做了不少研究，许多人根据其政治内容、思想感情、语言风格来鉴定，都认为文如其人，只有瞿秋白能写得出来，敌人是无法伪造的。现在中央档案馆藏有《多余的话》手抄本，据说，极可能是当时36师上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驻闽绥靖公署的两份中之一。《多余的话》手抄本与《逸经》所发表的全文相对照，发现《逸经》本《脆弱的二元人物》一节中缺少两段，约800余字。详见拙作《瞿秋白年谱》（198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重版）附录。

在狱中，瞿秋白曾尖锐地攻击了国民党，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他和宋希濂辩论时，当面批判三民主义。他说：“三民主义的革命是不彻底的，是一个大杂烩。”他还公然对看守他的国民党下级军官宣传说：“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清道夫，蒋委员长是清道夫的头子。”^①有一次，敌参谋长向贤矩问瞿秋白：“瞿先生你对中国的前途有何见解？”瞿秋白坚定地回答：“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国家民族前途的光明。”^②

5月28日 致信郭沫若^③，说三四年来，只在报刊上偶然得知他的某些消息。告知自己“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了”，流露出因曾经受陈绍禹的压抑而产生的低沉、消极的情绪。信里叙及近几年看见过郭沫若对甲骨文研究的一些著作、《创造十年》，并评价了创造社。他说他的“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不过，他认为“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尽量的披露出来，使得历史档案的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测和推想的考证功夫”。

① 凌宇，清心，《耿耿丹忠，半世不得》，《党史研究》，1980年第3期。

② 《凶手向贤矩、陈定的口供》。

③ 唐天然同志的《瞿秋白致郭沫若遗札的写作、转送和发表》一文（收入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第3辑），对该信作了一些考证。文章说，（1935年5月28日）国民党36师军医陈炎波与瞿秋白在约谈。当谈及郭沫若时，问瞿秋白是否要写信给在日本的郭沫若，并表示愿意“设法转交”。瞿秋白欣然同意，立即挥笔写了这封信，交给陈。瞿秋白就义后不久，因36师要移防，陈将信交给医官王廷俊保存。同年10月王将信带到南京，用双挂号寄给在美国留学的柳亚子女儿柳无垢，以防遗失。柳亚子曾将信交香港《大风》杂志发表，柳无垢也曾将信托陈其瑗在他编辑的纽约华文报纸《先锋报》上发表。后来柳无垢得知郭沫若在日本的住址，便将那张《先锋报》寄给郭沫若。郭沫若于1937年抗战爆发后回国，曾向柳亚子问起该信的原件。后来，陈其瑗也从美国回国，便将自己保存的瞿秋白写的原信交给了郭沫若。

5月 赠送给国民党三十六师少校军医陈炎冰^①1张照片,背面写着:“‘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最后落款:“瞿秋白一九三五年五月摄于汀州狱中”。

初夏 赠给狱中军医陈炎冰3首诗词。3首诗词写在1尺宽、1尺7寸长的宣纸上:

浣溪沙

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 湖海
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

卜算子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梦回

山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
思绕云山。

在狱中还作《无题》和《忆内》两首诗:

无题

斩断尘缘尽六根,自家且了自家身。欲知治国平天下,原有英

^① 陈炎冰,曾留学日本,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后脱党。解放后重新入党。1935年瞿秋白在狱中时,他经常给瞿秋白看病,对瞿秋白十分崇拜,彼此交往甚洽。

雄大圣人。

忆 内

夜思千重恋旧游，他生未卜此生休。行人莫问当年事，海燕飞时独倚楼。

5月底6月初 国民党派一个特务冒充瞿秋白同狱的同情者，来到杨之华的母亲家。说瞿秋白托他捎来两封信，一封是给杨之华的哥哥的，一封是给杨之华的。并再三说，给杨之华的信，瞿秋白要他亲自交给本人。杨之华在上海从偷偷出来的妹妹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出这是敌人施展“钓鱼”的毒计，要妹妹回去，就说不知姐姐的下落，并设法把两封信要到手。她妹妹只拿到瞿秋白给杨的哥哥的信。信的大意是：想来你们已在报上看到了我的事。我要和你们永诀了。之华是我生平的知己，我要留最后的一封信与她永别。可能她已经被捕，你们不知道她的下落。那么，就请你们把信投寄给叶圣陶先生，作为他写小说的材料吧。瞿秋白给杨之华的信是一封很厚的信，特务始终不肯交出来，只在家属面前晃了晃。为了不上敌人的圈套，杨之华只好放弃那封诀别信，宝贵的遗书。^①

6月2日 蒋介石给蒋鼎文发一道密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蒋介石决定杀害瞿秋白是为迎合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的需要。瞿秋白被囚以后，各方纷纷营救。当初，蒋介石惮于民意，不敢遽然加害。但此事被日本获悉，认为瞿秋白是主张抗日的共产党的领袖之一，其声望又高，如果不加杀害，为日后一大隐患。日本便施以“以华制华”的毒计，要挟蒋介石杀害瞿秋白，扬言“蒋久囚瞿某不杀，殆将为他日联共地步。”蒋介石获悉以后，极为恐惧。御用文人戴季陶，则是火上加油，他平日对瞿秋白揭露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64页。

他破坏民族战线的罪恶阴谋一直怀恨在心，因而大肆叫嚷“瞿秋白死有余罪，系狱过久，徒招友邦烦言。”^①于是，蒋介石便密令蒋鼎文杀害瞿秋白。后因陈立夫派人到长汀狱中对瞿秋白劝降，延缓了执刑的时间。^②

6月4日 晨8点，《国闻周报》记者李克长来到长汀狱中，访问瞿秋白。他问了瞿秋白家世、个人经历、党内情况及其狱中生活等20几个问题，瞿秋白一一作了适当的回答。当记者问及左联、鲁迅与共产党的关系时，他说：“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其中共产党员只有四、五人，余人至多不过为同路人而已。关于文艺理论方面，左联有时未问及，即告知以大体轮廓，至于发挥阐述，全由执笔者本人为之。”至于鲁迅，他说：“鲁迅原非党员，伊发表作品，完全出于其个人意志，祇能算为同路人。”巧妙地回答了鲁迅和其他左联的成员与党的关系，保护了他们。记者看了瞿秋白在狱中写的诗词后，又问还有何新作时，瞿秋白就拿出《多余的话》（是在黑布面英文练习本上，用钢笔蓝墨水书写的）给记者看，并说“请先生（记者）帮忙，使之能付印出版”（后未准取出，推脱另写一份）。瞿秋白还向记者表示：“打算再写两本，补充我所想所讲的话，共凑成三部曲，不过有没有时间让我写，那就知道了。”记者访问以后写了一篇访问记，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他访问瞿秋白的全过程，客观地反映了瞿秋白对他的回答。这篇约6千字的访问记录，于1935年7月8日，以《瞿秋白访问记》为题在《国闻周报》第12卷第26期上“公诸国人”。

夏 在狱中拟写一份《未成稿目录》，原文为：

① 参考南田：《瞿秋白先生略传》，巴黎《救国时报》第37期，1936年6月20日。”

② 见铁健：《瞿秋白的被捕和就义》，《人物》，1980年第1期。

《未成稿目录》民廿四夏汀州狱中

〈读者言〉：1. “王凤姐”。2. 张飞与李逵。3. 安公子。
4. 野叟曝言主义。5. “阿Q”。6. “阿Q”以后。7. 酒瓶
问题。8. “不成话”。9. 古汉文。10. 翻译。

〈痕迹〉：1. 环溪。2. 大红名片。3. 父亲的画。4. 娘
娘。5. 宁姐(以上〈家乡〉)。6. 黄先生。7. 出卖真理(以上
〈北平〉)。8. “饿乡”。9. 郭质生(以上〈第一次赴俄〉)。10.
丁玲和他。11. “生命的伴侣”。12. 独伊。13. 误会(以上
〈上海〉)。14. 蓝布袍子。15. 庐山(以上〈武汉〉)。16. 忆
太雷(以上〈一九二七年年底〉)。18. “老爷”。19. 忆景白。
20. 面包问题。21. 夜工(以上〈第二次赴俄〉)。22. 油干火
尽时。23. “做戏”。(以上〈退养时期〉)。24. 那松林的“河
岸”。25. 真君潭(雪峰)。26. 只管唱,不管认。27. 淡淡的
象(以上〈苏区〉)。28. 逃I 29. 饿的研究。30. 不懂的(以上
〈上杭〉)。31. 得其放心矣(〈汀州〉)。^①

6月11日 鲁迅致信曹靖华,认为营救瞿秋白已经无望。他
说:“它兄(指瞿秋白)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②

6月13日或14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派中
统局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和中共叛徒、中统特务陈建中来到长汀,采
用种种欺骗伎俩,软硬兼施,多次对瞿秋白进行劝降活动。国民党
福建省党部秘书、调查室主任钱永健和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中
统局特务朱培璜也参与其事。他们对瞿秋白说:“国民党中央组织
部调查科要设立一个编译局,要你参加工作”;“你如决心生存下

^① 转引自陈铁健:《瞿秋白传》第497页,该书作者注:“原抄件无17”。

^② 《鲁迅全集》第13卷,第148页。

去,不一定叫你作反共工作,可以担任大学教授,……或者作翻译工作,也可以用化名,你不愿作反共工作,保证不要你公开反共。”瞿秋白始终没有丧失自己的革命气节,严词拒绝了敌人的劝降。他回答说:“事实上没有附有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的。……这条件就是让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地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给他们长期带来耻辱和痛苦。”瞿秋白又厉声地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们这样做法很识时务,我情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的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瞿秋白岸然地说:“人爱自己的历史,甚于鸟爱它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历史!”^①

敌人多次劝降不成,转而凶相毕露,以死威逼,对瞿秋白说:“你只有三十几岁,就这样顽固,不愿活下去吗?”瞿秋白毫无畏惧地说:“我瞿秋白纵然一死,又何足哉!”并向敌人宣称:共产主义“总有一天在中国,在全世界成功的”。

敌人劝降活动完全失败。他们不得不承认,“由于瞿秋白先生忠贞不屈,严词拒绝,致无结果而返。”^②

6月15日 瞿秋白再三要求阅报,卫士始押他至“新生活”俱乐部翻阅报章。瞿秋白看到报上刊载关于日寇侵犯我国华北造成民族危机、民不聊生等情况之后,深为忧虑,对凶恶的日本侵略者极为愤恨。^③

6月15日至17日 蒋鼎文、李默庵天天电催三十六师迅速执行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决令^④。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64~165页。

^② 凌宇、吉心的《耿耿丹忠,举世怀仰》,及王杰夫、朱培璜的供词等资料。

^③ 社静、萧三:《瞿秋白同志传》,《烈士传》,苏南新华书店印行,1949年8月。

^④ 陆铁健:《瞿秋白传》,第505页。

6月17日夜，国民党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奉命来到瞿秋白的囚室，有意把蒋介石的处决密令暗示给瞿秋白，以死相逼，阴险地说：“瞿先生最后应再三斟酌，如能回心转意，尚可望蒋公收回成命。”瞿秋白毫无惧色，淡然一笑，断然地说：“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最大的光荣。”①

6月18日清晨8点钟，国民党三十六师特务连连长廖祥光奉师长宋希濂的命令来到囚室，向瞿秋白示以蒋介石的“就地枪决”的电令。瞿秋白正伏案挥毫书写一首绝句（集句）：“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集句下又写了如下文字：“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②瞿秋白在挥毫时，还自言自语道：“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③

9点许，国民党军事法庭宣读枪决令后，瞿秋白被押至长汀中山公园（原名列宁公园）凉亭前拍呈验正身的照片。然后用刑餐。《大公报》记者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瞿秋白至中山公园，全国为之寂静，鸟雀停止呻吟。秋白信步行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④

敌人得意地说：“杀尽了共产党，‘革命’便可成功了。”瞿秋白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66—167页。

② 《长汀通信：瞿秋白毕命纪》，《大公报》，1935年7月5日。

③④ 天津《大公报》，1935年7月5日。

冷笑着回答道：“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没有共产党，革命是不会成功的。”^①瞿秋白用俄语唱着《国际歌》，打破了沉寂的空气。

约10点钟，瞿秋白被刑兵押出中山公园（自始至终未绑），时着黛色布褂子、洁白布短裤、黑色线袜和布鞋，继续用俄语唱《国际歌》，又唱《红军之歌》，缓步走向刑场。在中山公园至刑场约两华里的行程中，手持香烟，视死如归，神色不变，意态极为从容，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口号。路旁的群众目睹此情此景，肃然起敬。瞿秋白走到长汀西门外罗汉岭前养济院附近的一块草坪中间，盘腿而坐，点头微笑地说：“此地很好！”旋即枪声响起，从容就义了。下午4点左右，葬于罗汉岭盘龙岗^②。

瞿秋白就义后，国民党反动派张贴布告，恶毒地进行诬蔑，说什么“凡民十六年以后，各地共匪之行动，悉由该匪唆使，以赣皖闽粤湘鄂豫川等省之生命财产，直接间接受该匪之杀戮焚毁者，不可以数计，其罪大恶极，已不容诛。”还说：“该匪被擒，共匪失其领导，残孽自易肃清。”^③这恰好证明瞿秋白同敌人是誓不两立，不共戴天；同时也从反面证明瞿秋白对中国革命作出重大的贡献，证明瞿秋白对党的事业有重大的影响。

6月18日以后

瞿秋白的殉难，引起广泛的哀痛。在中央苏区，在白区一些地方，以及在世界一些国家，都有追悼和纪念的活动。共产国际代表及共产国际所属支部如安南、日本、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共产党组织和个人都发表了抗议书、声明和悼念文章，严厉地谴责国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67页。

② 曹靖华：《罗汉岭前吊秋白并忆鲁迅先生》。

③ 《福建民报》，1935年7月7日。

民党蒋介石的暴行，沉痛地哀悼瞿秋白。中共中央多次给瞿秋白以很高的评价。

苏联《真理报》很快发表瞿秋白被害的消息。

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指出：“瞿秋白同志……的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巨大损失”，他的“所有行动，是中国人民为社会、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斗争的光辉榜样。”^①

共产国际代表发表悼文，对于瞿秋白被敌人屠杀，表示“衷心哀痛”，悼文说：“我们永远纪念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请你瞑目于地下，我们誓为你复仇。”^②

日本共产党发表悼文说：“瞿秋白的行动可为世界革命英雄的模范。”他们向瞿秋白宣誓：“你所遗留给我们的事业，将由日本和中国的工人共同奋斗以求彻底完成。……你的牺牲，将成为中日两国工人获得革命胜利的指南。”^③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悼文，对瞿秋白被杀害“深表哀悼”，悼文说：他的牺牲，“给予苏维埃中国，给予共产党以严重之损失”，“实是共产国际损失一最好的战斗员”。^④

美国共产党发表悼文，严厉谴责蒋介石的暴行，指出：“其暴行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第117页。《中国共产党史》第5卷，第130页，时事出版社。

②③④ 《民族解放先驱瞿秋白》第32~37页，史社刊行，1940年再版。

必然引起美国工人加强其国际团结的活动，以反对蒋介石的血腥恐怖，以拥护中国红军之反对中国地主与世界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①

瞿秋白牺牲的消息传到上海，瞿秋白生前好友极为悲痛。半月后，鲁迅曾约请茅盾在郑振铎家商定编印瞿秋白遗作的有关事项，决定“由鲁迅负编选的全责”。8月6日，郑振铎依照前日的商定，在家中设便宴，邀集了陈望道、叶圣陶、胡愈之、章锡琛、徐调孚、傅东华等12人聚会，对瞿秋白表示悼念，并就此正式议定编印瞿秋白的遗作。^②10月22日，鲁迅身扶重病，着手编辑瞿秋白遗作《海上述林》（上下两卷）。他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③

① 《民族解放先驱瞿秋白》第32~37页，史社刊行，1940年再版。

② 丁景唐：《记茅盾悼念秋白同志的一首遗诗——兼论茅盾对瞿秋白的崇高评价》，《纪念与研究》（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第7辑，1985年。按：为编印《海上述林》，瞿秋白生前一些好友都捐款资助。当时，郑振铎曾抄列一份为出版《海上述林》认捐资金的名单，名单开：“叶圣陶，十元；徐调孚，十元；章雪村，十元；宋云彬，十元；夏丏尊，十元；王伯祥，五元；丁彦先，五元；以上开明书店，傅东华，十元；吴文祺，十元；以上暨南大学，胡愈之，五十元；以上生活书店转，耿济之，五十元；以上由我转。陈望道，二十元；地址未详。约共捐得二百元，余款由我担任（负担）。”（转引自冒焯焯著：《瞿秋白研究》第223、224页，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

③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58页。按：1935年10月9日，鲁迅亲拟《海上述林上卷出版》消息，称本卷所收文章，“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

1945年4月20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瞿秋白作出评价，指出：“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①

1955年6月18日

在瞿秋白殉难20周年时，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瞿秋白同志遗骨安葬仪式，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在仪式上作了《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进一步评价了瞿秋白，他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的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②

1966年5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发动一场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掀起了“讨瞿”的罪恶活动，以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为所谓“依据”，把他打成“叛徒”，强加上“贪生怕死”、“投降了敌人”、“叛变了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等罪名。后来，又挖坟掘墓，曝骨扬灰。瞿秋白的家属、亲属、生前好友，以及许多有关专家、学者都受到株连，挨批挨斗。瞿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6页。

② 《人民日报》，1985年6月19日。

秋白夫人杨之华被关进监狱，折磨成疾，身患骨癌，出狱三天后，即于1973年10月20日，含冤而死。^①

1980年10月19日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通知说，中央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瞿秋白没有叛变自首，“文化大革命”中，把他诬蔑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中央指出，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中央重申，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瞿秋白同志所作的历史评价是正确的。

1985年6月18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隆重举行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50周年紀念会。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在紀念会上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了瞿秋白革命的一生，指出：“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②

同日，长汀各界人民隆重举行重建瞿秋白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由陆定一书写。纪念碑是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员会和福建省人民政府敬立的。碑文经中共中央审定。碑文记下瞿秋白一生的光辉历程和为中国革命建立的“巨大的功勋”。碑文最后写道：“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整个生命的瞿秋白烈士永垂不朽！”

① 《访问杨之英记录》，1980年12月。

② 《人民日报》，1985年6月19日。

1985年6月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选集》发表了毛泽东于1950年12月31日为筹备出版瞿秋白遗集的题词^①。毛泽东给瞿秋白以极高的评价。他说：瞿秋白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赞扬瞿秋白“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题词最后写道：“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一九九〇年十月竣稿

一九九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改定。

① 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

本书参考资料举要

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有关决议、通告、信函及其他文件。

中共中央早年机关报刊：《新青年》、《向导》、《前锋》、《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斗争》、《红旗周报》等。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

《东方杂志》、《申报》、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新社会》旬刊、《民国日报》、《中国与世界》《北斗》、《文学导报》等。

杨尚昆、陈云、吴玉章、周扬、茅盾、夏衍、陆定一、李维汉、郭沫若、冯雪峰、丁玲、郑振铎、萧三、周建人、王统照、曹靖华、羊牧之、郑超麟、许广平、李伯钊、赵品三、石联星、庄东晓、陈修良、温仰春、杨之华、杨之英、瞿独伊等同志的有关回忆录、讲话及纪念文章。

《民族解放先驱瞿秋白》，史社刊行，1940年再版。

《瞿氏宗谱》，1913年修订本。

冯雪峰著：《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2年8月。

丁景唐著：《学习鲁迅和瞿秋白的作品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59年7月。

丁景唐、文操编：《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59年1月第1版，1959年10月第2版。

丁景唐、陈铁健、王关兴、王铁仙：《瞿秋白研究文选》，天津人

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9月。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出版,1961年5月。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上海召集的学术界关于瞿秋白同志评价问题座谈会纪要(1979年7月10日至11日),未刊。

周红兴著:《瞿秋白诗歌浅释》,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3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3月。

黄美真、姜义华、石源华:《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补遗》,《学术月刊》,1981年第4期。

鲁迅著述中的有关“后记”、“书信”、“日记”等,《鲁迅全集》第7、12、13、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

《忆秋白》编辑小组编:《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8月。

《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6月。

《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6月。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于1985、86、87、88、89年出版。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3卷,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7、88、89年出版。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志》,中共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82年6月。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82年9月。

- 鲁迅博物馆编：《鲁迅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
- 曹子西：《瞿秋白文学活动纪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83年5月修订。
- 马纯古、章蕴等著：《回忆杨之华》，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9月。
- 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9月。
- 朱成甲编：《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上、中，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12月。
- 王铁仙著：《瞿秋白论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2月。
- 王铁仙著：《瞿秋白文学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87年3月。
- 黄美真、石源华、张云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3月。
- 唐纯良著：《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10月。
- 杨之华：《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12月。
- 傅道慧著：《五卅运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85年3月。
- 查国华：《茅盾年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85年3月。
- 王士菁著：《瞿秋白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5月。
- 赵朴：《八七会议与党的改组》，《党史研究》1985年第5期。
- 赵朴：《从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六次大会召开以前的组织状况》，《党史研究》1985年第6期。
- 刘继增、毛磊、袁继成：《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7月。
- 丁守和著：《瞿秋白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

10月。

郑超麟著：《郑超麟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6年1月。

陈铁健著：《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5月。

万树玉：《茅盾年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10月。

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1986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4月。

陈铁健等编：《瞿秋白研究文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1987年12月。

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1988年3月。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上海大事记》，知识出版社出版，1988年8月。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12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89年2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89年3月。

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第1辑，内部印行，1989年。

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第2、3辑，学林出版社分别于1990、1991年出版。

王观泉著：《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4月第1版。

冒斯：《瞿秋白研究》，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6月。

任建树著：《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9月。

罗家伦主编：《国文年谱》。

张国焘著：《我的回忆》，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1973年。

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美国纽约帕拉贡书店出版，1971年。

后 记

瞿秋白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贡献，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牺牲。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样一位功勋卓著、威望很高的中共领袖人物，竟被“四人帮”以他写过《多余的话》为罪名，诬陷为所谓“叛徒”，遭到恶毒的攻击，以至株连到他的亲属、生前好友以及许多有关专家、学者。即使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许多大学编写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或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对瞿秋白的作品仍采取回避的态度；新编的中国语文教学大纲中，也没有一篇瞿秋白的文章；报纸杂志上，也很少出现涉及瞿秋白的评论。”笔者目睹这种状况，深为不平。1979年夏天，读到当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上海召集革命老同志评价瞿秋白的座谈会纪要以后，与其他许多同志一样，胸中激起了对瞿秋白同志的强烈的崇敬之情，对“四人帮”的诬陷诽谤十分愤慨。笔者认为史学工作者对此决不能袖手旁观，而应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宣传和评述瞿秋白革命的、战斗的一生，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瞿秋白应有的历史地位，这是革命的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1979年，陈铁健同志率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重评〈多余的话〉》一文，对《多余的话》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给瞿秋白以公正的评价，肯定了瞿秋白的历史

功绩。笔者在读了《纪要》和陈文之后，得益匪浅，颇多启发，于是不揣鄙陋，决意试编《瞿秋白年谱》，实事求是地反映瞿秋白的生平事迹，如实地记录其不可磨灭的革命功勋。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瞿秋白年谱》于1981年12月完稿。1983年4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瞿秋白幼时挚友、早年秘书羊牧之先生和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分别为《年谱》作序。1985年重版一次。出版以后，虽然受到一些好评，但因当时受到材料搜集及笔者水平的限制，自感内容单薄，对瞿秋白的生平活动、思想发展及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反映得不够全面系统，还有个别不妥之处，亟待补正。

自1981年《瞿秋白年谱》定稿以后，笔者继续搜集材料，进一步研究瞿秋白思想，在初版的基础上，重新编撰。陈旭麓教授生前曾多次鼓励和指导笔者对瞿谱作全面修改和补充。他认为瞿秋白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为其编撰一部有份量的年谱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在这方面，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和好友也给予热情的鼓励。同志们的支持和鼓励，给了笔者以很大的勇气和力量。自1980年10月中共中央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以后，瞿秋白研究蓬勃展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瞿秋白诗文选》、《瞿秋白选集》、新编的《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至6卷和政治理论编第1至3卷陆续出版；同时，一批关于瞿秋白的专著、大量关于瞿秋白的论文，也相继出版和发表。这些都为笔者重编瞿谱提供了有利条件，增强了笔者重编瞿谱的信心。

经过整整十年的苦心耕耘，终于在1991年7月完成了瞿秋白年谱的重编工作。新编的瞿谱，为与初版本相区别，取名《瞿秋白年谱新编》。这本《新编》以初版本为基础，一方面对初版本的少数条目作了订正，大部份条目重新改写；另一方面根据新获资料，增编大量的新条目，并扩大对谱主作品的介绍和评述的内容。《新编》

正文共 30 万字，与初版本相应的正文部份 9 万字相比，增加了两倍多。初版的《谱后》和附录《多余的话》、《瞿秋白研究参考资料索引》，新编不再收入。

本年谱(包括初版和新编)的编写,其主要的依据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有关决议和其他重要文献及瞿秋白的著作,陈云、杨尚昆等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或纪念文章。瞿秋白早年的两位秘书羊牧之先生和郑超麟先生,虽然年迈,但不辞辛劳,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并帮助核实许多史料。丁玲、温仰春、陈旭麓、李践为、缪楚黄、黄玠然、丁景唐、丁守和、陈铁健、瞿独伊、王铁仙、朱成甲、卢权等同志,曾对初版年谱稿本提出了宝贵意见。初版书稿打印本,曾奉寄一册给秋白生前挚友茅盾同志。不久,惊闻茅公仙逝,竟未及赐教与补正,迄今犹深以为憾。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以及常州瞿秋白纪念馆等单位分别提供了有关的档案、图书、资料和照片。本年谱还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许多学者、专家如温济泽、丁景唐、曹子西、王士菁、丁守和、陈铁健、王铁仙、王保林、黄美真、姜义华、石源华、周红兴、唐天然、王观泉、冒焯、王明堂、王关兴、王尔龄、叶心瑜、汤淑敏、孙淑等同志的研究成果。我院暨历史研究所的历任领导陆志仁、张仲礼、卢莹辉、沈以行、方诗铭、唐振常、汤志钧、李华兴、陈崇武、潘光、刘运承等同志都热情给予支持和指导。本所前任常务副所长沈以行同志,曾对初版年谱书稿,多次抱病审阅、修改或提出意见。现任本所名誉所长(原所长)方诗铭同志、主持工作的副所长李华兴同志,不仅热心指导,而且提供了许多研究的方便。热情给予支持帮助者,还有任建树、武克全、熊月之、吴德铎、张子敏、张小鼎、李海文、赵庚林、刘修明、徐元基、周元高、孟彭兴、吴刚、谢玉叶、张金龙、陈祖怀等专家、学者。陈铁健同志不吝珍藏,无私地提供了一些

罕见的新资料。最后尤需说明的是，拙作之出版，蒙丁景唐、王铁仙两位专家的郑重推荐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的大力支持，获得了“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和学林出版社的热心帮助，才得以实现。出版基金评审委员会及丁景唐、王铁仙同志，学林出版社总编辑柳肇瑞同志，分别在审阅、评议过程中，对书稿作了许多重要修改，或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现在借此机会，对上述所有组织和各位先生、各位同志，谨致诚挚的谢意。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和受资料的限制，《瞿秋白年谱新编》仍不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周永祥

1991年9月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